



CONSERVATIVE
CAPITALISM

北京科学出版社

保守
资本
主义

1997年10月

4.80元

作者简介

大卫·雷斯曼，是Surrey 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其主要著作有：《亚当·斯密的社会经济学》、《里查·梯另斯：福利与社会》、《加尔布雷斯与市场资本主义》、《国家与福利》、《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进步与政治学》、《詹姆斯·布坎南的政治经济学》、《集体行为的理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使命》、《保健事业的政治经济学》、《市场与健康》、《克洛斯特德的未来：机会与结果》以及《安东尼·克洛斯特德：混合经济》等。

工作室
DESIGN STUDIO

视觉设计 / 高索康

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保守资本主义

[英] 大卫·雷斯曼 著
吴 敏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Conservative Capitalism

© Macmillan Press LTD, 1999

本书根据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99年版译出

《资本主义研究丛书》出版者的话

资本主义自15世纪初萌发以来，迄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学界一般将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史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母体内孕育、萌生、生育并最终取代封建主义的阶段，为期约300年，即从15世纪初到18世纪中叶的英国产业革命。第二个阶段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为期约150年，即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这个阶段中，随着资本的扩张和产业革命所导致的社会化大机器生产的突飞猛进，资本主义很快在全世界范围内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即是以这个阶段的资本主义为主要研究对象，给后人留下了经典性的理论分析、批判和阐释。第三个阶段是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为期约50年，即从世纪之交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马克思主义学术界，传统上认为列宁对垄断资本主义的界说富有权威性，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第四个阶段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以国家垄断为基本特征的新阶段。此外，有人还认为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开始，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崛起，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更新的垄断后的阶段，但此说在学界见智见仁，争议颇多，有待事态本身的进一步发展和理论上的深化。

不言而喻，作为当今学术研究的对象，人们最为关注的当是同世人关系最为密切和直接的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发展。资本主义的这个新的历史阶段以其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质的飞跃、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动为世人所瞩目。与此相联系，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社会等诸多方面出现了某些毋可否认的新现象和新变革。早在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国际学术界就以“资本主义改变了吗？”为题展开了一场热烈的大讨论。就国际学术界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认识和界说而言，尽管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概括起来大体上可分为四大派。

一种观点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最重大变化在于一般垄断转变为国家垄断，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大调整。这种调整推动了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和生产力的新的质的飞跃。但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实质上仍然是资本主义，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不仅仍然存在，而且十分错综复杂。

另一种观点则把当代资本主义称之为晚期资本主义，其特点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了几种新的质的变化。主要表现为：①剩余价值生产形式的改变；②体现阶级调和的某种准政治的雇佣结构；③政治体制的合法化的日益强化的需要。这些变化的结果是“合理性的危机代替了经济危机”。官僚化的过程正深入国家和社会—文化的一切领域。在这些领域里，传统的控制手段正在被逐步取消或淘汰。权力的行使越来越倾向于依靠各种管理方法、专业化和科学技术。

第三种观点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最重大变化在于企业正在迅速发展成一种以美国传统为基础的新式制度，它将改变整个经济制度，并最终改变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本身，从而形成“新资本主义”。而“新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是民主与自由企业制度的

结合。

第四种观点主要是被称为“未来学家”的部分西方学者的观点。他们认为自由主义思想和科学技术发明导致“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但今天在新技术革命的冲击下，自由资本主义和消费社会面临崩溃，其基本原则正在消失。资本主义的最重要的因素——财产、某些形式的自由、家庭、代议制民主和自由契约制度正趋于解体。一个代替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知识社会”或“第三次浪潮”、“科学社会”已经来临。

不言而喻，上述观点的划分是十分粗略的，每一派观点中由于视角和重点不同，存在着很多差别。这些观点的共同之处是承认现代资本主义在战后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但以什么样的尺度和标准来衡量这样的变化，是否存在从量到质的飞跃，则由于立场、方法、视角，以及政治、社会、经济、历史背景的不同导致了分歧和差异，这是毫不足怪的。应该说，现代资本主义作为我们同时代的社会发展过程，对它的研究完全是开放的。

就中国学术界而言，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研究是相对薄弱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资本主义被看做同社会主义根本对立的制度，是“恶”的代名词，其一切都应该否定。所以，谈不上对它作认真的研究，往往只是从经典著作中引章摘句，削足适履，把极大变化了的现实硬塞进现成的框框里。这种简单化的教条主义名曰捍卫马克思主义，实则同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完全背道而驰。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归根结蒂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也是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的基本路线，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和精髓。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要求我们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善于学习和借鉴他国的经验，其中也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

一些对我们有用的经验。同时，在当代世界中，必须看到社会主义国家也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运动范围之内。尽管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政治和社会生活方面的质的差异，但今日所有的国家都要参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运动。要参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就需要每个参加者都要像资本家那样对待这个市场中的其他参加者，参与合作和竞争。这样的客观需要也要求我们认真研究现代资本主义，以期收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之效。

有位意大利的左派学者在总结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的经验教训时，曾深有感慨地说：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却并不了解它。这一方面说明了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教条主义危害之烈，另一方面也启示我们，现代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发展和运动过程，有其固有的动态性和复杂性。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就必须充分掌握资料，兼听各种不同意见和观点，加以分析、探讨和研究。有比较才有鉴别和科学分析。发扬真正的学术民主，倡导不同学派和观点的争鸣，乃是保障学术发展和繁荣的基本条件。本着上述精神，为了适应社会的迫切需要，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资本主义研究丛书》。这方面的有关著作，无论中外，只要论证有据，资料确凿，言之成理，即使是一家之说，均在本丛书收入之列，以期为我国的研究者和广大读者提供比较完整的参照，来深入了解和认识现代资本主义的面貌及其未来走向。

目 录

汉译本序	1
一、引 言	1
1.1 资本主义	2
1.2 保守主义	6
1.3 保守资本主义	10
二、选 择	16
2.1 工 具理性	18
2.2 无知与不定性	25
2.3 认 知	39
三、归纳的保守主义	50
3.1 从经验中得出推论	52
3.2 心智与预测	65
3.3 有限的理性	73

四、经济与社会	84
4.1 社会视角	86
4.2 习惯与历史	101
4.3 波拉尼	111
五、习 俗	118
5.1 功 能	119
5.2 起 源	125
5.3 合法性	137
六、演化与经济	142
6.1 阿尔钦与弗里德曼	144
6.2 哈耶克	149
6.3 演化与资本主义	161
七、个人与利益	182
7.1 方法论个体主义	185
7.2 规范性整体主义	192
7.3 规范性个体主义	196
八、道德的约束	206
8.1 赠与的本性	208
8.2 社会道德：迪尔凯姆与康德	225
8.3 伦理学和经济学	233

九、结构作为资本	245
9.1 社会资本	246
9.2 社会资本的扩充	252
9.3 非社会资本	278
十、结 论	287
译名对照表	291
后 记	299

汉译本序

是经济的，也是社会的

资本主义；及其市场，关于它们，从亚当·斯密到新古典自由主义学派，我们已经获知了无数的颂词，无论是意识形态上的，还是方法论上的。而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苏东巨变之后中央计划经济被彻底抛弃，私有化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资本主义似乎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高歌猛进之时，大卫·雷斯曼 (David Reisman) 发表的《保守资本主义》发出了另一种声音，显示出作者清醒的头脑和深刻的见解。

从此书中，我们不仅能知悉资本主义能做什么，更能发现资本主义不能做什么；能知悉市场能做什么，更能发现市场不能做什么，并由此知悉社会、习俗、传统、道德等这些非理性的保守主义的因素，这些曾被资本主义的工具理性归入历史的过时货的东西，对于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在作者看来，资本主义为了利润的最大化始终是滚滚向前，从不后顾的。它产生着效率和财富；保守主义则植根于社会的意识形态之中，非常珍视历史和共同的价值，形成了社会持续、稳定的框架。二者的取向不同，视角不同，但保守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的桎梏和障碍，而是资本主义的前提和基础。所谓保守资本主义，就是融历史与未来、理性与感性、个体与集体、确定性与多

样性等为一体的混合的资本主义。作者认为，经过如此修补的资本主义，方可以避免资本主义普遍存在的一个谬误，即不断消解自己的前提和基础，成为自己掘墓人的谬误。

本书的一个根本观点是，人不是经济动物，而是生活在社会的动物。因此分析和考察人及其社会——即使是经济活动中的人及其构成的经济生活——的工具，也应该不仅是工具理性的，也是价值理性的，不仅是演绎的，也是经验的，不仅是还原的，也是有机的，也就是说，总之，不仅是经济的，也是社会的。以经济—社会的视角，作者一一检视了斯密、柏克、马克思、迪尔凯姆、沙克尔、哈耶克、波拉尼以及福山等人的观点。

本书作者，是 **Surrey** 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其主要著作有：《亚当·斯密的社会经济学》；《里查·梯玛斯：福利与社会》；《加尔布雷斯与市场资本主义》；《国家与福利》；《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进步与政治学》；《詹姆斯·布坎南的政治经济学》；《集体行为的理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使命》；《保健事业的政治经济学》，《市场与健康》；《克洛斯拉德的未来：机会与结果》以及《安东尼·克洛斯拉德：混合经济》等。本书的翻译是作者著作的第一次介绍进中国。其中的观点我们不一定都赞成，但我们相信，本书的精当分析对于我们当前正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工作，有着一定的启发意义。

一、引言

资本主义面向未来：它永不停顿，生生不息，锐意进取。在它看来，不断革命才是常态，停滞乃是需要对付的问题。保守主义回望历史：它是社会化的、法统化的、嵌入性的，它依靠社会既定的模式作规范自我的准则，依赖社会公认的标准作构成游戏的规则。保守资本主义是一种混合的经济体制，在同一时刻它既盼望着未来又关注着过去。这种两重性互相并不矛盾，而是不可或缺。一旦连保守主义的外壳都破裂成碎片，沉浸在资本主义美梦中的股民们会被好好地建议出清他们的资产，买把枪自杀了事。

本书研究的对象就是这个两重性和混合性。它的主题是合作关系模式的破裂和维系。它的论题是选择与非选择，拒绝与接受，成就与方针之间的基本互补。它提出，过去的历史必须永远被珍视和尊重，以防它被作为沉没成本（*sunk-costs*）而永远一笔勾销。此是我们的起点，彼亦是我们的起点，我们从此开始是因为我们从彼走来。相反乃相成。下面这段话说得好：“我们需要某东西的原因，在令人吃惊的程度上是源于我们渴望和他人一样，或者不一样；我们想做某事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能，或者不能；我们渴求纯正的友谊，但是同样绝对必要的，我们也需要私密性，甚至孤独；我们喜欢熟识的东西，我们也追求新奇；我们需要安全感，但同时我们也爱冒险”（奈特，1922：30）。上帝降

信于亚当和夏娃真是在冒险。如果他选择了蛇，历史可能就不会如此的反反复复、起起落落了。

引言的第三部分阐释了书名上的那两种精神的意义。第一和第二部分重新建构了若干理想类型，这些理想类型一旦匹配和结合起来，将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当然，并不是所有类型的每一个特征都能与现实世界一一对应。但是，如果不对抽象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和保守主义本身的本质做一些最基本的定义性说明，那么，将两种意识形态混合起来的设想就会行而不远。

1.1 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是一个产权网络。私人个体对于诸如消费品之类的产出和诸如土地和资本之类的非人力的投入，都拥有明确的所有权证。私人个体对他们自身也拥有产权。与奴隶制和封建农奴制相比，自由劳动力已经从那些以身份取代契约并破坏了无前提的利益谈判的地位、等级或出身中解放了出来。

通过占有权和让渡权，所有权得到扩展：相对于前资本主义的所有权可能受到诸如长嗣继承权和限制继承权等习俗的约束不能完全伸张而言，商业是一种具有解放意义的制度，是协议交易占主导地位的结果。市场机制使供需价格（不是实物单位，不是历史劳动的凝结，也不是沿用已久的各种比率）成了比较的基础。它对经济精确性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货币被用作起润滑作用的第三方。作为簿记单位，货币使对交换价值进行定量计算——一种与标准的思想家所提出的定性分析大为不同的境界——成为可能。作为价值的储藏手段，货币是进行跨时的财产投机的前提条件，并宣称此为对不可预知之未来的理性反应。作为交换手段，货币使等价物的让渡比在易货交易体制下进行得更为顺利。相应的，使用货币和市场价值，所有权交易的加权总和

能够有效地建立起来。在历史上第一次，枪炮可以和牛油加在一起构成一个关于异质事物的单一指标。

市场的权威以对人的尊重为先决条件，无此则人所显示的偏好就不享有道德的合法性。在此意义上，资本主义制度可以说表达了对人的信任，自主的个人是他自身利益的最好判断者，无论是在他选择工作和购买商品时，还是在他放弃投票或选择了埃思而不是琼时。资本主义制度依靠因式分解法对选择进行排序，并做出非随机的选择。依靠对分散的、孤立个体的信任，资本主义制度能够使需要变为欲望，并把市场价格作为主体福利的代表。但是，请注意，这些尊重和主权仅仅属于有效需求。无家可归者和没有偿付能力的挨饿者在市场里没有他们的合法权利。并且无疑，电影明星和工厂工人在市场的权利上有着巨大的差异。这里尊重人意味的就是尊重供需关系。接受了这样的程序，却要反对这样的结果，自然就会前后矛盾了。

在资本主义看来，自治的决策者不仅是具有自知之明和自我意识的人，而且是目标取向的、目标明确的和能够节约稀缺资源的人。换言之，纯粹的资本家，就是穆勒意义上的经济人，是一个单向度的动物，“他会毫不动摇地按照以最小量的劳动和物质上的克制获取最大量的必需品、奢侈品和实利的原则行事”（穆勒，1844：144）。作为坚定的单向人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工具理性的标准在一个崇尚效率、以浪费为耻的趋利避险的环境里，呈现为手段与目的的规范。因此，资本主义不仅与人们的选择密不可分。更重要的是，它还因有序的、有效的、实用的，并且解决实际问题的评估成本和收益的方法，而独具特色。诗人可以围绕本能反应和即时冲动建立起自我意象。作为经济人的男男女女其生存环境就严苛得多。希望货币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希望最大化地利用机会赚钱的生产者，都完全不能承受对经验事实的忽视，不能听任情绪的冲动，不能一再地重复放弃。特别是在市场

竞争剧烈的地方，敢于对抗理性的消费者和生产者是在冒空手回家之险。这就是为什么平衡也会有一个最优的逻辑的道理。

不过，资本主义并不仅是比较静态经济学的一部分。资本家的企业是以非人格的利润为目的；追逐利润的无上命令使得不停的逐利成为必需。市场的竞争者意识到，企业家式的警觉，有目标的追寻和延迟满足，能带来较高的回报——而且如果工业巨头严格的自我克制、丰富的创造力和知识创新都比不上对手的红利，等待他的将是破产法庭。要言之，资本主义就是一种盈和亏的制度，它与简单地复制已然的生活方式无关，而是缺一不可地在产品花色、生产流程和组织模式上不断变革，以避免在不进则退的竞争中败北。节俭和谨慎意味着为再投资而储蓄资金，聚敛资本和提高生产力则意味着经济的增长。在马克思主义传统里被支付仅够糊口工资的劳动者，生产了剩余价值，它又被投资于生产，用于扩大供应。所有的消费需求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传统在内，都已证实，没有物质财富的增长，通过需求的扩张而带来的无限增长，很快就会跌入萧条。消费需求只是可持续增长的前提条件。这就是为什么通常物质的进步也会被看做一个道德上的成就之理。基督徒们赞颂圣经。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们在希腊和罗马发现了黄金时代。资本主义则鼓动人们为了进步要勇往直前，不可后望，而它的进步，就是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资本主义是所有权：契约已经设定了各种的权利和义务，不得指望和要求更多的义务。资本主义是市场的：价格信号传递信息，弹性的诱因刺激着流通，决策在无形中被调节了，无须求助于统一的计划。资本主义是个体主义的：有时是冒险家的游戏，有时是谨慎的求稳者，在这分权的制度里，在这个分权的体制里，分散的单位按照谁出钱谁点唱的原则各司其责。资本主义是理性的：事实的根据和解决问题的账目履行着系统的功能，该功能如此重要，根本不能委之于传统的认同、乐天知命、宗教的

虔信或信仰的冲动等次好的技术。资本主义是扩张成性的：企业是拼命提高利润，消费者是希望不断满足他们日渐加大的胃口，而公众意见总的来说则要求国家财富要持续增长。所有权、市场、个体主义、唯理主义、扩张成性——这五个特征界定了资本主义的本质。

时间和地点的变化总是会危及单一的形象。不同的文化在其影响范围内有其独特的传统：因此，与那些把不断跳槽视为具有良好工作成绩的特征而加以欢迎的国家相比，在那些希望通过内部劳动力市场来实现其理想抱负的国家里，劳动力就较少受劳动力价格因素的影响。在亚洲的绝大部分和西方的很多地方，个体主义事实上就是家庭主义，或者扩大了家族主义。同样的文化在它的不同发展阶段上也会产生强度不同的影响：比如，一旦现模经济发展到大型企业以聘用经理替代业主成为总裁时，极富侵略性的谁跑到最后谁倒霉的利己主义竞争，也可以变得在逐利时不那么疯狂和无情。文化是多样的，文化是变化的。但是，就资本主义的五个核心特征而言，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还是有基本稳定而同一的含义。

把资本主义和现代化结合在一起十分诱人——诱人认为有一个从传统主义向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避免的过程；诱人把从农民的农业向现代制造业的转型当作资本主义制度的采用。必须抵制这种诱惑。当然，应该承认，资本主义的特色是经常处于工业和技术的更新换代。即使如此，也不应假定资本主义与增长就是同义语，或者资本主义应对现代化本身的直接后果的大部分负责。

劳动的分工也许是导致异化和个性丧失的一个原因，是人们的自我实现在适应机器节奏的劳动和工作中受到阻碍的一个原因。不过，同样的专门化作为必要的功能甚至也会出现于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社会。非个性化、无名化、孤独、疏远、孤立，这些也许都是货币化、城市化、多元化、剧烈的变迁和科层组织的副

产品。同样，任何把集约化生产的生产率列为比由村社为基础的交往所奠定的社会团结更为重要的经济秩序，都会同样地被共同体放逐。资本主义与现代化常常纠缠在一起；也许二者都应共同地对社会起飞进入工业和服务业模式后的种种极好和极坏负责。不过，二者虽然常常纠缠在一起，但是其差异是很清楚的。资本主义与前现代社会完全不能相容。而现代化，就算没有那五个指示资本主义道路的核心特征，也可能实现。

即使没有资本家选择之间的合作，现代化照样是可能的。不可能的是若采用资本主义制度而同时却没有健全的法治对它作周全的保护。信奉不干涉主义的最小政府，其政府作用在与计划经济相区别的分权经济的诸特性中，如分散经营、弹性汇率、独立核算中，表现得并不清楚。清楚的是加强契约的信度是其不容置疑的工作——同时，政府自身必须受宪法的强力约束，以保护国家财产不被谋私利的政客和公务员侵吞。现代化也并不必然意味着警察化或自由放任。它必然意味的是公正的仲裁。无此，则平等的贸易很容易就陷入霍布斯所言的矛盾和混乱。

1.2 保守主义

保守主义者希望能保存。他们固守现状因为它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抗拒变革因为“一个已知的善不应轻易地因一个未知的更善而被抛弃”。他们强烈倾向于“使用和享受所能获得的东西，而不是希冀和追求别的东西”：“于是，要成为保守主义者，就是要偏好熟悉之物甚于未知之物，已验之物甚于未验之物，事实甚于神秘，实然甚于或然，有限甚于无限，近甚于远，充足甚于有余，实际甚于完美，现时的一笑甚于乌托邦的无边喜乐”（奥克索特，1962：168～169，172）。奥克索特认为，保守主义者乐于现状而不是可能会实现的梦想；严格地尊崇连续性，因为现存的

一切制度都有赖于已建立的牢固的同一性；惧怕变革，除非和直到预期的改良其机会已成熟到足以弥补他们所已知的、预计的、关心的、尊重的、喜爱的东西之损失。通过他们的满足和焦虑，十分清楚，奥克索特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绝少具备适于成为赌客、冒险家、投机家——或者是追求效率的资本主义企业家的气质：“所有的活动，如果其追求的快乐泉源不是来自事业的成功，而是得到亲切熟悉的关系，那么它们就是保守主义者的象征”（奥克索特，1962：178）。

保守主义者希望能保存。他们的理想是目的本身，没有航海图的旅程对他们而言简直就是噩梦。翻译成经济社会学的语言，他们的世界观引致了卡尔·波拉尼的观点，即经济活动本质上是格式塔的一部分，而市场的自发性始终且处处威胁着社会结构：“市场的体制变得越高级，其不能满足一个稳定社会之需求的弱点就会越加暴露”（波拉尼，1977：1）。因此，保守主义者会建议资本家们应仔细研究习俗，以免心怀敌意的极端自由主义者彻底地使社会和经济一样地改变为违背自由市场主义者初衷的反乌托邦社会。

保守主义开始于共同的社会习俗，立基于共同的经验。它的分析单位不是个人而是集体，它论述的对象是宏观社会学而不是微观经济学。在自由和独立之地，它阐扬融合和归属，在私人生活和个人偏好之域，它阐扬遵从和角色。保守主义是关于共同体的——地理上的如地区，职业上的如专业组织和行业协会，包含上的如国家、民族和人民，在通过紧密相连来自我认同的家庭和部族的意义上最为主观。保守主义是关于成员资格的，包括忠诚、顺从以及地位的。保守主义不是享乐主义，不是流通性、实用性或者个人对最大快乐的无餍追逐。恢复约束，保守主义者会说，消费者就不需要用商品来填补内在的空虚。

保守主义是一种在它的社会经济学区里，把整体而不是部分、

组织而不是细胞当作不可化约的实体的世界观。它还不只如此：保守主义者不仅在资本家把骄傲归于“我”的地方呼吁“我们”，他们还感到有必要听取过往前辈的意见，而不仅是今天的参加者的意见。毕竟，正如约翰·格雷所言，我们从先辈继承下的传统，既不是妨碍我们自我实现的镣铐，也不是限制我们自我发展的桎梏，而真正是“使自我得到表达的必要基础”：“我们不像蝴蝶，它们不知道彼此的谱系；我们是有家世和历史的物种，如果我们想确认自己的身份，过去的人（记忆中的）就必须具有权威，他们的生活部分地是自创的叙述，从流传下来的共同生活的版本编制而成”（格雷，1993：125，136）。真理是全体，全体就包括过去。保守主义者的观点是，制度的秩序只能被理解为从静止的画面取下的一个定格。由于相信人类社会不可能轻易地被推进到操纵者所喜欢的图景，保守主义者因而诉诸于习俗、常规、成见、惯例以及习惯的帮助来确保蕴涵于民族记忆里的智慧能传承给全体成员，并代代相传，绵延不绝。

传承下来的传统必定已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单是这个意义上的生存就产生了一个推论：它们一定履行着一定的社会功能，不管多么微弱，以抵抗竞争性的试错法可能引发的潜在灾难。不知对计算来说是最大的障碍。实际上，在这个就连科学家们都不能洞悉和彻悟的不完美的世界，通过重复遭遇的不断重复而在社会事实演化的基础上建立起信任，才可说是真正构成了最为理性的程序。在这种情况下，认同现实明显的比规划现实更合时宜。但是，对一个保守主义者来说，是认同本身而不是其实际的收益更令他们依恋。社会化过程以非个体主义的比较和评估标准对每个公民的自由做出限定。由于已经在社会母体中得到广泛地满足，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习惯于任何别的东西，作为保守主义者的社会主体会逐渐变得把社会压制奉为宝典，而它实际上是人们进行复制和再生产的非理性的、无意识的反应。保守主义

是感情承诺的王国和自律责任的王国。它与店主短斤缺两的生意经完全不同，后者在贪婪的驱使下变得对公共准则漠不关心。

保守主义者赋予共有、存续和公认以特别的价值。因此，保守主义是一种关于协同、忠诚和责任的哲学，而不是求新求变率性自为的哲学。他们对生活方式模式化的强调也扩展到社会结构。保守主义者们（他们坚定的绝对性和亲戚朋友一样不会变化）对扰动社会关系稳定之网的社会流动心存疑虑。为了抵制由要求满足和发展的轻率冲动而起的过于快速的变化，保守主义者寄希望于成熟的领导以捍卫惟一的集体核心，反对无休止的鲁莽行事。保守主义者们强烈地赞成权威和等级制度。他们深深担忧的是奋进不已的精英们没有应付未来隐患的经验，没有日常程序和礼仪方面的训练——以及没有在现存社会结构中的已被确认的基础，这些基础能够抑制社会改革的实验走得太远。

保守主义者把市场嵌入社会整体。在他们看来，政治的卷入原本就如线中之丝。他们在方法论上的综合性产生的一个后果是他们政治经济学实用主义的开放性。自由主义者受他们还原主义的方法论指导，偏爱守夜人式的限制。保守主义者，由于他们对克制和服从有共鸣，虽然与自由主义者们一样担心国家这个利维坦会把市民社会压得粉碎，还是承认政府建设国家的能力。

保守主义者显然对于集中的国家监督怀着复杂的感情。一方面，集权国家不会仅限于强化集权文化的有组织的发言。因此，政府可能会坚持用它垄断的“国教”来统一全国；它会反对把妇女从把儿童培育为公民的家庭角色中解放出来；它会限制进口散布不同政见的报纸，而津贴传播主流意识的出版社。但是，另一方面，强大的国家把推进社会改革看做自己题中应有之意，其剧烈性有时竟与极端放任的自由主义完全一样。这在征用遗产税来打破家族财产世代相系的地方是事实；在学院的神学和国民的宗教让步于要求堕胎自由和离婚自由的地方是事实；在边境控制一

放松就会大量涌入并不打算归化东道国习俗的异文化移民的地方是事实。受其权力有强化功能的吸引，但又摒弃其破坏性，保守主义者对于国家集权的感情显然可谓复杂矣。

有些保守主义者会冒险把斟酌决定权让渡给领导者。另一些保守主义者，不那么放心和乐观，相反会选择对损害的限制和风险值的最小化。谨慎的保守主义者通常会要求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离未相互监督和保持平衡；要求两院制的立法机关和总统选举团；要求 **75%** 以上的通过率和 **30** 岁的法定选举年龄；要求法定条款限定货币发行量，禁止预算赤字。谨慎的保守主义者通常还赞成权力下放（到地区和地方），赞成权力的多元化（国家与联邦、教会、行业组织和其他社会团体的中介协会分享它的权威）。自信的保守主义者，不用说，很少关心如果国家变为一个摧毁性的而不是保存性的利维坦——不论是已经植入还是正在植入社会——会带来什么恶果。

1.3 保守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意味着所有权、市场、个体主义、唯理主义和扩张。保守主义则意味着共享、延续、接受、社会结构和政治嵌入性。在许多方面，两者的取向是大相径庭的。在某些方面，两者的视角是不可调和的。然而，我们发现，它们也经常混合在一起。实际上，不管高效还是低效，爱之还是恨之，保守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混合绝非哲学上的幻想，而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简单的事实。这个社会生活中的简单事实正是本书研究的对象。

本书第二章“选择”和第三章“归纳的资本主义”要说明，从认识论来讲，历史在多大程度上提供了一个参照架构和知识地图。无可否认，尽管自然中心主义宇宙论在它所提供的认识取向已经被历史抛弃了的地方会产生歪曲和误导，但它把现象置于环

境之中进行考察的方法还是颇具魅力。离开赋予世界意义的图式，孤立的观察就了无意义。人们继承下来的观念的棱镜是一种先在的结构，它有利于数据的选择和难题的解决。用这种方式，通过使搜寻得到聚焦，历史塑造了未来。

如果被弃置在充满未经解释的观察现象的世界里又没有罗盘，无家可归的心灵就会沦为焦虑、彷徨，和对未知的本能恐惧的牺牲品。一旦他们想要在这个桀骜不驯的、陌生新世界里开辟出一条道路，理性的选择是应付这个不安全的、无关联世界的工具之一。习俗和惯例则是另外一个工具。探索性的或习得的反应限制了漫无边际的浏览，这种浏览往坏里说导致了绝望，往好里说也使得探索从头开始。保守主义，从认识论意义上讲，以大量的历史记录提供了“尝试——验证”法的选择。当这个选择被比之为新的区间适应的打开的泻洪闸、无限的最大化时，这个选择就有点像烟斗和拖鞋 (**slippers and pipes**) 一样常见。不过，人的精神就是这样；并且熟悉也在效用方面产生大量的效益。

石里克发现，人的精神对现存的禀赋和既定的参照物有着感情上的依恋，它们把人们满意而又确定的事物的参照点和不可逆性强加给每一个新的开始。在此意义上，任何修改总是涉及一个成本，总是被表述为损失，“在维系现状的效用方面。从一个坏的选择转到一个好的选择产生的是‘客观’的收益减去抛弃现状的成本。从一个好的选择转到一个坏的选择产生的是‘客观’的损失加上抛弃现状的损失”（石里克，1998：114）。由于习惯于处在闪光灯下，由于受到令人放心的规则的保护，由于依赖（通过“他人定向的”）他人的赞扬来进行有效的强化，那些“内心只有祖先而没有朋友”（里斯曼，1954：23）的有礼貌的学生，耻于接纳（并取消）判断上的具体错误，对于以工具理性意义上的应然为自己的市场弹性提供动力的资本主义经济来说，心理倾向上的纯粹保守主义者构成了一个现实的问题。也许事实确实如

此——但我们会从这里开始，也从那里开始，但不会从应该所是的地方开始。

第四章“经济和社会”，第五章“传统”，第六章“演化和经济”，第七章“个人与利益”，强调了共享的社会中国民财富的嵌入性，该社会既是当下关系的蜂房，同时又重复上演着一部古老的令人尊敬的脚本。勒普克，一个社会市场经济的大力提倡者，曾经在日内瓦的安全区目睹了纳粹根深蒂固的变态行为，是这样谈论人际的结构，即只能从社会主体和经济主体在镜像中并非不同的而确实是同一张面孔的事实中，才可期望由市场决定价格的交易享有着有机共生所带来的密切关联的好处：“老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把市场经济看为一个自动旋转的自足过程确实是一个重要的错误。它忽视了市场只代表了社会生活的一个狭窄的领域，一个被比它复杂得多的东西包围和挟裹着旋转的领域；在一个更广泛的领域，人们不只是竞争者、生产商、商人、工会会员、持股人、储蓄者和投资者，而且是不能只依靠面包过活的真正的人，是作为他们家庭成员的人、作为邻居的人、作为教会成员的人、作为同事的人、作为社会公民的人，作为有着情感、欲望、理想的有血有肉的生物的人”（勒普克，1944：31~32）。勒普克宣称，经济是生命和鲜血。一旦把它从人类生活中抽象出来，替换到一个虚构的无摩擦的社会真空，它绝不能发芽和长成。

经济是人的——不是荒岛上其资本只是拥有时间和精力和自给自足者，不是只为了追求相互利益的最大化才偶尔聚在一起的圆融自足的谈判者，而是将公认的习俗内在化并复制现存标准的社会化了的个人。这些规则调节着互动过程；它们突出了各种期待；它们解决了不如此则会使人拼得你死我活的利益冲突。当教育者被教育时，社会的塑造过程保证了集团的成员（出于对被排斥和自我形象会被破坏的担心）会考虑到别的参与者，哪怕他

们的个人贪欲在这种方式上被既是舆论的原因又是其结果的公意所限制。规范的秩序显然是对选择进行限制的一个重要后果。甚至那些集各种天然的偏好于一身的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者，据说也认同于流行文化的程式化前的象征，而不只是亚当渴了夏娃饿了这些自源性的需要。此外，塑造和叠加过程还有更深远的后果；它必须处理成员身份本身的可感觉的价值。波拉尼把共同体当作兄弟关系和归属感、内聚力和团结的基础，无此，则在最好情况下也只剩下一个扁平的、破碎的和贫瘠的我。波拉尼赋予自成一体的社会以某种解放的力量，这种力量在极端情况下看起来有着近乎神秘的价值：“发现个体就是发现社会是个体之间的关系……发现个体的灵魂就是发现了共同体……事实上，个性并不外在于共同体”（波拉尼，1935：370）。我之成为我是因为我们是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资本主义，我们的资本主义，都无法不是保守主义。

整体是凌驾于个体之上的，规范是彼此传承的。在此意义上，资本主义经济似乎有剩余物索取者的特性，是自身缺乏最大化特性而对最大化进行限制的各种社会制度的非预期后果。这样得出的结论就是一个不力争上游的和非理性的资本主义；是一张从过去拍摄的现在的照片，但现在显然是随着现实的万花筒而变化着的。作为一个能动的因素，习俗无疑疏导着经济，并保护着一个无须成为自由和竞争性市场的刺激结构。不过习俗也是消极的，是有着自己的动量的并一直进行着的演化的可塑产品。在这样的演化过程中，资本主义经济自身会做出重要的因果关系意义上的贡献。正如马歇尔写到的（他的决定论倾向使人想起了像斯密和马克思这样的社会经济科学家的著作中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纽带）：“即使在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在供需动机的相对位置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以至连原本会把它们带入稳定的平衡的各种价值也与习俗的认可相去甚远之后，没有什么习俗能长久保持它的控

制地位”（马歇尔，1885：170）。如果马歇尔关于互惠的因果关系，特别是关于资本家的贡献是正确的，那么今天的保守主义可能与资本主义，甚至与昨天追逐利益的物质主义那样滞后的但是实用的后果，可能都不会不可调和。

第八章“道德约束”和第九章“作为资本的结构”，提出了关于态度的资本和社会的资本的内在关联的问题。它们确实如此，根据勒普克的诊断，即规范和网络不仅是任何独立的资本主义过程的组成部分，而且也是其前提条件：“市场经济需要一个坚实的框架，我们简要地称之为人类社会学的框架。如果这个框架被打碎了，市场经济就会成为不可能”（勒普克，1944：32）。会成为不可能——勒普克关于缺乏对立面的自由是头怪物的评价令人回想起柏克的论点：传统是理性时代的补充物而不是其知识上的对立面。艾德蒙德·柏克，谴责那些“诡辩者、经济学家以及计算者”，因为他们在1776年的所作所为才导致了1789年的事件。他警告说，自由若变成了肆无忌惮，就必定会以它不受控制的特许权使一个紧密团结的社会变为“一个在基本原则非社会的、野蛮的、联系松弛的一团乱麻”（柏克，1790：170，175）。对此，没有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解放者会认为是好的现象：“除非有一个对意志和欲望加以控制的权力存在，社会不可能生存……人只有对他们的欲望施加适当比例的道德约束，才有资格享受公民自由”（柏克，1791：389）。以适当的比例——柏克对秩序和德行的社会契约的强调，使人想起后来对后列宁主义的自由主义者的担心，他们不能相信1989年后的俄国的赌场式的资本主义就是他们深夜从美国之音中听来的帕累托最优。也许第八章和第九章的人际义务和代际关系就构成了保守主义的反应，即勒普克式的、柏克式的保守主义的反应。这样的反应能使他们缺乏嵌入性的市场经济变得更加诚实、更加具有合作精神的

公共产品。

道德和应然始终是对市场经济的一个支持——如果要问原因，正如格雷指出的，“和别的启蒙计划上的变异一样，自由主义的理论因不可能将理性的道德进行程式化而搁浅”（格雷，1995：9）。在最基本层面上，正是共有价值系统在表达上的象征主义才使契约、选择、竞争、美德和利己等社会事实得到合法化，无此，则自利的逐利行为会与排他和罪恶接下不解之缘。就它赞同企业家精神和冒险精神而言，就它非难条件反射的胆怯和惰性的浪费而言，与其说共同文化是市场个体主义的敌手，不如说它是推动冒险精神引导下的变化的发射台。自我放纵的应然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函数里能成为一种投入。自我克制的应然也复如是。利他主义的规范促进了一系列为陌生人提供的服务，如帮助罪犯的受害人，这若缺乏互惠关系根本就不可能被提供。讲实话的规范促进了异地贸易的效率，口头协议的效率以及分期付款的效率。以这些方式，被神话为普遍期待的承继得来的规范，通过某种对不断向前的资本主义有着彻底了解的保守主义，可以纠正市场的失灵。

与舆论上的应然一样，面对面的互动也复如此。社会网络确定着买者和卖者的位置，并使它们免于无名所带来的短期主义。家庭、地区、长期的顾客以及顾客的顾客——诸如此类的稳定联系给道德上的价值，例如，个人的忠诚与信守承诺，提供了集体的支持。它们不仅通过反复采用熟悉的渠道而产生了激励作用，还减少了商业上的交易成本。信誉成为了一项商业资产。相互认识便利了寻找工作。信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建立起来。信用借款不再遭受忽视。换句话说，他人变成了一种有收益率的资本投资。完全的竞争者是势单力薄的、面容模糊的和非依存性的。社会性的资本家则是可辨识的、嵌入性的和历史性的。并且是保守主义的。

二、选 择

规范是工具理性的：“个体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在于，它是理性化的。这种理性化建立在严格算计的基础之上，并接受远见和谨慎的指导，以便达到自己苦心追求的经济上的成功”（韦伯，1904~1905：76）。生活于非资本主义精神之外的决策者，当他们“按照情感取向，特别是情绪取向”行动时；或者在他们的选择是“传统取向的，经由长期实践而成为一种习惯”的场合；或者在他们的行动，作为一种价值理性，是“某些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意识信仰”的自然流露，“或是其他形式的、完全圆融自足、独立于对任何外部的成功的期待的行为”的场合，就不会发现什么不谐之处，也不会引起什么苦难。那些生活在个体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行动者，则不得不严格按照合算的利润标准来判断自己的行为。

马克斯·韦伯指出，资本主义的方式，就是工具理性的方式，就有目的的经济至上者而言，该方式关涉的必然是以“离散的个人为目的”的成就，是按照“外部世界客体的行为和其他个体的行为做出的预测”，以及为达到主体自身理性所选择的目标而把这些预测作为“条件”和“手段”进行运用（韦伯 1947：115）。罗密欧和朱丽叶行动的基础是激情与爱。中国人习俗的家长制持

久不绝。印度人献身于绝对的价值，毫不考虑得失。资本家作为资本家则采用工具理性的标准。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规范能适应他的需要。

本章的内容就是关于选择的制定。在 2.1 部分，即“工具理性”中，讨论的是以最优化分析的帮助来协调投入与产出意味着什么。其主题是贝克尔的“人的经济学”的变奏：理性的人是这样的，即只有在阅读的价值（对他而言）超过了其妻失眠所损失的价值，他才会夜里躺在床上阅读。（贝克尔，1976：268）。在 2.2 部分，即“无知和不确定性”中，对手段一目的之效能的预见力量提出了疑问。下文引自沙克尔，他毫不害怕承认自己的无知：“在经济学理论中，行为是对环境的理性应对；在真实的生活中，它只是风中摇摆的树叶”（沙克尔，1967：215）。在 2.3 部分，即“认知”中，论述了精神会背叛思想者，而感觉也许并不全是感觉的那样。在众人中，只有威克斯提得牧师是一个接受了计算机可能会有自己的意志的实用主义者：“我们的行为很大一部分是由冲动构成的，还有很大一部分不可思议；当我们反思我们的选择时，我们常会发现根本不合逻辑”（威克斯提得，1920：28）。

如果读者担心证据不足，对心理学有所困惑，他在保守的资本主义里得到的安慰足以使他释然。他寻找的保证会与哈耶克解释他的由看不见的手转移经济利益的观点有很多共同之处：“所有这一切都是可能的，因为我们置身于由经济的、法律的、道德的制度和传统共同构筑的伟大的体系。在体系中，我们通过遵循并非由我们自己制定、我们很难彻底理解的行为准则来安身立命”（哈耶克，1988：14）。是的，我们从未制定过它们，我们也从未理解过它们。由此过去为未来提供背景，为解决问题提供使选择成为可能的限定。

2.1 工具理性

研究市场企业的经济学家一般对此信条深信不疑：“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把自己看为理性的守护者，他人理性的赋予者，社会理性的规范者”（阿罗，1974：16）。一方面，世界存在着敏锐的直觉和迟钝的反应、瞬息万变与持久弥新、生生不息与萧条停滞、奇思怪想与刹那顿悟。另一方面，也存在着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们，相信社会中的行为人可以合理地模式化为目的和手段的仔细量化者。研究市场企业的经济学家对于建立在人具有自我意识的反映能力和审慎而又周密地对待生活的态度之基础上的理论价值深信不疑。有人甚至宣称他们关于人是敏于可能发生的后果的看法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人的行为必然总是理性的……行为的终极目的总是为满足行为人的某些欲望”（米塞斯，1949：19）

米塞斯作了很多普遍性的结论：“选择确定了人的所有决定”（米塞斯1949：20）。生存高于自杀的排序表明了人的愿望及其行动：“活着对人来说是选择的结果，是价值的判定”（米塞斯：1949：19）。一个经过选择的结果——并且一个理性的结果，是这样的：“行为人选、作决定，然后努力达到目的。如果碰到二者不可兼得，他选择其一，放弃其余”（米塞斯，1949：12）。时间、精力和其他资源的稀缺导致了物质上的压力，这就促使人的心智集中在选择上。人可以自由选择懒惰而不是生产，漫不经心而不是富于效率。惟一不能的是选择不选择。甚至对懒惰的选择，在米塞斯看来，也是一种买入最多的懒散而为此仅支付次于最好结果的机会成本的选择。米塞斯确信，人的天性是愿意“按照决定人的生命的宇宙状态来进行自觉调整的”：“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能有意识地调节自己的行为”（米塞斯：1949：11，

17)。米塞斯得出很多目标取向的选择：“人类的行为是充满目的的行为”（米塞斯，1949：11）。正是由于米塞斯把人的行为看为有目的的行为，米塞斯得出了结论认为“现代的主观经济学”已经“使市场价格理论转变成为关于人的选择的一般理论”（米塞斯，1949：3）。经济行为的核心不再是争取物质财富，而是选择、抉择以及工具理性的生存准则。社会行为的核心也同样如此。

这里遵循的逻辑是后边沁主义的，即强调快乐（利益）的最大化和痛苦（支付）的最小化。首先，一个理性的行为者会力求对他选择出的目标进行排序，并定义出区分可选择的候选者的基本距离。然后他会遴选出成本最低的方法，精心构筑最低成本组合，以此来最小化支出和最大化回报。为了最好地利用有限的机会，他会编制计划和程序、细心观察和广泛浏览。他还要考虑间接的后果，权衡现实的机会和未来的选择，尽量收集所有的相关实情，以做出全面的评估。一俟做出选择，他希望自己的选择显示了可传递性和连贯性，以便事后进一步加强模式的稳固。

目标的驱策力从不能用经济至上者的模式来确定：目标始终是绝对价值、情绪和传统的反映，惟一不曾的是工具理性。至于方法的选择，从理论上讲，要开放得多。方法的选择，理论上可以是韦伯所归纳的四种类型的任一类——经济至上者的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当然，还有无条件价值的影响（禁忌、宗教的使命）；情感性的归属（为教会服务，培育了偏爱的血缘联系）；传统的结构（习俗、社会义务）。同样的选择（例如支持工具理性和机械论的清教徒的绝对价值）也可能参照多个精选的规范做出调整：“很难找到具体的事例说明人的行为，特别是社会行为，是单单起因于一个或另一个缘由的”（韦伯，1947：117）。这就是说，与其说资本主义是一个智力游戏，不如说它是一个具有自身动量和规则的经济系统。于真空中抽象出的理想类型在遇到现

实世界的市场竞争和追求成功的挑战后，会迅速让位于工具理性的“应该如此”的约束。作为逐利者的企业和消费者的家庭，仅有有限的自由去爱撒马利安人如爱己，去遵循顽固不化的长老的教诲。选择的方法，从理论上讲，是开放的。但是，在给定的资本主义社会里，选择倾向于集中在说服力足以获取描写和规定象征的规范上。赚钱发财与工具理性具有象征性的联系。体制培养了它所最需要的规范。

无论是市场资本主义，还是经济学的教科书，都以工具理性为经济活动的核心指导方针。格雷·贝克尔走得更远，他认为这也应成为非市场领域的社会理论的要点：“经济学的方法提供了理解人类所有行为的有效统一框架”（贝克尔，1976：14）。与米塞斯一样，贝克尔相信成本与收益的关系，对于广泛的、通常不与价格或影子价格相联系的社会现象，都有着深刻的说明价值。

以此来考察犯罪这一事实：“这里采用的方法遵循的是经济学家对选择进行的常规分析，即假定人之所以犯罪是因为他希望得到的效用超过了他能够通过时间以及其他的资源和活动取得的效用。于是一些人成了罪犯。他们并非在基本的动机上有别于其他人，而是因为他们的支出——收益比异于常人”（贝克尔，1976：46）。人们服从法律并非是因为理所当然，也不是因为是公民的职责。相反，与其他活动一样，它被当作和别的一样的一种经济的交易。以此研究罪犯，他的任务即是对得失进行权衡：他既计算他可能的收益，也顾虑被发现的几率；他还要考虑惩罚的严厉性，考虑被判罚款和入狱的个人损失，考虑风险与收益的调换。若把社会看为一体，选择涉及控制犯罪的最佳数量：社会的决策必须适当平衡，以便一方面能够捉拿罪犯，另一方面也控制积淀到警察、法庭、监狱、检查指纹、监听等上面的成本。增加对犯罪消费者的控制，即是缩减犯罪需求的供应。但加大罪犯付出的成本，也即是加重社会的负担。罪犯们计算着代价，而国

家计算着成本。以此方式，镇压和犯罪的平衡得以出现。

第二个说明企业家成见的例子是婚姻伙伴的行市：“根据经济学的看法，某人之决定结婚是当且仅当他对结婚带来的益处的预期超过了他对保持单身或另外寻求一个更合适的伴侣所带来益处的预期”（贝克尔，1976：10）。一次性选择指向“是否”：在此消费者就要比较支出（对伴侣的追求，法律方面的费用，婚礼的花费）与收益（最特殊的是孩子，因为烹调、清洁、性和友伴并非一定依赖于婚姻），然后做出结婚还是不结婚的选择。分散的选择指向“谁”：竞争的产品按其性能进行分类：“财富、智力、教育、种族、身高、宗教、魅力、年龄”，消费者（或者还有其父母）带着自己的偏好和功用的目的进入市场，既是顾客他们就要尽量广泛地接触和了解，直到“他继续寻求配偶所能预期增加的价值已比不上他花费的时间和其他的成本”（贝克尔，1976：243）。在帕累托意义上，所谓最优即是达到无人感到无论是继续挑选结婚对象还是保持单身会更好些。

第三个说明理性选择的成见的是家庭的规模。孩子们是给父母带来长期精神收益（并且，特别在经济欠发展地区，还是金钱的）的耐用消费品。贝克尔认为，生养每个孩子的价格越低，需求和供应孩子的数量就会越大。避孕法的发明有丰富的内在动力：于是自愿的原则取代了生物性，人们可以决定孩子的数量和间距了。财富的弹性进一步强化了人们选择的自由：“任何替代孩子的东西都谈不上好，但是，差点的替代品可有的是”（贝克尔，1976：177）。美国的例证的确支持贝克尔的福利递增算法。立法限制童工。成倍地延长学龄。私人办学蔚然成风。也就是说，抚养每个孩子的成本增长了。与此同时，家庭的规模减小了。此间相反的关系令贝克尔得出结论，即，从理性选择的假定得出的预期在非市场的社会生活中甚至也是完全正确的。

贝克尔相信，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区别主要不在于其内

容，而在于其分析方法，它在理性选择中蕴涵着相当普遍的工具主义的指向：“我断言经济学的方法强大无比，因为它能够大范围地整合人类的行为”（贝克尔，1976：8）。竞争者如果把工作机会给了黑人他们要付出一定的心理成本，但若种族歧视者在大多数产业中驱逐黑人，他们又在经济上要蒙受损失。吸烟者会缩短寿命，等于慢性自杀，但是他们对获得的享受有一种特别的满意，认为其价值大大超过了他们可能作为交换的潜在损失的健康。在安东尼·唐斯的民主经济学理论里，公民们肯于费心投票是因为他们追求有利的政策：“每个公民都会投票支持他相信会比别的政党提供给他更多利益的政党”（唐斯，1957：36）。学生们，依照詹姆斯的评估经济学，肯于认真尽责，是渴求得到承认：“作为平衡，控制学生的时间和工作以及分数往往招致学生把自己的时间和工作弃之于教师，把从教师那里得来的分数还给教师（科尔曼，1990：136）。交换是处处存在的，对预算的约束是生活的一个事实。——莱尔内·罗宾斯发现它们是“充斥着日常生活的大多数”，不得被称为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罗宾斯，1933：79）。由于坚信人们不会愿意浪费他们拥有的有限天赋，贝克尔对理性选择的解释能力充满信心。

贝克尔统一了行为理论。马克斯·韦伯则假定了一个由四个精选的标准构成的光谱：工具主义的、价值驱动的、情感的、传统的。贝克尔把这四个压缩为一个指向。奥卡姆的剃刀简化了分析。但是，经济学的帝国主义，会导致对复杂性掌握的失败。

由此，关于由价值驱动的行为方面，贝克尔把正确和错误都视同为趣味和偏好。诚实不是康德绝对命令意义上的道德义务，而是清白良心的购入和可资利用的机会有出售。偷窃并不是对社会规范的绝对侵犯，而是出于对成本—收益关系的迅速计算和评估。贝克尔并不是要批评各种义务的道德地位，否认它们是社会规范的黏合剂。他的意思是这些压力可以有效地被解释为在交易

最大化的同质社会体系内的效用筹码。但是，其他人否认规范的约束力可以随边际的变化而变化，或者永恒若屈从于妥协也可称为永恒。相信价值驱动的思想家们指出各种行为存在着质的区别、类的差别，坚持在由结果评估行为和由意图定义成功之间，有着断然的差异：“义务论用来评判一个行为道德性的标准，既不是行为欲达到的结果，也不是行为导致的影响，而是行为履行或忽视了的道德义务”（伊茨奥尼，1988：13）。功利主义关注方法一结果的形态和理智主义的调节。义务论者称颂遵从非我的准则和义务。这两种指向是交替的，是观察世界的不同之窗。它们不能等同。

并且，在有关情感的行为事例中，贝克尔把情感当作追求最大化者产生的众多性格中最少被需求的特质：“爱情以及其他爱慕的情感，例如性爱或与特定之人经常密切的接触，均可视为特定的非市场的家用商品，此分析不容置疑”（贝克尔，1976：233）。很清楚，感情的性质有着近于经济上的交易性：例如，A爱的是B，但他选择了C，因为不具有情感的财产使C在A的眼中成为更好的买入。不甚清楚的是，决策者的这种普遍性质是否也能应用于特殊的、给定的可进行比较和替代的环境中。兄弟捐献肾脏挽救兄弟的生命。善良的撒玛利亚人本能地同情赤贫的被剥夺者。受虐者激于仇恨和冲动干下谋杀。而对自己的嫌恶和不能自控又导致了强迫性暴食。要计算医生为职业的骄傲和手艺人为从艺术的完美中得到愉悦所付出的边际成本十分简单。个中关键就是医生或手艺人原本不必如此小心翼翼地在一——或好像在一——非直觉的、非本能的、非情绪的态度下使他们的选择一一得到重建。非但如此，单只要提议人的热情应被削减至仅剩逻辑的内核就足以遭致人们在道德上的反感。诡辩论者能论证选择配偶不过是一种市场的交易，妻子不过是每年以8.5%的速度折旧到报废的私蓄娼妓。但是人们对于把自己的配偶类比为设备的观

点在道德上感到反感，那在买车时更适用。正如宗教的体验不同于世俗的感觉，因此，可争议地，非理性也可被视为某种与单纯成就取向不同的东西：“显然，一门成熟的社会科学应是能融合理智与情感的”（西蒙，1957：200）。

最后一点，行为在时间积淀下来的传统模子塑造下，容易随大流儿。打上传统印记的行为总是要努力保存已为社会承认和接受了的东西。它们从定义上与轻易搅乱传统生活方式的追求冒险的行为截然不同。如果要使现则保持同一，贝克尔那样的提法就只不过是玩弄言辞，他认为：社会成员对以程序代替结果的交易进行的理性思考可能存在于一个正在迅速现代化的传统社会里，以文化的繁衍为最高目的的传统社会则是排斥社会精神的这种二重性的。如果我们需要的是内聚力和稳定性，我们就不会欢迎这样的计算：当我们承认了象征礼仪之物不可交易的准则时，我们付出了相当于两条鱼的代价。计算者会坚持这样做确实造成了数字上的亏损，他是对的。但是，我们自己，对卖掉自己家族的徽记也许会生活得好点的结果，并不能得到什么意趣。我们会说，我们又不是唯利是图的商人，而是我们自己。我们在此土生土长。这里有我们的谱系、我们的亲朋故旧、我们的自我意象。工具理性，在我们可以进行自由决定的范围内是有效的。但无法解释有弹性的恒常性，即在传统约束的范围内，因既是果，果也是因。

以单一的理性准则统一多样性，无疑低估了价值、情感和传统的解释能量。这并不是要否认与物质富裕相关的指向具有显而易见的魅力，也不是要掩盖通常与解决问题的科学相对立的压迫性宗族制度。理性在规范的领域内不难为自己作辩护和调节。但是，真实的世界是使这样的道德哲学受到无尽挫折的源头。

积极的步骤应是避免从待定的公理出发作逻辑的推导来逆序解释原始的经验材料。经验主义的程序是，观察者既应收集有关

的事实材料，同时又应就其动机和心态做出解释。问题在于如何使主、客观相连接。难道利用他人失误和惰性造成的机会未遂也算是自觉选择不违背生活习俗？也算是不忍兄弟遭到破产的情感冲动？难道人们决定在星期一选择 A 于 B 前却在星期二选择 B 于 A 前就违背了条件的一致性？就是单纯的趣味排序的变化？从行为中显示出的偏好不足以回答这样的问题。观察者需采用韦伯理解心理学的移情方法来深入行为者的内心，来发现行为者自身系附于其中的意义。

使用解释的方法替代经济学家的先验方法具有一个益处，就是违背工具主义的规范，不再成为对理性准则的艰难背离，它可以得到行为者自身希望的非任意模式的解释。然而，就算规范只不过是工具的，要成功地最大化仍然存在着进一步的障碍。这个障碍就是有限信息——它是对为什么大多数采用单一标准的最优化者会待在错误的车站等一辆永远不会到来的列车的最通用的解释。

2.2 无知与不定性

行为者在使他们的方法适应目的时很少能掌握所有的相关信息：他们购物成交，然而他们关于当前价格参数的认识是不完全的、有缺陷的。行为者在对将来作计划时不能预测计划外的结果、不能预测看不见的手从充斥于微观世界的各种狭隘争斗中产生出的不可预知的局面：即将到来的历史成为了一个被发现的过程，作为经济人的男男女女在来不及重新调整他们的步骤时，只能算是明白了他们选择的是什么。行为者决策的基础是个体心理，而个体心理使他们成为不仅是单纯追求最大快乐的机器：偏见、畏惧、希冀、游移不定，他们显示的这些偏好可能符合他们的整个精神构成，但是有异于理性资本主义的工具主义规范。

一方面，有穆斯林的观点，认为事后的结果能相称于理性的预期：“我认为预期，由于告知了是对未来事件的预测，从本质上就是相关经济学理论的预测”（穆斯，1961：316）。另一方面，也存在着本部分怀疑论者发出的不同观点。

(a) 无知

让我们假定一个使搜索集中于所需证据的理论三棱镜。让我们假定一个易于完成和值得参考的数据集。还让我们假定一个输入当前选择输出未来结果的预测模式。给定了这些假设，逻辑的推断就能照亮黑暗。事实得到准确的辨认和正确的占有。结论是正确推理和精确说明的产物。决策过程的每一步骤都和理性主义者希望的完全一样：正确的分析，无限的能力和完全的信息。

假设的世界是一个有效化和自动化的世界，集合和缜密的世界。然而充满日常焦虑的世界却并不太配合命运的主人。有目的的决策者总是希望他们的行为能把理性贯注到某些未来的前景。他们的希望很高，但他们的无知会令他们跌倒。他们要去的是波哥洛，结果却发现到了斯堪索普，因此无劳客观的专家的指点，他们就会明白其对稀缺资源的分配是无效的。受过瓦尔拉斯的拍卖者、反复实验和综合平衡理论训练的经济学家们会把任何对即时最大化以及双边的全知全能的偏离看做分配机制的失败。然而，就像到了斯堪索普的旅行者对自己的估计依然充满同情那样，还是有理由认为一定的无知可能实际上是市场资本主义能够成功的功能性前提。

因此，兰伯顿指出，若拍卖者缺席，只留下不同的竞争者，那就是无知自身保持了竞争过程继续进行：“在真实的世界里，由于充满了不定性，企业要通过找寻市场上刚刚出现的能满足需求的东西来提高利润……因为当需求变得众所周知、稳定而可控制时，不定性就消失了，垄断就成为可能……因此竞争仅仅存在于信息不完全的社会”（兰伯顿，1971：10）。没有无知就没有市

场。这对理性资本主义的支持者来说是个应记住的教训。

正如有着对利益的追逐，也有着对利益的保护：“在一个自由企业经济制度里，对发明活动的支持是通过发明的使用创造了财产所有权来实现的；这条原则若成功实行到精确的程度，就会存在社会对信息利用的不充足”（阿罗，1962：149）。趋利避险者会理性地少投资于工业中新产品和新技术的信息会迅速泄露到其他企业的研究和发展的上。发明的动力来自相称的权利。如果信息的获得付出的成本（相当于拍卖和反复实验的费用）仅仅是总的信息传递费用，经济效益当然会较高。经济效益会更高——除了一件事：“在一个自由企业制度里，发明的获利需要的是资源的非最优化配置”（阿罗，1962：150）。发明一旦公开就成为了一种公共产品。而公共产品在私有部门里很少得到支持。有时是完全得不到支持的。研究和竞争，不可分割与外部效应，都是一个交易的社会购买一定的无知作为保护手段以抵御市场不良表现的理。不应忘记信息自身在经济上是可交易的。即使无知的决策者由于缺乏知识而感到挫败，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即交易取向能帮助他朝所能取得的最佳结果的方向更进一步。考虑斯泰格勒关于价格变化的理论：“价格的离散度是一种现象——并且，真正意义上，是一种计量——对市场里的无知进行测度的现象”（斯泰格勒，1961：62）。斯泰格勒承认，在买卖双方都清楚对方如何做生意的市场里，同样的产品会卖出同样的价格。但是，斯泰格勒有个注脚，提供货样和推销本身要发生经济成本——这种成本，确实，（在个别商品所占家庭收入的比例特别地低或高收入者的检索时间的机会成本特别地高的地方）可能会实际上超过了预期价格的增幅。使用交易定向，斯泰格勒因而建议商业的智者不要根据原则陷入无知或知的纠缠。相反，他建议，他们最好通过按边际收益决定边际成本的比例进行投资组合，就像买入是任何别的收益—成本（return-bearing）的资产那样。

建议很简单。在要支付成本的地方，最优并不意味着是最大。理性选择意味着，以信息替代资源，直到获取额外的信息增量变得不经济。甚至在均衡状态中，买入某些无知，同时放弃某些知识，也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因为在某些时候去获取某些知识得不偿失。

信息具有经济意义上的可交易性。当然它的可交易性还是有所不同——因为，它可能的买和卖，没有标准的单位（一个好的名称，博尔丁建议，用智力“WIT”）来对它进行量化和比较：“为它定价有点困难，因为商品自身的量化有困难。我们可以为印刷品、讲演的时间、报纸定价……但是，知识量度单位的阙如，和也许知识实质上固有的异质性，都使得要为这样的知识设计定价相当困难”（博尔丁，1966：23）。甚至在所有权是明晰的、私有的、排他的地方，也不容易量化体现在商业秘密和专利中的标准知识。除非交易者对公制达成一致，否则很难在价格上取得共识。

知识不仅在量上而且在质上也存在区别。已知还存在着垄断性的竞争、知识的寡头等不透明的缺陷，理性的购买者不得不投入时间、精力、甚至金钱来确认最可靠的供给者。有时要雇佣（技术一点，叫“咨询”）专业咨询师（医生和律师是常见的代理人）来给出查找的重点范围。有时要寻找第二步的，甚至更进一步的意见，一步步地向这种作为有偿保险政策——反对剥削不对称分布的信息和“封闭的信息”——的无尽自我保护推进（威廉姆斯，1975：14）。结果最后，消费者还是不能确定他买到的是关于正确信息的正确信息：“购买者通常不能在有意义的意味上掌握信息的价值；如果，在真正意义上，他的掌握足够测定信息的价值，他会知道信息本身”（阿罗，1963：18）。理论教导人们，消费者会使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现实却教育了人们，通常信息的需求者根本不知道到哪里去找线索。

市场的实况是在任何时候都不是平衡状态，而在动态发展阶段。这意味着在经济变化不断产生新参数的地方，学习曲线朝防卫方面持续增加。对惰性和墙的威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会一劳永逸地免除，而是永远的冲击。知识既是产出又是结果的原因存在着在任何工具理性模型中都有效用的海森伯格原则，就从知识的使用中获得期望的回报而言，它使得买入信息合法化。但是，重要的是，已持有的知识具有精华的时效性，内在的磨损性，易受自我推测和革新变动影响的敏感性。在自然科学里，把“事实”当作某种外在的东西，当作被动地等待独立的观察者发现他们于藏身之处的呆滞的经验主义，还有一定意义，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学里，不能轻易把稳定性和可预见性视为当然。理性的行为者在市场为了得到一点线索，要付出物质的成本获取资料，付出心理的成本与新人合作，付出适应性成本实践他之所学——也可能做了这一切却只是发现市场的真相（**market reality**）接着已逃逸到了一个不同的地方。按回馈作调整，换句话说，就是如同斯泰格勒的最大化条件一样没有固定的位置。更精确地说，它是例如使不自觉的无知成为经济生活的事实的不平衡和意外。

最后讨论的话题关系到与规范的证伪有关的无知。它关系到，特别地，关系到真实世界对信息不足是合理的假设的检验。

精于计算的 **A** 买入十个单位的无知，因为他相信这是成本效益的最大化。道德的 **B** 买入了十个单位的无知，因为他忠实于绝对价值，不容选择。情绪的 **C**，多愁善感又订了婚，买入十个单位的无知，因为这是聚集了全部精力的数量。传统的 **D**，按照常规，因为一种他可能已经，也可能还没有下定决心纠正的拖拖沓沓的适应性而买入了十个单位的无知。直觉的 **E**，易变而又冲动，因为一种喜欢随机作匆忙决定的无条件反射，买入了十个单位的无知。很清楚，即使公正的观察者已经得到了标准单位，要同质化不同的动机也十分困难。**A** 是工具理性。**B** 是价值理

性。C和D是非理性。E是反理性。不过，他们显示的偏好用标准的“非智力”（“witless”）单位来衡量看起来又是绝对一样的。

行为的记录只是模糊的重述。如果有两三个公正的科学家对回报最大化（return-maximising）的行为能达成共识，在理论上就有可能以此为底线对异常情况进行探查。问题在于科学只能辨认那些在已知所有的行为者都出自同一信息集的塑造时其节俭少于工具性观念要求的行为者。没有理由认为，所有被观察的游戏者都必须出自共同的游戏。因而当杰克拒绝以高速铁路亵渎圣洁的幽谷时，他如管理顾问一样理性，而吉尔也如同五角大楼的分析员一样理智，当她检查了家禽的肠道后拒绝宣战。杰克和吉尔选择的资料基础毫无疑问会被两三个公正的科学家描绘为效率不足。但是，事实本身，不应被从它们身上榨出的果汁搞糊涂了。杰克保卫神圣的幽谷是理性的——但他保卫一个他弄错了根本不神圣的山谷则谈不上理性。吉尔检查家禽的肠道是理性的——但她若因为鹰的肠道使她的军队涉险则极不理智。杰克和吉尔在他们需要的信息基础上采取行动。只有在他们的信息基础上他们的选择、评估才能被归入合目的或是错误的。他们行为的记录只是一种模糊的重述。

对汤姆来说，买入不活动作为宁静生活的方式是理性的。买入期货市场投机的兴奋则不明智。对狄克来说拖延变迁定货是明智的，太迅速地修正不平衡状态以致使他的个人账户出现赤字则是不明智的。对哈利来说今天选红明天选蓝是理性的，在他的爱好已经变化时还保持一致则是不明智的。为了检验有关理性的任何假设，很清楚，动员投入理解的移情方法以剖析每一种异于常情的乖离，分解每一个其余情况相同，是非常有意义的。不了解杰克和吉尔处理问题的知识，不了解是什么使得汤姆、狄克和哈利如此地不同，工具理性真有危险变为无意义的同语反复——而无知持有的股票会时时处处成为最优。

(B) 不定性

不管人对于真实的、现存的当前的概述是多么不完全，他对于没有经验过的的未来了解就更不完全。正是因为罩在不确定性之上的帘幕（它甚至厚过罩在无知上的帘幕，这个帘幕盖住了多少存在于此时此地的东西）使得决策者能够保持他们选择的自由：“如果知识是完全的，并且选择的逻辑是完善的、强制的，选择也就消失了；除了刺激和反映，什么也不会留下……如果选择是真实的，那么未来就不是确定的；如果未来是确定的，那就没有选择”（劳思百，1976：5）。根本就没有选择——劳思百强烈认为，很简单，不可能以由完善的先见之明必然要带来的情景决定论来调节市场资本主义的自发的创造性：“被经济学家归于经济主体的理性选择并没有表现出目的推理的迹象；它们是对主体所处环境的程序性反映”（劳思百，1991：1）。无知解放了想像力。预言则关掉了窗子。

当下缺乏拍卖者是模糊的，但至少它已是。未来则更成问题——因为“明天依然还没有产生”：“从人们的决定中将涌现的未来的历史是直到那些决定自身做出以前还不存在的。此时也不知道什么是不存在。”（沙克尔，1972：XI，3）理性的选择是对可靠信息的反应：“只是在无时间的综合平衡的虚构中，理性能独自流行”（沙克尔，1972：96）。企业家的决策是在进取的和幻想的精神之下做出的，是在“变革的、原创的，诗意的创造或变革的”精神下做出的：“除非我们承认了想像力，我们不算拥有了知识”（沙克尔，1972：23，26）。正是由于他对变化环境的理解是一个预期的万花筒、“一些可能性”和“无数的念头”，乔治·沙克尔能得出结论说人类的行为经常是那么事前不可靠，事后不成功：“人的头脑总是要探索、实验、猜测和赌博，并且还总是误导”（沙克尔，1972：76，107，125）。人的头脑不会因对不可预见之事的估计失误而遭责备。很简单，人类行为的本质决定

了人不仅仅是在他们不可控的潮流边上安睡的被动的价格选定者：“人类的事务就存在于制造历史”——并且“在我们制造历史以前，我们不懂得我们制造的历史”。（沙克尔，1967：vi）

新的产品、新的程序、新的进入者、新的机会，都使得对未来规律性的计划很难不冒浪费和损失的危险。不一致性而不是适应的接受性经常成为意外收入的法门：“竞争成功靠的是比对手猜得更准”（劳思百，1976：192）。寡头垄断的相互依赖、产品的分化、商业的策略、博弈基础上的谈判，以及内部组织的协商，都意味着事前的规划必须让位给永恒的不确定性。调查和市场营销成为基于学习的买入和通过劝说而卖出的新行为科学主义的中心。因此，在未来尚处于虚构和不稳定的商业环境里，确实有揭示需求和产生顾客所需要的新费用：“生产成本和销售成本之间的区别只是在信息完善的世界才严格有效。在这个观点里，销售成本就是调查成本……产品的分化是去努力发现、也是努力去修正顾客的喜好；这也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因为顾客经常需要发现与他们自己喜好的功能相联系的部分是什么”（劳思百，1976：185）。消费者在他于媒体上看到打字机的广告之前不知道他还有对打字机的潜在需求。生产商在他已同时投资于设计产品和唤起人们的消费欲之后才知道他的计划能否得到回收。消费者和生产商都明白未来栖息的地方经常不是别处而是人的头脑：“赋值在于期待，而期待在于想像”（沙克尔，1972：8）。我们不能选择现在——太晚了。我们不能选择未来——“除了虚空，未来是什么？”（沙克尔，1972：122）受困于不相干和未知之间，消费者和生产商能对他们的选择有任何的信心真是个奇迹。

顺序和结局还使得对结果的预期进一步复杂化。在一些例子中，一个原初的错误会实际上触发系列从一致的理想出发而不断自我放大的偏离。迄今为止，治疗失业的办法可能是削减工资；但是降低了的工资可能没有被认作市场清算的信号。在短期内，

工人们可能宁愿辞职而不是减薪（量的调整而不是价格的调整），并且可能把放弃的收入看为在找工作上的投资。但是，一人可以如此，所有的人则不能：收入的最初降低（假定为凯恩斯类型的消费功能）转变为消费的开始低落，其他人收入随后的降低被成倍地放大为整个需要的更全面的萎缩，而经过滞留工人们决定接受当初所裁减的工资，却可能发现要重返工作还得接受甚至更大幅的减薪。沟通不足而期待缺乏弹性：根据市场的信号只有在它们被理解时才会发生作用的原则，很显然，艾克塞尔·列均哈弗德，通过拒绝对市场失灵进行僵硬的管制，把凯恩斯理论中的失业视为一种尽其所能发挥作用的微观动力。列均哈弗德建议“在普遍的理论中，我们追求的描述应是过程的，而不是状态的”（列均哈弗德，1971：29）。他毫无怀疑只要市场在一个地方稳定的时间长到感觉足够抓住它，微观经济就能更积极地发挥作用。但是，从本性上，市场是顺续和后果的产物。无限的进步是导致思想相互矛盾的原因，但也是促进物质富裕的原因。不同意不确定性是前提和后果，就不可能保证利益不会在过程中受到侵害。

在凯恩斯的资金市场流动偏好理论的基础上，列均哈弗德建立了关于劳动力市场自愿闲置的解释模型。在两种情况下，决策人都有一个保留价格。在两种情况下，保留价格都有可能是错误的。

如果未来能够被充分地预见，闲置余额就不会被保留。闲置余额（不消费，不借贷）的保留恰好是因为前方有着厚厚的浓雾：“金钱是探索的中介……金钱是销售者获取信息时节约时间的手段”（沙克尔，1972：207）。金钱是一种具有拖延报偿之魅力的资产。它是一种类似保险的资产，一种传递以回报为代价的财富：“我们需要的能使我们与金钱分离的保险费是对我们不安全感的测度”（凯恩斯，1937：116）。利息率是对我们分配给我们的非理性期待的边际评估：“我们对以拥有金钱来积蓄

财富的渴望是测量我们对有关未来的预测和契约不信任程度的晴雨表”（凯恩斯 1937：116）。我们付出机会成本是为了得到无息的贮存。在金钱至少还能保持我们选择的开放性的次优环境下，我们这样做是正确的。

凯恩斯确认在两种情况下，行为者的无知会产生自觉的对闲置余额的需求超过对交易的需求。一种是预防性的动机：“为意外事故需要的突然花费和为不可预见的机会带来的有利购买作准备”（凯恩斯，1926：196）。另一种是投机性的动机，“把目标定在从已知中谋利好过定在未来会产生市场”（凯恩斯 1937：170）。在前一个例子中，决策者没有什么线索。在后一个例子中，他有期待，但没有确定性。一个否认了所有接近频数分布的机会，另一个告知了可能性但不知其产量；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尽力获得现款，因为他们生活在洞穴里：“我们，作为规律，对我们行为任何最直接的后果都只有模糊的观念……对未来我们知道得很少”（凯恩斯，1937：113，115）。

在二者之中，投机有着更为活跃的流动性。但是，不能期待对未来的推测会类似于回顾历史的记录。凯恩斯推断，存在着很大的趋同性，个体之间“在对新事物的反应中相似性远远大于相异性”（凯恩斯，1936：199）。即使如此，凯恩斯认为，还是必定有着一定程度的离散性，这部分是因为不同的人会做出不同的猜测——“兴趣的行情是高度心理性的现象”（凯恩斯，1936：202）——部分是因为投机者真正的收益是来自判断的偏离，以智取胜了大众。用沙克尔的话：“投机者持有特殊的资产是因为他不同意市场对它们的评估”（沙克尔，1972：111）。凯恩斯主义的现金持有者投机于股票的先期跌价是在冒预测的风险，冒估计延期会产生预期回收的风险。也许它会——也许他的直觉会使他倒下。不论是哪种情况，认识论不支持归罪于理性：“知晓未来在语言上是自相矛盾的”。

预测远期后果，不必说，要比预测近期后果更为困难。谈到铁路、铜矿或纺织厂的回报，凯恩斯的意见是“我们对今后十年产量进行估计的知识的基础……实际上很少，有时就没有”：“影响未来的人的决定，不论是个人的还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都不能建立在严格的数学推断上，因为供作此计算的基础是不存在的”（凯恩斯，1936：149~150，162~163）。资本的边际效率是“被决定……于不可控和不顺从的商业世界的心理”。（凯恩斯，1936：317）长期的预测“易于出现突然的修正”。（凯恩斯，1937：114）二十年的利益率完全没人知道，也不可预知：“毫无疑问，没有什么是能形成任何可计算的或然率的科学基础。我们完全不知道”（凯恩斯，1937：114）。商业决策更经常地是“动物精神”（“一种自然的冲动要去行动而不是不行动”）的结果而不是量化的或然率乘以加权平均量化利益的结果”：“是我们内在的行动冲动转动了轮子，以我们理性的本性，选择是要尽可能做出最好的选择，计算哪里是我们所能，但常因我们在突发奇想、情绪或机会上的动机而落后”（凯恩斯，1936：161，163）。企业精神不是消极的推断而是开拓性的首创，“通过优秀的想像力产生另辟蹊径的想像”：“成功最大的秘诀是出其不意”（沙克尔，1972：92，422）。万花筒被晃动了，模型被破碎了，不可想像的被想到了，凯恩斯认为终极状态的接替物最好被想像为非预期的结果，在进入竞争过程前不可预见的结果。他不相信教科书对手段和目的之间良好关系的假定上能够计划出有用的终极状态的替代品，它能清楚自动、不可避免地导致一种独特的和确定的平衡：“未来是可计算的假设导致了一种对行为准则——对行动的需要迫使我们去适应——的错误解释，也导致了对十足的怀疑、不确定、希望和恐惧等隐藏因素的低估”（凯恩斯，1937：122）。关于不确定性，换句话说，就是使如此多的理性成为希望的理性化或盲人骑马。

哈耶克和凯恩斯、沙克尔和劳思百一样，并不准备建立边际效用和边际比率替代品的模型，好像比例是效率最大化的预见自动带来的免费礼物。哈耶克认为，未知作为令人不安的无变化被隐藏起来十分重要。作为核心而不是外围，哈耶克坚持认为，发现分散的和未产生的信息，是实际的经济学家必须对付的基本问题：“社会的经济问题因而不仅是如何分配‘给定’资源的问题——如果‘给定’的意思是指给周密解决了这些“数据”所设置的问题的单个头脑。它更是如何才能确保最好地使用社会每个成员都已知的资源的问题，说到底，谁的相对重要性只有这些个体知道。或者，简单地说，它是一个如何利用知识的问题，这些知识并不是每个人都全知道”（哈耶克，1949：77~78）。

经济学是围绕着一个基本限制的中心建立起来的，即分散的个人只能拥有小部分社会信息。单个的头脑不可能知道选择范围内的所有商品和服务的边际效用与价格的比率。更不可能臆测在处理多个无名的他人过程中的智力活动的片段；预见他们在独特持有的事实和假定引导下做出的计划；推测他们的选择对他们同伴的选择造成的影响，在一个所有的人都同时参与生产相互规定特点的数据而相互影响的真实世界里。对知识进行划分后（一个与划分劳动相同的经济学现象），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解释人们如何学习（他们如何运用逻辑和直觉来赋予社会信号以意义）和如何在媒体上进行交流（他们对媒体的广告反应如何，他们如何解释在他们相关集体中的交往模式）。最重要的是，经济学家必须解释，尽管存在着当事人对于超出他们的直接视野的经济系统知之甚少的限制，原子化的和孤立的个人的分散推理怎样（在缺乏无所不知的协调者、永无过失的教育者和可靠的事实收集者的情况下）产生了相互共存的合理措施。哈耶克受交易机制的吸引因为只有交易程序能够保证对偏颇和特殊进行迅速调节：“谁也不知道谁知道得最多……发现的惟一办法是通过允许每个人进行

尝试和发现他之所能的社会程序”（哈耶克）。如此自由意志论者对自由的、非压制地逐利的要求与经济学家通过同样自由的改进和提高的程序来得到综合加工的信息的追求融合在一起了。

市场联合了不同之物。也刺激了新事物的产生：“在这方面，解决社会经济问题总是一个探索未知的旅程，努力发现比从前干得更好的新方法。只要有任何经济问题需要解决，这个过程就要保持，因为所有的经济问题都产生于没有预见的需要适应的变化”（哈耶克，1949：101）。经济问题起于意外发展、演变失调和揭示了新可能性的、虽在现有条件下进行了实验仍不能验证的调节等带来的后果。新发明、环境灾难、产品的分化、个人的关系和竞争对手的反应——如此这般的不可预见性保证了竞争的资本主义成为“连续的事件”（哈耶克，1949：102）而不是一切事物保持原样的静止平衡状态。游戏开始以前什么是必备知识完全不得知。必备知识必须不断地被企业和契约的自动程序所创造。消费者会买新产品吗？在什么价位？对手在回应市场竞争中会采用什么策略？傲慢的取得控制权的投标人真的已经评估出企业的真实价值高于市场的评估吗？此间的绝望正如冒险家喜欢依据信息安排他的未来，然而进退两难的是除非直到他已经在信息的产生中扮演了自己的角色，他不能获得信息。选择迫在眉睫，而事实还没有来到。

知识是不同的。资本主义意味着变化。结果是没有政府计划的协作行动。受到“人类相互影响的扩展秩序”和通过市场能够统合分散、整合突发事件的吸引，哈耶克为看不到手进行辩护：“亚当·斯密第一个察觉到我们已经偶然发现了超过我们知识和感觉限制的、规范人类经济协作的方法……我们被引导——例如被市场交换的价格系统所引导——要顺应我们知之不多的、会产生意外结果的环境做事。哈耶克说的程序，具有改善个人计划的地方主义的空间和远见。也许它是；但是对偶然和意外的强调

会成为目的选择论的理论家们对所有这些改善担心的一个原因。人提出理想：他克服他的依赖性，利用工具理性进行预测和控制。市场进行调节和列序：自由的企业把精心计算与不可计算缝合起来，并且用“出乎意料的结果”酬劳利润的追逐者（斯密，1776：I，477）。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目的选择显然意味着行为要尽可能理性，但也接受市场的价格是永远出人意料。

哈耶克对新古典主义的过分自信持批评态度：“基本问题的特性已经……被最近的许多精致的经济学理论弄模糊了而不是阐明了，特别是数学的滥用”（哈耶克，1949：78）。凯恩斯也持相同观点：“事实上我们对未来的知识是波动的、模糊的和不确定的，提供财富并不是古典经济学理论方法的长项”（凯恩斯，1937：113）。沙克尔也是如此：“经济学不可能成为一门计算结果的精确科学。它的本性是成为批判性的想像的题材，本质上适合文字从书面表达的题材，如同它自己的历史一样”（沙克尔，1967：VI）。劳思百也是如此：“实际上，竞争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状态……竞争是对无知的正确反应”（劳思百，1976：190，192）。四位持不确定性观点的理论家没有任何一位达到无政府主义的程度以至建议把抑制经济学当作经济学的信条，但是，这四位激进的主观主义者，都劝告概念化的主流应贴近实际上还知之甚少的经济生活的现实来定位。

在他们的观点中特别引人误会的是综合平衡的取向。所传达出的图像是一种前定和谐的选择、即时的决定、普遍的永恒和静止的状态。它们整齐，易受数学符号的影响，问题是没有选择就没有变化——没有企业精神就没有企业盈利——在这个模式中。首创精神，的确，实际上是对形成母体永冻层的机能障碍，对平衡状态确定性自身的威胁。在设定的情节中企业是被动地适应价格信号。在真实的世界中，企业倾向于一种不同的精神：在被模式称为机器人的地方他们是背离常规者，他们较少涉及对稀有资

料的固定财富的有效分配，而与谋略和野心联系紧密。

真实世界里的产品有非标准化的趋势：对手的反应取代了完全竞争，为利益而讨价还价取代了寻求独特的解决之道，最优化失去了机械的自动性，而在早期这正是物理学的规律吸引经济学家的方面。最大化与多样化一样成问题：只有在效用的定义宽泛到同语反复，微分学才被允许应用到描述消费者的选择，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大企业部门的盈利和生产者的经理主义和技术主义目标。当面临选择时刻而参数还不知道的时候，理性最好有一定的限制：今天的边际成本不能与明天的边际收益作比较，无变化不能真实地假设出漫长的一生的投资利益，在未来的现实是动态过程的地方，决策总是一种推测。如果给定未知，给定不确定性，就有一定的吸引力以经济学教科书的先验推理支持一种更谨慎的、更实证的方法，它视野广阔，不期待工具理性必然地成为规范。

2.3 认 知

掌握了事实，就可以假定理性个人的反应犹如被无偏见的计算机所引导：“每个人都多多少少地同意理性的行为就意味着秩序良好的功能，例如效用或盈利的功能，得到连贯的最大化”（贝克尔，1976：153）。问题是在真实的世界里，不是所有的个人在他们的行事中都能从他们掌握的信息中榨出最大的收益。理性的选择预设了理性的主体。但是，人的心理比在形式的真空中连贯地最大化稍微要复杂些。感觉和解释始终处处是横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工具效率之前的巨大障碍。本来只要提供的原始数据是排秩前的、选辑前的和包装前的，由认知的变形导致的失误就会大量减少。由于事情是立足于市场经济，原始材料并不是未经处理，大量提供的；并且人的心理有着把内在的潜力转化为行动基础的任务。这个任务就不是人的头脑经数学抽象形成独立的客观

性就可能完成的，而是一种依然有待于想理解在复杂真实的世界里经济系统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社会科学家作正确理解的智力上的努力，而这个世界对工具理性的契合并不高于多维复杂的人的头脑所提出的别的取向。

考虑一下在期待与结果之间出现了不一致会出现什么情况。矛盾（不和谐）会成为心理不适的一个原因，并在此情况下成为被折磨者尽力想减少的一种刺激：“不和谐所起作用正如驱使的、需求的或紧张的状态起的作用一样。不和谐的存在引起改变它的行为正如，例如，饥饿的存在引起改变饥饿的行为一样”（菲斯丁格，1957：18）。有些人对不一致的容忍能力很差，而有的人能接受相当的不平衡。但是，特别地，在选择被行为者视为意义非凡的地方——在，例如，买的是辆汽车而不是条肥皂——为了使所信和结果得到更接近的一致而有所行动就成为像菲斯丁格那样的心理学家的论点。

一种情况涉及削弱不愉快回馈的行为调整。如此吸烟者看到吸烟对他健康的威胁会放弃这个嗜好，而宅主的自我形象与他所住街区的特性不符他会搬到更合意的街区。另一种情况涉及对意见的修正，直到一些新的感觉和价值使行为模式生效因而能被保留下来不用改变。吸烟者通过戒烟会导致体重增加、同样不利于健康的推理使他的选择合理化。没有葡萄的狐狸让自己相信它从不喜欢酸葡萄，将之从它的实用设置中驱逐出去。种族主义者寻找强化他观点的新闻报纸，联系在他偏见上相互支持的同辈。如果人们准备听从已存的参考体系，他们就不感到需要新观点和事实来改变他们的行为以与事实保持一致。关键是他们并不想改变。第一种情况里的行为水平上的保守主义与对观念的保守有关，他们对认知差异的反应是努力保持一种连续性。

两种情况都把非理性的不可改变性嵌入了资本主义体系。在第一例中，一投资者会担心发生可能性极低的大地震而不计回报

地转移财产。在第二例中，另一住在已知洪水会泛滥的平原上的居民拒绝买保险，因为他已使自己相信他不会遭遇统计学的生活。不论是投资者还是居住者都偏离了在米塞斯和贝克尔的世界观里计算成本和收益的理性人的模式。他们的意向不是像使他们的不便最小化一样使他们的回报最大化。危险的是，人们可能说保守主义对事实和概率的方法，虽然是偏颇的、有选择的和非科学的，但确实是对诸如本身对消费者就是有效资源的传统和想像的完全理性的购入。在此意义上，人们被意外的误导并不比被计划产生的误导多：“如果人们相信某些东西胜过真实，他们通过他们的选择来这样做”（阿克洛夫和狄更斯，1982：143）。即使如此，拒绝适应变化的环境或修订“不正确”的信念，其经济后果将与由未预料到的无知和偶然的错误所导致的选择一样：妨碍了进步，没有效率。

人们从否认他们犯了错误中得到效用，但是，当人们事后发现，他们的期待与可指望的现实不同时，人们失去效用。妄想“不会发生在我身上”而对可能的担心打折扣的罪犯结局进了监狱。期待上帝会保佑一切的狂信者会被他的信仰出卖，当他与蛇同舞，被蛇所咬时。上述任一例都不能说对工具理性的拒绝导致的状态是采用非逻辑过滤器的决策者本意所愿。买心理上的再保险，决策者也是在买一个与他所愿不同的真实世界的目标。

罪犯和狂信者都以他们知道错误为结局。但是，在别的事例中，去波哥那的决策者决不会知道反而去了斯堪特霍普意味着什么。像这样信念的“不正确”很难被辨别的一个例子是消费者只读他喜爱产品的广告。虽然这也成功地排除了认知差异的不和谐，如此保守的态度错过了会更好满足他需要的别的品牌。另一个不能辨别信念“不正确”的事例是咖啡馆，像爱尔斯特描述的咖啡馆那样，最先是好产品卖好价钱，然后，价仍然高高的，偷偷地质量下滑：“故事的曲折是，由于认知不一致的减弱，没有

人体验到任何主观的损失。他们想，付的价钱越高，质量就越好”（爱尔斯特，1989：27）。从前它曾很好，现在它并不是很好了。在他们拒绝注意咖啡味道的差异中，存在着一个帕累托改良的萌芽：“店主获更多的利而顾客也感到高兴”（爱尔斯特，1989：27）。罪犯和狂信者事后发现他们的感觉背叛了他们。盲目乐观者，在另一方面，是他一直竭力要隐藏、无视和搪塞的认知不一致的牺牲品。

阿克洛夫和狄更斯举了一个从事危险但工资很高的职业的工人选择说服自己工作很安全的信息的例子。一方面是预计会符合，另一方面是实际的不一致——阿克洛夫和狄更斯以经济学的推理表明，越过一些阈限水平，自我欺骗的冒险者最后会不得不承认，是他们的幻想把不可承受的威胁投注到他们的生命：“相信工作是安全的其代价是在选择什么是安全的工作时出错的概率。工人按收益是否大于成本或反过来选择他的信条。如果在特殊的活动中压抑害怕的心理带来的收益大于事故几率增高带来的成本，这个工人就会相信活动是安全的。否则他就会相信是不安全的”（阿克洛夫，狄更斯，1982：125）。一旦事故的经验高于不行为的阈限，工人们变得更有弹性，会采纳新的信条，即最好遵循可观察到的事物的状态。但是，低于决定性的阻挡，工人们会继续显示他们有意形成的偏好，这些偏好没有足够的资料来源，虽然实际上他们都完全可以获取。当然，他们的鸵鸟一样的乐观（类似于马克思主义者用来解释宗教的自我麻醉的鸦片）必然会有任何别的没有太大的外部效应的生活方式所具有的同样的忍耐力。但是，不太清楚的是，是否理性的政策制定者应对在维护错误地知觉现状中所显示出的故意的错误采取民主的干涉主义。如果公民们非理性地忽视了反对现实的危险，民主国家是应该对这些公民们的妄想立法划出一些人行通道来，还是应代之以依靠统计的事实作他们独立的顾问？非理性认知的哲学地位很清

楚是必须由提倡按人们所是来对待人们的民主的个体主义必须解决的中心问题之一。

心理学实验证明，笼罩着未知的面纱作预测，主体并不一定收集各种计算出来的可能性。心理学证据支持，由表象得出的评估，不是对客体现实的镜像反映，实际上是歪曲和误会，以及“严重的和系统的错误”的中心场所（卡恩曼和柴维斯基，1973：48）。认知过程中偏见是常见的。从研究中得出的一个推论是，对理性选择普遍性的假设是草率得出的不可能充分得到证实的结论。

偏见的第一个来源涉及表征对人的判断所具有的启发性。在决定客体 A 是否事实上属于 B 类的过程中，人们在察觉的相似性的基础上评估 A 是 B 的一部分的可能性。寻找的是内涵之间的距离；但仍有可能在负责地细查足够的显著特性之前就被直觉打断。“法国女人”这个词唤起的是一个年轻的、优雅的巴黎人的意象。统计上的法国女人则人到中年，乡里乡气。

通过表征作预测，人们倾向于墨守成规而忽视了对分类有一定影响的变化整个范围。在一项研究中主体被告知“斯蒂芬”是温顺的、整洁的、乐于助人的以及热爱秩序的，他们就会猜测他的职业是“图书工作人员”：事实上，在农村社会，他是农夫的几率更高（柴维斯基和卡恩曼，1974：5）。在另一项研究中主体被告知“汤姆”在学校对数字很擅长，他们会推断他可能接受计算机而不是人文的研究生教育：他们忘了汤姆可能从进校后已经发生了变化，忘了那时他的个人一素描像可能还未完成，忘了人文科学里高一级的抽象数字与汤姆自己的目标有着统计的连锁关系（卡恩曼和柴维斯基，1973：49~51）。人们易于对样本的性质和大小不够敏感，人们易于在对特征作细分的基础上作概括。有时人们是正确的，但另外的时候他们的主观判断会把他们引入歧途。问题不是（或不仅是）信息不足。问题出在透镜、三

棱镜和单凭经验得出的方法。

N.D. 温斯顿领导的实证研究（大部分是大学生）很好地说明了在感觉的定位和统计的概率之间的不一致。面对消极的结果（酗酒、离婚、犯罪、疾病、失业）的样本和积极的事物（享受健康、拥有自己的住房、出境旅游、活过 80 岁），主体被要求评估他们自己与赌注的平均值相联系的机会。结果强烈地表明存在着认知的偏见和不现实的预期：“学生们易于相信他们会比同辈们更多地经历积极的事件，较少地经历消极结果”（温斯顿，1980：818）。后果越是不愉快，越有相信自己坚强的倾向（主体由于忽视公认的安全防范而冒险的一个理由）。发生的越有吸引力，相信自己的机会大于平均水平的倾向（不管每一个参与者都成功地在同一队列中插队在数学上的不可能性）越强。夸大的乐观，抑制的悲观是动机的和知觉的因素同时作用的结果：虽担心着最坏的结果，但总想望着最好，人们使用表征判断法的方式是使自己处于比独立的归纳所认为适合的地位要更有吸引力的地位。人们实际上过高估计了依照他们的优点突出的特征而有选择地删去了危及他们自信的危险因素。在他们的不合逻辑中也有一种逻辑。但，不是工具理性：缺少对癌症的保护，不写遗嘱，不系安全带，不戴曲棍球的头盔，他们显示出他们的偏好实际上立足于他们没有权力称为自己的表征之上。

系统错误的更深远的一个来源是由有效性所激起的评估。联想的距离，会显得，与实测的频率不一样。感觉到的可能性，会显得，与回忆的容易度紧密相连：“有一个普遍的经验，就是当人们看见汽车在路边倾覆时，交通事故发生的主观可能性就有可能暂时升高”（柴维斯基和卡恩曼，1974：11）。人到中年的同僚最近爆发的心脏病导致他个人获知要降低对他生命的期待值。可观的股票市场的崩溃和宣传很好的企业的倒闭都驱使储户把钱存回银行。空难的电视记录片使得人们立刻对灾难的体验引动想

像。上述三个例子都是突发的事件，带着生动的追忆，在心中引起过分沉重的结局。其结果是引起在后来的检验中证明是非理性的行为，如果不算是反理性的话。中年人买比实际受欢迎的要多的人寿保险。采取使风险最大值达到极小策略的投资者放弃资本回报而追逐小额的利率、吓坏了的乘客重回路面交通，其实其死亡率超过了飞行。上述的每一个社会行为者的产品最后都以迥异于他头脑清醒时所遵从的工具理性的客观规范所得出的结果而告终。但是，头脑驱策他以联想的力量作为频率的判断——判断力的下滑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

映象来自过去，行动是在当前。在这个意义上有效性，像表征一样，是一个保守的过滤器。大多数单词以辅音开始，在研究中大多数主体系统地忘掉了辅音 **K**、**L**、**N**、**R** 和 **V** 在别的位置也能出现的发现：“五个字母中的每一个都在第一位置更经常地比在第三位置为大多数主体所辨别……在 **152** 个主体中，**105** 个主体更多地在第一位置确认大多数这些字母。尽管事实上这些字母更经常地出现在第三位置，得到的还是如此结果”（柴维斯基和卡恩曼，**1973: 167**）。新的信息可能，当然，能刺激心智越出旧辙。这种看法是支持反对烟草的宣传战的观点，据说，或支持伴随产品开发进行资料宣传的观点，或支持多次重复会操纵听众接受的观点：“一个人过去越容易招致特定观点的影响，越容易从记忆中招回对它的回忆，因而，对它知觉的有效性越高”（库兰，**1995: 166**）。但是，完全可能，心灵在熟悉的事物中会感到最自在是真的——同样辅音会被系统地指派到它们并不占优势的位置。

关于作为保守主义的启发法的有效性，柴维斯基和卡恩曼的论述如下：“强迫背景下的产品很可能对未来的思想产生强迫。有很多证据显示，一旦一个尚不确定的情景被以特殊的方式感觉或解释，就很难用其他的方式看待它……因而，一种特殊情景的产生可能会抑制其他情景的出现，特别是那些会导致不同结果的

情景”（柴维斯基和卡恩曼，1973：178）。人们可以认为竞争的零售商工作的采购专家的职业生涯会大大缩短，如果他们的认知过程像那些被误导的调查对象一样是次优的，这些调查对象因为女性在抽样中不成比例地知名就认为 50 - 50 的样本中女性的比例失当。即使如此，智力屏障的保守主义偏见很清楚地对在人们自己作决策的经济系统中存在着理性的假定提出了疑问。

同样的保守主义在抛锚的地心引力中能够被认出。第一印象很难改变。这是事例、顺序、结果和议程成为它们自己认知偏见的原因。

数字从 1 到 8 的乘积是 40320。在一项研究中报出的猜想其范围从 512 到 2250（柴维斯基和卡恩曼，1973：170~171）。研究揭示支持精神偏见的前提是第一印象。如此相当不正确的结果可能意味着主体受到所涉数字低值（1, 2 或者，往后，8, 7）不恰当的影响：他们在此方式中忘记了乘法是阶乘，乘积以一直增长的比率增长。又，偏见的方向与给予参试者的开始的数字有直接的关联。要求猜测乘积的主体，给出的开始数字是 1，其相应记录的值就比从 8 开始以相反顺序告知数字的主体所猜出的值要低。逻辑地说，主体应该能够认识到数字从 1 到 8 的乘积应等于数字从 8 到 1 的乘积。由于他们以最早遇到的数字的值不适当地判断结果，他们没有做到这一点。从他们的错误中，最好建议找工作者在第一次见工时，穿上他的最好的西装。

接近外部现实的非理性方法也可在确定后果的明显的不对称性中被认出。从数学上说，一个确定能挽救 200 条生命的医学计划等值于 600 条生命三分之一的机会能被挽救，其三分之二的机会要丧失。从数学上说，两个假设的计划可以说挽救了同样数量的生命。但从主观上看，实验中的数据在样本心目中完全不等值：“确定能挽救 200 条生命的前景比具有相等期望值的风险前景，也就是，三分之一的机会挽救 600 条生命，更有吸引力”

(柴维斯基和卡恩曼, 1981: 435)。柴维斯基和卡恩曼在他们的研究中发现, 72%的被调查者选择保险的回报, 而只有28%的人选择了有可能挽救600条生命但同时伴有600人丧命的可能。样本中的被调查者, 压倒多数地反对冒险, 表示200确定能被挽救的生命不应置于危险中, 即使更多的400条生命——可能的生命——将得到挽救, 如果赌博成功。从数学上看, 两组生命从数字上是相同的。但是, 就感到满意而言, 它们显然不同。

把确定的价值置于可能的结果之上是追求实用的选择。这个选择在某种意义上明确地就是理性的选择: 个人把候选的计划排队是要努力挑出他们观念中最好的特有一组。这个选择, 另一方面, 其非理性强烈到选择与个人哲学紧密联系在一起。正由于没有过硬的科学优越性上的根据在手, 因此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以400人的代价挽救200人不是价值上的一种负担。等级的顺序, 事实上, 在相信确定的后果是坏而不是好时情况会得到改变。原来责备400计划而赞成200计划的被调查者也说如果确定性是死亡而不是生存, 他们会把可能性置于确定性之上。结果明显地不对称: 被调查者表现出他们宁愿在同样的数值期待上选择确定的收益而不是更高的彩头。——但是若关联到确定的损失他们很适应从保险的策略转换到冒险的策略。当面对着众多的被完全告知后果的决策者, 而这些决策者在以不同的方式提供同样的选择时呈现出不同的喜好, 理性选择的理论家不可能要求一致性和传递性。选择的拟订、事实的编排, 导致了对前景的重新估价。感觉改变了, 风险没有变。

卡恩曼和柴维斯基如下描述获得性的棘轮^①: “对福利变化的看法中突出的特征是损失比所获显得严重。人们在丢失一定数

① 棘轮, 一种有齿之轮, 装有一楔子, 用以防止轮子回滑。这里意指不可逆性——译者注。

量的金钱中体验到的恼恨显得比与赚取同量金钱相联的快乐要大”（卡恩曼和柴维斯基，1979：279）。他们的陈述提供了确定的效应（它与把保险第一原则置于投机之上有关）与天赋的效应（它与非理性对现状的永久性的承诺有关）之间的桥梁。从心理学上说，获得与放弃是不一样的。买是加强心理的满意。卖是体验心理离别的痛苦。在讨价还价的经济人的实用功能中补偿的行为很明显不是相等的而是对立的。对立是当然，且当然不平等；补偿经济损失的裁决因而把补偿的价值置于相同的买入价之上，以保证在心理健康的水平上不会感到有不公正的减缩。

愿意被赔付以解决问题表明解决矛盾的倾向比获得的愿望要强烈。所有的调查“一致发现人们说他们要索取比付给保持同样的权利更大笔的金额才放弃他们的使用权和获取资源的权利”（纳奇和辛登，1984：508）。不相等的一个例子（在此例中，4：1）是由北美猎鸭者提出的数字：他们告诉调查者他们每人最多愿付247美元维护湿地，但最少要1044美元才同意转让（纳奇和辛登，同前）。有时探察假定的估值，有时追寻真实世界的谈判，证据表明确实存在着一种心理倾向，它把任何对现有分配的侵害都看得比增长要重。不相干的曲线能够相交。而同一颗敏感的心其地位由需求者转换为供应者时，市场的清盘价价格不必保持不变。

不相称性也许反映了精神的不安全感，它害怕任何所属物与之分离。它也许表现出一种弗洛伊德型的固执，即在便秘中找到它的生物表达，在吝啬中找到它的经济学表达。不情愿与财产分离而反对冒险也许正是一种深思熟虑，以避免随后的后悔。也可能正是某种自我保持的本能才使人的心智能够免于非生产性耗费，除非它证明自己有所努力和计算的需要。主观主义者，像伯纳尔德、马歇尔、弗里德曼和沙维基，他们会认为资金边际效用的递减必然总是使从赚取中感到的满意度低于从等量的丢失中感

到的不满。不管原因何在，这些实验证实存在着保守主义的偏见。这个偏见驱使人们依据实际上是非理性的普遍惯性来重新评价市场理论。

享有无效退款保证的消费者看来并不愿意在试用的后期放弃商品：交回他们所已经拥有的商品（并且这与包装和运输的交易成本无关）被他们视为损失财产和承认错误。购票者参加他们付钱的所有项目，即使在此期间他们已改变了他们的愿望：因为不愿浪费他们的积淀资本，没有把评估集中在仍处于他们的控制范围内的增量成本，因此什么像过去的已经永远过去了的理性的格言都扔在了脑后，真正的钱坏了也不应该扔掉。消费者（在即使价格上的差异完全一致时）被要求放弃现金折扣时，会比允许他打折但要添加信用附加税时花更多的钱：附加税在感觉上是从口袋里往外掏钱，价格差异的一个简单的标注也会对参照点的位置发生主观的影响。在一项研究中，已经在两个礼物中作了选择的受访者，在他们选择礼物后对被选的礼物实际上估价会变得更高（被拒绝的礼物就低一点）：同样的膨胀也会出现在对已经做出的决定的估值上（一种将自我催眠称为消除精神矛盾的现象），在参加摇奖活动的彩民中，该现象十分常见，他们需要增补资金以继续买入他们已投资了信心的彩票。大学生对他们支付的教育成本远比他们不去赚钱所付出的机会成本要敏感：抵制各种收费是因为它们是一种失去，其次的放弃是作为从未获得的东西而不加理睬。不要求退款，不忽视资本积淀，不懂得信用附加费，不抵制滚雪球效应，不承认机会成本——从实验和问卷中得出的这些发现说明天赋效应的普遍性和伴随它的认知保守主义的力量。资本主义是从此开始的动态系统。但是，人的头脑，是受时间约束的东西，永远倾向于滞后。

三、归纳的保守主义

资本主义是一个逐利的发现过程。它的企业雄心勃勃。保守主义收集关于曾经所是的历史资料。虽蒙蔽于认知的偏见、受挫于资料的缺漏、失败于解释图式的过载，他们至少能把搜索集中在历史的火车已知曾停留过的目的地。但是，资本家们是在市场上找寻对未来的可靠的向导。他们的搜寻是更大的挑战。由于不能确定一个失衡到底是发展的趋势还是来回的波动，也不知道竞争的对手们到底知道些什么，计划着些什么，并总是遭遇着出其不意、暴利以及灾祸，因此资本家们能确定的只是一件事——他们正奔向一个依然还未存在的车站，没有人曾见过它，没有人能准确地描绘它。保守主义的经济产生着关于路线和顺序的良好指示，由过去所驱动的将来很可能会重现过去。资本主义经济则不如此。有些资本家能获利，有些会遭受损失，有些则会破产。资本主义能够与工具理性的规范紧密携手，而保守主义则更受到它的现实世界的要求的影响。

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学中有一个为工具理性辩护的长期的传统。帕森斯和斯梅尔塞（他们关于美国文化熔炉的反思评价——它给予成就、成功和效率高度的社会认可——无疑通过社会化和强制极大地培养和形成了对理性的欲求）正是这个传统的一部分：“从经济学的观点看，经济理性是一个公设……但是从经济

是一个社会系统的观点来看，经济理性就不是一个公设，而是系统自身的一个基本经验特征”（帕森斯和斯梅尔塞，1956：175）。一个“基本的经验特征”而不是一个简化了的理想类型；帕森斯和斯梅尔塞显然不会拒绝演绎的新古典主义的逻辑，该逻辑把工具理性作为坚实而可靠的假定。

有的批评者对熟悉的先验推理中的经验的地位、解释的权力提出了质疑。因此哈格瑞弗·赫尔普，他强调“它作为人的行为的模式的局限性”，认为只要经济学家们不对他们的公理的意义做出重新的评价，他们对有关公共政策的争论所做的贡献就是非常贫瘠：“主流经济学被它对工具意义上的理性的排他的、形式的依赖所贻误”（哈格瑞弗·赫尔普，1989：1）。另有批评者对学院派经济学的作用表示怀疑：学院派经济学“密传的不相干的言论”（“经济学家经常力图迷惑而不是启发大众”）做出的是非现实的抽象，在此之上它建立了自己的分析：“传统的经济学提供的有关世界实际运作的观念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误导……十分必要替换它”（奥米诺德，1995：VII，20，27）。李斯特·梭罗是注意到误导性的预见来自严格建立在理性的最大化基础之上的模式的评论家：“经济学的状态十分混乱……数学的精致性是加强了，但对真实世界的理解减少了”（梭罗，1983：236）。凯恩斯是另一个对以数学的推导代替了商业的敏感做出不利评论的批评者：“大部分最近的‘数理’经济学只是种种虚拟，其不准确性一如它们所依赖的初始的设定，这样它们就允许其作者在虚设且无益的符号的迷宫中无视真实世界的复杂性和相关性”（凯恩斯，1936：298）。所有这些批评家都不否认，在一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知情的选择和目的取向的节省是十分重要的。他们所要说的是，没有对特定环境作过无偏见的检查，不能就简单地对工具理性规范的范围和影响做出判定。把经济理性称作“基本的经验特征”是跃入了一个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结论。

同样的智力上的谨慎在本章得到推荐。强调每一个经济体系都是理性的选择和非理想选择的共同繁衍物，本章的注意力集中在时间的排序上以指出现时的计算不可避免地植根在打着过去烙印的模式和由经验总结出的方法中。在此意义上，将作的选择会受到影响，甚至已经先定了，被那些曾经作过的决定，被那些已经实施了的决定。我们也从那里出发。我们标准的混合经济是彻底混合的。但，这也可能是为什么资本主义体制能取得尚佳成功的原因。

本章建议的是在时空中无偏见的经验主义。它不赞同单枝独秀也不赞同混合。它的论题不过是如此，即，混合是常态，因而通行的选择倾向于保守的维度。它的论证分三个阶段。3.1部分，“从经验中得出推断”，通过诉诸于先在的模式而建立在前一章的基础上。3.2部分，“心智与预见”，阐述了已被确立了的启发方式，精明的或愚蠢的，都可应用来获得一致性，即使代价是失去了敏感的适应性。3.3部分，“有限的理性”，讨论了这样一个观点：在永远富于新的变化的资本主义的万花筒中，有限的审视可能就是惟一的审视。

3.1 从经验中得出推论

在综合平衡中，没有任何东西会被发现或被学习，也没有对某单一受重视的最优化进行计算的进一步需要。在寻找和变化、搜索和实验的状态中，代替确定性的是冒险地抓住救命稻草造就了大部分现存的知识和确定的程序：“不确定性是存在的，因为行为人不能解释他面对的决策问题的所有的复杂性，这直接妨碍他们选择他们最情愿的选择。结果是，行为对信息反映的弹性被限制到能被可靠管理的更小的行为范围”（海纳，1983：585）。不确定性不是偶然的错误而是经济过程的本质。标准的保守主义

是在真空中导航的正在发黄的地图。没有全面最大化——它不能成为一个选择——理智，这部分讨论的问题是，当价值陷入了对无人能知的未来的混乱中时，是否推断和启发法使得任何价值的过去都成为了秘团。

受困于全知全能的神话和毫无线索的黑洞之间，迷失方向的人无疑希望历史的次优至少会帮助他们向着波哥洛推进，而不是把他们撂在斯堪索普的某个地方。这部分达到的结论是有限度的信心不会被误用。数学更精致而物理学更准确。即使如此，抹杀标准的保守主义而支持把真实世界所无法匹敌的最优化预测能力给予了模式世界的同时性平衡，是错误的。

经济的选择关系到还未成为现实的未来。经济的选择影响到它们也寻求适应的过程。当使长期收获最大化的新奇事物还有待产生，而非故意的结果的原则是非意料之事物后的永久剩余物，要瞄准“最好”的东西并非易事。没有人能预见明年麦子的收成或外部偶然的意外的事物，例如境外的战争。逐利者不可能知道有多少别的机会主义者会争先利用高回报的不平衡：在他们的昏暗不明中存在着结构的谬误和微观经济的陷阱。企业家们不知道哪一笔交易会带来最大的回报：正是在他们的猜测的分布之上建立了幸运和判断的差别。有太多的东西不能预见。有太多的东西不可能知道。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能收集 **1066** 年的史实。但是，**2066** 年，还没到呢。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承认，持续的改变比静止的状态更难模式化：“时间……几乎是每一个经济问题的主要困难的核心”（马歇尔，**1990：VII**）。他还相信经济变化的趋势是变慢和变缓，而不是突然的、革命性的。正是他的穿过稳定性的非永久性的观念引导他，跟随大卫之后，把熊彼得称为“创造性的解构”（熊彼得，**1890：VII**）放置于广义上的进化，它是有机的而不是机械的，自然的而不是人为的。持续进步的嵌入性对工具性的保守

主义有着重要的意义。不同事物的概念化都受到同样的限制，这使得在从过去得到的频率分布的基础上估计未来的可能性十分合乎情理。面包可能被预期在明年冬季用火车运输——虽然面包还没烤，火车甚至还没预定呢。小学校的教师可能 20 年间会人满为患——虽然这些校长和女教师们现在自己还在接受基础教育。像这样的推断也不是百分之百的准确，但它们也不只是无端的一种猜测，就像过去对未来没有提供什么阐明似的。

从经验中得出推断，凯恩斯发现，是预测策略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形成我们的期待中，过分依赖尚不确定的东西是不智的……因此，现存的事物，在某种意义上不成比例地，进入了我们长期预期的形成过程”（凯恩斯，1936：148）。人们在他们已知情况的基础上作长期的计划——自我实现的预言——能够成为稳定性的来源，成为其期待比如果每一个性各异的冒险家决策时从不后顾的局面更为理性的原因。给定稳定性，并用不同的与更远的过去有关的加权做实验，统计专家就能测定系列的宏观社会学的聚合体。例如，在边际储蓄倾向中探索持续性，就可能算出积累对家庭总需求节制的影响，算出公司投资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倍数效应。未来的数据将起源于反应过程中的需要的这一事实显然不是什么不可克服的障碍，对在洞察过去的基础形成的预测来说。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认为资产阶级，通过聚敛资本，既减少了利润率又（生产自己的掘墓人）摧毁着资本主义制度。从外推法得出的微观社会学通常不如周围的积累来得准确：就个人储户、投资者或资本家所关心的而言，关注他人的意图所为，然后（考虑公共交通的免费搭车人或凯恩斯的节俭悖论）通过逆潮而动获取个人和私人的利益显然是十分理智的。不能指望从经验中得到的推论能为每个人都识别出可以大获全胜的最优化策略，它也不能使节俭的经济至上者放心在过去实践——它们可能从不是被选出的，也从不是理性的——的基础上做出的预测选择

有着某种内在的理性。尽管如此，在一个人人们把现状的体验作为他们的底线的社会中，从经验中做出的推断有着适当乐观的信息来传达理性期待的可能性。

个人以从记忆的果实中一点点收集的智慧交换未来的果实。国家宏观经济模式参照反复实验的指标作调整。市场研究人员根据从前发生的事物预测男性的平均寿命和八月的天气。用这样的方式，社会共同体在经受时间考验的心理定势中传达它的信心，陈述它的自信：历史可能会重演。显然，根据规律地重复的过去而做出的预测也可能被意料之外的紊乱——诸如突然死亡的废弃或在波哥洛的路障和革命——推向偏离。但集中注意力于最坏可能性的情景而忽视了适用的信息是通过暂时的形象和广泛共有的模式而产生的，则是十分错误的。大多数人都相当地满意于一种智力上的保守主义，它建立在结构之上，为了特殊事例要倒退到重新开始。商业人士在这方面很可能像普通人一样是保守主义者。

沙克尔在商业社会中敏锐地发现“野心勃勃渴望改变的人只是一部分，他们因自己的立场，反对其余人的稳定局面。因为只有稳定的环境中，成功才有一个清晰的含义和度量。一个人若其参考体系是更迭的，其世界在不断适应新的价值，则他不能确立他的成功……野心和保守主义有很多共同利益”（沙克尔，1972：78）。沙克尔在此设定了一个野心的悖论——每个人都想跑在最前面，每个人都想除他而外所有的人都不变以形成他的进步——这实际上是智力上的一个矛盾，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相形之下，保守的资本主义更令人安慰。保守的资本主义不能帮助每一个野心勃勃的人甩下他的邻人，或提供禁止不受欢迎的新手闯入的保证。但是，它所能做的是，确保经济的变化发生在不以不可控的速度产生变化的经济环境之内。有时正确，有时错误，事实是期待更可能被经验所证实。大多数真实世界的资本主义的保

守主义的性质是对预测能力贡献良多的稳定性的一个原因。

大多数真实世界的资本主义同时既因区别而分开又因相互依赖而结合。就本书的完全竞争的例子来说，好像存在着拍卖（关于均衡价格只是逻辑的事体的一个虚构）但它对事关家庭主妇和公司实际上所达到的终极价格的向量的调节过程无足轻重。如此的价格制定理论实际上就是根本没有价格制定。寻找出路却反遭答案的蒙蔽，劳思百（跟随着 G.B. 里查森）因此认为，非完美的理论的建立至少把行为的内容加入进了否则就会不可解释的模式之中：“形式上的完全竞争不能为期待提供似乎合理的基础，相反寡头垄断至少明示了竞争表面的相关设置，可能还促进了信息的交流，使公司有信心做出承诺。完全的竞争是不确定的。不完全性才是使体制运转的因素”（劳思百，1976：187）。

竞争富于影响力的一个维度是生产的异质性。若每一个可识别的供应商都在他独有的品牌和服务上达到保持各自准垄断的程度，他显然既按个人的也按通用的需求曲线做贸易。他在他的分市场里有强大影响力的事实意味着他处的位置能对价格—数量的关系——对此他特有的商业经验已有效地训练他做出了预测——施加一定的控制。本地的店主很少会有什么大的区别以至能吸引顾客不去光顾别的略逊一筹的商店，而友好的老板也不能阻止他的工人人们的流动。但是，准寡头所期望的是，他的贸易伙伴要能容忍一定的剥削和相当不公平的经济关系，因一些他所能提供的无法替代的好处：地点、人力、质量或速度等。

惟一性的吸引力还被探索的障碍而得到补充。良好的商誉，经常的惠顾，不同的人知道他们的顾客和供应商在何种程度上被其自己过去的决定所投下的沉没成本和重新尝试所要花的边际成本所约束。A 希望他的投资良好，能得到回报，而 B 则畏于动荡的不确定的前景。重新注册的浪费、准入的失败、歉疚的感觉以及对未知的畏惧，这些都是心怀不满的人还待在原来的地方不

动的原因。通常，还存在着与年龄相关的棘轮效应，即在一生中的关键性阶段做出的某些特定的决定，随后的生涯证明要做纠正十分困难。诸如此类的不完美性加强了保守主义的地位，妨碍了资本主义市场的最大化效率。如果经济人都在第一时间做出选择和反应，如果新的选择者的涌入与旧有的承包商的存量——它是不可改变的——高度相关，公开的竞争就会有争议地更为理性。

但是，非理性在某种意义上，是预测的一个悖论，即重复的购买和经济上的墨守成规也能表现出高度的理性。从顾客或供应商的角度看，长期持续的关系能节约交易在信息和协议方面的费用，从分化的生产商的角度看，跨时贸易的含糊契约支持着期待的理性。每一方，假定，都能迫使对方三思而后做出改变——销售者通过所出价格超过购买者会付的最高限度，购买者通过提供的价格低于销售者能接受的底线。重复的商业行为使各方（准确地是因为他们不是陌生人或新手）都能知道讨价还价的范围，在其中意向谈判的不确定性受到一定的限制。由于希望看到他们相互的合作能够继续，参与者都明白为了自己的利益不能超过限度。产品的异质化增加了找到新东西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买卖双方都把真实世界的那么多资本主义都碰巧也是保守主义的当作了令人感到安慰的经济。

偏好持续的联系和理性的推断的不完全竞争的一个维度是产品的多样性。寡头的相互依赖是第二个维度，它更有助于预测的准确性。寡头们是对手，总要去侵夺利润，并保住自己的市场份额。寡头们也是盟友，知道商贸即战争，不想在战略上输人一筹。零和的选择就像一盘没有哪个公司能做出预言的棋。共同保险的选择则不同。有时是公开的（卡特尔），有时是默契的（价格制定权），寡头们在相互支持的案例中都相互勾结、互相协作，给予双方在商业计划中都需要的参数。

在反应不确定的地方，普通的程序是保持价格的稳定，而让

数量随着市场波动。当价格失去了作为竞争核心的地位时，至少竞争者们知道，除了过去的价格、将来的价格，没有什么他们是应期待的价格。公司如果试图通过抬价控求——这是大多数非经济人士希望从自由企业制度中得到的东西——来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实际上是冒失去商誉的危险。“弯曲”的需求曲线理论阐述了冻结价格管制的功能。它确实如此，就商业对手的选择计算而言，对他来说别人的反应功能永远是个谜：“在定价中，他们努力运用他们从经验中得来的我们称之为‘完全成本’的一条法则……如此则利润会最大化，如果它们完全是起于对这条法则的运用，当然，作为意外的（或演化的）副产品也有可能”。

开始于这里而不是那里，理论没有（并且，确实，也无法）解释建立于参照点之外的调整过程，也没有阐明为什么历史会选择支持别的无限性的独特立场。理论所能做的一切是在过去价格——它被紧张的当前采用来以备不确定的未来之用——基础上预见自续的稳定性，收获是得到了灯塔和地图。损失是当需求过量时增加了等候的排队，当供给过量时导致了非自愿的失业。没有价格发出的信号，就没有向着正确的和确定的供需平衡的社会自动平衡的吸引力。如果经济能够依靠利润最大化来使经济恢复到信息完全的综合平衡，那么热切排队等候的顾客以及需求不足的后备军，都会一下子自动地被消除。

无疑他们会被消除——但是 $MC = MR$ 不是一个选择。当一个更有效的比较会以一个歧途对抗另一个歧途时，把真实与理想相并列总是错误的。弹性价格做出分配，但无知又起着模糊和阻碍的作用。每一个经济上的次优都既有着好的一面又有着坏的一面。保守的选择显然责备真实世界的资本主义以过时的谬误从事贸易。另一方面，它是保险的方案，在其中潜能的运用低于其能力，但加强了远的远见提高了其执行的成绩。保险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是一个有效的选择。拒绝把经济保险的任何形式——它能使消

费者和投票人更广泛的目的得到满足——给予真实世界的资本主义，似乎是很不厚道的。

保险，就像知识一样，从不可能是全面的：“令人想望的经济冒险的行动被不能确保不会失败所抑制”（阿罗，1974：34）。对资本家明确的保护因为谈判和加强契约所花的成本而成问题。不过明确的保护的确存在；并且，甚至更为普遍，非直接的保护也存在着。保护的一个例子是期货市场（与消费者从加油站买汽油和在商店买家用的现货交易一样有规则），它在动荡的世界里提供预见性，以作为对为消除波动而补偿风险投资的保险费的交换。另一个事实上的保险保护的例子是在农业市场协作的次优经济学里的价格刚性。从经验中得出的推断使真实世界的资本主义比所有的商业都在一个早上从此开始的资本主义要理性得多。因此可能性不能被排除在外，真实世界的资本主义比把价格委之于看不见的手更使市场经济接近于瓦尔拉斯的价格拍卖和静态的帕累托最优。

居于怀特的作为模仿的市场概念的中心地位的是不完全竞争而不是完全竞争。怀特把市场视为人，视为“相互监视对方的生产商的各明确的派系”（怀特，1981：543）。不是脱离具体的抽象而是社会学的实体，怀特认为，商业决策的基础一部分是对顾客预期的估计，而大部分是相互关联的生产商实际所处的地位。这种相互的意识、这种对期待的证实以及对不确定性和矛盾的克服，正是把根本不同的东西连接为一个综合的母体的基本理由：“市场是在以对相互行为的观察来确定角色的特定的企业集团和别的行为人当中进行自我复制的社会组织……关键的事实是生产商在一个市场之内相互监视。在罗格·班尼斯特打破了四分钟一米之后不出数周，别人也会照此行事，因为他们是以监视别的‘生产商’，而不是靠猜测和推断大众的需求或鉴定者的言语，来确定现实和报酬。市场不是由系列的顾客确定的，就像我们传统

的说法那样，生产商也不为时时要预测无定型的需要而苦恼。我坚持认为一个公司在市场上所做的一切就是尽可能地监视竞争对手”（怀特，1981：518）。

怀特认为，可以有效地根据社会角色、社会定位以及自我复制的联系来建构社会。在缺乏拍卖师但有嵌入性的情况下，没有确定性的人们有一种趋势，即从对他们的同辈的观察中学习，跟随他们人群中的竞争对手的引领。怀特把市场作为制造雄心的场所来解释引起马歇尔注意到，同时也是受到巴格霍特对“为什么伦巴第街有时非常沉闷有时又极为躁动”（巴格霍特，1873：CH.6）的心理社会学的解释的很大影响，即一旦较低的转折点被相信已经触到了，牛市的回报也就来临了：“增长引起的信心会导致它本身的增长……当然在不同的贸易中并没有正式的协议要重新开始开足马力地工作”（马歇尔，1879：155）。在马歇尔的例子中，也如在怀特的例子中，没有根据供需对平衡点做出的预测，平衡是相互作用的头脑的产物。当怀特使生产单位成为基本的建筑单位，而数量和价格成为必须适应的经济变数时，他的这番话显得十分有效：“市场是由公司集团的自我复制而不是别的方式所确定的”（怀特，1981：520）。

怀特可能会批评一种片面的方法，它既低估了消费者和需求的重要性，也低估了市场平衡的重要性。在这个程度上，他的理论也许应被看做关于生产—决策的理论，而不是把市场作为整体加以解释。怀特的理论不能解释实得的价格/数量的关系，也不能解释出现的位置在分配上的影响。不过，它所做的一切依然很有价值。它表明，通过模仿的交流提高了从经验中得出的推断的预见能力。别的人帮助我们作预见。一个稳定的社会是对理性选择的支持。

别的人帮助我们作预见。国家也是如此。加尔布雷思曾特别强调，在市场经济中，那里长期的酝酿时间和沉重的资本费用是

运行不良和失败的威胁，能够通过国家——经法规、支持和选择性的所有权——来采取建设性的领导：“这些必要措施的一个回报性的结果是发现了一旦资本主义失灵了，政府的介入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有多受欢迎”（加尔布雷思，1965：63）。无知意味着不能逼真地预见相似性和模式。国家把资本主义需要提前计划的定位点给予了资本主义。

因此，宏观经济的稳定性政策（伴随着与收入相关的失业救济）通常被认为是消除了周期波动的影响；而指令性经济计划（不排除国营部门自己中间阶段的支出目标的前出版物）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一个有效集权的预见机制。在没有法律一个“囚徒的困境”就会遮蔽了反应的地方，强制带来了合作。专利法提供了研究和发展中的冒险所需要的保护。在某些领域的刚性——固定的兑换率、进口的关税、付款的控制、租金管制——都可能成为支撑别的领域的弹性的信息的基石。所有这一切表明的是，资本主义的管弦乐队在指挥的带领下会比每件乐器都各行其是要有效得多。

保守主义使得资本主义能够作计划。政治学能强化过去以使变化为人所知。如此看来，国家的领导权，像社会的相互依赖和代理的实验一样，有着诱人的特性，能通过规范资本主义进入可预测的模型而使市场经济更有效地发挥功能。当然，相反的观点是，混合经济使用的混合特质，有着以牺牲需求的满足为代价来换取安定的效应。正因为未来是隐藏而不易发现的，较之依赖通过权威和指导所带来的一致性和统一性，选择分化、研究和推测显得更为明智——“为竞争辩护的基础是相信人们很可能会出错”（劳思百，1976：192）。支持“交易经济学”或交换优先观点的学者并不认为分权制和价格调节机制在各方面都很理想。这些主张自由放任主义的理论家所主张的是，没有任何单一的代理人能对分散的知识有一个总的概观（并且政客们和官僚们特殊的

目的一功能有着进一步歪曲公众利益的威胁), 真实世界里的市场是实现发现和交流、协调和系统化、整合和合作可能最好的方式。也许它是这样的——但不确定性仍保留着。通过强制和公告赋予了结构的保守资本主义至少提高了从已知中得出推断的效率。

自然而非人工的选择。渐进主义, 像模仿和政府一样, 对选择的理性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有些承诺, 昂贵而不可逆转, 相对于不可预见世界的专横相当脆弱: 河流干涸了巨型的水坝也不能拆除, 而异乎寻常的反应堆也不能经济地改造为学生的宿舍。但是, 更多的选择, 是小型的、边际的, 对重订和约十分敏感: 因此一家中餐馆在碰到口味上的变化时, 它能买进意大利的食谱, 而一个储户注意到利率持续增高的压力后, 他会在股票进一步跌落前把股本转移到银行账户。不是所有的资金都是部门专属不可改变的。不是所有的变化都是分散的、突然的而且是一劳永逸的。在承诺有着高度的弹性的地方, 在变化相对较为缓慢的地方, 长期能够被明智地构想为系列的短期, 每一个环节只是在前一环节基础上的一小步。

渐进主义, 很清楚, 有着双重含义。首先, 该术语指的是递增的宏观进步, 当形势发展了, 它结合机会进行反思。其次, 该术语拾起了非革命的宏观变化, 它使预测不管环境的发展如何都能成为可能。它的可塑性和透明性都为选择的理性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有时, 实际上, 其贡献会在计划的阶段就被明确地制度化。具体的渐进主义的一个变体是“如果 A 决定提供 X, B 承担对它的购买”这样的形式的应急定约。这种条件性, 承认预见的不完备, 使选择保持开放状态, 保证不是所有的选择都必须在同一时间做出。另一个变体, 是情景性计划, 从一劳永逸式的计算中胜出, 以允许增强反应的灵活性。在智慧树的事例中, 行为人在活

到老学到老的基础上不断从树干到树枝、从支撑的树枝到依靠性的树枝成长着。在开初没有地图可得时，持续的反应可能是达到目的地的最有效的方式。每一个转折点都有一个从过去推断出的可能性的分配。理性的选择就是在旅程中的每次关节点上选择出尽可能最好的干道。理性的规范指的就是这些单独的每一个每次。行为人会希望，很自然地，每一个每次叠加在一起就会得到成束的理性。像一次性的选择一样，情景性计划也如此，困扰的事实是对规范的使用并不提供什么担保。

制度化的渐进主义的进一步变种是预防的缓冲器。让我们来看如下的例子，一个从政者，他预知会被提问，但不能预先知道提哪一个问题，他就会以需要解决的问题范围的答案来装备自己。确实他的远不完备的预见使得他的过度准备造成了浪费。如果问题先就公开了，这本来完全就不必要。另一方面，他对增加的信息的搜寻建立在他的背景知识的不可退还的成本上，背景知识允许他以较低的边际成本应付挑战的不相称的速度。他的行为是非最优化的（在他过量地作准备的意义上），但它依然是对收益的追求（在他能尽可能地理性的意义上）。在知识的缓冲器中追求收益的因素与制度化的渐进主义的保守主义的性质有着紧密的联系。渐进主义既能使决策人对未探访过的比赛场所的限制进行预测，也使他无须滥增成本就能采取预防措施。在达到如此地受保护的程度后，他就能稳步地前进，无须付出昂贵的计算成本。而如果长期的复杂体系没有被分解为系列的小冒险和偶然事件，这样的成本是一定要发生的。

制度化渐进主义的最后的变体是投机的保护手段。作为在限制损失的极小中的极大的原则基础上做出的选择，这样的保护手段为了防止将来的后悔达到这样的程度，它鼓励谨慎的人们选择一种混合的投资组合。防止“错误”的选择可能也挡住了“正确”的选择；而且也必须记住，分化（证明了已陷入利益中的凯

恩斯主义的流动性偏好)并不是没有成本的。即使如此,像彼特·厄尔所解释的那样,避免最大的风险——它会导致把所有的鸡蛋放入一个篮子的后果——是一种令人心安的策略:“一个英国家庭度假时通常可能会采取在西班牙过一个双周,待在一个他们知道很好的旅馆。但是若为了‘换胃口’而在英国度假,他们可能会选择把两个星期分开过以应付英国天气的多变,即使如此会意味着作两次整理行李和旅行的损失”(厄尔,1986:75)。英国家庭知道推断也可能使他们犯错误。为了限制可能的损失,他们因此选择了沿着两条独立道路作较小的推进,而不是跨一大步,那可能意味着两个星期都泡在雨里了。保守主义允许他们作推断。保护手段允许他们有多多样性——但有一定的成本。

制度化地体现在保护手段和缓冲器、情景性计划以及应急的契约中,渐进主义的吸引力在于为头脑的跨时(in-period)变化留下了空间。一旦人们确定了他们的选择并开始了他们的旅程,他们并不会停止从经验中进行学习。而且,他们会继续通过现存的模式过滤新的刺激,根据意想之外的反馈校正他们原来的推测。在此情况下,理性的选择意味着不是一个点,而是系列的点,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一个过程。这些修订可能会,当然会,加剧了本应减少的不平衡;而变化着的状况可能会因一个预测上的错误——它实际上是过时的范式的一个产品——而受责备。不过把工具理性简化为是/否的规范丢失了很多东西。决策很少是完全理性的或完全非理性的,而是倾向于处在两极类型之间的某个地方。纠错机制不可能把系统错误全部消灭而进入完全预测的模式。所能赞同的只是,如果根据数学的统计而不是心理学的动力——它在不平衡的道路上作导引和告知——来模式化理性的选择,中途的灵活性会成为以结果定期待的更大汇集的原因而不是实情。

3.2 心智与预测

米塞斯在统计学家对经验证据的追求中没有发现大的价值：“作为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计量经济学是数字的天真游戏，无助于说明任何经济的现实问题”（米塞斯，1962：63）。作为一个人类学者、一个演绎派的哲学家、一个先验论的相信者，米塞斯把经济学的王国定义为人的头脑而不是非自我的外在现实的王国：“经济学家……处理的是存在和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事体……他无须替换自己；他能够，不管别人如何不屑，像逻辑学家和数学家一样，在一个圈椅里完成自己的工作”（米塞斯，1962：78）。经济学家的王国，米塞斯坚持认为，应在个体的决策者的心理组成中去寻找。它不应到比较社会学或有关物质限制的知识中去寻找。

米塞斯既是逻辑的又是心理学的。在他的著作中，演绎和归纳的联系是他在代理行为人的目的行为中的信念：“人们在行动中锁定的特定目标是各不相同，持续变化的。但是所有的行为都不变地只受到一个动机的引导，即是说，以更适合本人的状态替代缺乏他的行为时所处的状态”（米塞斯，1962：77）。经济学中的人并不是财富聚敛者的代名词，一门心思扑在消费、投资和资金的价值。但是，他应是谨慎的最大化者，一生按工具理性的规范行事。经济学中的人，米塞斯认为，不能被模式化，因为他们太不同了。以贝克尔的话讲：“对最大化的行为、市场平衡以及稳定的爱好的联合的诸多假定，形成了经济学方法的核心……这种经济学方法提供了理解所有人的行为的有价值的统一框架”（贝克尔，1976：5，14）。行为是乐观的行为，是制造更满意状态的干涉。行为不是随意的，不是无意识无目的的努力。

没有人会说他们的行动是随意的，或在他们毫无信念的随意

变动上浪费稀缺资源。有智慧的人是骄傲的生物，不愿意承认他靠计算横穿马路的鸡来安排生活。自我形象受到目的选择的预期的奉承——但是，精神，尽管如此，绝对保持着自制。墨守成规和错误的分类造成了无根据的推断。有选择的回忆青睐较近的过去。已获得之物的排序高于新的东西。爱和忠诚驱使人们做出非计算的选择。人的大多数行为，就像在前一章节显示的那样，似乎拥有着显著的非最大化的特点。证据表明，简单地说，人的行为是混合的行为，有时理性，有时则不。米塞斯和贝克尔让人产生争议的地方在于，他们过于迅速地把一个选择性标准——它能解释廉价物胜过解释贵重品，但不是超载的分期偿还的成本或受忽视的机会成本——普遍化了。理性的选择可能被纳入一个关于人们会怎样行动或应该怎样行动的理论。是否它也是关于人们如何能行动或行动的理论还相当成问题。精神就是精神。没有理由把既不能作解释也不能预测的理想化的单向度强加于精神。

从工具理性中会产生滑移。这个滑移对于理解资本主义制度有着相当的重要性。萧条岁月产生的集体性失业，在衰退让位于过热很长时间之后，还能导致必然的夸张陈述。潜意识能促使购物者趋向颜色和款式，如果他们相信他们的选择受到价格和质量的控制。对未知的恐惧是对打折产生焦虑的原因，这使得可能最好的项目变成了毫无吸引力的赌博。就经济的市场而言，经济的精神所造成的状态在这儿与在经济学教科书中被模式化的分配的最优状态相比，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反的。说人们在这儿以不受欢迎的通货膨胀、消费不良和失去机会等为代价买入纪念、形象和安慰等是理性的选择，这纯粹是玩弄词句。把经济体系看做一个整体，一般来说做出诸如此类的非理性选择的人们实际上是在剥夺资本主义的核心动力。只有大多数人都理性地进行选择——并且只有大多数人都作工具理性的选择，资本主义的经济学才具备意义。

奥尔森定义（市场）经济学并不在财富的结局，而在目的的规范：“经济的（或更准确地，微观经济的）理论在基本意义上更是一个关于理性行为的理论，而不是关于物质商品的理论”（奥尔森，1969：142）。贝克尔，他以经济学家的标准为参考解释犯罪、自杀以及离婚；其观点是最大化的方针，社会地讲，是普遍性的。被确认无疑地是小尺度的而不是总计的从经验中得来的证据，支持一种更谨慎的方式。由于研究的增多引起了对目标指向的行为的遍在性的疑问，因此像罗塞尔和泰勒这样的学者得出结论认为，心理学的偏见不是一个例外的注脚，不规则不是随机地分布或应大量地删除。罗塞尔和泰勒发现，对经济学家规范的违背，并不是附言而是解释的中心。“竞争会产生不相干的反理性的极端观念只在很特殊的例子中适合，可能在现实世界中极少被观察到”（罗塞尔和泰勒，1985：1071）。关于反理性是到处存在的争论对于手段——目的、投入——产出的模式的应用投下了阴影。

但是，即使在人的行为是很不理性的地方，对经济学家规范的违背并不一定意味着结果是内在地不可预测。独立的和客观的估计并不是预测未来选择的前提条件。模式化所需要的是貌似反常行为中的理性，即偏见基础上的稳定性。一旦偏见得到了领会，行为人和观察者无须诉诸科学的事实，仅仅根据已知的感觉，就能够对相互的动机和反应做出估计。行为人所感觉到的频率可能是没有根据的和歪曲的。当然到他们完全不理解的程度，他们不太可能对作为整体的经济的效率做出很大的贡献。但是，就预测而言，情况还是比较令人鼓舞的。被感觉的频率，尽管是错误的，能为显露出的偏好——像它们在头脑之外成为非实体性一样，它们易受预测的影响——形成基础。

按其本质，经济学必然总是一门关于主观性的科学。与思想、满足、猜测、推测和感觉有关，它必然总是更接近于认知心

理学而不是关于结构、客体和物体的物理学：“在自然科学中，所思是建立在所见之上；但是在经济学中，所见是建立在所想的基础之上”（沙克尔，1972：66）。思想是过程的发动装置。因此在经济学中，所有的预测都必须依靠对精神状态的正确理解。经济学家可能在结果中发现了浪费，或甚至断言方法与目的不相称。无疑，这些意见会被曾犯过浅显的错误的工具理性的行为者所欣赏，就像会被在别的竞技场里竞争的价值理性的行为者所憎恨一样。但是，就预测而言，经济学家能够节约他在规范性判断上的劳动。把精神状态作为他开始的焦点，他的任务不是评估可能的偏见，而是确定被期待的一致性。有些行为，确实非常随意，总是会溢出他的模式：灵感、直觉、灵机一动，以及企业家的想像，都几乎像神的启示一样难以预测。重要的是，许多刺激—反应的关系能在预测的范围内产生，而如果经济学家把研究过窄地集中在理性的选择和效率标准，它们原本会被丢失。推断能够且必须反映真实世界的系统化。就算它是一个强加于逻辑的愚人们的估计，那么经济学家必须使自己成为愚人们和他们的智力框架的学生。

认知的偏见是经济选择的一个部分。下面有三个例子将用来表现以偏见和错觉——在从前作为反射起作用——来预测未来的含义。

第一个例子是关于生命的价值。由于人们易于相信他们不太会比常人更容易得肺癌或更容易在街头受到袭击，因此，若靠显示吸烟和人们穿行黑暗的街巷所冒的危险，建立新医院和扩大治安巡查的国家政策会达不到同意的最高值。问题不是统计上的危险（对此人们乐于了解），而是个人的风险（对此头脑喜欢打折和低估）。在布鲁诺·弗雷的术语中，情况是这样的：“被特定的人采纳为与他或她自己有关的可能性的定向——它被称作当事者的可能性定向——不同于客观可能性定向”（弗雷，1992：198）。

事前乐观者一族因为“它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而屏弃有可能发生大损失的小可能性。事后受害者一族又抱怨医院的床位不够，街道缺乏警力。按照客观可能性的定向而行动是疏远纳税人，按照当事者的可能性定向而行动又会使受害者失望。希望使在国家里感觉到的福利最大化的政府显然会发现，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若它把生命的价值立足于市民们偏颇的预期效用。

第二个例子有关语言的构架。奎特罗困和柴维斯基作了一项关于涨价和劳动力市场的研究。研究进行了两次。第一组调查对象被询问，若有**10**个百分比的劳动力会失业时，他们是否能赞成**12**个百分比的通货膨胀：只有百分之**35**的调查对象觉得可以如此。第二组调查对象被问及若**90**个百分比的劳动力会找到工作时，他们对**12**个百分比通货膨胀的态度：百分之**54**的人认为这可以接受（奎特罗困和柴维斯基，**1988：2**）。反应是不同的，但呈递的信息并没有不同。人们显然对负面事件（失去保险）的否定性反应要强于他们对正面事件（工作）的肯定性态度，不管二者是多么地等值。从问卷中获知了这种不对称的价值的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会以保持它的宏观经济学的不动摇但改变它的语言表述为明智。如此地行事，它会只好落入服从于从偏见做出的预测，而这是超市作陈列的逻辑，商品放置的位置要刺激冲动性购买，或者是广告的策略，它推销的是生活方式而不是产品。医疗行业的人士可以通过把死亡率换为生存率所带来的益处来改变改变它的治疗等级。像在关于失业率的案例一样，关于死亡率的案例也可同样如此，预测并没有受到非理性的妨碍，而框架可以重建以作适应。

第三个例子是关于习惯性精神的默契知识，能像巴甫洛夫的狗那样产生如高尔夫击球一样的反应，无须提供理论上的正当理由。无意识的重复使习得的常规成为“第二天性”。波拉尼，他相信“我们所能知大于我们所能语”（波拉尼，**1967：4**）：“虽然

我不大能说清楚我是怎样骑自行车或我是怎样认出我的雨衣的（因为我对此认识不够清楚），但这并不能阻止我说我知道怎么骑自行车和怎样认出我的雨衣……我明白这些东西，虽然我对所知道的东西说不清楚，或几乎说不清楚”（波拉尼，1958：88）。对自古已然的求助使行为用自信——在不太有挑战性的领域，未加思考的常规也能得出可接受的结果——免去了对意外和关键之物进行仔细的思考：“它们变得熟悉了。他忘了当他开始时它们原是新奇的。他甚至不能把它们解释给外人。它们已变成了常规和理所当然的东西。他的精神再也不能被唤起对它们的思考”（康芒斯，1934：697~698）。有了一个收获，在这个意义上，也有了一个成本：自动的驾驶仪使操作变得重复，但它达不到最优化程度。一旦需要适应性的变化，复制着当前反应的认知的偏见——勒宾斯坦的棘轮的理性（勒宾斯坦，1976：88）——会再次导致缺乏解决问题的理性的选择的结局。用马格里斯的话来说：“一旦一个模式（不论是行为的还是思想的）已变得过度确立了，那么它会习惯性地被一些暗示的模式所推动，想使它停下来并不容易。一个意志的行为（停止哪个习惯）不能长期地起作用”（马格里斯，1987：122）。以这种方式，昨日的各种判断能变成今日拒绝面对现实的基础。显然它们能；但至少它们便利了预测。

认知的偏见，就像在这些例子中揭示的那样，是经济选择的一部分。一定不要与缺乏教育的误解（简单的错误，如，金钱的错觉）相混淆——虽然在效果上，当它发生时，对资本主义秩序的效率的破坏是同等的。认知的偏见意味着对事实有选择的评估（超科学的价值和感情的影响）和对不一致的合理化解释（对待不一致的逻辑的本能，试图解决紧张和不和谐）。认知的偏见意味着有限的反馈，而且较之因金融刺激而预期的适应性变化——其在经济理性的理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还意味着较少地从

经验中学习，更少的市场自我纠错。承认认知的偏见并不一定受欢迎。理由很简单，它确实存在着；非工具性的东西不一定是偶然的；并且因此系统的错误能够被模式化，无须假定方法一目的的效用最令人关注。

不管可预测或不可，所清楚的是精神就是精神，它必须处于任何经济知识或经济事实的核心。作为一个加工者而不是一架照相机，作为一个做出积极贡献的思想的过滤器，精神赋予事实以意义，并且选择能存活计划。很容易误解现实，博尔丁写道——或容易低估“映象”对经验整理的影响：“我们确实没有方便的语言可以描述人的精神的内容而无须疑问是否这内容与它之外的任何东西相符合。由于这个原因，我已经……使用了术语‘映象’表示人的精神认知的内容”（博尔丁，1966：21）。

外在的现实，博尔丁强调，是通过个人过去的有选择的视野而被感知的：“映象是作为映象所有者的全部过去经验的产物而建立的。映像的一部分就是映象自身的历史”（博尔丁，1956：6）。映象因定义而过时。在这个意义上，“是”必然总会落入能使其可以被辨认的背景的“曾是”中。也不应假定每一个离散的事件都能被独立地还原。伴随着印象的是包围它的价值尺度，它影响着每一条新信息可能具有的效果：“通过感觉得到的信息本身是通过了价值体系的调整的。我们感知的并不是我们感觉的原始材料；它们通过解释和接受的高度习得的程序而被作了调整”（博尔丁，1956：13~14）。一方面，我们个人的过去使得我们以昨日的消息为透镜观察今日的事件：“我们的映象本身就抵制变化”（博尔丁，1956：8）。另一方面，与已确立的方向不相符合的新信息极有可能被忽视掉：“这所意味着的，对于任何个体的生物或组织，不存在‘事实’这档子事。有的只是通过可变化的价值体系过滤了的信息”（博尔丁，1956：14）。既因为个体的过去，也因为环境的价值层次系统，结果是精神变得扎根于时间和

空间。由于不断地接近精确仿佛真理就等同于熟知，也由于在一个互相强化的文化群体内共享价值，精神变得既对不稳定的也对陌生的东西感到神经紧张。精神，一句话，变得保守了。没有固定的点位精神就会发现发挥功能很困难。

即使一只狗也能找到回家的路（它有空间定位的能力）或认出它的主人（它有一种分类和依赖的理解力）。狗像人一样显然是有着想像力的生物。不过人能做的不只是简单地抽象和反应。人，与狗不同，能使用文字、符号和象征来表达他的爱好。他能够通过语言进入谈话、对话和形成结果的谈判。他能，首先，对未来有一个看法，这允许他想像一个比现存“更好”的世界：“他的映象包括的不仅是实然的东西，而且还有或然的东西。它充满着到目前为止还是非现实的潜力”（博尔丁，1956：26）。由于映象是习得的结构而不只是原始的材料，于是，在博尔丁的观点里，它除了是继承图式的简单的传递外，还是干涉和主动行为，人们有时接受从老一代人传下的规则和社会文化的约束，有时又采取行动重新安排外在现实的运动，甚至当他们消除了现有的扭曲后，还会产生新的骚动。

结果是沿着内摄的各种惊奇而重现出一幅混合的图像：“映象不仅产生了社会，社会也持续地重铸着映象”（博尔丁，1956：64）。过去的参照与想像的偏差混合在一起。个人的潜意识与同辈集体的社会化混合在一起。而物质与精神混合在一起：“如果我们从摩天大楼往下跳，在下坠过程中不管怎样提高我们的思想，也不能影响我们下坠的速度或最终的结局”（博尔丁，1956：116）。博尔丁显然还没有被唯我论所吸引，还没有否认存在着自我之外的现实。但是，他也没有被经济决定论所吸引，被如在马克思主义中的机械唯物主义所吸引：“一旦我们把社会看做一个通过各种信息而不断修改诸多映象的过程，显然，就不存在什么一个阶级被它之下的另一阶级推翻的机械过程”（博尔丁，1956：

107)。信息是受制于处境的——除了受制于生物的和物理的环境，还受制于已遗忘的童年、受制于社会地获得的价值。不过，信息也是自主的，它会有小的变化但仍不是先前的母体。博尔丁希望社会科学能说明接受的信息和发送的信息之间的联系。对于理性的选择，博尔丁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他只是说，若不谋求对回忆的理解和对人的精神的分析，没有什么理论能够具有预见的力量。

3.3 有限的理性

博尔丁意义上的映像，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教科书世界中并不难于做出判断：“如果我们接受了价值是给定的和连贯的，如果我们的假设是按照世界真实的所是做出的一个客观描述，并且如果我们假定决策者的计算能力是无限的，那么……我们不一定需要在真实世界和决策者对它的感觉之间做出区分”（西蒙，1986：26~27）。如果我们假定完全的知识是唾手可得的，并且计算的能力可以完全弹性供应，那么，理性的选择就成为惟一正确的答案，明智之人都一定会涌向它：“我们可以全凭我们对真实世界的知识，无须对决策者的感觉和计算模式作一点了解，就能预测理性的决策者会做出的各种选择”（西蒙，1986：27）。若输入他或她的爱好函数，则事实和关系会被毫无错误地输出，并自动地得出惟一的和最优的选择，就好像被一个看不见的程序员引导着：“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理性人总是能达到客观的，或真实的选择，就效用函数而言是最好的”（西蒙，1986：27）。因此关于选择的科学在根本没有选择的理论中确实变得边缘化了。

西蒙，他受到新古典主义对目的取向最大化的预期的吸引，并且对激情、直觉和情感的解释力量产生了怀疑，迅速地把人的行为描绘为“有目的的理性的”（西蒙，1957：200）。由于确信

工具理性的奋斗有着伟大的重要性，他的许多保留意见并不是和理想本身有关，而只是与那些缺乏现实的企业相关，它们在当今“认知的复杂性日益增加的情况下”（西蒙，1978：9）假定了“实质上的无所不知和无限的计算能力”（西蒙，1957：202）：“人的精神的表达和解决各种复杂问题的能力，与若要得到解决就需要真实世界里的客观理性行为——或甚至是一种相当接近客观理性的行为——的各种问题的规模相比，是非常微小的”（西蒙，1957：198）。预见不可能完全。计算会有失误。工具理性的理论家们使自己受到完美标准的束缚，但其之不可获得正如其之具有无穷魅力。西蒙的追随者们承认次优（**second-best**）是第一位的，并且以此为出发点：“广义地说，我们的工作是以一种理性的行为——它适宜于接近包括人在内的生物在它们生存的各种环境中实际处理信息和计算能力的方法——代替经济人的全面理性”（西蒙，1955：241）。

西蒙写道，“严格地，只是在人的行为是具有目的理性但该理性又是有限的领域里，才存在着组织和管理的真正的理论”（西蒙，1957：xxiv）。调查的领域继续存在着目的规范。但是，强调的重点从最大化转移到了可接受性，从全面理性转移到了有限理性。数学的制模失去了它的使人信服的力量：在人们没有注意到选择的差幅，也不知道怎样计算可能最好的报酬时，决策人不能使大多数人的爱好受到预算的强制。由于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被揭示出有“严重的误导”，是“没有操作意义的”（西蒙，1978：12）的解决之道的源头，于是心理学成为了切入点以理解各种信念、热望、意识形态，以及假设——即“映象”——并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被受挫的经济至上者引入了选择计算中，那里主观的维度不能简单地从客观的“事实”中单独地推导出来：“当这个区别成立后，我们再也不能预测他的行为——即使他的行为很理性——从客观环境的各种特征之中；我们也需要知道一

些有关他的感觉和认知的过程”（西蒙，1959：256）。换句话说，我们需要访问一下经济至上者的头脑，以换得知悉当他有目的地与存在于他的感觉之外的现象打交道时采用为参考的主观框架：“决策的各个过程，像经济制度的所有其他方面一样，存在于人的头脑之内。它们被人的所知所发生的每一个变化所改变，也被他们计算方式的每一个变化所改变。由于这个原因，通过从无异议假设的一个小的集合中演绎出的结论进行预测和描述人的经济行为的努力，必然会失败，而且已经失败”（西蒙，1976：146）。

演绎的办法必须被停止——但是对合目的性的预期必须被保留。动用他关于真实世界里的经济心理的知识，西蒙阐明，他的目的不是以无理性替代理性来解释人的行为，而是要重建关于理性的理论，使它成为能够，以一些现实为借口，被运用到人的行为中的理论（西蒙，1957：200）。这实际上意味着，西蒙希望看到一个重点上的转移，从实质的或结果取向的理性——“我们只有在环境是足够简单到对（这个）头脑而言是透明的情况下才能期望实质理性”（西蒙，1976：144）——向逐步推进的、探索性的、由原则统治的程序上的理性作转移：“当行为是适当深思熟虑的结果时，它是程序理性的。它的程序理性建立在产生它的过程之上”（西蒙，1976：131）。实质理性与材料的收集和问题的解决有关。程序理性也是如此，但有以下的不同：它松散地与当前有关，通过昨日对所能达到的最好的方法的预先决定。我们以昨日已锻造好的工具探索今日。昨日的理性促成了多阶段的组成。在一个受到种种限制和强制的世界，今日的理性采用可能达到的最好的程序以取得良好的成绩，如果不是最优的结果的话。

过去，显然，作为程序是处于合目的性的核心地位。过去是种种习惯和习俗的来源，当前能依靠它们，当它根据从经验得来的法则——它能使迅速、本能的反应成为可能——与新事物打交

道时。过去提供的图式能使有经验的人用储存在记忆中的习得的决策机制重建熟悉的模式。过去，总之，使得经济的市场既受文化的约束，又为历史所驱动。经济学家若希望了解真实世界的个人实际上是如何使他们的选择在资本主义的体制里富于成效的，就别无选择只有去研究保守主义的方针，即重点集中到收集事实而削减各种计算法。统计学上的推断很容易被经济生活的绝对复杂性所破坏：“即使在计算机的帮助下，人们很快发现自己处于可计算的实质理性的领域之外”（西蒙，1976：135）。好的程序在这个意义上是十分需要的东西，虽然它在一个堕落世界里——那里作决策的头脑，实在地说，“既没有见识也没有智慧去发现‘最优’的道路，即使假设最优的概念还有待清楚地定义”（西蒙，1956：270）——是一个寻常之物。

从过去得出的程序部分地是这样的现实凑合的结果，即计算的理性很少是真正的选择。但是，从辩护的角度看，被确立的程序也是试错得出的结果，是确实曾产生了一定效能的经验的产品。计算能力有限的人很可能从规则中心本身获益。如果据信非理性的标准在过去构造出了好的结果，并且如果竞争的习俗被当作可能曾经导致了不太令人向往的状态，他更有理由从中受益。学习是持续的、当下的经验，既证实着也挑战着各种预期。规则是适应性的，程序是理性的。尽管如此，决策的单位还是被指责为没有作最优化而是勉强维持，没有最大化而是“找一个会引导它追求一条‘满足最低需要’的道路的选择机制”（西蒙，1956：271）。满足最低需要的程序能识别“足够的善”但不能达到最高的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足够的善”可能就是所能达到的最高的善。

众多的决定并不是同时做出的，而是有一个顺序。由于认识到人的决定的连续性质——并摒弃对全知与全能相结合的总体理性的假设——西蒙把满足最低需要与设置满足的起点联系在一

起：“人们可以假定，决策者已经形成了关于他要找寻的选择好到什么程度的一些希望。一旦他发现了一个达到他希望水平的备选，他就会停止搜寻，做出选择。我把这‘称作’满足最低需要的选择”（西蒙，1979：503）。在这样的序列中的行为人不被认为要熟悉所有的选择或能计算所有的后果。所假定的只是他已在心中有了一个他能接受的形象。当他发现了它时他就中断了他的搜寻。边际成本和边际收入与这个行为人的选择并无直接的关联。原因很简单：他不知它们为何物。

应用于汽车或住房的销售，出价是顺序地被接受的，到了一些点位，卖主就必须下定决心：“在一个满足最低需要的模式中，当最高的出价超过了一个希望的水平——它自身也逐渐地向着迄今所接受到的出价作调整——寻价就确定了”（西蒙，1978：10）。应用到商业行为中，一旦承认了“企业很可能力图的是‘满足最低需要’而不是‘最大化’”（西蒙，1959：263），则在效用的理论中，关于利益的追逐就变成了一个副主题。不同的企业很可能有不同的希望值（无须辩白心理收入与金钱的收入存在着差异）。如果有些企业希望高回报而另外的企业其希望值有着较低的门槛，那么没有理由认为效益较低者会被竞争淘汰出局，或利润率会有趋同的趋向。在评估经济成功的指标不是单一的地方，根本很难对市场的功能在事前就做出任何预测。

满足最低获利需要的商业，显然，不能满足新古典主义关于在（完全地）竞争的市场里作有效配置的条件。它的程序是理性的但不是实质性的计算。它的规则是从过去推出的，应用是多期的。它的平衡是动态的，从不静止。它的行为人的希望是风格各异、互不雷同，而宏观经济的成果凡乎是不可能得到稳定。所有这一切都提示着，较之如果政治经济学家能够相信新古典主义的解释会出现的问题，有限理性是使得人们更难对资本主义的功能

产生信心。但是，西蒙的回答会是，他的再诠释只够使这样的经济过程——即被看做已实践了广泛接受为经济成就的标准的经济过程——模式化。他的认知理论并不准备创造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只是要了解它赖以生存的信息加工的机制。

西蒙，当然，并没有说是什么决定了程序原则的内容，或决定了希望的阈限的状况。他的理论没有解释为什么一个特殊的探索法会出现，或为什么采用了这个程序而不是另一个。有限理性说明了过去怎样限制了现在，但并不说明过去是怎样出现以及又如何变化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他的理论不够彻底，不能指明什么是在程序理性中作为罗盘或海图的明确的理性。

合目的性在程序主义中可以说是一个智力迂回的产物。西蒙的各种原则虽然并没有得到经济学家的高估，但还是被有效地接受了，因为它们就是常态的现状。如此地为现存的各种程序作辩护，因为过去的应用虽然不是一个有力的保证，但它们没有使人失望。现在我们进行搜寻用的是次优 (**less-than-perfect**) 的机制。而次优的机制是用低于完全的信息、非或然的计算能力的理想的各种标准精选出来的。虽然允许通过反馈的更新而纠错，并承认西蒙的论点，即复杂性使乌托邦成为了一个无益的比较，但现状的合法化仍然显得使“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原则与一些别的只是差强人意的原则相混淆。即使最大化应被摒弃，即使能假定可怕的执行情况可以被辨别和拒绝，经济依然并不一定显然会自动地趋向可达到的最佳程序。在第三好 (**third-best**) 已是“事实”的地方，在第四好 (**fourth-best**) 满足着有限的希望的地方，似乎在西蒙的理论中并没有清楚的理由解释为什么次优会不知怎么地就演化成了主流的策略。

担心程序理性会在操作时与程序的惰性或甚至与程序的失败主义不可区分的观察者，会津津有味地提出艾因霍恩所举的在一个繁忙餐馆里的侍者的例子为证明：“因为他当班时没有时间为

所有的顾客都提供优质服务，他就对哪一个顾客可能会给出多或少的小费做出预测。那么提供的服务是好是坏就全看预测了。如果服务的质量对小费的数量有影响的效果，结果就‘证实’了原先的判断”（艾因霍恩，1980：282）。当然，侍者也可用相反的探索法来进行实验，以用自我纠正的介入丰富他的直觉。但是，他就会以损失收入（如果他原来的判断是正确的）来得到它（如果他原来的判断是错误的）。显然，他的学习，并不是没有丢掉收入的风险。只要他目前的原则不是太糟，他看不出有任何需要重新考虑他的决策框架。如此，顾客们仍然不会得到好的服务。侍者仍然得不到好的报酬。原因不是被预期的回报与交易成本相比有差数——那是实质理性的不同标准。原因是概念的前说明和认知的前模式化——该程序在这个例子中满足了常识对“尚可”的检验但没有形成任何真正的信心，即它会在一个不怎么好的环境中达到最优。

社会背景使对能达到最好状态的行为进一步复杂化了。孤立状态的侍者还有相当的自由把个人的经验和风格加到对原则的选择。但是，在社会中的个人，就常会被迫满足于参考群体的步伐。

共同的抱负水平的存在是一个社会事实，它被建议、模仿以及要求遵从的人际压力所支持。它是共同的思想模式，是共同的分类标准，是对“这个东西像什么？”和“现在需要纠错程序吗？”等问题的共同的答案。科学也许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标准尺度——但我们从这里开始：“到了客观的、非社会的手段都不可及的程度，人们通过分别地与别人的意见和能力作比较来评估他们自己的意见和能力”（菲司丁格，1954：124）。在受惊的霍布斯主义者那里，无知产生了最坏的东西，甚至不准备相信自己。而共同的抱负水平至少还有一个提供了好的开端的模式。

培育了信心的日常思想框架总是与对被看做到处都是的中间状态的模仿联系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的模式泛着一层令人尊敬的光泽，一种常青藤大学般的，甚至一个新牛津学院般的令人安心的特征：“一旦得到公式化，诡计也令人肃然起敬”（道格拉斯，1987：120）。无疑，已被采用本身就是它自身心理安慰的源泉：在罗马时代，比穿着破长袍糟糕得多的是罗马人实际上对此还根本一无所知。本书是关于保守资本主义的；在此必须承认，集体的正统性也可能意味着有规则的错误，例如放慢经济增长的速度。一方面，我们需要保守主义，因为它使我们有信心。另一方面，我们又需要资本主义，因为它使我们致富。科伊正确地指出，我们欲望的双重性很可能把必然发生的成就不足的边界加入到我们的经济成就中：“社会的各种范式，也就是，各种的习俗，都是被设计来减少不确定性的，它们要发挥效用只能在它们是稳定的情况下……不能达到最佳的标准是我们以习俗解决不稳定性所付出的代价”（科伊，1993：103）。

科伊会认为，共有的抱负水平，是一种混合的探索法，它节约了早期的适应以保持稳定，如果也可说是非最大化的话。集体的正统性显然并不支持整体的效率：“甚至当个人清楚地意识到现存各种习俗的愚蠢，相互之间的检查也可能会使改变失去勇气。共有的范式，因而显得甚至比个人的范式更缺乏弹性”（科伊，1993：105）。

根据“因有名而有名”以及“危难时不择好坏的出路”的原则，这样的探索法能够变得自我强化。它还可因本身受到社会成员们欢迎的原因而变得自我强化。由于社会价值超越了经济效益，对社会最低需要的满足很容易陷入赞同这样的集体习俗，即实际上是浪费了稀缺资源以达到社会认为高于财富的目的。一个例子就是自由民主，它被社会成员所喜爱，甚至在集权主义的计划被普遍地相信是经济上更有力的步骤的地方。换句话说，作为

一个经济心理学的理论，程序理性并不保证，社会化了的男人和女人们必然会愿意从由他们掌握的资源中尽可能地挤出所有的产出。在这样的例子中，他们那样的保守资本主义就不是真空恐惧——即认为规则总是有胜于无的，而是一个得到很好定义的社会共识，即并不只是因为社会制度的潜在生产能力才要重视它们。

西蒙赋予选择的心理学相当的重要性：“当决定决定的一部分环境是存在于决策者的精神中之时，把一个决定描述为‘环境地决定的’是错误的”（西蒙，1976：147）。一部分在精神之中，但另一部分，在它之外的环境之中。社会背景行使着外在约束的力量。经济的市场显然也同样地如此。采用低生产率程序的企业会遭遇到采用成本意识程序的企业的低价竞争。停止了非最大化的企业通常比承担了不能清偿的更多任务的企业更富竞争力。承认市场经济的逻辑的读者们，对西蒙的政治经济学中认知的过程和客观的状态可以被当作补充而不是作为另一条路线的观点印象深刻。至于集合体，在科学和艺术的启发法的运用中甚至也可能存在着大量实质理性的事实多少让人有点安心。除了一个对感觉的强调，没有一个功能的理论，就不能期待在作为整体的经济中，离散的微观模式中的部分平衡会指向总体的平衡。

西蒙的理论可以被有效地看做两个观点的混合。第一个观点，反映着在实验性研究中未被揭示的偏见，即实质理性的理论“并没有提供一个好的预见——甚至不是一个好的近似值——对于实际的行为而言”（西蒙，1979：506）。第二个观点，接受了证据是“一个对新古典主义的假设的直接驳斥”（西蒙，1979：507），即程序理性很好地解释了在信息还有问题并且计算能力也有限的地方，真实世界的人们实际上是如何得出各种复杂的决定。西蒙在这里既做出了肯定的观点也做出了否定的观点。但是，没有一个观点，能没有证据就可以相信。实践中需要的是一

个实证的调查，同时既仔细检查决策者们实际上是如何作决定的，也检查不同的途径实际上产生的不同的后果。

夹在两个对立的框架之间，或许一种谨慎的实用主义是应采取的正确的心态。但是，即使这样，也一点不能是当然的。正如先在论者们和最大化者们会坚持严格的逻辑证实了他们例子中的真理，同样，主观主义者们和怀疑论者们会说西蒙的准理性没能承认未来的现实是绝不可被预见的。西蒙不否认存在着一个客观概率的分布，并暗示只有沉沦的人们才不能知道它的所是。对于西蒙对“足够好”的诉诸，支持极端不确定性的人会回答说，它是植根于曾使新古典主义的最大化丧失了自己的边界的同样的乐观主义。而新古典主义，不用说，也会有一个自己的回答：“我们的假设恰好是建立在相反的观点之上：即动态的经济模式并不假定足够的理性……信息是稀缺的，经济制度普遍地并不浪费它”（穆斯，1961：316）。西蒙站在使沙克尔和穆斯分开的中间地带。在每一边的全面和公开的审视中，其中心是有时限的规则——对保守主义而不是混乱的强调既是最大的优点，也是在过去被相信为“足够好”的现成方针最大的弊病。

决策的原则可能与已经消失的条件相联系：看看对政党的冲动性的投票，先前偏向工党，但是随后又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理智的立宪主义可能由于在认知新事物中的迟滞而培养了安全的错觉：看看军事情报的解释透镜，它集中重点在传统的敌人而没能发现新的入侵者。这样的程序可能使二流的水平永存，因为在另一原则得到实验成功之前，“足够的好”已被宣布了：看看在尚可忍耐的供货商那里发生的重复的购买，这是一个懒人对不逐店购物的借口。这些规则可能都是方便的而不是真正理性的——经济可能使理性满足到这个程度，即使它信任过去的经验。这些规则可能使注意力集中到了单一的维度——选择有很多的维度，偶尔还是矛盾的，但是，这些规则无疑节约了认知容积和时间与

精力的资源成本。如果人们力图通过逐件事逐件事的(case-by-case) 审慎解决所有的问题，实际上就不能做出多少决定了。

各种固定的程序可能提高了经济效率，或者权衡起来是妨碍了它。探索性的理性则必须保持有争论的问题。不过，毋庸置疑的，是决策者会频繁地求助于从经验总结出的原则。各类商业并不计算利润的最大值而是重复习惯性涨价的幅度。卡特尔的价格为的是市场的份额和传统的目标。时尚的领导者被模仿，其基础是巨星最知道哪种样式最畅销。赌徒们走近赌桌前已先安排了何时出局。官僚们援用系统的先例以减少潜在的反。简而言之，探索的理性是熟悉的而且是被广泛应用的。没有任何对常态保守主义的解释能忽略它与经济选择的更广泛主题之间的联系。

四、经济与社会

与他人相隔绝并不使人免于固化的惯性。被丢弃的塔布拉·罗沙，虽没有家庭、朋辈或关于社会化记忆的内化的范畴使他成为一个英国人，仍能成为一个保守主义者。从经验得出推断使他构想的未来就像它的过去一样。他的精神采用从经验中得出的各种原则，它们引导新的认知穿过各种现存的偏见。还没有失望的各种希望在已经变化了的环境中用来应急。在这个假设中的孤独者——绝不是惟一的——似乎，陷入了原本是他自己设定的固定的陈规。小屋在受着野猪的攻击，河流快要泛滥了，而山民皮特仍然在三点钟喝他固定的下午茶。他的以自己的经历为拐棍的倾向正是在前一章中讨论的标准的保守主义的标志。

山民皮特的保守主义可以追溯到被解放的一劳永逸的浪漫的惟一性。它是关于我的保守主义而不是我们的保守主义，是文艺复兴的保守主义而不是柏克的保守主义。因而，它与作为社会的互动、集体的强制、历史的演化以及积累的因果关系——这些压力，以米歇尔·诺威克的观点，典型地把自主性和首创性封存于共同体和文化的共同遗产之内——的产品的规范的保守主义形成鲜明的对比：“我们每一个人最初的体验和反映都在生活过的世界之内……人类对自身最初的体验是社会动物，由传统所塑造，被从社会所获得的符号、语言和思想所滋养。我们的个性只是在

后来才出现了。在我们一生的大多数时间里，我们更多的是被塑造而不是去塑造”（诺威克，1982：61）。塔布拉·罗沙出现在未开化的状态，必须自己创造自己的陈规。社会化的公民则是简单地传递他无法选择的接力棒。

本章的主题是社会生活以及它的传递。它的重点集中在超个人的、超理性的以及超评价的保守主义，认为从早期阶段的重复经验中吸收得来的各种共同习俗有开导和引导人的行为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就不是像使游戏持续进行的有效承诺那样的使行动最优化的边际选择。在关于社会关系的更广泛的科学中，经济学变成了一门分支学科。而经济在关于模式化实验的普遍理论中，变成了一个副主题。

本章的第一部分，“社会的视角”，表明多维的经济学是富于成果的，反对“经济学家的谬误”，即认为只有自律的价格机制才足以解释生产、消费、分配以及交换：“人的经济……是嵌入并陷入制度的，不论是经济的还是非经济的。非经济的结论是重要的。因为宗教和政府对经济结构和功能的重要性可能会与货币制度和工具与机器的生产能力一样”（波拉尼，1957b：250）。本章的第二部分，“习惯与历史”，考量了那些“同于人的普遍性的固定的思想习惯”（凡勃伦，1919：239）——凡勃伦像其他制度主义者一样，把它们看做关于共有的感觉、共同的信念以及集体的惯例的经济学的坚强核心——对经济行动的特殊贡献：“制度在社会中是游戏的规则，或更正式的，是人为设置的规范人的相互行为的限制。因此，它们把刺激建构于人的交换之中，不论是政治的、社会的或经济的”（诺斯，1990：3）。这部分并不否认金钱是要紧的。它所坚持的只是社会的各种习惯也很要紧。

第三和最后的部分是有关卡尔·波拉尼——他对20世纪30年代的失业和法西斯的看法是社会经济学的，即认为不论制造和销售不过都是社会在运转：“我们发现自己被市场经济的遗产愚

弄了，它留给我们的关于经济系统在社会中的功能和角色的观念过于简单。如果要克服危机，我们必须获取一个关于人的世界的更加现实观念，并根据这个重新认知来形成我们共同的目的”（波拉尼，1947：109）。我们必须思考并且我们必须行动。在教科书的交换中的无家的我并不充分：“没有什么能像经济学家的偏见一样有效地遮蔽了我们的社会观念”（波拉尼，1944：159）。

4.1 社会视角

保守资本主义存在于社会经济之中。理由很明显：虽然山民皮特在没有人真空中可以成为一个保守主义者，他却没有办法在没有供应商、合伙人以及顾客的情况下成为一个资本家。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社会的经济。本节分三部分展示了一些路线，在其中，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在处理社会结构中最接近于国民财富的那部分的同时，也从事于集体的行为和互相的支持。

(a) 经济学的定义

经济学通常被定义为关于竞争机会的科学研究：“经济学是这样一门科学，它把人的行为作为在各种目的和各种稀缺手段——它有着选择性的使用——之间的关系来研究”（罗宾斯，1933：16）。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是关于有限选择的科学。它是关于俄狄浦斯在十字路口选择的科学，是罗密欧选择朱丽叶的科学。

对于一门研究在东伊甸园的吝啬者中做决策的科学——那里并不是所有的道路、所有的伙伴以及所有的干草束都可以被自动地选择——有很多东西可说。但是，定义上的困难在于，所有人的生活都在那里。在换一个电视频道或替换一对筋疲力尽的夫妻也是经济学的地方，经济学就变得什么也不是了，因为没有什么不是经济学：“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家没有什么对象性”（科

斯，1988：3）。

不过经济学家确实具有对象性；其界限可以从经济学家实际所作的研究中推导出来。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以企业、工业、消费者、市场、资金、就业等为措词划定了学科界限，阐明了是人所欲求的增值的生产和分配，而不只是寿命以及其他资源的可察觉的稀缺性，给了他研究的分支学科明确的身份：“经济学是一种对人的研究，它所研究的人是在普通商业生活中生活、行动和思考时的人”（马歇尔，1890：12）。马歇尔明白普通的商业生活意味着商业的普遍生活。同样的还有理查德·伊利，他坚信经济学绝对是对生产和它的分配的研究：“经济学是这样的科学，即它处置的是那些源于财富的获取和财富的使用的人的活动的社会现象”（伊利，1893：2）。马歇尔和伊利都不相信，一旦消费者已达到了自感饱足的顶点，生产者还会继续扩大对其产品和服务的提供。到这个程度，稀缺的条件是暗含在两者的著作中了。它之所以在二者的著作中是暗含的是因为它是作为整体表达在人的生活中的。不管是暗含的或明确的，关键的是马歇尔和伊利都没有使它成为使他们的学科分离的特殊特征。

J.R. 康芒斯，与马歇尔和伊利一样，在具有物质头脑的大学生都能容易地理解的程度定义学科：“经济学所处置的是人的这些问题，即当他们四处奔忙着谋生和致富时的问题”（康芒斯，1950：21）。在康芒斯的经济学中，稀缺是存在的，不管明显还是不明显。但是，从它推出的结果，是对达成协议性规则的人为强制：“起源于稀缺的不仅是矛盾，还有因相互依赖而建立了秩序的集体行为”（康芒斯，1934：6）。产生于物质匮乏的是——其接生婆是“协商心理学”（康芒斯，1934：7），互相迁就促进修好的谈判——各种可行原则，它们赋予财富追求一个保守主义的结构。没有这些规范，康芒斯认为，就没有利益的足够和谐来维持拨款和转账的行为。这就是为什么康芒斯要澄清，他

的经济学首先和最重要的是对有控制的集体行为的研究，只是其次才是对土地、劳动以及融资的研究：“制度经济学是人和人的关系，而工程经济学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工程师关于财富的概念排除了所有有关所有权经济的东西，而所有权经济是关于各种权力、义务、自由以及承受风险的演化之历史和制度的经济”（康芒斯，1934：256）。经济学是关于人和自然的研究，但也是关于人和人的研究。两者一起，而不只是绝对的配置，划定了可以被经济学家正确地称为自己的领域。

西蒙如下谈到经济学和它的边界：“广义地说，经济学可以被定义为描述和预测数种经济人的行为的——特别是消费者和企业家的行为的——科学”（西蒙，1959：253~254）。像马歇尔、伊利和康芒斯，像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西蒙在这儿把学科定义为对国民财富的研究。经济学家描述和预测国民产值的创造，解释为什么家庭消费随收入而增长，以及国民收入是怎样分配的。经济学家，“显著地”，描述和预测供需对话以什么方式提出由劳动分工引起的协作问题。西蒙可能是最后一个对贸易关系的包含关系加以怀疑，或给它贴上无效标签的人。如果种植业、采矿业、制造业都与国民财富有关，那么通过有秩序地进行剩余物的交换而使生产计划成为可能的交换过程也必然如此。

肯尼斯·博尔丁走得更远，他把对交换的研究当作经济学家的领域的明显特征。因把经济学规定为“对‘经济领域’的研究为的就是获取关于它的知识”，博尔丁把“经济领域”定义得非常明确，就是“社会领域的一个分支或所有被交换现象打上特殊标记的人的行为、关系和制度的领域”（博尔丁，1966：22）。有目的的销售当然也在此之列。

穆勒使市场成为信息的核心：“只有通过竞争的原则，政治经济学才有了具备科学特征”（穆勒，1848：242）。布坎

南也把自由交易看做使命：“作为一门学科或探索的领域，经济学的社会价值能提供一个对秩序的原则会从分权的过程中突然出现的理解”（布坎南，1979：282）。市场采用“金钱的尺度”（庇古，1920：12）来测量主观的强度；并且通过个体谈判的多次交流来调节利益的分歧。用这样的方式，穆勒和布坎南认为，市场商人式的心态有助于既文明又富于生产力的社会互动。由于有这个可能，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一定不要与实证经济学相混淆。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对国民财富的研究。有时它会赞同市场，有时则不。但是，它总会特别地保护它的智力自主性免于任何单一的工具性。

(b) 经济学与社会学

经济是一座城池，社会是一个透镜。经济学有关生产、消费分配和交换。社会学有关相互依存的感觉和人际的关系。没有什么经济活动是不以相互依存的和人际的东西为前提的。由于自小被弃为野人是个例外，山民皮特是个反常，观察者因而最好以具有显相功能的透镜观察他的城市，而不是假设对孤立个人的孤立研究就能对一个连接在一起的整体产生真实的映像。

马克斯·韦伯把社会学定义为“这样一门科学，它企图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为从而达到对它的过程和效果的因果性解释”（韦伯，1947：88）。他的定义有两部分。从主观上讲，正因为人的行为有着使它与在物理学中观察到的机械反应相区别的个人“意义”，社会学家必须采用想像、感应、移情等方式来理解理性的和非逻辑的过程，它们在刺激了行为的观念和情感（有意的和潜意识的）的方面使行为得以理解。从客观方面讲，社会学家必须用如下方式以经验主义补充解释，以便从不同个人的精神中产生出集体的模式——横向的标准化，它保证共同的环境激起一个共同的反应；时间上的标准化，它把超时间的一致性固定到共同取向的团体中；奖励和惩罚，它们产生了可预见性并压制了矛

盾。韦伯的概念化显然是一个心理学（从业者把自己放入行为者的精神中，以确定主体会用什么方式考虑别人）和统计学（从业者收集有关记录过的统一性和关联性的信息，以对可能的因果做出有条件的预测）的混合物。它的理论上的事前总是个体的——“没有什么集体性的人格可充任社会学的目的”（韦伯，1947：102）——但是它的实证的事后能够像国家一样是宏观的。它对理解经济过程有着直接的关联。各种各样的银行、股份公司以及工会都是增值城市的居民。投入理解加上推断就组成了研究的透镜，无它，则它们的行为模式就会被看做偶然的，如果它们真的能被看见的话。

艾米尔·迪尔凯姆，像马克斯·韦伯一样，是有助于划定社会视角的重要洞察力的源泉。他总是从整体而不是从细胞开始，强烈认为集体的事物控制着原子的事物——“除非社会存在，就不可能有社会学”，“如果只有个人，社会不可能存在”（迪尔凯姆，1897：38）。迪尔凯姆拒绝实用的自由主义的所有形式，它们力图使共同性成为不过是各部分的总和。他对使共有生活的自成一体性成为不过是不可减少的身体和基本必需的精神的生成物的拒绝，被经济学家康芒斯所复述，他坚持一个蛋糕并不是各种原来成分的简单集合体：“‘社会’并不是孤立个人的一个总和，像一个人口普查似的；它是协作的个人的一个倍数”（康芒斯，1950：132）。替代把整体的成员当作仿佛是一个个孤立的山民皮特的无背景的因子分解，迪尔凯姆提出了一个围绕“社会事实”概念而建立起来的综合的而不是还原的方法。一个社会事实虽然是外在于主体的，是通过个体在语言、宗教和信用方面受训的学习过程而内化的，但它依然也是一个存在于主体的意识之中的“行动、思考和感觉”的模式，因为它已被外在的普遍集体精神植入在那里了：“社会事实是因要影响个人而在个人中重复的集体条件。它因存在于整体而在每一部分中被发现，而不是因存在

于各部分而在整体中被发现”（迪尔凯姆，1895：5）。一个社会事实是一个约束而不是一个选择的对象。对规范的遵守能够被法律和制裁所加强。同等地，遵守也可这样得到保证——“空气不会因为我没有查出它的重量而变轻”（迪尔凯姆，1895：5）——通过习惯和良心，通过排斥和嘲笑，通过竞争过程的制度化的逻辑，它可防止创新天才们卖出不应卖的东西。即使在以财富为取向的部分，迪尔凯姆坚持认为，外在性和约束性使得我成为我们中的一个齿轮。

真理是整体的。这个认知，同于迪尔凯姆的社会学和格式塔的心理学的，使得阿希强调相互联系论和整体论的解释力：“如果各种行为和经历都处在相互依存的联系中，那么我们就必须以它们为其中一部分的单元进行研究。在对社会事实的思考中，没有什么错误比不能看到它们的位置和功能还要严重了”（阿希，1952：60，61）。各种对象依背景的色彩和支持的角度而有所不同：“当被观察的现象有着秩序和结构时，把注意力集中在部分而看不见它们的联系是危险的”（阿希，1952：60）。依记忆的环境是积极的（像家庭圈子或和乎烟斗）^①或嫌弃的（像厌恶疗法使用的条件反射），对象在联合上有区别：“在我们的周围，我们很少有什么对象不会因先前对它的接触而产生不同的感觉，并且很少有什么行为不因过去的事件而产生变更”（阿希，1952：90）。对于意识和解释，阿希认为，最好不要理解为孤立的和一次性的，而要理解为联系的和习成的。应用到经济学，这意味着每一个行为和动机都应被看做不是“自然的、永恒的和不可改变的，”而是偶然的和相对的，是由那些独特的东西造成的特殊条件和人际关系的产物：“我们要学的第一课就是我们不能把关于人的任何观念想当然地当作不证自明，比如，像经典经济学把获

① 指北美某些印第安部落于庆典和集会等场合使用的象征和平的烟斗。

利的动机当作经济学的中心事实的假定”（阿希，1952：7）。历史的、人类学的、归纳的、相互联系的——从阿希的有条件的相对主义得出的是不同的社会应研究不同的经济学，而不是被那些在商业中发财的中产阶级的中年美国人的世界观统一到他们的经济学中去。

阿希力图表明经济活动是被完全整合到其周围的社会交往的基体中。他把财富的创造看做一个社会事实的观点为沙林斯所赞同。沙林斯期待经济有文化的再生产而不仅是物质的再生产的效果：“人不仅是‘生存着’，他们还是以确定的方式生存着。他们是把自身作为一定类型的男人和女人、社会阶级和集团而进行再生产的”（沙林斯，1976：168）。在详细论述了其经济生产是建立在家庭共产主义的共生、合作和共居基础之上的猎人和采集者后，沙林斯强调指出，在这种条件下的经济是社会的一个功能而不是一个独立的结构或体系：“甚至连原始社会的‘经济’这个说法也是不真实的。从结构上说，‘这个经济’不存在。这个‘经济’与其说是一个确切的和专门的组织，不如说是某种对社会团体和关系，特别是亲属团体和关系进行概括的东西”（沙林斯，1972：76）。沙林斯在这里特别提到前市场社会的家庭团结。但是，更概括的命题，即财富的创造是指号和符号的基体的一部分，对他来说也是生活的一个事实。

因此，当致力于“资产阶级社会就像他致力于所谓的原始社会一样”时，沙林斯宣布“物质部分并没有有效地从社会中分离——仿佛原本首先要通过开发自然来满足需要，其次才是人们之间的关系问题似的”（沙林斯，1976：205）。经过扩展家庭的调停，或经过买和卖的调停，“意义”赋予了秩序——它指定了男女之间的分工，看待牛为食物狗为腐肉，法定了所有者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就此而言，“意义”本身是使经济学家产生物质稀缺感觉的原因——是为什么贪婪的人受着无尽欲望的驱使永远有无

法满足的需要（经济人是一个资产者的结构）而原始人却能以“无需则无缺”的心理自由使自己感到满足的原因：“他的欲求很少而他的手段（相对地）很丰富”（沙林斯，1972：11，13）。沙林斯认为，是观念和意识把物质产品和社会关系绑到一起，组成了再也不能有效地重新划分为其成分的共同体。对于精神和物质，经济和社会，沙林斯赞成拒绝把财富的创造看做独立之事的人的行为理论。

(c) 通往社会经济学

财富的创造一定不能被看做独立之事：“像亚当·斯密曾很好地理解的，经济生活是深深根植于社会生活之中的……离开了产生它的社会的习俗、道德和习惯，它是不可理解的”（福山，1996：13）。经济生活，福山认为，除非在比较文化中给出它的背景，否则它是不可理解的：“经济学……以社会生活为基础，并且离开了现代各个社会是如何组织它们自己的大问题，它就不可理解”（福山，1996：XIII）。福山用了“不可理解”这个短语。他的话没有错。福山说的是，太抽象和太形式化的经济模式，不能提供对经济体制实际上如何运作的充分解释。

福山对广度的要求得到了乔治·阿克洛夫的回应，他支持这样的经济学，即解释的不仅是为什么当整套价格下降时需求的数量上升，或“为什么你在纽约总能买到菠菜”（阿克洛夫，在瑞典，1990：68）：“正如传统的法国烹调不用海藻或生鱼，新古典主义也不从心理学、人类学或社会学中得出假设。我不同意任何限制经济模式中的要素性质的原则”（阿克洛夫，1984：3~4）。阿克洛夫对开放性的赞同使人想起 J. K. 加尔布雷斯的折中主义，他总是寻找着最适合于现有工作的工具，总是准备绕过固有的学术分工，其理由是“很遗憾，世界并不是整齐地按划分专家的线路进行划分的”（加尔布雷斯，1967：393）。虽然相信“学科的界限是传统的和人为的”（加尔布雷斯，1967：26），加尔布

雷斯也不相信多学科性，以免非法入侵的制度化被当作一种虽不合法但却是对无理性新领域的承认。加尔布雷斯坚持认为，需要的不是封闭的学科之间有礼貌的合作，而是无偏见的调查研究，即对整体的现象进行调查研究而无不变的职业性的学派自满：“现代的经济生活会被看得跟清楚，若……努力把它看做整体”（加尔布雷斯，1967：25）。

像福山、阿克洛夫和加尔布雷斯这样的思想家，以斯密、马克思和熊彼得等早期作家为基础，都赞成以一种广泛而折中的方式对国民财富进行研究。他们对社会知情经济学的强调——它不假设任何单一的制度化结构、规范性取向或客观的功能——清楚地使他们对人的生活的解释与新古典主义正宗的较少人文较为机械的经济学相区别。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在应当倾听时却在说。因而社会知情的经济学的第一个规定性特征是否定性的，它尖锐批评有着太多理所当然的过分自信的倾向。第二个规定性特征较为积极，一个社会知情的经济学是关于观念、交往和过程的经济。它是关于人的经济学，也是关于产品和服务，当且仅当它们与人相联系时的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是服从于资源限制的最大化。它广泛地应用数理逻辑，包括微积分。它倾向于把注意力放在单一个人（效用最大化）的或单一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原子选择。它解释行为怎样破坏了平衡而反应又怎样重建了它。它采用的是一种从两个密切相关的公理：工具理性和自利的人，中推论出的演绎的方法。它通常假定人的本性、财产权以及消费偏好都是外源的且永恒不变。它通常视市场为竞争的，信息为充足的。它赞同手段和目的意义上的强制性节约：没有任何以摆脱国家贫困为目的的科学会容忍无效，或会指责使从有限的财富中榨出的福利得到最优化的仔细计算。它支持消费者的主权、天然的偏好以及选择的自由：它的能最大程度满足需求的理论假设了自愿的交换、市

场供需平衡的价格以及尽可能从政府干预中解放出来的看不见的手。最重要的是，它不涉及价值。哲学家们认为像自主性、无匮乏、利益、效率以及选择等概念都载满了价值并且易于引起争论。新古典经济学则不如此。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中，这些概念根本不是价值判断，而完全是生活的事实。

新古典经济学让人相信，它的背景假设是相当合理的。对于总要把钱花得值的经济人的男男女女们在真实世界的意义，它从无深刻的怀疑。即使这些先入之见自身是让人怀疑的，甚或，它们本身并不必然会影响新古典主义公理的实际效用，如杜威式的最关心结果的实用主义者所见。因而米尔顿·弗里德曼，他阐明知识和理智并不是经济学家最希望有效地最大化的稀缺效用，认为若假设是“好”的，并不在于它们是“真”的而是在于“理论是有效的”——“即意味着理论是否有效地产生了准确的预测”（弗里德曼，1953：15）。弗里德曼会认为，社会经济学家是在作徒劳的反对，当他们抱怨“让我们作一个假设”是心理学上的贫困和文化上的丧失。对于要履行职能的经济学家来说，预测是目的，解释则不是，而描述则几乎没有价值：“理论的意义越多，假设就越不现实”（弗里德曼，1953：14）。上帝咳嗽之后会吐口水——以这样胡说的联系来预测打雷之后要下雨的经济学家，在岸边也能卖伞赚很多钱。

新古典经济学以表达的严谨和预测的准确这两项标准来判断自己的成功。在这种情况下，它对批评它过快地上升到演绎而不“进行观察人的艰苦工作”（西蒙，1959：254）的意见并不敏感。经济学的主流，西蒙写到，过于迅速地省去了人之真实所是的细节——它们建立在原始的材料上，既是定性的也是定量的，通过众多的访问、问卷、个案研究、态度调查以及对参与者的观察而艰苦地得出。而主流经济学家，西蒙继续写道，过快地躲到关于理性和自利的天真漫画中，不论时间和地点。它漠视偶然性的多

样性，所持理由是一个专门研究稀缺的人完全“不需要一个关于人类行为的理论”：“他想要知道人们应是怎样行为，不是他们实际上如何行为”（西蒙，1959：254）。西蒙对过于内视的职业议程不感兴趣，它关心的更是抽象的推理而不是人类学的根据，以及一切易于忽视主题不适合被符号简化的东西。西蒙相信，所需要的是更广泛的计划，它不受特殊的先在性的束缚，而是向永不停止的新发现的输入开放。不难预测新古典主义者对实证主义者要求证据的反应。归纳法本身是好的，但统计学相对于目的只是一种手段。历史学家们为自己的利益打算要搜集材料。经济学家们在岸边只买他们需要提供的胶套鞋而不是冰激凌。

社会经济学显示它对相对性和环境更为重视，新古典经济学则更加相信抽象和普遍性。社会经济学因而更倚重于只使用暂时性假说的事实搜集，倚重于容纳了搜集到的事实的解释，而不是把现成的标准的意义强加给它的解释。社会经济学，更明确地，把它的事实搜集和它的解释引向社会科学探索中的三个紧密相连的领域。

首先，是感觉。经济是通过精神而折射的。化学的反应并不思考，物理的数量没有知觉。人们是有差异的。社会经济学力图理解藏在与财富相连的选择后面的各种思想和动机。它特别关心集体中的个人的模式化反应。在它通过既是相互依存的又在个人之内的精神状态来研究与财富有关的东西的运动中，它的探索唤起了韦伯的“解释性的理解”，迪尔凯姆的“集体的表征”，阿希的法则，沙林斯的符号——以及深深固定了的社会所有化，它导致帕森斯和史密斯这样谈到先天的心理本质的意义：“个人并不是效用最大化的规定单位”（帕森斯和史密斯）。我们生存于内的社会对我们每一个人低语它计划我们去作的选择。社会经济学研究的就是这些感觉，内化的和普遍相似的感觉。

凡勃伦反对实用主义的快乐主义的经济学把人比喻为一个

“关于快乐和痛苦的快速计算器”，一颗“渴望幸福的同质水滴”（凡勃伦，1919：73）。他认为，把丰满的人的本质削平为教科书对理想类型的资产者的简化，是既无根据又产生误导。他的质疑和批评后来为科斯所赞同。科斯在经济学家理想类型和真实世界固有的态度之间没有发现什么联系：“经济理论中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与克拉伯姆之车上的乘客没有什么相似性……没有理由设定大多数人都从事于对任何事物，除非它是令人不快的，最大化的，即使这是不完全成功的”（科斯，1988：3，4）。因而更有效的焦点应放在各种真实的感觉而不是假设的感觉上，即那可能不被克拉伯姆车上的乘客认为是自己的感觉上。

人的精神的内容是有名地难观察。社会经济学尽其可能地用韦伯的投入理解的移情理解来发现人们真实的所思所感。它对主观性和意义的探索，不管多么模糊、主观和不精确，在康芒斯如下对进入精神状态的要求中得到很好地捕捉：“经济学家所需要的是理解，他需要度量只是作为对理解的一个帮助。经济学家们处理的题材不是一个机械装置或调查者不能理解其动机的机体——而是他能通过‘身临其境’来很好地理解其行为的人”（康芒斯，1934：723）。除了有关什么、怎样、多少，还有关为什么，经济学家像精神分析师一样，不管愿不愿意都必须把他托管的人请上诊断台。

社会经济学整理的是理性的程度和性质，以及工具理性通过集体价值而合法化的范围。社会经济学评估的是由敌意、仁慈，以及从同化到独特的社会集团中的典型的个体那里认出的商业的自利所组成的特殊混合物。社会经济学研究的是由内在的满意、同辈团体的竞争，以及通过广告和影响消费者的推销术而创造的需求等所产生的相对影响。社会经济学还研究逐利的商业平衡，以及在组成企业的个人的实用功能中其他人的目标的平衡。简而言之，社会经济学，建立了一幅关于环境中的各种感觉的图画，

它，或是实用的或不是为了在沙滩上卖伞，有助于在人性的方面解释为什么人们像他们所做的那样行事，当他们从事供给和需求活动时。

其次，互动。经济可以被概念化为孤立的个人做出离散的决定，为无根的无名者通过敏感的价格机制的自我规范的自动性而在一个协作的整体中结合在一起。经济也可被看做角色的扮演和社会的期待、结合和共识、历史和环境。社会经济学，拒绝自由主义的以独立的交换来鉴别经济活动的推论，赞成后者的视角。代替价格机制、重力和自然法，它提出结构和重复的部分应成为对国民财富探索的主要重点。

因此伊茨奥尼批评市场自由主义把过量的重要性赋予了独立的决策者，并认为“个人在其中活动的社会背景”是“不可分解为人的活动的”环境：“社会的各种集体……是主要的决策单位”（伊茨奥尼，1988：4）。在纯正的迪尔凯姆的意义上，各种模式和秩序都是外在的和强制性的：“经济学家通常研究的那些决策类型——人们买的是什么，他们投资了多少，他们工作有多努力，等等——除了反映出他们所属的团体外，还极大地反映了他们的社会、政治、文化和亚文化以及阶级”（伊茨奥尼，1988：181）。因而，极端的还原主义者最好还是记住，我可能根本不是社会选择的基本单位：“没有历史的或逻辑的理由可假设充分形成的人是先于社会或共同的规则的。实际上……个人不会存在，如果没有社会和规则的话”（伊茨奥尼，1988：199）。各种模式和秩序的内在化至少保证了共同的身份不一定被感觉为强加的约束：“相反，社会的背景是，在重要意义上，是被视为一个人的生存的合法而必须的一部分，是一个我们，一个个人是其中的构成元素的整体”（伊茨奥尼，1988：5）。此外，社会的我，不仅是宇宙价值的消极的陈列室，还保持着运用他的积极创造力回应变化世界的的能力。社会的我显然既不是社会化不足（在把共同体

简单地视为一个“个人们为了他们自己的方便而临时联合的聚集体”的算计的契约主义的意义上),也不是过度社会化(在约定俗成的极权主义上,例如使“共有的联合体”而不是自由的主体成为“权威和合法性”的单一源泉)(伊茨奥尼,1988:8)。社会的我,是折中的生物,是平衡的生物,在尽量充分利用“创造性的张力”,即在自由的革新者与周围的我们之间对话时,最为活跃:“个人与社会相互塑造着并且相互需要着。社会不是一个外在的‘约束’,甚至也不是一个机会,它就是我们”(伊茨奥尼,1988:9)。伊茨奥尼接近资本主义经济的方式显然不是经济最大化者的方式。作为对我和我们的一个研究,他的社会经济学的中心主题是自由个体们在集体的母体内的互动。

卡尔·马克思也把国民财富看做人们的互动:“显然,商品不会因自己的利益而进入市场和进行交换。因而我们必须依靠它们的监护人,也就是它们的所有者”(马克思,1967:84)。由于强调所有权和阶级的有系统的特有形式,马克思根据经济资源和生产功能对主体进行了归类:“出现在经济舞台上的各种角色不过是存在于他们之间的经济关系的人格化”(马克思,1867,85)。他还建议,经济学家应潜入市场价格表面之下进行深入研究,以免“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被错误地视为“事物之间的关系的虚幻形式”(马克思,1867:72)。马克思,深信一切价值皆产生于劳动而商品拜物教却通过资产阶级掩盖了剩余价值的异化,十分注意可变因素的经济重要性,例如权力的关系、意识形态的信念、财产权,以及政治的联动等,它们后来都被定义出经济学,埋葬于无变化的英镑了。马克思看不出有理由假设别的事物是稳定的,当它们实际上处于削减的边缘。

第三,过程。社会经济学研究感觉和互动。它也研究感觉和互动中一直发生着的变化。感觉和互动,就像国民财富自身一样,并不是结果和终极状态,平衡和目的地。相反,它们是历史

和演化，发展和过程。因而，在观念（例如成就和契约）和现象（例如多国公司的建立和计算机主义的盛行）中勾画出变化，以把观察到的已发生的事物安置到一个总是流动的永不停息的背景中去。

背景是流动的——但流动的大多数背景其流动都有一定的滞后。像丹尼尔·贝尔那样本质上的保守主义者，他从返回来和今天继承了他们权利的继承者一道捍卫传统的滩头阵地的先祖们的形象那里吸取了伟大的灵感：“当一个人被切断了过去，他就无可逃避未来会持有终极意义上的虚无”（贝尔，1976：50）。但是，像卡尔·马克思那样本质上的现代化主义者，对于那些退化了的制度既不伤感也不同情，它们已经变成了新的发展的一个障碍：“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马克思，1852：315）。不管以什么方式，习俗的惯性在关于社会化了的男人和女人——他们通过习得的反应处理未来——的保守资本主义中，都是十分重要的主题。

过程意味着习惯的、以时间为主导的以及熟悉的东西。社会经济学显然并不先在地期待，选择，不管多么理性和节约，没有记忆就不会发生。过程也意味着持续之物的可变性和非计划之物的持续性。在这个意义上，正如它对现状阻力的敏感，社会经济学研究的是各种新习俗的发展。一方面是自我的存续，另一方面是对惯例的挑战——凡勃伦能通过把“变化”和“强化”相似地安置于演化图式的母体内来解决在稳定性和弹性、刚性和新奇性之间的明显矛盾：“今天的环境经过一个选择和强制的过程，通过作用于人对事物的习惯观念，也就是改变或加强从过去传递下来的一个观念或一个精神状态，来塑造明天的各种制度”（凡勃

伦，1899：132~133)。今天的经验有时威胁昨天的习惯，有时又强化它们。演化的视角说明了各种趋向在永无完结的社会过程的流动之中的平衡。

4.2 习惯与历史

感觉和互动，与过程不可分割，通常是从过去延续下来的集体生活方式的规范和标准：“制度是习惯的产物。文明的增长是习惯化累积的结果”（凡勃伦，1919：241）。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凡勃伦写道，错误地忽视了作为后果的累积的因果关系和预定的选择：“边际效用的假定，以及快乐主义的成见，普遍地在这一点上十分失败，因为它们把注意力限定在这样的经济行为的方式，诸如被习惯了的规范和观念想像为不受条件约束的和对习惯化不产生影响的经济行为的方式”（凡勃伦，1919：243）。一个更为现实的途径，凡勃伦认为，应是使思想和行为的习惯化成为国民财富研究的中心主题：“任何科学，例如经济学这样要处理人的行为的科学，变成了对人的生活图式的遗传学研究；并且，在如经济学那样研究主题是人在处理物质生活资料中产生的行为的领域，科学必然是对物质文明历史的探究”（凡勃伦，1919：241）。像经济学那样的行为科学必然是对历史遗产的探究，对“通过先辈们的经验积聚的思想传统”（凡勃伦，1914：7）的探究。像经济学那样以财富为指向的学科必然是对遗传的特性和传统的期待之间持续的日常对话的一种探究：“个人的经济生活史是一个手段适应随过程的推移而逐渐变化的目的的累积过程，行为人和他的环境在任一点上都是过去历程的产物”（凡勃伦，1919：74~75）。作为一门行为科学，一门以财富为目标的学科，经济学，凡勃伦强调到，不是静止的和点状的，而是经济的历史，是运转中的社会的活动画面。

凡勃伦，在他把经济学当作经济史的解释中，赋予了文化延滞和自我强化的规律性以重大意义：“人们现有的思想习惯倾向于无限期地坚持，除非环境强制其变化。这些被传下的制度，这些思想、观点、心理倾向等的习惯，或诸如此类，等等，自己本身因此就是保守主义的因素”（凡勃伦，1899：133）。当前的选择，甚至在计算是有意识的、有目的的、理性的地方，仍然大部分不大可能是从头做起的，不大可能在没有先例的记忆或人际接触的压力下进行。由于与集体的习俗和模式结合在一起，标准化的常规和法统化了的实例是重复和模仿的一个源头。它们是不仅控制着收入的余数，是不仅约束着政府的余数。它们也是这样的余数，即当前的服从可能不是对某一潮流，而是对某一具体刺激产生的一种共同反映。用道格拉斯·诺斯的话：“历史是非常重要的。它之重要不仅因为我们能向过去学习，而且因为现在和将来都通过社会制度的延续而与过去相连。今天的和明天的选择都由过去所塑造”（诺斯，1990：VIII）。历史是重要的。传统是重要的。1530年的挑战在招手。通往1241年的门大大敞开着。

像法律一样正式，像礼法一样弥散，遗传的惯例是全面地研究国民财富所不能忽视的一个文化的维度。文化保守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的可能影响是一个更难归类的题目。根据最有助于适应的刺激结构不是最适合于动态发展的刺激结构的说法，有一个不能否认的预测萧条和停滞的诱惑：“在这个体制框架内发展起来的各种组织会变得更有效率——但是在使社会更不具生产性和使基本的制度结构更无益于生产活动方面更有效率”（诺斯，1990：9）。过量的文化负担可能确实对生产力的进步有沉重的影响。但是，重要的是，文化辘重的不足也会产生同样的抑制影响。有些社会习惯，历史的遗迹，确实不是对增长的社会限制，反而是对国民生产函数的有价值的投入。

(a) 参考体系

原始材料必须经过筛选和处理。过量，而非匮乏，才是问题所在——不过文化的过滤器提供了一个向导和权衡体制：“文化提供了一个以语言为基础的概念化框架以对由感觉呈递给大脑的信息进行编码和解释”（诺斯，1990：37）。甚至有一张在过去绘制的地图也比被根本没有地图而做出的理解所包围要让人少些糊涂。特别在变化是缓慢的、递增的和持续的地方会是如此。边际主义在渐进主义意义上用尝试和验证的图式使做出合理的估计成为可能。革命和冲动则使得选择和对材料的甄别更为困难。

在自然而不是人为的地方，信息能被以源于经验的效率所采用，以这种方式不必要的成本得到避免。不同的人体验不同的现实：边缘的人必然利用修改了的过滤器。外在的现实本身是发展的：边缘的理论必须更新以保持它们的解释力。在边缘产生差异和发展是一个稳定法则的温和的例外。不过，在自然而不是人为的地方，例外可能造成的对体制价值的怀疑小于事实上由过去的信念和实践所发生的激进性破坏。尽管遭受了二战的毁坏和创伤，日本文化仍明显地维系了自身的同一。非正式的俄国礼俗在遇到苏维埃社会工程师的法令时显示了非凡弹性。一个文化的破坏必须明显地是一个真正根本的破坏。

由于人们把新的刺激物纳入习惯了的形象的背景，并抹去不希望出现的事物因为它们在熟悉的框架内没有位置，所以当它们力图理解外在现实时，他们求助于现存的体系。他们使用的程序可能像私人和个人单凭经验得出的方法一样是个别的，或像共同和共有的选择标准一样是社会的。有一个为社会知名的经济学家的观点是，共同的东西更有价值，先在的范畴能够成为集体的财富而不简单地是对个人习性的启发——因此能够自由思考的人们，在由“信息发生装置”所设定的限制之内，通过“对期待加密的实践”（哈格瑞弗·赫尔普，1989：72）经常运用他们的选择

来进行推理和作解释，而这些限制原来就是一个带有自身特点的集体所共有的制度：“它们涉及共同持有的行为与思维习惯的模式，涉及到一个常规化的而且持久的性质的模式，这些模式与在团体或更大的集体中互动的人们联系在一起”（霍奇森，1993：253）。稳定而迟滞，共有的透镜发挥着对个人视力限制的作用，但也提高了被视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聚合体在一定时间内的内聚力。

(b) 规范的指导

制度解释着原始的事实，并把感觉导入被许可的模式。它们也影响行为，“把一些规则告知人的行为实践”（哈格瑞弗·赫尔普，1989：72）。在思想或行为、精神或物质上，习惯和传统的事物使规范的指导标准化，并鼓励可预测的表现。制度，“通过传统的实施、习俗和法律的约束”，倾向于，霍奇森写道，“产生行为的持久而常规化的模式”，它对于反应的预测是不可缺少的条件：“正是持续性和常规性，在一个非常复杂并且有时又反复无常的世界中，使得社会科学的任何实际应用从根本上成为可能”（霍奇森，1988：10）。资本主义包含着自发性、新奇性、计谋和想像力。保守主义通过保证将以既确定又可预见的互动的基石来补充企业家的首创精神，使资本主义成为可能。

制度使个性系统化，也使行为变得确定。它们之做到这一点，正如阿克塞罗德解释的那样，是通过规定和惩罚的混合使用：“一个规范能够生存的给定社会环境是，个人通常以确定的方式行事，并且当被看到不如此行事时经常要受惩罚”（阿克塞罗德，1986：1097）。因此，就正规的法典来说，法庭和警务人员都承担着执行习惯法和成文法的任务。侦查犯罪和强制服从是防护性基础设施的义务（一种执行成本不可小视的义务）；然而选择会招致制裁的不可小视的预期价值的冒险是自愿背叛者的选择。并且，就非正式的法规来说，规范是未成文的和分散的事实

并不意味着它将不能获得社会强制的地位。帕森斯和史密斯已经把非正式的制度描述为“这样的道路，在其中，通过对角色期待的定义和动机的组织，一个社会系统的共同文化的各价值模式在各单元的彼此互动的具体行为中被连接成整体”（帕森斯和斯梅尔塞，1956：102）。帕森斯和斯梅尔塞在他们关于角色和动机的祈祷中使读者相信，即使没有专家的执行费用，全体高于个体的社会戒律也会有深远的影响，保护集体的认同和禁忌免受来自个人选择的威胁。不进行贿赂的商人会发现他们被排除在接触、签约和特权之外。索价低于竞争者的外科医生可能被从专业举荐和医院特权中清除出去。批准腐败的传统和制造竞争禁忌的规矩并不是有法律地位的正式法典。尽管如此，它们对贸易所得的强烈影响既是可预见的，也是强烈的。

因而，阿克洛夫使社会习俗成为一些国家非自愿失业的一种可能原因，在这样的国家，社会化了的雇主们，居心公平，有名誉意识，反对拍卖者提出的保证市场供需平衡的工资的诱惑。在付薪高于零工以保护“公正价格”中，这些延续过去的资本家事实上以金钱利益交换一个非物质的利益——该利益，假定是理性的选择，以他们的估计会让他们生活得更好。利润被出让了但购入了实效：显然，“非个体主义的最大化行为能导致均衡，它与那些个体主义最大化行为的产物有本质的区别”（阿克洛夫，1980：72）。社会的赞许，受到足够地重视，显然能被用来解释劳动力市场调节的失败——解释（不找寻工作型的）失业的固执，它可直接归结于在工作机会变得竞争时雇主遵守的严格的道德原则。

如果名誉的价格变得过高，可能甚至十分重视道德的人也会因为在边际成本和边际利益之间的不可接受的不平衡而重新作预算。在大多数人都尊重刚性的货币工资的地方，其变体能终结甚至连最低工资法也不能完全阻止的互利交换。在社会舆论对获取

金钱利益的谴责十分薄弱的地方，放高利贷者和套汇人能够收获租金到普遍地被人憎恨的程度，即亚当·斯密所认为的公共执行人的丰厚薪酬的程度。其间的差异，亚当·斯密发现“荣誉构成了所有可敬的职业的报酬的绝大部分”，而“耻辱则有相反的效果”（斯密：1776：1，112）。他的补偿优势原理能轻易地扩展到减薪者和收取利息者，他们违背了习俗但通过金钱又追了上来。在如此的视角中坚守的经济学成为前述的次优经济学：“一个习俗，若追随它花费不大，一旦确立了，就会持续地被追随……一个习俗，若追随它代价太昂贵，就失去的效用而言，将不会被追随，因而会消失”（阿克洛夫，1980：95）。服从有代价，坚守也有代价。冒着猜测的危险，阿克洛夫与马歇尔一样，会投资于持续性和中庸的原则：“我倾向于相信，通常最大的回报会给予那些不破坏社会习俗的人”（阿克洛夫，1976：35）。在长期性中，压力可能是不可抵挡的：“中世纪的放高利贷者今天已转变成为银行家了”（阿克洛夫，1976：35）。不过，即使是在短期内，若得到认同的利益可能超过利润的利益，也会使社会习俗相对地比较安全。

(c) 作为生产投入的稳定性

制度使原始材料得到安置。制度使社会行为得到系统化。简言之，习惯是定位和合法化的资源：“虽然规则和规范的混合物变化着，……它们的联合体依然给予我们愉快的感觉，即知道我们正在做什么，向何处去”（诺斯，1990：83）。生活方式是熟悉的，偏见和成见就是自身的一部分。当前瞻时而后顾无疑使得共同体对自我感觉极好。社会的遗存在文化保守主义者手中是安全的。不过，更容易引起争论的，是经济效率——分配的和动力的——的地位。

弗洛伊德对压抑的功能很关注。他的起点是天生的懒惰，先天的缺乏责任心，这些使他不相信乌托邦个体主义者乐观的完美

主义：“人在他们的工作中展示了一个天生的倾向：不谨慎、无规律、不可靠”（弗洛伊德，1930：93）。人的天性显然不支持工作人。不过，纪律的习惯给薄弱的意志植入了脊梁：“命令是一种强制的重复，它，当一个规则一旦从此制定后，决定何时、何地、怎样做一件事，为的是在每一个类似的条件下，他能免于犹豫和优柔寡断……它使得人能够最有效地使用时间和空间，同时还保全了他们的精神力”（弗洛伊德，1930：93）。制度使行为有重点，允许节省选择的劳动。重复购买某一品牌省去了犹豫和优柔寡断，它们是由对未知可能性的危险评估而生。使已确立的秩序合法化的社会逻辑保全了精神力，否则它会消耗在使认知不和谐得到一致的合理化解释中。习惯的东西使人效仿，规则的东西让人放心。正如迪尔凯姆所言，把（社会）的约束置于（个人的）爱好之上：“人的天性不能成为它本身，除非当它被训练后”（迪尔凯姆，1925：51）。认同得到了自由则选择不自由。迪尔凯姆，像弗洛伊德一样，清楚地阐明了非理性会经常成为提供的所有选择中最理性的。

各种的制度“阐明和限制了个人选择的集合”（诺斯，1990：4）。它们还把交往的交易费用控制在团体水平。由于有强迫，也有合作，期望一定是经济上的收获。精通交通法规消除了在出事地点现场谈判的需要。被视为当然的权利消除了劳资纠纷带来的分裂。膝反射似的购物意味着购物过程甚至购物的结果并不一定要深思熟虑。文化希望护士和秘书由女士担任（即使一位男士能以两倍的速度进行工作）。文化对提供给低收入黑人的训练机会侧目而视（以这种方式成见的恶性循环实现了对成绩不良的预见）。从所谓生活在当前的观点当然并不能得出推论，像这样的文化期望必然会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甚至也不是永存自身必然会比报废和重新开始更节约稀缺资源。所谓生活在当前的观点很简单，即在相对静止的条件下，谈判利益之间的平衡能成为这

样，即任一缔约方都不认为费力要求重新调整和约是值得花费的：“注意，这样的状态并不暗示着每个人都对现存的规则和契约满意，只是意味着对缔约方之间的游戏进行改变的相对成本和收益并不值当”（诺斯，1990：86）。在这样的均势中，维持现存的制度比缔结不同的和约所引起的交易成本要经济得多。

稳定性在否定意义上是经济的，因此不需要引入用欧元标价的价目表，欧洲制式的插头在成本上也不合适。稳定性还在其他方面对节约使用稀缺资源有贡献。规则和习惯在不确定的海洋中是锚。价格和工资常规也有同样的功能，它们限制了市场适应性的振幅。在某种意义上，带条件的预期抑制了反应的更新。不过，在另一种意义下，规范性的指导可以说是市场能发挥功能的先决条件。参考熊彼得的观点，他坚持传统是“资本主义图式的一个基本元素”，并且契约本身只能向产生于它之前的文化价值寻找它的合法性：“没有任何社会体系能运转，若它单独只以（法律上）平等的缔约方之间达成的自由契约的网络为基础，或若在这个社会中，假定每个人都除了他自己的（短期）实用目的外不被别的东西所引导”（熊彼得，1942：139，423~424）。参考凯恩斯，他发现传统的期望使猜出选美的结果不那么困难，坚持认为若市场参与者们都以对熟悉和正常状态的了解来面对未知的未来，就可以节约时间和金钱，并提供互相的安全：“虽然产品和工作机会是由生产商的短期期望而不是由过去的结果所决定，但最近的结果通常在决定这些期望是什么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凯恩斯，1936：50~51）。

凯恩斯所欣赏的对滞后的“普通意见”和曲折的群众心理的说明是对金钱的——交易的，备用的，以及投机的——需求。凯恩斯注意到记忆中的证券价格和历史上的利率曲线，都展示了习惯性的反应能限制斗智对于无任何规范的不确定性会引起的不稳定性：“也许，更为准确的是说，利率曲线是高度传统的，而不

是一个高度心理学的现象……利率的任何水平，若被以充足的信心公认为可能要持久，它就会持久”（凯恩斯，1936：203）。凯恩斯对以下方式十分欣赏，在此方式中，推断的可能性提供了在没有国家指导情况下使企业的长期计划成为可能的边界和目标。霍奇森同意凯恩斯的观点，他在下文中描写的不仅是金融的功能，也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所有名目的各种价值：“价格和工资（不完全的）刚性不应作为被强加于一个‘更普遍’的模式上的限制性的假设。刚性不是一种‘特例’。这些被称作‘缺点’的东西有助于把内聚力和秩序加之于市场体系。市场能连贯地起作用就在于这些‘缺点’，而不是主流理论家所假定的不理睬它们”（霍奇森，1988：191）。刚性的价值减少了随机性的风险，并且使经济关系更容易作预期。

各种刚性的价值来自经济的非计算关系，并使之永存。它们也是传统的化身和熟悉的知识，是“我们共同的生活方式”的面貌的一部分，并且单是这个理由就不管怎样都正确而可敬。过去显然是道德的过去、文化的过去，而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的过去。在此意义上，由凯恩斯和霍奇森讨论认可的经济稳定性与处于斯堪普特的保守资本主义中心的社会稳定性和谐了。我们从这里出发是因为我们从那里出发。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我们没有选择：“人的思想是他所成长起来的文明自身的产物，并且……塑造它的许多经验未被觉察——那些通过体现在习惯、传统、语言以及构成它一部分的道德信念来帮助它的经验”（哈耶克，1960：24）。人的智力史不是与外部增值一样的审慎买卖。因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由于不知悉规范的遗传性——它使得第二回合如此地依赖于前一遭判例所立下的权威——就显得过于浅薄了。

哈耶克对于超越了挨个相传方式的原则上的跟随十分肯定：“为了使我们自己做出理性的行为，我们通常会发现有必要由习

惯而不是由反映来作向导”（哈耶克，1960：66）。出于同一原因，维克多·范伯格也持同样观点：“至少在非常小的面对团体体的狭隘范围之外，如果一个社会秩序所依靠的规则只能在这些情况中被遵守，即只在若特定的约束会给予服从规则者提供以实际上效用最大化的选择的情况下被遵守，则一个有活力的社会秩序看起来甚至是不可想像”（范伯格，1988：13）。同意哈耶克所说的人在天性上“就是遵从规则的动物，正如其是追求目的的动物一样”（哈耶克，1973：11），范伯格为认同的贡献作强烈的辩护，认为它不是一个希求近期回报的短期交易行为，而是经一致同意在规定上的长期趋同。社会的和经济的都一样，范伯格强调，先于游戏的先行承诺是产生满意结果的先决条件。它是必要的条件，因为承诺遵从就是对不被持续重新调整着的行动接行动的计算所影响的基本承诺。正如加斯尔所很好地解释的：“义务藐视利益，但是对义务的认同实际上是有利的”（加斯尔，1986：2）。

制度有安放的作用。制度有向导的作用。制度有稳定的作用。通过历史传递下来的习惯可以说在这三种方式上对经济行为有积极的影响。不过也不是每一个观察者都会赞同过去有利于生产函数，或个体主义和契约必须被强制走上理性和利益决不会选择的道路。正如有的人会说制度改善了行为，别的人会回答到生产力更可能被把新观点视作威胁的传统主义所窒息。

经济至上者的批评在真实意义上是程度的不同而不是方向的不同。毕竟，大多数经济至上者都赞成例行工作的训练、通过红绿灯进行协调以及以一年一度代替按小时结算薪酬的稳定性。少有经济至上者会把这，即以不断的讨价还价来代替诸如这些的制度的基石，视为对交易费用的谨慎的承诺。不过，灵活的反应所提倡的是，经济学家应以此为研究内容，即把遗传的作例外处理，生活在期望的未来，但从这里开始。

4.3 波拉尼

卡尔·波拉尼（1886~1964）是一位奥匈帝国的知识分子，他在1933年移居英国，在他从五十到七十多岁的20多年间，他从一位维也纳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记者变为伦敦和牛津的一位特别讲师，佛蒙特州本灵顿大学的客座教授，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在最终写作了《伟大的变迁》（1944）和《人的生计》（1977），《我们过时的市场心理》（发表在《评论》，1947）和《汉谟拉比时代的无市场的贸易》、《亚里士多德发现了经济》、《作为制度化过程的经济》（都发表在《早期帝国的贸易与市场》，1957）等作品的形成时期，他目睹了金本位制的崩溃、充分就业的瓦解、法西斯独裁的上升、两次世界大战、罗斯福新政的成功、斯大林五年计划的胜利、以及不顾启蒙运动的自由放任主义已经造成了可察觉的损害，凯恩斯在恢复宏观经济的表现中所采用的预算干涉主义的胜利。赫伯特·斯宾塞曾支持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以反对维多利亚女王强权下的世界和平的背景。卡尔·波拉尼则见证了更为艰难的时世。

波拉尼是一位热情而富于使命感的人，他转向历史和比较的证据以确认社会脱节的经济原因。他更接近托尔斯泰而不是马克思，没有看出他的时代在勉强糊口的工资、对劳动的剥削、阶级矛盾、代理资本家的政府等方面的危机，而是把它们看做过于乐观的维多利亚主义的直接后果，认为是它不明智地使汽车离开了跑道：“灾难的起因在于经济自由主义想建立一个自律的市场体系的乌托邦式的努力”（波拉尼，1944：29）。物质上的分裂、文化上的堕落，波拉尼暗示，是几乎不可避免地要落到过于乐观的还原主义的身上，因它无视亚里士多德把经济作为解不开地嵌入其人际关系的背景中的实践。经济是社会的，决不是分离的事

物——这，像斯坦菲尔德表明的那样，是波拉尼发动的把弯曲的权杖折回以使它重新伸直的运动的本质：“他研究经济在社会中所处地位的动机是引导人们把经济放到它自己该处的地方，并把它保持在那里。他认为，他感到……这是存在的中心问题，也是我们时代最急迫的斗争”（斯坦菲尔德，1986：25）。

在分析的层面上，经济的关键是模式的维系和社会共同体的准则：“近代的历史和人类学研究的杰出发现是，人的经济，作为一条规则，是被浸没在他的社会关系中的。他的行为不是为了保护他在占有物质产品中的单个利益；他的行为是为了保护他的社会声望、他的社会权利、他的社会资产”（波拉尼，1944：46）。波拉尼所说的是，经济行为，是与角色扮演和集体内聚力紧密相连，与服从和束缚紧密相连，与被如格雷那样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所理解的意义上的人格同一紧密相连。格雷在下面写道，“不可选择的历史”，对社会中的个体来说，确定了“他们最本质的东西，最终，是最偶然的東西”：“人的个体不是自然的材料，像那些鹅卵石或苹果似的，而是社会生活、文化和历史所成就的人工制品：他们是，简而言之，是共同生活本身的产物。没有生活的共同形式，就没有个人”（格雷，1993：65，136~137）。有如此视角的经济学家是经济的社会学家，他们的事业是理解“共同生活”在办公室、工厂或商店中自然发展时所织就的意义和交往之网。经济学家们显然不是经济专家治国论者，他们遵守单一的职业誓约，把最大化视为效率，不论是分配的还是动力的，这反过来导致他们致力于从原则上保卫竞争性价格和自由贸易。人的经济是沉浸在他的生活关系之中的。经济学家应该研究这种嵌入性——而且进行研究时不应给他的对象们加上一些独特的、惯用的模式。因为单是这些模式就能保护他们免受匮乏的威胁。

波拉尼尖锐批评心智狭隘的执着，它把经济视为不过是节约：“经济学家的错误……在于倾向于把人的经济等同于它的市

场形式”（波拉尼，1977：20）。波拉尼看不出有什么可能的理由可以把他的分析装入一个那么庞大的、那么普遍主义的、那么褊狭的结构中去。一次又一次，他力图以不对制度的合法性抱有成见的客观态度来分析现象。

一个例子就是他把非判断的开放性带入“公正价格”这个由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发展起来的传统模式：“交换率应为能使社会得到维持……不是个人的利益，而是社会的利益是首要原则。不同阶层的技能必须按适合各阶层的比例进行交易：建筑工人的工作成绩抵得上补鞋匠好多次的工作；不如此，则互惠就会受到侵害，社会不能维持”（波拉尼，1957a：88）。在那些保守主义者，那些从巴比伦的汉谟拉比到当今对市场价格波动多变的批评者们——他们希望交换比率能使让人满意的社会模式长存并使供需的讨价还价只处于第二位——这样的保守主义者看来，缅因的“身份”，而不是缅因的“契约”是均衡的关键。使习惯的社会距离得到固化的传统分化显示了它在当代的劳资谈判视觉中的残留物，即分配不是价格的仅有的功能。天主教的教义也是如此（有时祈求基督的仁慈来保护最低工资法），报酬必须足以保护工人的自尊，撤消社会排斥的非嵌入性。波拉尼（其父原为犹太原教旨主义，已转为天主教）在奥地利天主教家庭中养大，当时的理论主流是利奥十三世，他坚决反对1891年的个体主义。

波拉尼分析经济关系时没有它们必须也是市场关系的先在要求。传统的价格给他的实践提供了一个说明。劳动和土地的独特性提供了第二个说明。制造品，波拉尼说，会经常为利润而出售——但是使人和自然服从于同样原子化的契约主义“只是为了在一个有组织的社会中对每一个人和任何的文化制度作结算的一个短期方案”（波拉尼，1944：159）。劳动从非市场化的公共行为中分离出来损坏了同一性所形成的整体的内聚力，减少了善良的睦邻以原本在一个不那么商业化的社会中会采取的方式来对个

人的贫困作迅速反应的可能性：“正是个人会挨饿的匮乏威胁使原始社会，在某种意义上，比市场经济更有人性，同时也更不经济”（波拉尼，1944：164）。土地贬值到了这样的程度，商业的投入引起的对根的感觉的挑战代替了坚定的忠诚，腐蚀、毁林、沙漏、气候变化等代替了环境对人年深日久的养育：“自然会被降低为它的元素，郊区和风景被弄脏了，河流污染了……生产食物和原料的能力被破坏了”（波拉尼，1944：73）。关于人们，建议（不只是对发展中国家）是保持乡村的联系和中等的技术，否则灾难就是“毁灭社会结构以从它们中抽出劳动的元素”（波拉尼，1944：164）。关于自然，鼓励为了后代的利益而节俭，连同承认土地对于领土的统一来说是过难的前提条件，因为它被解放而自由交易了：“使它分离并从它形成市场可能是我们祖先所有事业中最难以解释的事”（波拉尼，1944：178）。关于土地就与关于劳动一样，经济不能被套用为节约。也不应通过市场的透镜来折射所有的分析，它对于生产和价值增值的吸收来说，通常是不合适的工具。

波拉尼在分析的层面上，就社会互动对经济作了解释，没有使用买和卖的滤光镜。焦点是共有的文化而不是社会的自动平衡机制，在公共政策的层面上，波拉尼看不出有理由追随自由主义拥护在社会权威和财富创造之间搞两分法：“政治学和经济学制度化的隔绝，已被证实为对社会财富的致命威胁，它会近乎自动地以公正和安全为代价生产自由”（波拉尼，1944：254~255）。对自我规范的市场的提倡，波拉尼反对道，是准备以唯利是图者对企业自由的单一追逐来牺牲共同珍视的家庭、生态、健康、和谐和团结。英国在工业革命中的经验显示了后果会轻易地成为什么——“施加在人们生活上的影响，可怕得难以描述”——但这也是社会迅速地求助于“钝化这个自我毁灭机制活动的保护性反向运动”的原因（波拉尼，1944：76）。更特别地，它求助于国

家发挥领导作用，使现存的社会事务免于脱离族类的商业化的危险，即把群体饥荒看做不过是一种刺激工作的功能。

于是就有了救济贫穷的“生存权”、限定工作时间和条件的工厂法、制止污染的法律、给工会发言权的法律。国家插手于减少失业。它向投机商人的横财征税。它支持艺术和科学。国家，很显然，在它也抓住了“人的天性需求”（波拉尼，1944：249）不能通过无政府和真空来真正地得到满足的地方，不再准备预先承诺不干涉政策。回顾历史，波拉尼写道，人类社会可能已“毁灭了”，人的种族可能已灭绝了（波拉尼，1944：76），如果国家不曾接替了由封建制度，以及跟随它的传统主义的崩溃而空缺的职位。瞻望未来，波拉尼继续写道，工业制度的真正幸存者预设，经济权威在社会母体中会再次嵌入，并且随后在拯救那些那么容易变成“名副其实的人性垃圾”和“堕落的暴民”们免于市场社会“文化真空”的“自尊和水准的丧失”的民主领导中，会再次嵌入：“十九世纪社会的先天缺点不在于它是工业社会的，而在于它是一个市场的社会。当市场自律的乌托邦实验不再是一个记忆时，工业文明还将继续存在”（波拉尼，1944：157，158，250）。

在波拉尼的社会感应的经济中，价格体系的未来没有完全阐明。一方面，他说市场必须存活，“以保证消费者的自由，以指示需求的变迁，以调节生产商的收入，并且充当会计的工具”（波拉尼，1944：252）。另一方面，他说自由的市场必须被转型为一个有管理、有指导的市场，“完全终止其作为一个经济的自我调整的组织”（波拉尼，1944：252）。波拉尼显然需要可变价值的配置效率能与受控制的制度的稳固统一体一起被传递。他显示出他不曾希望过这两套利益最终被证明是不相容的。也许这是因为他反对的只是严格地自我调节的市场，是作为人和事之命运的惟一导演的市场，而不是那在有着自我意识的集体的合理限度

之内负责地使用其自由的市场。也许这是因为他没有把维持体面的谋生与金钱收入的最大化等而视之，并且相信要感到安乐通常会涉入到一种集体选择，放弃一些可有可无的消费，代之以取得一些使模式得到维系的适应、一些非物质上的适应。有一点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清楚的，即对波拉尼来说，对市场进行调节既不暗示着对前资本主义的回归，也不意味着逃入列宁主义。波拉尼所想要的是保守资本主义，而非他心目中使社会离散为孤独、动荡和缺乏连续性的资本家的资本主义。

并不是只有波拉尼提倡社会—政治的回应来应对粗鲁的资本主义的挑战。约翰·格雷，一位中间派的保守主义者，非常强调“文化的继承性，它是稳定的资本主义秩序的母体”，并且要求国家的干预：“任何保守主义的政府，在英国或别的地方，必须不仅表达体现在市场资本主义里的个人自由，还要表达在世代相传中被不断更新的文化认同”（格雷，1993：65，273）。格雷的意思不是反对提高生活水平或享受优裕的生活质量，格雷提醒人们注意贫病的大量存在。他通过对“政府可通过正确的行为来强化的共同文化遗产”的反复要求，通过对“关心本民族的同情心和集体的保守的托利党人——因而他们要求的就不仅是“最小政府”的赞同，支持他对社会和福利服务的主张：“虽然市场很重要，是对个人自由的一种表达，但它只是个人们在其中做抉择和承担责任的社会的一个方面”（格雷，1993：56，63）。

同意格雷对“被可能的福利政府所限制（或补充的）自由市场经济”（格雷，1993：66）的要求的，有尤金·厄哈德和勒普克，以及斯宾塞、哈耶克和泰勒先生。不同意见的有米歇尔·奥克斯特——他作为一位保守主义者和一位保守党人——想要的是一个法制的政府而不是别的：“在有关政府事宜方面，所谓有保守主义者的倾向是深深相信……管理的惟一合适的方式是通过制定和加强行为的规范”（奥克斯特，1962：189）。奥克斯特希望

国家在规则方面保守。格雷希望国家在社会方面保守，因为它是规则的来源。为了保护社会的核心文化，反对企业的价值不相称性疯狂发展，格雷很像波拉尼，坚持经济的事务最好还是回到它们在社会中的根，遗传的和共有的根。

五、习 俗

我不辜负你的期望，也希望你知道我的期望。你知道我的期望，也希望我在你的期望的基础上作计划。我的被预期的一致是你现在所作选择的原因和结果。你的被预期的一致也是我塑造未来的主动行为的结果和原因。未来是未知的，也是不可知的。制度化了的期待，“那些为所有社会成员都接受的行为的规则，以及那些在特定的周期性的环境中指导行为的规则”（司各特，1981：9），至少照亮了子夜，使它进入了黎明。

第三章归纳的保守主义是从过去的反复重现中考虑进行推论。第四章经济与社会把注意力集中于作为一种投入和一种约束的共有和普遍的东西。它们提到的预测的和互相依赖都汇集到眼下关于支持着集体行为的习俗的讨论：“所谓习俗是存在于由期望的体制所产生的行为中的规律”（刘易斯，1969：118）。习俗使得你能向我提供不变的观点。习俗也使我能为你提供一个固定的观点。

本章的主题是编纂成社会规则的固定观点。主题是社会规则——不是数学的规则，不是卫生的条例，不是在食谱上标明的程序，而是连接着人们思想的规则。本章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考察了各种规则的功能，第二部分则考察了它们的起源。第三部分，从社会经济学转变为伦理的经济学，探索了那使习惯的顺序

转变为责任、义务和受欢迎状态的合法性。

5.1 功能

教科书把经济当作平衡、实用、替代品、流动性、利润、竞争和市场对待。其隐含的假设是价格机制是关键，别的社会因素则无关紧要。对社会规则的承认引起对这种“其余情况相同”式的忽视其他社会条件的自满的怀疑：“经济学所包含的信息网络远比价格机制描述的要丰富。这个网络的组成包括：一整套的制度体系、实践得来的经验、各种风俗，以及各种信念——当主体的行为不能被价格所分散或当管理价格机制过于昂贵时，它们能帮助传递大量的有关预测经济主体行为的信息”（司各特，1981：118）。有些信息是通过分配的弹性产生的：“价格是提供关于社会稀缺资源信息的机制”（司各特，1981：157）。有些信息被作为嵌入的相互关系的结果而被传递：“制度是提供关于别的经济主体的可能行为的信息的机制”（司各特，1981：157）。经济不是被一个而是两个指路灯所引导。没有哪一个灯可以先在地假定为应被贬低到“其余情况相同”式的含糊境地。

习俗的本质在于它传递信息。每一代都能用这种方式向过去学习，教育后代。对保守主义而言，习俗是连续性的一个具体体现和对先辈后继有人的一个肯定。对资本主义而言，习俗补充了价格信号，并给相对短缺一个记忆中的底线。各样的习俗允许行为人把可能性归因于相互的行动，减少了包围着协作过程的不确定性。习俗有时是成文的、明确的、正式的，有时是弥散的、心照不宣的、未经编纂的，最关键的是它有了为了获得稳妥的解决之道而征募记忆和回忆的能力。在以下对它的功能的两类独立情形的讨论中，它能增强预期的相互和谐的能力很容易得到理解。

第一类情形关涉的事例是：那里所有的人同意需要有一个

规则，并且那里无人有行骗的动机。

骷髅和交叉的腿骨是毒药的公认标志。**SOS** 是灾难的公认信号，白旗是投降的传统表示。美元在波士顿是充作交易的中介（那里“钱”就是钱）。加拿大元在蒙特利尔是一致赞成的法定通货（那里“钱”意味着储存）。中国人用筷子吃饭，俄国人用刀叉，印度人用手指。在那些以习俗来协调一切期望和协议的地方，视觉标志、金融资产、语言符号以及餐桌礼仪，都是对得到一致同意的筹码的例证说明。

因此对小贩来说按习俗星期四是早结账日而星期五按习俗是集市日没有多大关系。影响他的收益的不是日子本身而是潜在的消费者实际上对集会知道的情况。一周分为七天而不是十天，或教徒们在天主教堂里脱帽但在犹太教堂里戴着他们的帽子，或正式舞会的参加者们应穿着正式的礼服，若穿年轻人的迪斯科装，则过于违背传统，成为时髦的表现，等，都并不是什么值得争议的问题。更不值得争论的还有汽车是红灯停而绿灯行；或英国驾驶员左行而在法国驾驶员右行，等。有些汽车用户会假想他们喜欢不同的习俗，就像有些法郎的用户会青睐欧洲货币，有些母语为英语者会喜爱世界语一样。但是，所有的汽车用户都绝对会同意一致的规范比任何特殊的规范要有价值得多。红或者绿，右或者左都行，最要紧的是别有人在路上遇难或受伤。

有垄断地位的习俗就有功能。“女士优先”的原则，不论是出于最先即最好还是石器世代的遗迹，减轻了理解的困难，使预期有重点。在休谟对协作划浆的分析中，一个共同的律动，使得多桨船只的前进成为可能。采用星期三为国家休息日保证了国民作为整体获得了一个同一非工作时间。人们的选择是协调的；它不需要明确的同意；每个参与者都没有欺骗的动机。其间的危险在于平庸——因为现有的习俗被相信已得到了充分的沟通，所有的人都同意不对现存规则作反向的实验。危险不在于逃避——因

为在米兰拥挤的酒吧里伸着两个指头作 V 状的游客必然只能怪自己符号学未臻完善。

第二类情形关涉的事例是：那里所有的人都承认规则的功用，但是那里每个人，单方面地，都面临着背叛的诱惑。

寡头垄断者会发现在卡特尔之内达成价格垄断是理性的。但寡头垄断者也会发现偏离和约和廉价出售是理性的，只要他们的伙伴仍遵守协议。邻居们发现同意共同排干附近的沼泽是理性的。但邻居们也会发现继续干自己的私活是理性的，只要他们的合伙人仍然信守着承诺。市民们发现把讲真话看做优于虚假是理性的。但市民们也发现不履行诺言是理性的，倘若一个讲真话的社会不能辨别没有信守社会协定的食言者。寡头垄断者们、邻居们以及市民们，都绝对同意一个相互受益的情形可以通过规则得到实现。每一个寡头、每一位邻居以及每一个市民，也都注意到还有一个更吸引人的情形，即可以搭乘免费车，只消费，不贡献。但一人如此能奏效，所有的人都如此则不能。通过习俗来进行协调的第二类事例，指的就是这有极端不稳定的倾向的情况。

红或绿，左或右，第一类情形的习俗，避免了反复无常地自我毁灭，具有一个自我强化的规程应有的一切理由。垄断的价格、排干的沼泽、信守的诺言，第二类情形的习俗，因那些盲目最大化的野心勃勃的离群者，他们要最优的最优化的独占性而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的较低值的最优化，而始终处于危险之中。在两类情形中，都有对规则的实用功能的一致认同。但是，在第一类情形中，遵守规则符合个人的利益——在第二类情形中，共同承担成本是理性思考的结果。否则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自动地选择只拿不给，一品脱血也无人捐赠（在梯玛斯意义上），一张选票也无人投（在唐斯的意义上），一头牛也不会从过度放牧的共用牧地中牵回（在哈丁的意义上）。影响行为的习俗使得期望、预期和预测成为可能。但是，属于策略性质的习俗，给可达到的理

想的满足投上了不确定性的面纱，对这些理想，所有人都明白可能根本不会得到满足。

习俗作协调的工作。它能实现这个功能完全是因为它是保守主义的。

先考虑第一类情形的习俗。这里没有任何单一的平衡具备先天的优势，但流行的规则有已充任焦点的吸引力。通用语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吃肉前先喝汤。足球传递不用拍子。即使实践一开始是巧合的，时间会挖出深深的辙印。模仿和滚雪球式的累积产生了那么完全的趋同，没有任何参加者想打断这个常规。任何规则都能奏效，只要它通过坚持产生了效力。倘若现状保持了它引导和疏通的能力，没有理由认为必要的坚持不会即将到来。

现在考虑第二类情形的习俗。那里盟友们也是敌人、那里合作作为矛盾所限制，因此历史的经验又一次能扮演特别有用的角色。

一则，参与者们可能都有一个共同的过去，这使他们对各自的可能反应都有一个彻底的了解。网球职业运动员们对相互的认知不是通过一场比赛，而是通过多次比赛的重复结果。在不止一次地与同一对手的遭遇中，他们能根据个人的观察形成他们现有的动作。相似的学习过程可能还有两个累犯的犯罪社会化，每个人都希望牵连到对方，每个人都注意到他的同伙有同样的愿望。若案犯们先前已被放入过同一个牢房，则被多次讨论的“囚徒困境”，就比动态的博弈——它没有建立起在过去基础上的预期经验的储存——要容易解决得多。

可能性当然不能与动机等同。不过，假定当事的双方都倾向于无限延长他们的相互合作关系，则他们当前投资于相互支持以备将来使用，是符合他们双方的利益的。一个经常与异民族交战的民族，会明白“不择手段”地屠戮婴儿是签下自己的死亡证，而短期行为的先例会使统治策略成为泡影。一个寡头垄断者，明

白毁灭性的价格战可能起于贪占小便宜，会事先建立起信任以保证平衡的长久。一个有经验的囚犯遇到困境时会按如此推测行事：今天的背叛就是明天的被背叛。过去的行为作为可能性的反应给予暂时性的指导。预期的行为则担任着吓唬对手，使他转而采用避免损失的极小极大化：“在重复的游戏中，对 $(A1, B1)$ 的重复选择是一种准平衡：起于不信守诺言的混乱不符合游戏每一方的利益，即使不信守诺言的策略在短期行为中可获利（一次性的）”（吕斯和瑞弗，1957：98）首先采用细菌战的国家能损害它的对手。削价销售的寡头能结果一个垄断者。供认同党的囚犯能使自己获得自由。在游戏理论的推测中，混乱并不是惟一的可能性。因为合作比变节更有力量，对损失的害怕显然比对收益的希望要大。不确定性使得双方都胆怯——结果就是诱使行为要有节制。

双边游戏中的重复性鼓动了可能性，也提供了诱因。更复杂的——也更普遍的——是类化的、多人的状态，在其中原子的人默默无闻、无足轻重。行业中的每个工人都能享受集体谈判的好处而不用交工会的会费。在战斗中，没有士兵对战争结果的贡献能与给他一个不逃跑的理性相等。一人能做的事，全体则不能。普遍的违背会意味着没有工会也没有战斗。但是，选择，是由独立的个人而不是全体做出的。孤立的个人正确地察觉到，每个人对历史的整体来说并无真正的区别。孤立的个人因此有理性的理由弃权和不作奉献。

然而孤独者并不是没有他的界限；个人们在已经拥有章程的模式化了的环境中，确实与他人进行着互动。一个俱乐部一段时间后会产生产章程，因为需要它来约束成员。拥有过去和未来的社会也同样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根据行为人是自始就为了自己作打算的假设来推断乱丢废弃物的人、善良的撒玛利亚人、纳税人以及诚信者，是不现实的。习俗是传统的。甚至孤立的个人也并

不孤独。

因此，当新的参加者进入了这个开放的同盟（逐渐地取代了原有的自动退出的参加者们）时，每个人都变得注意那些在（微观上）俱乐部里和在（宏观上）社会里限制他们选择的规则：“由于我们所分析的游戏重复地进行着，游戏者对由经验得来的方法、规范、习俗以及制度发展出社会性的认同，并把它们传递给后来的游戏者”（司各特，1981：12）。伴随规范的是约束力，它使得理想如同信息和管理机制一样有效。从否定的角度讲，害怕被报复、被排斥、丢“面子”、良心不安（“你必须和自己和谐相处”）等，阻碍了自由精神把自己与大众拉开太远的距离。从肯定的角度讲，对赞许的、友谊的、团结的和认同的热爱，是对坚守职责的同伴的忠诚的个人奖励。甚至在集体是庞大而无定形的情况下，每一无名的越轨者也会遭受名誉受损的折磨，就像遭到“公正的旁观者”的非难一样，当他放弃了共同的约定或战争时当了逃兵。不要忘了庞大的集体通常是由更小的分支集体所构成，它们可是个人的、面对面的。正如丹尼斯·罗宾逊解释的为什么马歇尔相信，对“因为破坏了共同的市场而招致别的制造商的憎恨”（马歇尔，1890：380）的担心会阻止甚至绝对的竞争对手以低于平均的可变成本的削价来应对供过于求：“看起来，不是害怕他们的贸易政策使得马歇尔意义上的生产商改变了，而是害怕他们，当他在教堂外、在俱乐部里遇见他们的时候，对他（无疑还有对他的妻子）的个人行为”（罗宾逊，1956：15）。同行业的压力加强了习俗，它规定交易时着正装，安息日不得纵酒作乐。这些压力是全体加于个体上的个人压力。非弹性价格的公共利益因此免受了供需的影响。

不用说，强制会经常采取自上而下的权威形式而不仅仅是非正式的相互作用。这种垂直的形式很容易成为与平行的形式不同的世界：它见证了独裁者的私党提出适合它自己的法令的行径。

不过，平行的形式也能为垂直形式提供存在的理由和合法性：在所有的人都承认规则的功绩但每个人，单方面地，又有欺骗的冲动的地方，通过强制而达成协作的民主防卫能使舆论持有的愿望得到所能达到的最好的实施。舆论与强制在这样的环境就能联手工作以确保那些要求他们份额的集体成员也会付出他们应付的份额。考察集体谈判的参与者，若所有人都选择了不负责任，就会发现自私自利会导致自我的失败：“如果一个巨型集体的成员理性地致力于他们个人福利的最大化，他们不会致力于谋求他们的共同的或集体的目标，除非有强力强制他们这样做……有些义务性的会员资格的形式，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于联盟的生存是不可或缺”（奥尔森，1965：2，3）。考察前线的战斗人员，若所有的人都同意接受同样的纪律约束，每个人都不会准备选择逃跑：“射手们自己要求在他们的阵地周围布雷未必是不理性的（除非他们没有定位的地图），如此可保证他们在战斗中的团结”（乌尔—曼—玛格丽特，1977：33）。像这些例子中经同意而产生的强制并不是通往奴役之路，而是形成互利状态的自由的引路人。

5.2 起源

习俗帮助人们相互满足对方的期望。第一类情形的习俗在所有的参加者都坚持从合作中获益并且无人因规范而受损的情况下得以奏效。第二类情形的习俗实施的环境更具竞争性，在其中个人的最好与集体的最好并不匹配，因此每个人都必须对个人的利益退而求其次。

对于像经济人一样挣扎在围绕着相应的效用建立的选择计算之中的行为人，习俗具有把一个稳定而可预测的模式加之于其上的定义清楚的功能，而不是有能力以别的方式在集体行为的领域内协调必不可少的相互关系。本节讨论的主题是规则的起源。叙

述分为三部分：“进化——第一种情形”，“进化——第二种情形”，以及“法令”。

(a) 进化——第一种情形

过程，如乌尔曼-玛格丽特所说，是一种渐变：“规范不像规则有明确的形成时间，也不是一定数量的相关行为的结果。它们，更是众多人群复杂的行为模式长时间的结果”（乌尔曼-玛格丽特，1977：8）。过程是一种自然的展开。它不是对人类的计划或事先的契约的记录，而是无计划地朝向无目的的结果的看不见手的历史。各种规范乃是因为它们已经是虽非合法但实际存在了的标准性实践而事后得到生效的。当期待的原因和结果通过规律性的重复而逐渐受到限制时，要从实然转化为应然，没有什么比现状的成功带来的证明似乎更为其所需要。

就第一种情形的习俗而言，先例能变成惯例，很简单因为它给理性的决策者产生了可见的高回报。个人因此同意以被最广泛接受的货币进行贸易，同意在左行的国家放弃右行的驾驶习惯。个人以这种方式投资于继承来的渠道的持续性，节约了彼此的探索费用：“在任何的平衡点上，不仅没有任何参加者有改变其行为的动机，若给定了他人的行为；而且也没有任何参加者希望任何别的参加者在行为上有所改变”（司各特，1981：22）。鲜明和有重点能带来操作上令人满意的协调。这本身对个体主义的经济至上者来说就是一个好的理由来放弃对想像中的最好的原则的探索，而赞成重复的相互作用就是最重要的原则。

被采用的规则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成为被全知的最大化者所规定的习俗。猜测伟大的计划者会对经常有些事物是未经计划的有何看法并不能阐明进化的过程：“制度通常是不知其父母为谁的私生子”（司各特，1981：14）。从历史的角度看，更有价值的是对产生了真实世界的统一性的事件的系列的重建。这个解释有可能包括了临界质量的概念。因为希望进行交往，理性的个人选

择了承诺会有最高成功率的语言。因为希望进行贸易，理性的个人选择据观察别的大多数人所采用的货币。B模仿A，C模仿B；由此，无需现则达到想像中的最好，协调出现了。

对规则被采用的最好解释是潮流本身，而不是规则的最优性。其结果是把“though”念作“thru”是良好的英语，但把“rough”写作“ruff”是蹩脚的英语。习俗就本身来说是关乎于运气而不是逻辑的，但它至少提供了常识，使得预测成为可能并为服从找到目标。它所享有的一致同意源于它有能力产生相互期待的体制。因此，与嗜好与时尚不同，与伴随着新产品发行的流动力量不同，它只有保持了它自续的稳定才能保有对它的支持。但是，倘若它实现了它的协调功能，有可能大多数人的意见会支持尝试一印证的方法，它会是企业家为追求更好规则而运用的试错法的巨大障碍。不满在边际总能找到它的话说：目击美元充当着事实上的世界货币的非官方身份。即使如此，不可否认的是，一旦习惯已用规律性作为它自己的辩护时，较之社会在积极寻找行得通的中间道路时，进化的推进会慢得多。

(b) 进化——第二种情形

与第一种情形的习俗相联系的是没有输家的一致性。第二种情形的习俗就冲突得多。对A国来说可能中最好的结果是A国征收关税而B国实行自由贸易。对B国来说可能中最好的结果是B国征收关税而A国实施自由贸易。对A和B国双方来说可能中最坏的结果是两国都征关税而不实行自由贸易。对A和B国双方来说所能达成的最好结果是两国都实行自由贸易而不征收关税。这样的次优显然对双方都是互利的。不过，每一方，目睹可能中最好的选择的存在，仍然无疑会有背叛的冲动。习俗能够促进合作，阻止自利。问题在于这样的习俗是否会自动地出现，是否在妥协和自我克制之外，还需要由第三方来行使权威。

阿克塞罗德相信会自动地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理性本

身的自利本质，与传统所支持的关心他人的行为无关：“没有必要假设参加者之间的信任：互惠的益处就足以使背叛成为徒劳。无须利他主义：成功的策略甚至能诱导自私自利者产生合作。最后一点，没有什么中心权威是需要的：建立在互惠基础上的合作能自我监督”（阿克塞罗德，1984：174）。伴随计算者是有记忆力的先决条件的，是透明度和连续性。过去的影子——因为对行为的观察是做出相称反应的基础：“正如未来对于建立合作的条件是重要的，过去对于实际行动的监控也是十分重要……没有这个利用过去的的能力，背叛就不能被惩罚，而合作的愿望就会消失”（阿克塞罗德，1984：182）。相互作用的透明度——因为在持续的联合不能被认明的情况下，默契的合作不会自然而然地发展：“必须使个人不能侥幸地做成背叛而不被别人有效地进行报复……这个反应需要的是背叛的个人不会消失在匿名的他人之海中”（阿克塞罗德，1984：100）。合作关系的持久性——因为在有穷游戏的最后一局，参加者不会再投资于一点也不吸引人的节制：“达成稳定的相互合作关系的最大可能性在于有一个持续的相互交往的好机会”（阿克塞罗德，1984：182）。一旦得知临近结局，参加者们在其中就无需再作克制，倒数第二回合轮到时就变成了欺骗是理性的赛场。与一次性的博弈一样，在连续博弈的终局，一旦没有了可去发展、去影响的无限未来，合作也就崩解。不过，若给定了持续性的前景，给定了熟悉的伙伴和顺序的历史，阿克塞罗德相信，自然选择有望建造出一个互利的背景。它之有望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理性自利本身的天性。

阿克塞罗德举出一个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策略的例子，它衍生于一战前线的战壕里。友谊显然不是什么交战双方的战士都避免相互狙击的原因；口头的协议或明确的契约（这无疑属叛国）也不是他们相互维持的基础。这种阵势在阿克塞罗德的解释来看，能达成信任的关键在于无尽的后果会非偶然地重现，即今天

的受害者可能明天会报以同样方式的背叛：“使双方的克制成为可能的是壕沟战的静止状态，在这里同一小股人员长时间地对峙”（阿克塞罗德，1984：21）。没有一方想首开杀戒——它的首选战果是得到因为利益而保持隔离的结果。没有一方有背叛而不受警告的经验——至少错置信任的第三好结果没有作为不希望的结局出现。相反发生的是次好的局面逐渐发展了，枪炮好像在黄金律的指导下都射不准目标。

出发点是自利但结局却是合作。重复会带来前景显然带来了同样的均衡，就像早期基督教团体的说教所做的那样。以阿克塞罗德的观察，它之能奏效，凭借的是在有着顺序、认知、不朽、和解和相对性等特点的模式之中追求着收益的理性。更特别地，它之能奏效还在于一报还一报的理论：“一报还一报……是合适的、宽容的和报复的。它是决不要首开背信弃义；它在完成了单一的报复后就宽恕了这个孤立的背叛；但它始终会被背叛所激起，不管到目前为止相互关系有多好”（阿克塞罗德，1984：46）。

按照一报还一报的游戏规则，一旦被冒犯，理性的利益追逐者总会施行报复。以这种方式他告诉考验他弱点的潜在侵犯者，他拒绝首开欺骗并不意味着他不会愤怒，或会听凭恃强凌弱者的随意摆布。不过他也会采取暂先宽谅的行为，以免只此一次的截然回击从此永远陷入无尽的不稳定重复的不平衡状态：“当一个背叛能启动一长串的重复犯罪和反击犯罪时，双方都会深受其害”（阿克塞罗德，1984：38）。缩短延迟的记忆和一步咬一步的拉锯的最终结果是双方在一报还一报的比赛中都不示弱，没有一方的得分能胜过对方或取得实际的胜利。汤姆的死亡意味着弗雷茨的死亡。弗雷茨的生存意味着汤姆的生存，这一点汤姆和弗雷茨在前线的战壕里看得很清楚，自己的成功取决于对方的成功。他们合作的发展就是对他们的——次优——报酬的明显的相互依

赖性的赞扬。

预测是乐观的。A国不首先使用其核武器。B国克制其征收关税的欲望。汤姆和弗雷茨找到了一条生存之道代替了你死我活。隔绝中的理性产生可能最坏的后果。一报还一报则导致可能最好的事态——并导致最能适应相互报答的游戏的游戏者的生存：“能从他人那里达成有利反应的个人更有可能拥有得到生存的后代，并且其后代会延续使他人发生有利反应的行为模式”（阿克塞罗德，1984：22）。

预测是合作的：“如果人群中的每个人因为大家都采用一报还一报的策略而与别的每个人合作，那么没有人用任何别的策略能比这能做得更好”（阿克塞罗德，1981：312）。如此发展起来的平衡显然也是使互惠得到最大化的最佳状态。不过，其条件是有限的和或然性的。

稳定秩序的状态因新的进入者以及无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成绩记录的突变而遭到怀疑。但是一旦得到确定，合作的规范就享有自续动力的强大保护。不过，商业生活是变化的；积极的竞争与新奇和变化紧密相连。启动新计划的新企业家威胁着形式价值，并使推断变得困难。每一步，新的一报还一报都必须发生，并发生在总是以不知为借口的毫无信誉的贸易伙伴之后。稳定的秩序协调利益。机会主义则打破成规。

容易识别这一条件在庞大人群内就处于困境。当一个选举交易的诺言没有被遵守时，两个政客对谁是应受责备者心知肚明。双方的互相了解使得两人都得遵守诺言。当从两人膨胀到一群人后，识别就变得更为困难。例如，乱扔垃圾的市民就不能普遍地成为一报还一报的对象。

在标准的惯例是离散的交往的地方，被期望长久的条件会无效：“当参加者今后再也不会相遇时，背叛的策略就是惟一不变的策略”（阿克塞罗德，1984：92）。合作的发展预先假定，相互

关系的维持必须够长，以使违约成为报复的焦点。一个没有未来的关系不能提供使理性的行为人投资于自我克制的动力。

承认大部分人的行为不是避免损失（一点点的奖金不能使赌徒满意，老是和棋不能让棋手满足）以及大部分人的动机在天性上不是工具理性（就像在嫉妒、怨恨、没有安全感以及愤怒等造成了“两报还一报”的过度报复的地方，其导致的不是削弱矛盾而是宿怨的快感），会削弱达成次好和解的条件。在新古典主义的看来，一报还一报低估了易引起反感的比较，高估了把未来看做高度可消费的程度。以这种方式，一报还一报偏向提高合作的可能性。

道德中立的情形由于竞争模式的存在而受到挑战。因此基督教关于“转过另一边脸”的教义（与“以眼还眼”的一报还一报的复仇标准形成对比）会成为无尽伤害自己和自己所在社会的原因，因为这里的背叛者从不会被强硬地阻止。此外，对“为他人之所欲为”的一个解释也可是人们应该始终合作：毕竟，这是每个人都希求从他的同伴那里得到的东西。这样的绝对命令很容易被看做自毁长城的单方面的约束而加以解除——但如果好人都只按自利的原则行事，恶人就会淹没了好人，好在这不太可能发生。事实是“转过另一边脸”和“为他人之所欲”都确实存在。这样的选择可能会妨碍需要一报还一报的复仇，其行进的基础不单是签订的条约或社会契约，而是通过一系列微小的行动，一步步地，逐渐建立起所需要的信任。

顺序、识别、持久、和解以及相对性这些条件是有限的和或然性的。它们加到一起，限制了在一报还一报的基础上协作能被有把握地预测的程度。还必须注意到一报还一报的基本逻辑预先假定的在现实世界很难达到的理解力和注意力应达到的程度。因此若背叛者理解不了警告信号或看不到邀请他回归的合作，报复就失去了建立和平的功能。又，若捐献者不知道合作关系何时到

尽头（他贷款的企业何时快要破产或保证要与他互投赞成票的政治人物何时快要丢掉席位），合作会成为一种经济的浪费。在一报还一报的游戏中，太容易把重要的信息当做临时的或偶然的而忽视。特别危险的是若游戏者只通过行为而根本不通过语言进行交流。不像扑克这样的游戏，这里成功有赖于意图被清楚地表达而不是隐瞒。在这样一个供应不足的真实世界里，对什么将要发生以及别的游戏者将做什么做到了如指掌，是完全正确的。

如此则一个后果就是折扣系数的合并。其明显的好处是策略性投资于背叛过期之后。在自己收到从当前的节制中所预期的将回馈的礼物之前，变化可能就已使交易死亡或停止了。选择“一鸟在手”的早期回报能提供直接性和确定性，这是延期满足从不能承诺的。因开发所冒的损失风险会被极力避险者看做主观上比通过背叛获得的相等机会要严峻。诸如此类的考虑表明合作的发展服从于折扣系数。它们也许还暗示，个人的未经交流的权衡计划，会把如此多的复杂性引入秩序，以至妨碍了在有利于社会秩序的次优原则上的可预见的认同。

第二种情形的习俗有可能在小集体的背景里通过一报还一报得到发展。不过，大的集体更易受到不愿做一点贡献的理性计算者的逐利的伤害。在大众性社会背景中，没有重复性的社会交往，没有名誉的传播，没有对过去伙伴的识别，没有持续观察的机会。从从未发生过的历史中得不出推论，它更不能运用于显然不同的将来。在这种情况下，相互作用的行为人没有理由寄希望于彼此收益的修正——而有相当多的理由免费搭乘于彼此的缺乏了解。正如弗雷德·赫希写到：“只有我能知道是我在到处扔垃圾”（赫希，1977：139）。看来天然的，公共用地很久以来就应淹没在垃圾之下。

不过它还没有。自律的市民把垃圾倒进垃圾箱里，正如不相识的陌生人也避免说谎，为病人的康复献血。这些人毫不吝啬稀

缺资源，因为他们自愿于他们本可以避免的付出。有时被称作撒玛利亚人，有时被叫作“容易上当的人”，证据显示这些人明确地遵守合作的习俗，不管事实上习俗并没有因相应的回应，没有因一报还一报对个人的批评而有什么明显的加强。

合作在大型集体中能够生存。是否它也能在由无名氏和一次性行为所代表的社会环境中自然发展还有许多疑问。大型集体被公认是由较小的集体所构成。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对面对面约束的害怕减少了乱扔垃圾者，以及话到嘴边的出租车司机的粗口。也许真的只有当大型集体分解为组成它的较小的单位时，服从的压力才可说真正地产生了第二种情形的习俗。不过，如果这样，那么这样的观点就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即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根深蒂固地敏感于并不真正威胁其事业的不赞成的表示——才是规范演进的可能场所。

当然，一旦规范到位了，日常的惯例就获得了自己的动力。显著的和引人注意的是，典型的实践被简单的重复所吸收，被非正式的约束所加强，并经课程和角色训练传递给孩子们。社会的成员分享在给定环境中什么是“奏效”的背景知识：以这种方式，他们的行为和希望被导入了规律性，无需每个人作单独的摸索。不论什么内容的规定都有一个共同的连续性，即时间会赋予它具有约束效力的身份：它变为社会同一性的一部分，享有所有希望集体保持它规定的独特性的人的支持。这意味着，保守主义是保护已经发展起来的東西——并且一旦一个规范到位了，就获得一个与开端不同的自增强的功能。

希腊人用希腊语交谈，即使有人私下发现法语有着更高级的文法。规范的自续天性在第一种情形的习俗中再清楚不过。重要的是，同样的保守主义可以说也保护着第二种情形的更为矛盾的结构。规范被结合进现有集体的内聚力和团结之中：在公共牧地乱丢垃圾是背弃团队。各种规范也成为自我的一部分：辜负信任

是对自己形象的玷污。保守主义者，简言之，面临选择的时刻总带着思想框框。不能讲不是希腊语的母语，不能区分身份的本质和形成它的社会化，保守主义者常常发现他们选择的关键是根本没有选择。因此一个社会化的炮手，认识到自己的职责并有强烈的荣誉感，即使他的同伴们选择了弃职和逃跑，他也会接受死亡：“也就是说，人们在这里坚持战斗更好，不管别人怎么做”（乌尔曼-玛格丽特，1977：37）。过去支持着他并调整着他的报酬计划。献出他的生命、投出他的选票、包好他的废弃物，他自愿地接受合作性规范。他之如此行事，是因为，通过过去的社会经验，规范内在化了，成为他能用作地图的全部。

(c) 法令

有时一个统治者，走习惯和惯例自然演化之外的捷径，会至上而下地公布行为的标准：“在有些新的协调问题中，一个解决之道好像就是通过一些权威为此特别发布一个准则”（乌尔曼-玛格丽特，1977：83）。对这样的强加之物的第一类型的例证是货币的十进制换算、竞争性货币的统一、无线电频率的分配等。显然，即使所有人都同意新规则更好，对被外在的第三方编外的孤立的个人来说，还是很难启动一个改变左行的习俗的变化。通过强制获得自由的第二种类型的例证是法律的制裁加强了契约的约束力、使纳税人义务纳税、支持只雇佣本工会会员的制度。曼可·奥尔森发现，共同的目标通常只能通过协同的控制才能达到：“工会会员，像个体的纳税者，不愿牺牲比他被迫要牺牲的更多的东西”（奥尔森，1965：91）。要大量供应公益，舆论显然是不够的。因而，根据曼可·奥尔森的观点，通过法令会使关于预期的争论变得一致起来。

法令通常会追随先在传统和习俗的轮廓。在此情况下，就不是创立一部新法典，而是使默认的契约得到形式化。法令，作为一个替代的办法，有时会需要还未经个人意见检验的协作行为。

由于口头说明比较困难，而经谈判达成一致费用又太高，可以想像的就是人们会希望使产生了普遍更为满意的利益调节的先例在事后得到合法化。不过，还可想像的，是可能他们会怨恨新规则，抱怨它悍然不顾民主的意愿。禁止在公共场所吐痰，以及在已有两个女孩的情况下，思想的统治者禁止他的家庭再扩大，对此人们可能会反对，理由是集体的利益倒是可能有了，但他们的个人地位没有得到尊重。强制就是强制，不能保证他们的抗议会有任何实际的结果。

平衡不一定是最优的。少数派的选择不一定符合社会的规范。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本质是，至上发布的法令可能与经一致同意而编纂出的法典不同，即政治的统治既反映又固化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基于阶级的剥削：“现今的这个时代，即资产阶级时代……使阶级矛盾简单化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现代国家的政权只能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205～206，207）。第一种情形的习俗作无冲突的选择，符合每个人的利益。第二种情形的习俗促使人们达成次于最好的和约，尽管有着不确定性的不安的摩擦和战略性的相互作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向包围着偏离这两种习俗的自满发起挑战。在社会基于生产力的限制而呈双峰分布的地方（而不是简单的分解为个人的无结构的总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促进一个阶级的利益的规范通常只有在减少了另一个阶级的福利的地方才能奏效。均衡不必一定是最优的。通过强制而得到支持的法令特别易遭它是有歧视性偏见的谴责。

因此，由国家对个人财产权进行的保护通常倾向于正向总和：禁止 A 抢劫 B，但同样禁止 B 剥夺 A。马克思主义者们，不为天赋现状的合法性所动，不承认正被强化的公约是真正公正的

习俗。现存的权利分配并不平等，有的集团继承了开始时抢先的特权——而资本积累本身就是劳动力为有产者生产剩余价值的异化劳动的直接结果。马克思主义者会说，保护这样的财产而反对它的生产者，立法的目的就不是为了达成（次优型的）和解，而是偏向处境更为优越的阶层的（最优型、第三好型的）不均衡。

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强制而产生的公约显然解决不了阶级矛盾，正如纸包不住火。当然，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对不均衡的习以为常可能会减弱怨恨的程度。同样，商业利益是全国的利益的公众看法也可能起到同样的效果。长期的习以为常可能会使不公平的感觉转变为国民接近解决合作问题的关键因素。倘能如此，则在马克思经济决定论者世界观里的虚假意识，就会为保守资本主义的理论里有争议的和令人不安的偏见找到一个借口。

在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国家的阐释中，法令能使不平等固化。根据同样的理由，在自然发展起来的习俗是有益于小部分人而不是全体的地方，法令也能修正不平等。

因此卡特尔之内的忠诚意味着更高的价格和有限的质量。盗贼之间的荣誉意味着更少的被捕和更少的背叛。议员之间的合作意味着生产商的租金和商店的通货膨胀。为避免诸如此类的发生，显然如果每个成员都把他对利益的追逐从为了小集团重新定位为为了自己，这对于大多数的顾客和市民总的来说会更好。正如曼可·奥尔森对他从未被侵略的、未被挫败的也未被革命化的稳定社会中发现的慢速发展和繁忙的日常工作所作的解释一样：“有着不变边界的稳定社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易于积累更多的为采取集体行动而进行的勾结和组织……总的来说，特殊利益的组织和勾结降低了效率，让收入在他们操纵的社会中集结，并使政治生活日益分裂”（奥尔森，1982：74）。

分配上的共谋会减少非成员的福利。这种情况下，免费搭乘显然就成为一项公众的福利；而保守主义显然有助于解决资本主

义的不利。在这种情况下，至少共同体的利益会实际上得到自利的个体主义者们的加强，他们不放弃任何集体不会补偿给他们的东西。

看不见的手会在提供弹性的、适应性的反应中招来贪婪和背叛之徒。不过预料中的报复，对那些作为自利性毁约结果的令人渴望的外在性来说，始终是个障碍。特别在他们没有条件直接地作交流、跨时间地先作小试以及签下可强制执行的合同的地方，贪婪和背叛之徒完全不知道多少背叛才是安全的，不会使他们遭到制裁。法令的功能就是使他们的私人贪心有了尺度。

限制性常例的设立使低成本的闯入者能进行削价竞争。被监禁的同伙们的分离妨碍了长时间的联合。文职官员的轮换制（类似于前线部队的换防）使供应商和游说者对获得共生的捕获物感到气馁。与一报还一报相矛盾的成功指标（也就是说，按比例地对前线的杀戮付酬）打碎了舒适的和解。在优秀申请人名单从来一贯相同的地方，公营部门从国外招标就减少了心照不宣地达成垄断价格的共谋机会。受到在议会连任两届的限制，政治活动增加了谋求官职人员人事的变动，减轻了提前享用优惠的程度。正如政府能建立一个控制污染的联合阵线，那么，显然，它也能向阻碍着自私的邪恶去侵害符合公众利益的公共美德的联合战线发起进攻。合作并不总是与社会共同目标相一致。在它不能如此的地方，看得见的手就最好还是削弱习俗而不是加强它。削弱了习俗，看得见的手，在作为整体的社会中，也能对道德的普遍性做出积极的贡献。

5.3 合法性

一个规律是统计上的而不是义务上的。一个习惯是事实上的而不是责任上的。简单的复制不足以使可预测的重现转变为规范

上的应该如此。一个经验上的顺序要获得社会规范的地位，还需要比重复的行为和遵从的模式更多的东西。需要的是，围绕着习俗的可感的合法性，以及个人因为相信在习俗中有些东西确实值得他的忠诚而甘受约束。因为一个社会的习俗要扩大为一个社会的规范，它必须要能唤起内在的信念。它必须能提供内在的鼓励，即比兴趣更有约束力的承诺能始终给予承认纪律的社会行为人以报酬。

合法性不与“实然”而与“应然”相关。它与受个人趣味（“杰克习惯早餐前喝咖啡”）限制的规律性或服从于科学实验（“吉尔总是用3号车床使浪费减少到最低”）证伪的规律性无关。对杰克的爱好以及吉尔的效率感的尊重有着集体表征的所有权威。咖啡和车床本身并没有什么权威。实际上，存在于交易关系核心的合法契约也没有什么权威。正如迪尔凯姆所言，市场的交换物并不是从真空中自己获得了合法性，相反是由先前的和围绕着它的习俗和看法使之有效：“总之，契约就自身来说并不充分，它之成为可能只是由于源于社会的契约管理……社会给它提供了强制性的力量”（迪尔凯姆，1893：215）。迪尔凯姆认为，正义乃源出于共同体，并由一致同意所确认。它与顾客在商店里对性能价格的一番比较毫无关系。

合法性与“应然”有关并规定了范围。不过，与不可交易性和与约束性的混合在本章里产生了一个概念的问题。在前两节，不动感情又充满计算地，用工具理性的商业逻辑和自利的个体主义探讨了习俗的功能和发展。第三节面临一个更困难的任務，解释为什么选择者们会认为有义务不作选择，为什么资产者们会把保守过去当作一种责任。第三节必须令人信服地解释多个时期的非自我约束的立宪主义，而不是求助那导致了以茶代替咖啡和以更好的工具替换了3号车床的同期的利益。前两节暗示，社会买入最有效的规范——并在它们过时后无情地报废。第三节考虑环

境，在其中，昨天能使它的标准永存——并甚至在缺乏教师、启示和书籍之时，仍能激起一致同意的“应然”。

詹姆斯·布坎南是那些为开放的道德相对主义作辩护的怀疑论者和不可知论者之一。理由是，在布坎南看来，在一个多元主义和怀疑的时代不存在诚实的选择：“价值被广泛地认定是源于个人，没有绝对之物。上帝已死一个世纪之久，企图使他复活无异于毁灭”（布坎南，1986，12）。上帝已死，是个人并且只有个人掌管着通往“善的社会”、“公共利益”、“社会福利功能”以及“公意”的神圣钥匙。只有个人能表达价值。只有个人之间的同意能使一个不仅仅是“是”的“应是”合法化。

个人们有着各种爱好但它们也需要习俗：“我们为了生活在一起需要各种规则，很简单，因为没有它们我们肯定会交战”（布伦南和布坎南，1985：3）。个人们珍视自由但他们也珍视秩序：“有一个章程总是理智的”（布坎南和图洛克，1962：81）。个人需要自主，但他们也需要商议：“任何契约性协议的本质就是自愿的参与”（布坎南和图洛克，1962：250~251）。所有这一切加起来就等于经同意而产生的各种义务，以及先于游戏开始的所有未知世界的参与者认为是管理游戏最适当标准的一整套规则：“所谓‘公平的规则’，是在游戏本身开始前，在参加者的特定位置被确定之前，参加者就同意的规则。仔细注意这个定义的内容：规则是公平的，如果参加者同意了它。它并没说因为规则是公平的，所以参加者都同意它”（布坎南，1986：126）。没有人会说，通过按照一定规则制定出来的程序，并经过民主协商所达成的共鸣性的应然（*ought-to-bes*），与那些本应由一个救济性的、全知全能的和仁慈的神灵所颁布的，并得到无可怀疑的圣书所规定的等级制度支持的规范性法典是一样的。没有人这么说是因为没有人能懂得这一点。陷于无知的困境并从此开始，惟一的确定性的是调和为共同舆论的个人意见：“‘真理’，说到底，

是要通过人们是否一致同意来检验的。若人们不能一致同意，就没有什么‘真理’”（布坎南，1977：113）。这句话的道理并不深奥，但它是城里惟一的游戏规则。

布坎南从一致同意中得出合法性。在他的市民购买道德正如屠夫购买啤酒和面包的市场式的模式的基础之上，质疑在本章前两节中展现的逻辑能否足以使结论部分的主题充满合法性，是十分有趣的。这个问题就是，换句话说，个人是否会受前两节从理性和自利中推出的道德标准的吸引，或他是否会坚持不太明确地是资本主义文化特质产品的保守主义。

本章的第一部分把习俗的功能定义为对无利益冲突的期望的协调：“所谓社会的规范就是为社会成员普遍遵循的举止或行为的规定性原则”（乌尔曼-玛格丽特，1977：12）。第一种情形的习俗使选择得到和谐并产生愿望共享的状态：因此“在大钟下”或“大中心车站”可能是被丢了旅伴的人们当作会面的地方。第二种情形的习俗减少紧张程度，它导致的次优状况被有保险倾向的人列为比争最优而冒险要高明：圣经的戒律“你不应偷盗”是禁止令的一个清楚例子，它甚至对一个贼也有意义，因他本身也是另一个贼攻击的目标。不论第一种情形还是第二种情形的习俗都显得与社会舆情十分相容。社会舆情就像布坎南的经过同意而产生道德合法性一样，使是扩大为应是，并因此成为社会控制的一个模式。

本章的第二部分转向规则们的演化以及它们在法令中的编纂。一报还一报指出合作是作为狭隘的最大化的预料之外的后果而出现的；而威胁和惩罚保证了有条件的希望不会永远地因无益的背离而偏离方向。最终的状态是比每个人单独地做出选择的后果更能使每个人都感到满意的一种均衡：“在一种均衡的联合中，没有任一个行为人原本会通过不同的行为产生比他的喜好更多的结果，除非别人的一些行为也不同。没有人在得知别人如何选择

后会后悔自己的选择。没有人因缺少而失败”（刘易斯，1969：8）。均衡无须是最优的。这就是说，有理由期待产生了如此情势的规则会获得采用为规范的足够认可。

经一致同意而产生的“应是”与耶稣和康德的“应是”并不矛盾。所需要的一切是，应向会受规范约束的人们商量相应的法规并得到他们的认可。

当然，这确实使选举人从决定论的王国进入了义务论的王国。动机会作考虑，而直接的利益则不，甚至在囚徒困境中也存在着良心和牺牲：“所谓有道德的人，在构成公共领域的环境中，按假定他人也会作同样选择的假设，选择合作的行为，并且，他不会背离他的选择，即使他确知由于某种原因，别人无法在以后也通过背离对他进行惩罚”（乌尔曼-玛格丽特，1977：41）。一个有道德的人拒绝攫取短期利益，因为他已投资于长期的习俗。当实际上只有自我进行约束时，有道德的人的行止就像为法律所约束一样。简言之，有道德的人是天然的保守主义者。本章已表明的就是，在理性上和利益上，他也可能是一个天然的资本家。

六、演化与经济

本章的出发点不是价格理论、比较静力学或边际均衡，相反，是社会选择、永恒的运动和对环境的适应：“人在社会中的生活，就像其他物种的生活一样，是一种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斗争。因此，它是一个选择性适应的过程。社会结构的演化就是一个对制度进行自然选择的过程”（凡勃伦，1899：131）。凡勃伦认为，社会生活与有机体的生活十分相似，因为它服从于不断累积的因果关系、非均衡状态和为了避免灭绝而发生的突变：“个体的经济生活史就是一个手段不断适应随过程而不断改变着的目标的过程。在任一点上，主体和环境都是上一个过程的结果”（凡勃伦，1919：74~75）。凡勃伦说，经济活动最好按照达尔文的生物发展的思路来理解，而不是将其简化为牛顿物理学式的数学力学。阿尔弗莱德·马歇尔写道：“经济学的中心思想”不是别的，就是“生命力和运动”：“经济学家的麦加在经济生物学中”（马歇尔，1890：vii~viii）。这是一个可以让凡勃伦和其他关注游戏之结构、参数和规则演化的人类中心主义经济学家共享的观点。

马歇尔是一个进步论者，相信变化总是有利于进步，不管在物质上还是道德上都是如此：“在人类的每一个世代，人们都津津乐道于一些尖刻的故事，讲述当地或局部地区的退化；但是，

如果放眼更广阔的历史事实，我们就会发现，世界是进步的”（马歇尔，1873：115～116）。卡尔·马克思也持这样一种观点，只是对进步到底意味着什么有不同的看法：“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①（马克思，1867：763）。不管是马歇尔还是马克思都希望国民对财富的追求能够促进制度的进步，与此同时，制度进步反过来又有利于国民对财富的追求。然而，一种更为中立，更为科学的立场则应当把演化同乐观主义分离开来，将经济学同哲学分离开来。故此，演化经济学家应当追踪各种现象，解释各种规范，而不应贸然地下结论说，变化本身具有或者会带来某种应然的价值。

鉴于适应和生存总是具有功能失调和死亡所不具有的某种正当性，这将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不管艰巨与否，超然的分析都不会像其替代选择那样让人壮志高蹈，但它确实有利于对那些所能发现的事实进行不怀偏见的考察。演化经济学家是一种在“不断展开的过程”中而不是在“自我平衡的机制”（凡勃伦，1919：173）中寻找解释的研究取向：“现在经济学家们面临的问题不是各种事物怎样让自身保持于一种‘稳定状态’，而是它们怎样不断地生长和变化”（凡勃伦，1943：8）。演化经济学研究的就是生长和变化。它竭力做到不偏不倚，将各种与福利和目的论有关的价值评价悬置起来，直至其完成实证研究。然而进步主义的阴影总是挥之不去。阿尔钦和弗里德曼的演化经济学（见6.1节）和哈耶克的演化经济学（见6.2节）正好表明，在实际操作中，将逻辑与赋予现象和规范以道德价值的意图区别是多么的艰难。

① 中译文见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一卷，第831～832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版。——译者注

6.1 阿尔钦与弗里德曼

新古典经济学始于起点，即追求利润最大化和回报最优化的理性决策者。阿尔钦的演化经济学始于终点。即通过所实现的回报对相对效率和报酬业绩进行检验的“非人格化的市场力量”：“这样的成功是通过什么推理过程或动机实现的，并不重要。它所取得的成就这一事实就已经够了。这就是经济体制选择生存者的尺度：那些取得实际利润的就是幸存者；那些遭受了损失的就会灭绝”（阿尔钦，1950：213）。经济体制挑选得胜厂商就像自然环境选择最具有适应能力的植物一样：“植物朝建筑物的阳面‘生长’并不是由于它们意识到那里存在着最优的或较好的条件而‘想那样’，毋宁说是由于那些刚好享受到更多阳光的叶子长得更快，他们的营养系统更为发达”（阿尔钦，1950：214）。那些决策者们倾向于将商业上的成功归因于智力上的远见和对有利条件的事先算计。阿尔钦的意思是，如果存在着基本的不确定性，承认机遇的随机性，那么，仅是事后的结果本身即足以揭示有关“经济体生存的实现条件”（阿尔钦，1950：216）的真理。对高级经理人员而言，就像蔬菜一样，成功来自适应，结构就是对各种事物进行选择的实体。

阿尔钦强调的重点是整体所具有逻辑，而不是部分的谨慎从事的意识：“经济体制是一个吐故纳新机制，它在对‘成功’或‘利润’的适应性追求所驱动的探索性行动中进行选择。这一理解所暗示的方法体现为生物演化和自然选择法则”（阿尔钦，1950：211）。经济体制固然在挑选，但外部的旁观者仍然可以运用理性导向去预测其结果。哪怕跑步运动员是偶然之中选择了他们的路线，但旁观者仍然可以根据最短路径原理预测出胜利者。哪怕种子是由于风力作用而随机种下的，但旁观者仍然可以根据

土壤的肥力预测出最丰产的种子。在这两个事例中，行动单位的理性选择都不是其取得成功的可靠解释。并且，那些抓住环境限制的旁观者能够确认最佳路线和最肥沃的土壤，而根本无需依靠行动单位自身的最大化估计。因此，尽管存在着行动单位本身经常受到无知和不确定性的羁绊这一事实，但理性假设也许仍然可以继续保留为微观经济学理论的核心教条。

在阿尔钦的视野中，成功的后果并不依赖于事先的估计。既然如此多的人类选择似乎无需教科书上所说的那些反思和比较的条件，那么，阿尔钦这一保证是值得欢迎的。用格雷·贝克尔的话来说，就是，承认非理性但捍卫理性假设：“经济学方法并未假设决策单位必然意识到他们为实现最大化所做的努力，或者能够将其行为系统模式的理由用语言表达出来，或用渊博的知识描绘出来”（贝克尔，1976：7）。理性选择必然带来良好的预见性——仅是这一检验标准本身即足以令阿尔钦和贝克尔感到满意，就像它令米尔顿·弗里德曼感到满意一样，即尽管“理性的和信息完备的最大化”显然缺乏描述上的完备性，但仍不失为一个有价值的假设。

米尔顿·弗里德曼争辩说，精确的预测才是经济学家严格意义上的研究，但这些完备的解释，虽然很有启发性，但对于迫在眉睫的急务来说却是完全不必要的。他以台球运动员为例来支持其应用应当高于理解的观点：“如果假设台球运动员良好的预见性产生于他击球时好像了解那些能够给出台球最佳运行方向的复杂的数学公式，那将完全是荒谬的”（弗里德曼，1953：21）。那些优胜者实际上并没有进行算计并遵循原来的计划。对他们来说，没有必要因为似然（as if）理性假设而去这样做，以保持自己的预测能力。台球有重量，球桌有宽度，球杆有长度。那些赢得比赛的运动员实际上是那些最具有适应性的运动员，是那些最能适应环境因素的运动员。靠运气而不是判断力赢球这样一种可

能性决不是忽视似然预测性的价值：“在一场有足够的赌马者严格按照随机原则下注的赛马中，某些人能够赢得所有八场比赛”（阿尔钦，1950：215~216）。理性假设能够确定最合适的运动，似然预测表达了这种一样信念：某些种子注定要飘落到肥沃的土地上。

资本主义企业就跟上面所说的台球和种子一样。规则就是上面所说的环境，行动单位努力去适应，最适者生存。取得成功的条件就是向你付费的交易伙伴的满意程度：“不管怎样，除非商人的行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报酬最大化原则保持一致，否则他们在商业中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弗里德曼，1953：22）。顾客必须得到满足，否则商家将会被淘汰出局——这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是商业生活中的事实。与此相比，不太清楚的是，审慎的算计会对后续的市场结果产生什么影响。弗里德曼就会说，只要似然的解释精确地预见经验结果，更深层地去探究商人的内心秘密没有现实的必要。

但是，尽管如此，如果将经济灵魂放到显微镜去观察，理性的利己主义在资本主义市场中很可能会展现为某种更具体的东西而不是一个简单化的似然。其原因，根据马克斯·韦伯的阐述，恰恰在于资本主义本身的特性：“资本主义与对利润的追求，与通过连续的、理性的资本主义企业对利润的永无止境的追求是等同的。因为它必须如此：在一个全然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中，一个不会利用一切机会去实现利润的个体资本主义企业注定是要灭亡的”（韦伯，1904~1905：17）。身陷这样一种历史进程的牢笼，就像迪尔凯姆所说的，个体资本家可能会省察到，心灵在事物的法则面前是如此渺小，甚至一个自主拥有的企业也可能成为一个约束系统：“作为一个个体主义者，我可以自由使用以往各世代的技术方法；但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会招致某种形式的毁灭”（迪尔凯姆，1895：3）。事后，保守的个体主义者会认识到

自己服从的成本，就像雪花事后会发现阳光与阴影之间的差别一样。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在竞争性资本家的理性利己主义中，存在着一种无思维能力的雪花无法得到的事前的因素。同样地，成功的后果可以利用似然理性预测出来，因此，很显然，基于意识建构，竞争之中的资本家会被塑造得非常敏锐和俭省，以保证自己的生存。

米尔顿·弗里德曼援引非经济性的歧视现象为例。在歧视现象中，非竞争行为将使那些作恶者为自己的将来付出代价。弗里德曼的观点是，非竞争行为就是一种与求利性目标不相容的自我羁绊：“一个在自己的商业活动中表示出与生产效率无关的各种偏好的商人或企业家，与其他不这样做的个体相比，将处于不利地位”（弗里德曼，1962：109）。这样一来，那些稟性将会被那些追求经济效益的人廉价抛售：“在一个自由市场中，他们会将他驱逐出去”（弗里德曼，1962：110）。因此，那些理性的人将会事先减少固执，以使自己能够留存在游戏之中：“比如，一个竞争之中的出版家承受不起只出版他个人喜欢的作品”（弗里德曼，1962：17）。旁观者与主谋者，实然的与似然的，这里的假设是，“在竞争性市场中，雇员们对金钱方面自我利益的死心踏地的追求”和期望本质上是有利于经济的（*pro-economical*）：“这个‘假设’适用于经济学中的许多前提”（弗里德曼，1953：28）。

竞争性资本主义在环境的驱使下，会只选择那些对自己的可持续效能具有某种功能的制度。一方面受当前对手的牵引，另一方面受潜在对手的推动，最出色的厂商将是那些最先革除“求生性工作”（*job for life*）、任人惟亲、论资排辈、职业结构、产品陈旧、反射性供给等现象的厂商。最失败的厂商则是那些被阿罗所说的造成“历史上最大的悲剧”的原因——“对以往目标的忠诚意识，这种意识正好在经验表明这些目标必须被修改的时候巩

固了它”（阿罗，1974：29）——压垮的厂商。竞争性不会把入场券卖给过去的意图，也不会资助费用给那些不能自己付费的仪式和感情。适者生存法则只购买那些对自己有某种用途的行为；与此同时，看不见的手也不会准备奖金以补偿那些落败者。纪律是铁面无私的，大量包袱必须甩开。社会收益，在那些与新古典主义者一样高度重视绩效的演化着的买卖人眼中，不止是弥补个人的衰败——这是优胜劣汰过程必须付出的代价——：“面对普遍存在的稀缺，竞争决定了更有效率的制度、政策和个人行动才能生存下来，缺乏效率的则会灭绝”（诺斯，1981：7）。如果传统是好的而衰败是坏的，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则又可以说稀缺是坏的，富裕是好的。后一种视角的拥护者会说，资本主义只购买服务于其普遍经济目的的保守主义是正确的。

知识的准则是假设与证伪。它在物质层面上的对应物是连续的逼近。波普尔清楚地看到，科学家和资本家在反馈—调整式的假设—检验方法上有很多共同点。假设—检验方法的主要特点是，“通过试错法来……解决问题”：“新的反应、新的形式、新的机构、新的行为模式、新的假设，被尝试性地提出来，并用排错法（*error-elimination*）加以控制”（波普尔，1972：242）。由于成功与否是通过试验来加以甄别的，因此，可以理解，模仿行为会出现，并且会导致所观察到的一致性——这是一个演化过程中的幸存者的标志。在一个欢迎任何风险规避措施的经济市场中，一种行之有效的新颖技术，它以往的记录显然会传播开来，从而成为公共产品。随着这些措施的传播，它们就会变成一个威胁。正如阿尔钦所观察到的，随着习俗的建立，一个有关“在条件发生变化时愿否从已有的规则中摆脱出来”的问题就必然会提出来：“那么，重要的不只是模仿行为而且还包括在‘正确的’的时间和环境下放弃它的意愿”（阿尔钦，1950：218）。如果缺乏这种意愿，与因循守旧如影随形的创新意识很容易蜕变为安于

马匹和马车的地方性最大化，而不是追求汽车和飞机的全球性最大化。

弗里德曼希望竞争性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成为使创新精神的火花生生不息的动力。约瑟夫·熊彼得亦是如此。熊彼得是马克思和达尔文的阅听人，也是一个提倡不断变革的理论家：“与资本主义打交道就是与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打交道”（熊彼得，1942：82）。不过，与弗里德曼不同，在那个属于大公司和官僚精英们的踌躇满志的时代里，他未能预见到对生活消费品和生产方法的常年 [FS1] 重新评价（*perennial reappraisal*）。熊彼得寄希望于将来。他深信，组织僵化会不可避免地带来制度停滞。对此，他说过一句很值得记取的话：“资本主义能够生存下去吗？不能。我认为它不能”（熊彼得，1942：61）。不过，也许他错了。

6.2 哈耶克

哈耶克是一位自由意志主义者，也是一位经济学家。他鼓吹通过企业的自发行为和市场搜寻推动演化。他尖锐地批评那些“沉溺于权威”，“缺乏对经济力量的理解”（这也许是哈耶克曾经将他的一篇文章命名为“我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的主要原因）和存在着农奴制培养起来的“对轻信他人的不受控制的社会力量的恐惧”的保守哲学：“保守主义态度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害怕变革，对新事物胆怯、不信任，等等，而自由主义姿态则是以勇气和信心为基础的，是以即使我们不能预知变革的方向而仍让其自行其是的准备态度为基础的”（哈耶克，1960：400）。保守主义者在进入某个过程之前即想知道终极状态。自由主义者则承认目标是由旅途中的环境形成的，但他还是鼓励旅行者们不顾风险去行使自由选择的权利。

知识是分散的，将来是晦暗难明的。在一个内心的一致性和选择的纯粹抽象性让位于冒险、零碎、不协调和缺乏预见性行为的万花筒般的世界里，对成本和收益的苦心孤诣的平衡，对最大快乐的丝丝入扣的算计，从逻辑上说，必然会受制于有限理性，甚至没有任何理性可言。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要把那种视误差项为残差的新古典做法颠倒过来：“在我们解释人们为什么会犯错误之前，我们首先必须解释为什么他们应该永远是正确的”（哈耶克，1949：34）。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是普遍存在的，当前的状态也总是晦暗难明的。不管演化的结果是什么，它显然不可能是预先安排的手段与个体希望通过一段时间的经济运作之后能够带来的预期终极状态之间理想关联的产物：“演化不可能被人们的需要牵着鼻子走，而且通常不会产生人们所需要的结果”（哈耶克，1988：74）。

在原子起作用的地方，混沌状态是可能的。相反，在环境本身发挥主导约束作用的地方，协调也是可能的：“自发的秩序来自让自己不断适应环境的个体要素”（哈耶克，1973：41）。环境提供参数并对个体的完全自由进行限制。从另一方面来说，环境是建立“正确期望”（哈耶克，1973：36）的基础，这样，它就成了把正为适应而斗争的行动者统一起来的背景知识的源泉。显然，社会整体肯定不能具体化为一个个分离的东西：所谓“社会”不过是惟一能够感知和行动的“个体们做出的可以相互理解的行动”（哈耶克，1949：69）。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说社会是个体、感知和现象的集合——个体在生存压力的驱动下，必须以之为目标确定自己行为的方向——就进而认为每个特殊的个体必然会更多地起到事件形成作用，而不是一个被动的十足的竞争者。

每个个体都会有自己的计划。形势则会对这些计划做出自己的处理。有目的的行动起着发动作用——由关于“地方条件”的

深层知识开发出来的投机机会以及还未成为公共产品的关于“即逝性环境”的专家性评估，即可为例。结构性的整体与分散的局部之间相互糅合：“整体作为一个市场发挥作用，不是因为市场中的每一个人对整个领域都了然于胸，而是因为这些受到限制的个体的视野充分地交叠在一起，最终通过许多中介使那些相关的信息能够传达到所有人”（哈耶克，1949：86）。在原子起着决定作用的地方，有可能是一片混沌状态。经过环境的统合，混沌状态可能会扭转。

哈耶克说，“一个社会的经济问题，主要是一个如何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下快速适应变化的问题”（哈耶克，1949：83）他还相信，交易秩序能够成功地面对分散的意图和结果的多样性的挑战：“交换是生产性的；它确实利用可以获取的资源提高了人类需求的满足程度”（哈耶克，1988：95）。演化就在这里出现了，适应也在这里发生了；但是，仍然没有任何一个个体能够在实际的交易——它赋予（客观的）凝聚着成本的商品以（主观的）附加着价值的经济状态——发生之前，知道最终的价格和数量，以及变化着的品质和特性。没有任何一个心灵能够预知最终的结果。终极结果不是预谋的结果。它们并非理性选择的产物。

哈耶克是一位功能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位个体主义者，一位个人自治的信仰者。与此同时，他也相信整体有其自身的逻辑——一种绝不会因为现实的决策者不知其为何物而陷于困境的逻辑。波普尔也具有这种二重性。他像哈耶克一样，将这种二重性看做理解人类处境的关键：“理论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探索有意识的人类行动在社会层面上的无意识的反映”（波普尔，1963：342）。这也是亚当·斯密关于“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推动着意料之外的结果”的逐利商人的那段著名赞词的核心思想：“对他自身利益的琢磨自然甚至必然会引导他更倾向于从事那些对整个社会最为有利的职业”（斯密，1776：1，475，

477)。部分和整体的二重性是哈耶克经济适应理论的基础。分散的过程是能够得到的最好的东西。因此，市场的结果也是能够得到的最好的东西。关于效率的更进一步的定义是无法提供的。自发的秩序经得起关于它的最后的裁决。

哈耶克在他关于现象的讨论中采取了向看前的态度。他向大家展示了各种现象如何在非人为的过程中来而复往，但他很少说明这些现象为什么会有具体的形态，以及它们何时能够停留。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市场资本主义理论实际上是一种关于不断适应的理论，而不是一种多阶段固执 (**multi-period perseverance**) 的理论。

相反，与关于现象的讨论相联系，哈耶克甚至将关于演化的讨论置于习俗和传统的背景之上。习俗和传统有利于秩序的形成，因为它们根基很深：“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具有悖论意味的是，一个可能的事实是，一个成功的自由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也一定是一个传统束缚的社会” (哈耶克, 1960: 61)。法庭保护公民免受国家的侵害。市场本身被认为是一项永远存在的制度。货币可望保留其作为媒介的可接受性和作为贮存手段的价值。这些事物中的任何一项都无需随着基础的不断变化而进行重新协商。事实上，要真是这样，对它们的社会功能将是一个威胁。显然，在诸如此类的事实中，以往互动过程所产生的无意识结果在哈耶克的经济学中具有一种生存者的地位，这一点是经济学所广泛暗示的。

门格尔关于货币的论述阐明了货币演化的几个阶段。他关于留存于现时的历史的分析清楚地描述了像哈耶克这样的累进主义者 (**incrementalist**) 在说明习俗可以成为选择的一个无声的补充时所采用的推理过程。

门格尔强调，货币并不是按照人们觉察到实物交换的低效率后的反应方向演化的：“货币既不是节俭的人们达成协议的产物，

也不是立法行动的产物。没有人发明它”（门格尔，1871：262）。货币的演化是自然的，自发的。就像语言和习惯法一样，它不是有意识建构的产物，而是分散决策和独立互动的结果：“我们只有将这里讨论的社会制度理解一种无意识结果，理解为一个社会的成员们特殊的、个别的努力所造成的无计划的结果，才能真正对货币的起源达到充分的理解”（门格尔，1883：155）。一个社会的成员制造了他们意料之外的结果。事后出现的立法机关，不过是对业已存在的状态进行确认的橡皮图章。它的法令要求人们依法遵守，在这个意义上，它对进一步的自发性是一道刹车。尽管如此，它依然是反馈性的，而非前摄性的。在本质上，它只是对“某种已经成为货币的事物的承认”（门格尔，1883：153）。

一种制度的发展总是逐渐展开的，而不是一次完成的。就货币而言，在人们选取某种货物充当货物这项工作中，就经历了逐渐淘汰效率低的货币（比如，牲畜、贝壳、小米）而采用更合适的媒介（最值得注意的是贵金属）这么一个演化过程。门格尔曾就最具有收入弹性（*income-elasticity*）从而最适合做货币的货物的客观属性发表过自己的看法。他说，他们应当“最易于携带，最经久耐用，最易于分割”（门格尔，1883：154）。他还阐述说，货币不过是一种主观性、观念和协议。货币不是大多数人应该使用的资产，而是他们实际上确实正在使用的资产。

在检视历史记录的过程中，门格尔从已有的事实中得出结论说，不管是关于功能的检验还是关于可接受性的检验都指向了同一种资产：“随着经济的进步……我们时时处处都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即一定数量的物品，特别是那些在一定的时间和地点最容易卖出去的物品，在习惯的强有力的影响下，变得为交易中的每一个人所接受，因而能够用于交换其他任何一种商品”（门格尔，1871：260）。演化增进了可交易性。可交易性积淀为习惯。习惯推动稳定性。这样，交换就能够日复一日地进行着，而

不必在每个阶段都要重新选择支付的手段。

门格尔是这种观点，哈耶克也是这种观点。在同一周期 (*in-period*)，商业之间相互竞争，胜者生存。在跨周期 (*multi-period*) 上，则存在着赋予资本主义以保守性格的法律、市场和货币。甚至在现象层面上，在哈耶克的发现经济学中，似乎既有常量，也有变量。

在其关于事物的讨论中，哈耶克的注意力集中在竞争和生存的共时性 (*in-period*) 强制性上。当他将注意力转移到规则上时，强调的重点发生了变化。哈耶克写道，“只有规则才能将扩展秩序统一起来” (哈耶克, 1988: 19)，“普遍规则一定会自发地流传开来并蓬勃发展” (哈耶克, 1988: 73)。哈耶克在使用“只有规则”和“一定会流传开来”等字眼来标示历时性 (*multi-period*) 保守主义的时候，其字面含义与其真实含义是相同的。根据哈耶克的估计，没有历时性 (*multi-period*) 的保守主义，共时性 (*in-period*) 的资本主义会丧失进步的能力：“反之，只能是贫困和饥馑” (哈耶克, 1988: 63)。

哈耶克是个人自由的鼓吹者，同时也是规范约束的鼓吹者：“如果有可能免于强制的话，一般地说，愿意服从并非任何人主观设计出来的社会过程的产物和也许无人能够理解的理由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 (哈耶克, 1949: 23)。哈耶克是一位理性算计者，但他同时也认为，理性算计者必须“甚至没有任何思考地接受数不清的传统” (哈耶克, 1988: 62)：“在参与社会进程的过程中，个体必须准备并愿意调整自己，以适应新的变化并服从并非心智设计之产物的习俗——它在某些特定场合的正当性可能是难以认识的，对个体来说，常常显得不够明智和理性” (哈耶克, 1949: 22)。简言之，哈耶克同时是过去和现在、理解和接受、自由和限制的捍卫者。他争辩说，自治性和习得性不是相互矛盾的，而是相互补充的。事实上，它们是混合经济——只有

它，才能保证持续的演化并保证共同体免遭贫困和饥谨——的基本要素。

演化过程会选择那些能够很好地适应形势大局的事项。对于规则，亦是如此：“为了让人们在自发秩序各得其所，不管是所要追求的结果，还是所要使用的手段，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或必须知道的。这种秩序是自己形成的。规则之所以能够在不断调整中创造出秩序，并不是因为人们对这些规则的功能有了更好的理解，而是因为那些繁荣昌盛的群体恰好以使它们更有适应性的方式改变了它们”（哈耶克，1988：20）。不言而喻，具有思维能力的人更少的是一位建筑师，而更多地是文化环境——这个环境适应过程中教给他各种规则——的产物：“学会如何处事与其说是洞察力、理性和理解力的根源，不如说是它们的结果。人并非生而聪慧、理性和善良，而是经过教育才变成这样的……人变得智慧是由于存在着传统”（哈耶克，1988：21）。传统规训着内心的直觉，沟通着意识的设计。不是冲动，不是科学，也不是国家，保证了自由的个体——如此容易成为“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愿望塑造他周围的世界这样一种致命的自负”的牺牲品的人，不至于忽视通过试错法产生出来的各种规范——它不是有意识设计出来的并得到人们的无条件服从，但“远远超过人们有意识构思的各种计划”——：“人类通过发展和学会遵守规则而创造了文明……这些约束规则选择了我们：它使我们能够生存”（哈耶克，1988：12，14）。任何成功地避免霍布斯式的独木舟并使合作成为可能的行为规则一定值得大力推荐。

一个群体能够适应环境是因为它的成员都接受它：“塑造习惯和道德的选择过程能够考虑比个体所感知到的更多的实际环境……相应地，传统在某些方面超过了人类理性，或者说比人类理性更‘聪明’”（哈耶克，1988：75）。就像关于事象的自然选择一样，信息是分散的，个体缺乏大局观，结果也不是计划之中

的。就规则而言，这意味着那些最适应群体生存的标准将会流传开来：“行为规则的基因（从更大尺度上讲，也可以说是文化）从一个个体传送到另一个个体，而规则的所谓自然选择将会根据作为结果的群体秩序效率的高低来进行”（哈耶克，1967：67）。看不见的手“根据它们对于人类生存的价值”（哈耶克，1988：20）对规范进行选择，“使那些实施这些规范的群体能够繁衍得更为成功并将外人也吸纳进来”（哈耶克，1988：16）。看不见的手深刻地依赖于“那些在自己的领域内已经被证明非常成功的习惯和制度”（哈耶克，1949：88）。在自动调节的错误一修正过程中，那些没有脱颖而出的有意识定做的应然（*ought-to-bes*）是不会有变成现实的：“我们从来不能选择我们的道德”（哈耶克，1949：24）。

哈耶克似乎是说，道德市场与物品市场显然具有相似性。在上述两种情形中，各美其美的相对主义对某项选择的合适性来说是一个定论性的东西。自动性和肉体上的生存成为选择的标准。简明的规范和明确的结果被给“匿名的、似乎非理性的社会的力量”（哈耶克，1949：24）。只有它，才有那个眼光挑选出最为实用的规范来。

合理的就是已经演化出来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只有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才能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加产品——是无意识适应的一个典范，它已经表明自己能够交付足够多的商品：“我们从未刻意设计我们的经济体制。我们还没有聪明到能够那样做。我们一不小心掉了进去，然后它就把我们送到了——一个意外的高度”（哈耶克，1979：164）。资本主义由于其卓越的资源使用能力（这是它对生存斗争的贡献）而取得了合法性。相应地，扩而言之，那些既是分散市场平稳运行的结果又是它的前提条件的规则也一定是具有合法性的。正是这样，哈耶克，一位理论上的伦理不可知论者，才能将自己的研究从图钉缩小到诗歌，从以盗窃

为乐缩小到“那些确实与这里讨论的问题有关的特殊道德传统，比如私有财产、储蓄、交换、诚实、信任、契约”（哈耶克，1988：67）。作为一个演化论者，哈耶克既没有宣称这些价值是绝对物，也没有说资本主义的包裹可以不经检查就带走。哈耶克的观点仅仅是说，在霍布斯和马尔萨斯欲言又止的时候，达尔文从经济学中得到了进化的基本观念”（哈耶克，1988：24），自发演化性伦理的替代物只能是混乱或非常不利于物质进步之必然性的强制。

哈耶克论述中的很多东西让人联想到正式宗教中那些学而知之的规则。对规范进行选择的高深莫测的手。在生存问题上比在幸福问题上表现更为强烈的有保留的目的论。对力图摆脱外部责任约束的卢梭式解放的抵制。为传统和共享允许范围内的自由意志和创新所保留的角色。显然，由于哈耶克的论述中没有提及上帝、圣经或教堂，所以两者之间还不至于太相近。不管怎样，哈耶克本人是意识到了这种相似性——进而才能对这种关联的性质做出很有见地的推测：“也许许多人在提及上帝时仅仅意味着某种使他们的共同体长盛不衰的道德或价值传统的人格化”（哈耶克，1988：140）。共同体的宗教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因为它们不能很好地适应群体的需要。经济学的宗教繁荣起来，因为它们能够将资源动员起来以克服即将到来的心腹之忧：“那些惟一能够生存的宗教就是那些对财富和家庭提供支持的宗教”（哈耶克，1988：137）。毫无疑问，宗教本身必须服从自然选择过程。

宗教能够生存下来是因为共同体生存了下来。共同体能够生存下来是因为资本主义生存了下来。既然如此，公认超人类的规范不能说是超自然的。规则不是出世的，而是入世的，不断演化的规则不是一个外在于经济的上帝的意志，在一个受到资源约束但希望生活得更好的共同体中，它毋宁说是经济活动在功能上的前提条件。

应予定论的是演化而不是民主：“支配着当前社会的绝大多数规则不是我们特意制造的结果，……（而是）一个演化过程的产物。在此演化过程中，远非单一个体所能全面了解的经验和知识积淀到了规则之中”（哈耶克，1967：92）。显然，效益而不是推理才是规则质量之点滴进步的保障：“各种行为规则……不是为了实现一个众所周知的意图，作为大家认可的条件而发展起来的，它们之所以演化出来，是因为那些实践这些规则的群体更为成功，甚至取代了其他群体”（哈耶克，1973：18）。显然，哈耶克坚信，事后的共同利益并不是事前的共同意志之理性最大化。这样，他就将自己关于模式和规制的经济学与詹姆斯·布坎南的契约论（contractarian）视角区别开来。布坎南的自由主义立场妨碍了他肯定那些未经自由个体同意的规则的有效性。那种认为有一个哈耶克就有一个布坎南的评论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观点。

首先，布坎南有一个观点认为，一项规则除非或直到它保障了合意认可（consensual recognition）的合法性，否则不能说它是“好的”。意即规则必须被有关各个体认为是非常优秀的。单位能动者们本身必须对哪些可以算是“有效”（类似于理想状态的经济交换——它是双方都希望）的规则做出界定。规则之所以被特别认为“有效”，是因为那些将会服从于它的统治的个体们都这样认为。布坎南说：“除了同意，契约主义者几乎没有别的路可走”（布坎南，1977：295）。哈耶克意义上的演化并不是将“合适的”化约到只知道什么是主观约束和鞋的什么部分夹脚的自我的层次上。

其次，布坎南有一个估计，即演化不能保证其结果在社会层面上是事实上最优的规则：“历史无需在社会政治空间中随便踱步，我不相信社会演化过程的效能。那些存活并繁荣起来的制度不一定是那些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潜能的制度”（布坎南，1957：167）。那些存活并繁荣起来的制度不一定是那些生活在这

些制度之下的人认为“最好”的制度。看不见的手不能提供最令人满意的约束。这表明，在这种情况下，有意识地重新拟订规则的行动可以催生出回报率更高的游戏。哈耶克乞灵于集体、群体、有机性和功能性的做法对布坎南的吸引力非常有限，因为他深信，分散的知识和方法论个体主义经常意味着不能完全自动调节的宪法秩序。

因此，布坎南非常赞同地指出，在其著作的某些段落中，甚至哈耶克这个最乐观的演化论者也承认，生存并不一定是效率的有效证据。在其中一个段落中，哈耶克承认，所有规则的演化都具有某些有用的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其他方面，这一法律不会朝人们非常不希望的其他方向发展，当这种情况发生时，经过有意识的立法进行修正也许是惟一可行的出路。……因此，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完全免去立法行动”（哈耶克，1973：88）。在哈耶克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布坎南观点中的某些逻辑，即只有在它们满足了人类期望的时候，人为的修正才会长久地存在下去；某些时候立法机关有必要提高那些比较好但不够好的习惯法的类近似于生物学的自动性。

在这方面，维克多·范伯格对政治的效用的评论很有启发性。首先，范伯格认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指望，人类有可能得到的最佳规则能够自动出现：他特别提到，哈耶克关心的是群体的生存，而事实上的扬弃过程则是由优先考虑其特殊利益的个体来实施的。哈耶克是一位强调自发成长，而不是一位强调智力评价的理论家：“当前社会秩序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更有效率的制度在竞争过程中的普遍流行，而不是由于人为的设计”（哈耶克，1979：154）。追随布坎南的观点，范伯格的回答是，他不明白个体为什么会回避搭便车的诱惑，而投资于把他们的实际利益移交给整体的行为规范：“那种认为有着‘更为成功’的规则体系的社会体制将会无往不胜的一般观念，似乎太含糊了”（范伯格，

1986: 87)。

范伯格认为，一个次优的规则有可能出现并成为整个规则体系的核心。他还认为，这样一种第二好 (**second-best**) 的规则，一旦被采用，可能会抵制新的、甚至更有吸引力的社会规范的挑战：“一旦一个坐标性的规则在一个群体中确立下来，一般来说，很难设想，向一个更有利的规则的转变能够通过一个自发的、看不见的手的过程产生” (范伯格, 1986: 90)。个体们会发现，单方面改变规则代价太高了；如果那些已经成为习惯的属性没有同时受到其他人的磨蚀的话，几乎不可能得到成功的结果。匿名的、不定形的大型群体，很容易就投入那种败坏保守主义名声的保守主义——一种身陷其中的所有人或几乎所有人都不太满意，但自我平衡机制完全拒绝干预的静止状态——的怀抱：“自发地巩固某一特定习俗的同一种社会条件，很可能正好排斥向那些由看不见的手的过程产生出来的、更有利的规则转变” (范伯格, 1986: 90)。我们所有人都希望看到某种变化。但是，我们中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单独创造能够增加我们福利的变化。因此，这里需要由民主国家倡导的共同的努力，而不是将其留给难以尽数的、微不足道的个体的累积性反馈。

布坎南和范伯格对哈耶克持批评态度，因为他过分倚重无意识结果。他们认为，他太不信任通过同意治理方式 (**agreed-upon governance**) 进行的规则创设了。尽管如此，人们仍然无法说服哈耶克和哈耶克主义者相信，事物的正常运转过程中的最优化最好是由民主干预来推动，而不是通过演化过程。一个较为引人注目的争论与跨时段 (**inter-temporal**) 问题有关，与新的民主制度在推翻专制制度过程中采用的“一人一票”制度相类似，这个问题使人想到有关以下现象的道德地位的讨论：没有离婚可能的婚姻、自愿的自我封闭和与世隔绝的修道院中无法逃避的隐修。哈耶克主义者会说，从历史上看，个人也许曾经正确地邀请

国家为他们设立一个行为规定，这不仅仅是因为任何规范都胜过霍布斯式的无道德状态，而且是因为一个特殊的规范在那个时候被看做有可能得到的最好的标准。然而，历史进程继续向前而法律规章却在原地不动。在一个具有自动平衡能力的秩序中，社会—文化规则具有适应新形势的机会；不难证明，法官制定的法因其反应的灵活性亦复如是。从另一面说，在一个政治化的秩序中，警察和监狱的任务就是跳出来捍卫昨天的宪法，昨天的参考框架。哈耶克会说，在此时此地也许是正当的民主，有可能已经将自己的未来付与了一项自己并没有选择并且也不想要的契约。就像协商的倡导者不能为国债的代际传承辩护一样，真正的民主似乎也一定会对通过立法确立下来的现状的代际传承持怀疑态度。昨日的民意，这个暴君，与希特勒和斯大林这样的暴君完全不同。即便如此，哈耶克主义者仍然会说，这是通往奴役之路上的一个驿站，它为了追求短期效益，将得不偿失。

6.3 演化与资本主义

阿尔钦和弗里德曼，主要描述的是各种现象。他们描绘了一个能够选择最合适的企业，能够将成本居高不下的落伍者逼到墙角的自由市场。他们承认每个个体商业经常意识不到市场中特殊的供需状况，承认那些负责工资的经理人员经常面临着以与自己没有重大关系的利润为代价去追求行政效用最大化的诱惑，认识到许多开拓者实际上是失败的模仿者，他们力图拷贝他人，而不是跌跌撞撞进入新的领域，从而将其经济学的注意力集中在结果上，而将关于动机和期望的研究留给心理学。他们说，相信竞争性资本主义能够将最好的回报分配给那些最能满足顾客期望的人。

哈耶克，主要描述的是各种规则。他关心的是有利于群体繁

衍和进步的、由文化决定的各种习俗的选择和采纳过程。社会习惯既不是人们有意识深谋远虑的产物，也不是随机事件的结果，而是自发演化着的无意识后果，就像门格尔意义上的货币一样，是对某个系统的需求的反应。哈耶克忠告说，理性的人们应当服从受各种规则支配的秩序，哪怕有思维能力的个体自身并不了解那些习俗所满足的功能。某种规则已经扩散开来——这意味着在某个明确界定的领域中，它已经挫败了其他规则。规则培养了适应能力——这意味着通过市场合作，它有利于财富的创造。哈耶克最后总结到，规范，既是竞争的产物，也是竞争的基础，它通过演化过程已经证明了自己的有效性。这就是彻底的资本主义。

阿尔钦、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等经济学家坚信从演化到资本主义，从资本主义到进步主义这一过程中存在着的因果关系。他们的乐观主义态度使他们将推陈出新的新事物视为在某些方面更好的事物，而不仅仅是一个变化。但是，在分享他们这一估计之前，有必要首先更有批判性考察发展过程的两个方面：社会民主和制度约束。

(a) 社会民主

第一个方面涉及市场本身的地位。演化主义者用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来解释生存，而经济学家强调有限资源禀赋的有效利用。市场自由主义者相信，交换机制是实现那些紧密相关的目标能够得到的最好的手段。用霍奇森的话来说，就是，市场自由主义者倾向于“认为在一个市场环境中市场本身被选中了”，倾向于推论存在着一个实际的“市场的市场”（霍奇森，1993：176），在这个“市场的市场”中，市场的自发性无疑胜过任何一个竞争对手的产品。生而有之的封建型（feudal-type）地位的式微，对前苏联计委那种死路一条的中央指令的抛弃，利他主义公社向扩大家庭的收缩——所有这些历史证据都向市场自由主义者表明，体制的演化已经到达一个终点，自由企业资本主义宣告自己已经

获得了永远的胜利。

弗朗西斯·福山把发生于 21 世纪的从柏林墙向撒切尔式私有化的转变看做从极权国家主义向个人自由转变的一部分，他是这样做的诸多思想家中的一个：“独裁主义和社会主义中央计划同时发生危机，使拳击场上的对手只剩下一个，即某种具有潜在的普遍有效性的意识形态：自由民主以及个人自由和公众自主信条”（福山，1992：42）。福山正确地将关于自由民主的宽泛的意识形态分解为求利的合法性（由此引申出私有产权制度和求利欲望的合法性）和民主国家（主要是出版自由、集会权利、秘密投票、允许组织反对党、定期选举、成人普选权）等两个部件。他也承认，在现实生活中，这两个部件并不总是相互支持的：“潜在于我们具有指向意义的历史之中的机制既有可能带来一个官僚独裁主义的将来，也有可能带来一个自由的将来”（福山，1992：125）。

福山这里的意思是，自由市场并不欢迎挑战（因为它确实与生活水平的提高普遍地联系在一起，所以它感到很受用），民主国家不要如此自信地认为自己是经济进化的原因和结果：“对民主来说，不存在……什么经济理性；即使有，民主政治也是经济效率的一个拖累”（福山，1992：205）。福山并不是说，那些快速发展的国家很可能就是那些完全消灭了取悦选民和赢取选举的需要的国家。他想说的是，快速发展国家中的一些实际上是那些固执专断地将社会纪律扩大到嚼口香糖、持有枪支和吸毒等问题上，而与此同时保证工业、财政和商业基本自由放任的国家。福山列举的有关政治警惕性（political watchfulness）的例子，来自东亚和东南亚那些富有生机的经济体。他暗示说，中国香港特区、中国台湾地区和马来西亚的成功，表明美国和英国所采取的政治市场化的办法不能视为促进资本主义进步的惟一办法。

资本主义市场被选中，是因为没有表现更好的自动扶梯，自

下而上国家 (the bottom-up state) 被选中, 是因为它“按照我们自己的自我价值意识来评价我们” (福山, 1992: 200)。自由企业被选中, 是因为它能够便捷地让我们富起来。福山相信, 选择标准是相互分离的, 并且是可以分离的。然而, 那些可以相互替代的视角必须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从历史上看, 现代化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意味着资本主义市场。从历史上看, 资本主义市场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意味着自下而上国家。这种相关性肯定不是偶然现象。

因此, 在哲学层次上, 资本主义和民主都可以统一于这样一种普遍观念, 即将特殊的个体视为道德的主体。正是这样一种意识, 即将自治的“自我”看做值得尊敬的东西, 才使消费自主权的行使、劳动与资本的流动、成本和利益的转移、对不同趣味和偏好的容忍具有了合法性。正是对独立、责任、权利、搜寻、自主和理性选择的同等重视构成了从世袭领导权、开明专制和独裁权力解放出来的参与型政治的核心。不管资本主义还是民主都是一个需求导向的决策过程, 它在承认利益的多元性和投入的稀缺性的基础上, 力图调和各种自由展现出来的偏好, 而不会强迫大家接受以普遍意志的立场所做的自上而下的界定。资源禀赋是不同的, 所以尽管指挥着政治家的是严格的一人一票制, 但收入分配却是不平等的。基本原则是相同的, 所以在道德上和方法论上, 不管资本主义还是民主都致力于保证因子分解 (factoring-down) 的优先地位。

不管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 资本主义经济和民主国家都一再表现得如此紧密相关。资本主义不仅决定于规范场面上权利和交换的合法性, 而且决定于保障框架——它包括侵略行为在内, 并使协议具有可执行性。社会价值提供合法性, 而法律和命令则提供保护。只要民主国家掌握着权力的独占权, 就能够很好保证私人个体不会侵犯其他人的空间。资本主义扩大了选择集,

民主则使它能够做到这一点。

而且，由于要对具有选举权的公民最终负责，如果要以命令取代竞争，国家也不敢以一个独裁者可能采取的方式去侵害公民或者滥用权力。事实上，国家要不仅在自由裁量权的遏制方面而且在物质财富的日益增加方面都必须满足全体选民。这样，就会出现一个以民主为基础的约束机制，它赞成一个相对自由的市场和相对受限的官僚体制，赞成一种不会扼杀积极性的负责的税制和不会哄抬利率的预算实况。一个围绕服从、容忍、等级、神权等价值而建立起来的政治文化，一个将种族、阶级、部落、性别等由于历史原因而形成的社会分化加以制度化的政治体制，不大可能提供必要的保护和保证所期望的绩效。毋宁说，它是这样一种意志的体现，即希望表达和证明自我，希望自己的意见永久流传，希望被看做等价物，希望得到大家的尊敬。这也是一种使资本主义——而不仅仅是使民主——被普遍接受的意志。不管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必须指出的是，资本主义和民主很可能是一种混合物中两种相互补充的成分，而不是相互分离和分解的。

在谈到东亚或谈到美国和欧洲的时候，福山认为，社会事实上是一种混合物：“没有一个现实的社会能够仅仅依靠理性算计和欲望长期生存下去”（福山，1992：215）将资本主义解放出来的是个人主义，而使个人主义合法化的正是保守主义。自私自利需要一个政治支柱，而支撑自私自利的正是保守主义：“不存在没有民主主义者的民主”（福山，1992：134）。不管是在市场问题上，还是在国家问题上，福山都认为，先验的共识都是必要条件。他关于观念能够产生某种后果的观点，不无裨益地提醒我们，人性中除了动物性以外还有更丰富的内涵。然而，同样可能的是，社会价值，作为目标而不是手段，会导致这样一种事态，即公民要求国家限制企业的自由，以便推进公民们出于某些理由更渴望推进的更高的自由。换句话说，适用于政治民主的东西，

对社会民主也是适用的。一个由于政治民主本身是个好东西而有勇气选择政治民主的社会会选择受制于国家的市场（**managed market**）甚至福利国家——在福利国家的观念中，企业的自由并不能满足更广泛的文化需求。这样一种保守主义将资本主义囚禁了起来，将它变成了一只服服帖帖的野兽，而不是将它放归阿尔钦、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的丛林。不难想见，一些经济增长将会因此而丧失，浪费将会乘虚而入。然而，买卖就是买卖；市场自由主义者也不会把保守主义者做出的抉择当作无效的东西抛弃掉。

文化有可能妨碍政治民主。更重要的是，文化有可能正好妨碍资本主义自由市场。让我来考察一下人们对同情和慷慨的越来越高的评价。亚当·斯密认为，同情和慷慨是国民财富增长的结果：“我们只有在多多少少对自己感到满意之后，我们才能够明显地感觉到他人的存在。如果我们的痛苦非常严酷地压榨着我们，我们也没有闲情去关心我们的邻居；因此，所有的野蛮人满脑子都是自己的欲望和需求，以致根本不会注意到其他人的欲望和需求”（斯密，1759：297）。让我们再来考察一下关于安全和保障的越来越高的评价。J. K. 加尔布雷斯认为，安全和保障与社会的富足有因果关系：“有这样一种观念，是如此地受到传统智慧的推崇，即，现代对于安全问题的关注是对现代经济生活绝少犯错误这一特殊公害的反应。更确切地说，它是财富不断增加——即从一个人几乎没有财富的社会发展到一个人们有大量财富需要保护的社会——的结果。在第一世界，不幸和苦难是地方性的和不可避免的。在第二世界，它们已经变成了插曲和可以避免的了”（加尔布雷斯，1958：115）。对于对兄弟般团结的不断发展的趣味显然可以通过私人施舍得到满足。对极小化极大控制（**minimax control**）的不断发展变化的欲望则可以通过商业保险来满足。不过，从历史上看，公民将其反应不断政治化，并在自由企业之外寻找他们所需要的适应性，则是有案可稽的事。

总的来说，现在资本主义企业已经委曲求全，接受国家而不是法律、命令和国防等公共物品市场的各种条款。它发现，将自己对私人利益的追求与社会民主给自己的运作施加的许多限制调和起来非常困难。最低工资制强迫雇主不得不对贫困者进行救济。失业救济则减轻了失业者心理上的焦虑，宽限了他们找工作的时间。安全规程强制雇主负担护目镜、屏风、手套和护理的成本。职业保障制度使雇员对自己的工作场所拥有了所有权。双重法人税在那些即使在外部能够得到最好回报的地方也引发了内部再投资。资本主义已经表达了对商业活动进行上述集体性限制（**collective restrictions**）的怀疑。它在利润追求部门支持下，已经对国家提供的各种补贴、关税、执照、紧急财政援助、担保销售、财政福利等承担了更多的义务。不要忘记，企业以及家庭能够从社会服务——比如容易取得的、政府为低收入者提供的廉价住房，廉价的公共交通，把不健康税降至最低水平的全国保健服务，把可转移技能的储备增至最大限度的国民教育体制——中得到经济上的好处。从控制和规定、管理和福利中，商业既有可能获利也有可能失利。然而，更关键的是，由于政治化和司牧化（**shepherding**）的缘故，它无时无刻不会体验到自治的界限。

演化意味着适应。在哪里求利行为受到控制，在哪里企业家身份就不是可以自由选择。根据定义，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里所讨论的适应与阿尔钦、弗里德曼和哈耶克所认可的那种自由市场最优化的情况并不相同。适应应该另有所指。不过，对从一个本质上是经济化的东西向一个具有更广阔基础的价值和法令的集合转变这一过程的主观满意度的含义则不是那么清楚。当一个苏格兰人渴望的工作位于杜塞尔多夫时企图让他们滞留在苏格兰，在经济学上可能简直就是胡言乱语。但一个人，不管是作为购买者还是作为投票者，必须被视为他们自己福利的最好的裁判员。人们想要他们想要的东西。如果他们把保守主义和习惯看得

比一个已经被关闭并运到海外的苏格兰还要重要，那么，那就是一个宽容的共同体最希望发扬的适应性。

在对游戏进行重新定义的时候，在那些对最适应者进行重新选择的地方，资源可能会配置不当，创新亦有可能受到阻挠，有可能造成经济效率上的损失——也有可能，某种后经济舆论并不将物质的损失视为实际的牺牲。在富裕国家，贫困和饥饿已经不再构成宏观经济方面的挑战。在一个野兔社会 (**rabbit society**) 中，人口的繁衍达到消费的极限将是一个威胁，而在以往，人口繁衍一直是人类能够承受的。斯密眼中的关怀和加尔布雷斯眼中的安全都具有人类亟需的高收入弹性。诸如此类的想法可能会使后经济舆论把经济增长的倡言者们在谴责民主干预放弃物质享受时经常提及的现象，即压力集团、**51%**的大多数、部门扩张、理性的无知、错误的规则调整、公共开支、利率上调、政治商业圈等放在一个无足重轻的位置。不但在评价生产力时，而且在评价其他事物时也一样。在一个富裕社会中，后经济舆论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必须服从于保守主义，必须将演化从那些将演化局限在市场本身的思想家手中拯救出来。

(b) 制度约束

关于演化的理论即是关于竞争的理论。选择过程被看做一个大规模的筛选机制，“它对任何给定的时间段上的社会模式和制度进行扫描，并对其进行筛选，穿过这个筛子的，一定是最能适应它们各自角色的”（**乌尔曼 - 玛格丽特, 1977: 282**）。那些“最好的”被挑选出来，不能适应的则将灭绝：“没有必要假设有一种理性算计在对最佳策略进行识别。相反，对在哪一特定时点什么东西被选中的分析，必须以这样一种观念的操作化，即有效策略比无效策略更有可能保留下来为基础”（**阿克塞罗德, 1986: 1097**）。事实证明，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企业比生产合作社更有效率。股份所有制式 (**share-owning**) 的民主让国有化的公用事

业黯然退场。私有财产战胜了部落的公有财产。美国佬的灵活性征服了前苏联的古拉格^①。生存即意味着“最好”。“最好”者就是幸存者。胜利者胜利了。败者可以仿效那些胜利者，或者将他们的资源转移给那些能够有效地使用这些资源的人。

简单地说，关于演化的理论就是一个关于将追求最大化这样一种目的性导向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的竞争的理论。如果更深入地考察，演化理论是服从于多种制度复杂性的，这种复杂性对经济运行的实际轨迹具有重要影响。这一小节的任务就是引起人们对这些约束条件中的一些——它们对即使自由企业最终也不得不汇入其中的演化路径具有显著影响——的关注。

在传统上，经济学家对霍布斯、马尔萨斯、达尔文、斯宾塞、萨姆勒里式的生存竞争中如狼似虎地夺取最大资源的饥饿的主体形象更为熟悉。将适应定义为一种对生产起促进作用的变化，这一共同选择背后潜藏的正是人们心中对剥夺的意象和恐惧。经济增长是“最好的”，是因为它以食物供应满足了焦虑的婴儿对于食品的偏爱。经济停滞之所以不是最好的，是因为它迫使现实世界的男人和女人们只能依靠一把小米儿过活。

由于市场资本主义是一种扩张性体制，因此它演化的动态过程很少在一把小米儿的地方就戛然而止。然而，更重要的是，市场资本主义同样是一种平民主义体制，它依赖于个体“感受到的幸福”对之做出肯定。如果消费者和公民确实将“感受到的幸福”理解为物质生活标准，那么，他们自己察觉到的饥饿就会起到一个阿基米德支点的作用，使“最好”与管理 (**husbandry**) 的联姻成为可能。但是，如果他们的福利函数包含着多种目标，那么，用经验事实对适应理论进行检验就会变得非常困难。如果我们不能证明，存在取得同等适应性的更好的办法，那么我们只

^① 古拉格，即 **Gulag**，苏联内部劳改局。

能说，无论这个办法是什么，它都是最好的。这并不是同义反复。它确实是现实与理想之间的一个矿区，充满了各种混合物、加权计划 (**weighting-schemes**) 和平衡，使效率和次优难以坐实。

在下面这一段关于制度约束是一种混合物的论述中，艾尔斯 (**Clarence Ayres**) 精辟地指出了如上所述的紧张状态：“对任何社会而言，事物都是由其技术所产生的向前的推力和其仪式系统所产生向后的压力共同决定的” (艾尔斯 (**Ayres**), 1944: ix)。一方面，有理性选择提升着我们的技术，增加着我们的财富；另一方面，有各种价值、习俗、意见、观念、世界观、宗教满足着我们心智方面的需要而不仅仅是生物方面的欲求。换句话说，制度约束是一种混合物，它既要求资源上的节约，又要考虑欲望满足上的多样性。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将在宗教节日期间关闭商铺的行为看做是一种有适应能力的和有效率的行为，以及呼唤一种社会的民主制度——这是上一小节所考察的例子——以传达同情和信仰的服务的原因。这样做，我们无不是为了争取提升我们的福利。但是，我们争取提升的福利不仅仅是膳食和点心。环境是多维的。环境中的适应不能被简化为阿尔钦式——或马克思式的经济决定主义。

在社会层面上，动机和最大化仍然是一个问题。在企业层面上，人的意图无疑是导致复杂性的原因之一。阿尔钦，深信演化论的似然理性选择逻辑，预言事后的成功与事前的、有意识的行动出于自我需要而确定的目标没有关系：“也许不是有动机的个体在适应，而只是环境在选择” (阿尔钦, 1950: 214)。另一方面，方法论个体主义则很少根据功能主义者的看不见的手来预测效率和增长。个体主义者会说，更为科学的方法应该是去搜集那些与形形色色的动机的现实混合物——正是这个混合物创造了现实的、既存的市场规则——有关的数据。

在自然丛林中，那些环境适应能力比较强者会消灭那些环境适应能力较差者。而在一个产业中，不管在一国内还是在世界范围内，正如我们见到的，不同的利润水平是同时存在的。毫无疑问，如果不均衡的差异状态能够通过引力和套利得到修正，那么帕雷托意义上的最优化是确实存在的。而事实上，一个商业共同体可能会对反映着一定范围内欲望的一定范围内的收入感到完全满意。如果态度上的这样一种离散状态是一个规律，那么我们所需要的与其说是收入平均化定理，不如说是一个具有开放心态的模型，一个对与客观禀赋和外部环境紧密联系的个人构念十分敏感的模式。

故此，拉特瑟斯 (Latsis) 曾经对教科书上的经济学理论表示不满，因为它倾向于将市场资本主义的特质单一化为缺乏选择性的“环境决定主义”，从而“将决策主体变成了一个传声筒” (拉特瑟斯, 1972: 233)。其观点中特别让人感兴趣的是，教科书上所说的“自由的”商人，就像是置身于标准尺寸的紧身夹克一样，不管是可以自由算计的还是按照规定行动的，在他们能够做出的选择的作用下都奇怪的是“不自由的”：“在这里，我们面临一个非常矛盾的处境：按照自由意志主义—理性主义模型，只有一种可能结局的环境具有最好的解释能力。在具有多种可能结局的环境中，对行动的解释可能需要一个新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心理要素在全部解释要素中处于更核心位置。简单地说，行动越是‘自由’，解释就越是决定主义” (拉特瑟斯, 1976: 16)。行动越是那些与金钱无关的雄心的产物，适应的方向就越是朝向惯例而不是利益，纯粹的利润最大化模型就越是不能预测选择的“结局”。

凡勃伦的工程师专注于适用性和质量，而不是适售性和“机会主义”。加尔布雷思的“技术结构”纠缠于工作满意度、保障和增长等问题。在这两种情况中，研究与发展都未能转化为适于

销售的新鲜事物。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担心不在资本家获取红利和股息。在现代企业中，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给予了那些按时受薪的经理人们一个追求业务目标——以加速度进行的扩张、多方面的荣誉、异想天开的好奇心、通过工作表达自我——的机会，享受工作乐趣的机会，释放饥饿和嫉妒等非生产性情绪的机会。这表明，这些受薪经理人们确实是受利润驱动的，但绝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既然如此，那么，即使在竞争过程把企业逼至亏损甚至停业清算的地步的地方，竞争过程也只能排除掉低效率。次最大化利润和没有吸引力的机会成本并不一定足以将商业共同体从一个混合物性目标上转移开来——它实际上已经做出一个意识的抉择，即将这个混合性目标的重要性置于“适者”生存法则之上，在它看来，“适者”生存是一件恼人的东西。

人类欲望的异质性阻碍了瓦尔拉斯全球均衡的实现。有阻碍的竞争对最适者生存降格为次优的合理者生存，具有补偿性作用。

产品的分化（包括地理位置）赋予了即使是很小的供给者在自己特有的服务品牌上的独占权。进入壁垒，比如需要提高启动资金、树立产品形象、扩大经济规模等，甚至可能在很长时间内维持不正当利润，保护商业萧条。信息收集、缔约、监督、执行的交易费用会导致人们选择那些技术和经济上都属次优的制度（这里不妨看一看，即使在那些接管浪潮将平均成本推向消费者的地方，纵向一体化也减小了向垄断挑战的可能性）。自然选择依靠竞争的压力来推动进一步适应。这样，有障碍的竞争就意味着，企业——它们很少对能够想像得出的最好的适应感兴趣——将不会被迫去找到相对于那些沾沾自喜的替代供应商来说能够得到的最好的经济体制。这样一来，资本主义正好能够改变保守主义的方向，因为受到保护的商业没有去从中作梗的现实需要。

从观念上说，生物有机体的有限的生命周期确实一再使竞争

成为主动性和突破性的源泉。创始人终会变老以至衰亡；产业终会传递到平庸的、“缺乏精力和创造才能”的后代手中；冲击是由那些拥有有利于自己的“弹性和进步力量”的“较为年幼和弱小的竞争对手”发起的；最后，现任企业会“几乎无可挽回地变得支离破碎”（马歇尔，1890：250，264）。1890年，马歇尔提出了一个从生物学角度来看很有见地的观点：在大森林中，一棵树逐渐老化，变得“僵硬，缺乏生机”，最后腐烂，变成泥土，“为其他更有活力的生命腾出空间”（马歇尔，1890：269）。而到1910年，他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就像树木的生长一样，在最近庞大的联合股份公司大发展之前，作为一种普遍规则，商业的成长也是如此，它经常停滞，但并不容易死亡”（马歇尔，1890：263，着重号为作者所加）。这表明，相对于曾经是消费者利益保障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兴盛—衰亡过程来说，自然选择越来越有利于停滞和过度发展。

当然，即使供不应求的市场状况也总是伴随着价格战和咄咄逼人的赔本抛售。产业的集中不一定意味着消极和调和。然而，不可否认，仅在少数之间展开的竞争对那些风雨飘摇和相互依赖的企业是一个特殊的诱惑，使它们转而依靠价格联盟、卡特尔和其他串通性安排。一个依赖以往的规则以缩小将来的选择的保守资本主义是完全有利整体发展的，在这里，策略家如果准备做长期投资需要的话，就必须承受自己面临的风险。但是，对一个必须适应稀缺性的更广阔的社会，删掉了大量选择的商业规则是否同样有利，则是一个更值得讨论的问题。对一个群体来说有效率的东西对另外一个群体来说不一定是适应的，从受到障碍的交易中获取的收益也不一定全国范围内进行总体上的平均分布。比较容易让人相信的是，在一个没有摩擦的制度环境中，各种收益将会被自动地、公正地分配给各个无权无势的、十足的竞争者。

经济中的权力提出一些有关影响力的不平等和演化的重新定

向的问题。从现象层面上说，不平衡可能意味着，充满活力的、规模较小的商业将成为高收费的主要对象，并遭到具有再分配能力的企业集团和巨人的排挤：“在现代社会中，最常见的趋势是，发达国家强大的产业通过控制贸易条款，对第三世界的弱小经济进行剥削。更有必要提及的是，即使在一国之内，现代大型企业也能够剥削小型企业，直到最后它们远远不能与其相提并论”更进一步，在规范层面上，经济力量的集中会对那些所谓最适合的规则、被允许生存下来的法则具有显著的因果性影响：“正式的制度框架，只有当它对那些具有足够改变正式规则的讨价还价力量的厂商有利时，才有可能发生大的变迁”（诺思，1990：68）。不管在事实层面上还是在法律层面上，在加尔布雷思和诺思看来，作为一个厂商所具有的规模和力量的直接后果，它们都能够获得返还性收益（regressive gain）。

不管是加尔布雷思还是诺思，都不同意马克思关于阶级冲突是演化过程的普遍动力的观点。他们更不会同意凡勃伦关于政治统治只不过是经济成功的代名词的观点：“现代政府的政策，从其进一步提高了其主子所关心的利益这一点来看，具有‘商业的’外观……代议制政府首先意味着商业利益的代表。政府通常是为了商人的利益而工作……就大的方面而言，立宪政府已经成为商业组织的一个部门”（凡勃伦，1904：285，286，287）。加尔布雷思和诺思所要表明的是，商品市场以及类似的观念市场都被深深地烙上了相对资源禀赋和影响力的烙印。可以想见，充分竞争即意味着对那些最能够让人满意的理性最大化者进行自然选择，而非充分竞争则使那些低效率者取胜成为可能，因为它们庞大到足以让其骄横跋扈。

权力能够对当前的均衡产生扭曲作用。权力也可以具体地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对人们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一个以前发生的事件也许已经成为对特定的环境限制最有适应力的东西。或者

说，一个以前发生的事件可能已经作为威胁、欺骗的结果和判断上的错误而保持了自己的至尊地位。不管以前所发生的事件所具有的这种力量来自何处，关键的问题在于，事件一旦发生，就会像一个基因一样被编上码，并被传递到一个新的群体——如果这个群体是通过剧烈地改变现实来为自己开辟道路，从而不满足于获得一个退化的器官的话。故此，昨天所发生的事实限制今天的适应范围。我们都是以前的势头的推动下，在特定时空的条件下起步的，而很少是白手起家的。

已经付出的成本是能够长期保持领先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4'81/2"**轨距之所以能够在竞争中获胜，也许只是因为**在4'81/2"**轨制上的大型固定投资排除了调整轨距以便采用更为优越的轨距的可能性。要不是高速公路一旦建成就成为可以提供免费服务的沉没成本 (**sunk cost**) 的话，公共交通可能宁愿选择私人轿车。要不是在优化过程中将原有设备废置不用而另起炉灶的成本如此高昂的话，一个以地方语言为基础的通讯网络从经济角度来看很有必要转换成英语。不管新的、可能更合算的技术如何发展，资产专用性 (**asset-specificity**) 和网络外部性 (**network-externality**) 的棘轮效应在保护电话方面具有同样的效果：“一个制度矩阵构成的相互依赖的网络能够产生巨大的、不断增加的回报” (诺思, 1990: 95)。在如此所述的情况下，以前付出的成本显然会缩小所有行动主体灵活地适应当前的反馈和信号的自由度。名义上是“自由地选择”，实际上“它们的行为，不管怎样都被紧紧地攥在因时代久远而被遗忘的历史事件的手中，都受到他们或他们的利益都未予考虑的环境的塑造” (戴维, 1985: 333)。

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是鲜活存在于当前之中的：“在某些时候，除非你了解周围世界是怎样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否则揭示其内在逻辑（或者不符合逻辑的地方）是不可能的” (戴维, 1985: 332)。这一命题可以用标准键盘上 **QWERTYUIOP** 这一

效果欠佳的字母排序方式仍然能够留存下来这一事实来证明。作为替代选择的 **DSK** 排序方式能够将打字速度（手指变化）提高将近 40%，其字母排序也具有直觉上的合理性，然而，**QWERTY** 排序却是被最先采用的历史事件。在 **QWERTY** 这个事件中，很显然，“生生不息的过程呈现出一种本质上属于历史的属性”（戴维，1985：332）。理性的男人和女人们今天仍在不经济地使用标准键盘打字，从根本上说，是由于萧尔斯（Sholes）的缘故。

1867 年，萧尔斯之所以决定采用 **QWERTY** 排序方式，是因为它将敲击打字杆的频率减小到了最低程度。必须承认，他这样做的根据，是早已被淘汰的打字机。然而，萧尔斯关于键盘的安排甚至在萧尔斯的原型已经被抛弃之后仍然留存下来。因为秘书们已经按照 **QWERTY** 排序的形态获得了人力资本：为了完成他们的职责，他们要求使用熟悉的键盘。雇员们在这个处于垄断地位的模式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硬件置换的高昂成本使标准化——然而是不成熟的——成为一笔近乎不可避免的开销。乐队彩车滚滚向前。然而它只是一架适应能力欠佳的乐队彩车。显然，死循环（locking-in）和过去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要对此负责。

QWERTY 键盘证明，能够幸存下来的“偶然的创新”并不一定是毅然决然的求利行为从一开始就认准的理性最大化。人们在投资之后所追求的损失最小化保证了刻板和重复的行为会享受到某些保护，使之免受竞争之苦，实际上，它是被交易成本和其他不可知的因果关系——它们总是妨碍人们抛弃已有的东西——隔离保护了起来。除此之外，还有将初始选择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的路径依赖的渐进效果和累积性的因果关系：“路径依赖来自递增性回报机制，这种机制强化了一朝选定的路径方向”（诺思，1990：112）。然而，不管级差有多大，为了使自己获得再次

学习的机会，从而超越原有技术的限制，一个已经自立门户的外科医生（相对于一个年轻的本科毕业生来说）确实只有在思想上来一个大的变革，他才有可能抛弃专属于某个部门的技术。一项与自己不相干的投机生意即使利润率再高，一个承受着日常管理费用，拥有合同、信息和经验的企业（相对于一个没有经验的、不受约束的新的进入者）也不愿意重新白手起家。可以理解，某些个体和企业会遗憾自己错失了机会。不过，重新缔约、重新开始最优化进程，又是另一回事了。

也就是说，千万不要将关于障碍的理论误认为是关于不可能性的理论。文字处理机已经取代了打字机，飞机已经取代了横渡大西洋的蒸汽轮船，不用马的火车已经取代了挂着流苏的萨里式游览马车。只注意到适应能力较差的东西生存了下来而忽视灭绝和更新换代也在每时每刻地发生，显然是一个错误。老实说，不存在这样一种技术，将所有失败和成功都总和起来，然后计算各种轶闻逸事的最终结果。一个折中结论应该是，在创新行为的威胁之下，将不免发行淘汰过程。但是，如果调整是一个渐进的、谨慎的和缓慢的过程，既存的各种组织将会感到最为舒适。从长期来看，一个组织只有衰落到不得不更新的时候，它才会在重新考察它们自己的适应情况之后，承担起转型所带来的成本，将自己从较好提升到最好。

就像沉淀成本能够将事实上的不足之处长期维持下去一样，规则也能够阻断你死我活的、绵绵无穷期的竞争。这样，一个国家过去所积累的规范，能够对沟通未来的演化起到刹车的作用。

因此，由于不断被人们重复而变得神圣但在效率上并非最佳的规则能够生存下来。“先到为君，后到为臣”这样一种期望会剥夺一个企业最具有生产力的职员。在战争中，按排队先后配发枪支根本不符合国家的需要。通过抽签来决定谁接受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具有破坏性影响。一个只由男性组成的合唱乐队会对音

乐构成威胁，如果不是一些有益的交易被遭到传统禁止的话，我们本来可以听到更好的音乐。漫长的学徒期和专业团体的存在是出现垄断性标准化和导致自发性被禁锢的原因之一。一个有着某种历史的共同体已然是一个即时构造过程的产物和一种角色结构。确定身份，是其所是，对伴随任何形式的变化而来的背叛来说，曾经一直是一种奇特的抵抗力。不会让任何人吃惊的是，竞争和模仿并没有战胜美国 50 州之间的松散状态和立法上的多元性。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习俗。一旦习得的程序已经越来越阻碍人们打破再新思考行为的模式的时候，上述情况就会发生。

那些能够生存下来的制度可能是那些与当前的各种条件最相适应的行为模式。不过，当前的状况也许是一个信封，它包括了过去产生的种种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最优化就意味着，最聪明的大脑会不屑在“交易”中度过自己的职业生涯。其惟一的原因，与国王戴着王冠、阿尔巴尼亚人当众抽烟以及尽管人口的减少让我们付出了代价，但我们的村庄仍然保留着族间仇杀的传统的原因相同。显然，就像事实所展现的一样，那些在复杂的环境下并不能最有效地满足经济效率任务的规则，仍然能够生存下来：“制度的存在减少了人类互动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的发生，既是由于人类所要解决的问题的复杂性，也是由于个体解决问题所占有的硬件。上面所说的任何事实中，没有一件表明所有制度都是有效率的”（诺思，1990：25）。在拉开自己的演化经济学与最优化的保证书之间的距离时，凡勃伦更为强烈地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从历史记录来看，愚不可及的制度凌驾于人类生活和文化之上的例子，比人们凭借天生的直觉的力量将自己从一个绝望粗糙的制度环境中拯救出来的人们的例子更多、更蔚为大观”（凡勃伦，1914：425）。从生产力的观点来看，规则可能存在功能障碍。从规则的观点来看，生产力也可能存在着功能障碍。人们对滞后的制度的适应，并不表明，任何一个地方

都找不到更好的规则。

在市场上通过试错试验 (**trial-and-error experimentation**) 搜寻规则，即使可行，也存在着代价高昂和前途难料的缺点。并且，所有以前的规则本身都是具有一定功能的，因此它才成了搜寻和期望的焦点。在这个意义上，哪怕是一个次优的信号灯，仅仅由于人们认为它能够协调各种社会行为，相信它能够为人们的行动提供指南，也能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尼尔森和温特曾经提供了一个关于一个组织内部的惯例不断复制既存的模式，并在人们遇到困惑时充当事实上的蓝图的例子：“我们认为，组织是通过行动来记忆的” (尼尔森和温特，1982：99)。组织记忆使潜在的冲突得以缓解，使各种技能的调配得以结构化，并使保守主义的选择变成新古典主义者的最大化：“当然，这是我们理论假设的核心：企业的行为可以用它们采取的惯例来解释。关于惯例的知识是理解行为 (**understanding behavior**) 的核心” (尼尔森和温特，1982：128)。企业、官僚制，最好被理解为一个规则矩阵。尼尔森和温特认为，有规则就足够了。尽管如此，仍然没有人敢预言它们就是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好的规则，一个没有经过多少努力和花费的扫描所成功地发现的就是我们能够得到的最好的规则：“非最优化的规则能够在行径均衡中生存下来” (尼尔森和温特，1982：154)。满意度投射出一个巨大的阴影——那我们就从这里开始。

知识不足对人的进取心是一种阻碍。今天的差价，今天的利润，对将来的结果顶多是一种暗示，因此对演化着的适应能力顶多是一种大打折扣的刺激因素。知识不足的核心是对他人缺乏预见性。流星撞击地球和热浪抬高冰淇淋需求量这样一种意外事件，其在经济上的意义，远远低于他人如何反应这样一种永恒的可能性。我们只不过是不知道。正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理性地做出反应的能力大为削弱。

对相互依赖状况的无知是市场在外部性和公共物品问题上失灵的原因。只要哪里存在着搭便车的问题、以偏概全的谬见和囚徒困境，哪里就会出现这样一种切切实实的危险，即自动性不能提供令人们从个人评价来看最为满意的现象和法规。

在那些期望之间互为条件但相互联系的链条过于松散，成员数目过于庞大，相互之间的联结过于疏远以至不能产生环环相扣的福利增长机制的地方，效率低下的情况最为明显。甲如果知道自己不知道别人会不会供出真相，那么他就会供出真相。乙如果知道自己不知道他人会不会放弃入店行窃，那么她就会放弃入店行窃。甲和乙都相信合作对他们是最好的选择。然而，甲和乙对由多个个体构成的共同体能否通过看不见的手达到这样一种选择都不会抱持真正的信心。在猜测别人的猜测和识破别人的行动的过程中，甲和乙能够确切知道的惟一的事情，就是他们能够得到的满意水平低于协调行动能够达到的期望水平。

几乎没有办法了解处于临界状态的群众会朝哪边摇摆。让我们来考察一下那些无知状态，它总是盘桓在威胁要将老式保守主义抛进垃圾堆的对新式服从的选择的左右：“举例来说，当大街上阒无一人时，一个人在暗夜里步行回家是不安全的。因此，人们都倾向于乘出租车。如果安全性提高了，那么敢于步行回家的人的数目也会增加。一旦达到某个安全水准，平衡就会被打破，大多数人就会养成在暗夜里步行的习惯”（石里克（Schlicht），1998：48～49）。处于孤立状态的大多数人都会私下欢迎，以家庭传真机、电子邮件地址和移动电话为中心的新网络的引进方面的变化。然而，整体能够做到的事情，一个人却不能。在这种情况下，引发模仿的示范效应由于不协调，不确定，孤孤单单，因此不可能被群众见到，因为它合算到足够担保这一中断。因此，如果自由判处自己不自由，就像一个忧心忡忡的人写下下面有关市场决策的不完善性时所预言的：“他人就是地狱。

经济也是如此。因此，经济就是地狱”（雷斯曼（Reisman），1990：141）。

在分散的交换中，信号是不完全的，不可能出现协调的反应。的确，挫折感使一些市民转向政府以寻求一种在明确的权威监护下的单一的有意识的设计。民主舆论的风潮在这种情况下会认定，人们最想要的规则和权力来源于领导；不能指望偶发事件使投机行为和游戏产生我们能够得到的最佳的秩序。明确的一致性解脱了束缚。得到巩固的沟通有助于社会的演化。康芒斯强烈反对 19 世纪个体主义者的机械原子论，认为这种理论低估了规则的作用，为了教条化的免于的自由（freedom from），使可感受到的公众利益处于一种生存用品定量配给（starvation rations）的状态，他指出，“集体行动不仅仅意味着纯粹对个体的行动进行‘控制’。它意味着个体行动的解放和扩张；因而，集体行动事实上是获取自由的途径。获取‘自由’的惟一的方式就是将责任强加于他人”（康芒斯，1950：34~35）。

根据这种观点，国家被认为是提高了选择的理性程度。但这并不是惟一的观点。要建立新的利益集团来挑战现存的政党联盟代价非常高昂。要打破既得利益与其政治庇护人之间那种相辅相成的关系非常困难。政党政治的竞争偏爱短期效益的解决方案，而不是长期视野中的重新考量。今天的寻租者会成为明天的租金收受者。今天的新生工业会成为明天的跛脚鸭。路径依赖性对嵌入性起着保护作用，使传统的东西得以长期存在下去。诸如此类的因素提醒读者，政治保守主义对适应所具有的抑制作用与其所具有的解放作用至少是等量齐观的。本章多个地方提供的证据都表明，在模仿和最优化之间可能存在着明确的关联。演化经济学就是关于历史过程的研究，而目的论和进步论则完全是偏听偏信。

七、个人与利益

精明的个人总是能进行有意识的选择。因此，这种选择总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以自我利益为中心。不管是喂鸽子，还是让穷人挨饿，理性的个人总是可以将所有可能的选项进行排序，然后将对他们最满意的选项置于其他选项之上。

理性的个人总是选择他们的所需。但是，他们在经济市场中的选择总是受环境的约束。消费者、有限的预算，至少可以在财政减少的范围内进行没有限制的选择。效用追求者不同于利润追求者，他们自私的目的地指向最终价值，而不是中间工具，这一简单事实就使他们把可以自由地把购买汽车和度假的钱转为缓解饥饿。生产者并不是如此幸运，企业必须在密切关注竞争过程中进行选择，并严格遵守市场的生存法则。公司将由于竞争性对手的相互依赖性而受到惩罚，并非由于穷困潦倒，不能按期支付或者由于罢工合作的工人们减少导致正常的生产中断。成本与收益比为**27:2**在利润上是非常明显的：“正如钉子可以在石头的缝隙中固定住一样，欺诈也可以发生在买与卖之间。”在一个竞争性的环境中，资本家知道，他在高尔夫球俱乐部的成员身份和他的孩子的学费取决于他对诸如“乞求”(**invocations**)之类的东西充耳不闻。作为消费者，他保留着把挣来的用于餐馆就餐的钱转向资助那些无家可归者的自由。作为商人或者制造商，他的选择将

受到更多的限制。市场交换的补偿以获得利润为前提。如果买方和卖方都喜欢他们的邻居如同喜欢他们自己一样，那么他们在市场或者谈判桌上就很难达成成交协议。

企业就是企业，市场是残酷无情的。在竞争性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完全霍布斯式的对抗是可能存在的，这种在对抗获得生存的完全自然状态，对个人来说意味着是一种并不安全的生存状态，永远处于“孤独、贫穷、齷齪、残忍和暴躁（short）”。卡尔·马克思简单地在它们之间建立了联系。马克思并非是在虚无缥缈的过去而是在追求利润的现实中发现最明确的有关“贪婪以及在贪婪中的战争——竞争”的依据（马克思，1844b：107），他的观点是建立在“整体上人剥削人的意识”基础之上：“我通过损害他人为自己获得利益……所有这些事实上都适用于资产阶级分子。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只有一种关系是有效的——那就是剥削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1845~1846：110）。马克思认为，市场把个人的价值归结为供给和需求，生产和需求，狭隘的自私和商品价值。令人奇怪的是，霍布斯也声称：“人的价值是以其他事物的价值——也就是他的价格来确定的，也就是说，它等于赋予他使用的权力价值：因此人的价值不是绝对的，而是依赖于另一方的需求和判断”（霍布斯，1651：151~152）。

霍布斯把自然状态描述为追求权力的市场。认为它起源于社会偶然签订的契约仅仅是这一问题争论的一小步，正如麦克弗森（C.B. Macpherson）已经指出的，利维坦与其说是关于心理上恒定的描述，不如说是刚刚具有占有欲的个人主义的表露，作者描述的是在他生活的时代里，归属感不断衰落的英国状况：“关于所有的人天生都具有获得更大权力的欲望的假设，适用于生活在已经具有广泛竞争的社会里的人……他错误地把市场社会的特征归结为所有社会的共同特征，结果夸大了他结论的效力”（麦克弗森，1962：45，99）。商业就是商业，竞争就是战争——“因

此如果任何两个人渴求获得同样的东西而不能共享，那么他们必然成为敌人；一方总是力图去摧毁征服另一方”（霍布斯，1651：184）。

马克思和麦克弗森把市场资本主义作为霍布斯战争状态的最终原因。他们把自我追求解释为对利润的追求。他们把大街完全看做是红色的，把商业自由完全理解为人与狼的竞争（*homo homini lupus*），认为严峻的紧张适用于本章讨论的主题个人和利益。它是一扇可能很容易到达一个真正霍布斯式世界的窗口，他们同社会主义者一样都对市场无政府状态极度不信任，需要绝对的独裁统治，个人受利益驱动被迫保持平静。但是另一种可替代的观点认为，市场资本主义与其说是激发冲突，不如说是解决冲突，因为真正的霍布斯主义者对权力分散的正当性表示怀疑。亚当·斯密认为，合作的基础是自我利益的交换：“给我所需，你将得到你的所需，这就意味着每一个人都需要供给……除了乞丐，没有人需要依靠他同伴的仁慈而生存”（斯密，1776：1，18）。真正的斯密主义者认为，霍布斯的战争状态是最有可能同被压制的协商机制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同讨价还价、签订协议并遵守协议书联系在一起。从这一视角看，个人和利益应该受到欢迎而不应该被恐惧。

个人和利益是本章的主题。本章考虑到微观——宏观层面，把有意图的行动置于经济总体的集体环境中。本章讨论的问题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方法论个体主义”，根据主体是个人的、不可还原的、独立的事实，考虑程序自下而上的逻辑。第二部分是“规范性的整体主义”，在什么环境下，可以要求公民成为团队协作者，成为有责任感的、拥有共同和共享价值观的志愿者。第三部分是“规范性的个体主义”（*Normative Individualism*），讨论的是在市场经济具体环境下的个人和利益。它预示着资本主义的风气依靠的是一种严格的划分，善良而不仅仅是一

种方便的“让我们假定”（“let us assume”）的区分怀志，已经超越了仅仅是一种方法论的问题的讨论。

7.1 方法论个体主义

方法论个体主义是一种对社会互动解释的归纳方法。这种方法是将整体分解为部分，并且将整体建立在部分之上。这种方法认为，分解是理解公开选择的必要条件：‘所有的行动都是由个人从事的……社会集体实际上并不存在，也不存在独立于个体成员行动之外的现实……认识整体的方法是通过对个体行动的分析进行的……“我们”实际上不可能采取行动，而是我们中的每一个个人代表自我采取行动……不管一个人是什么或者他以后可能成为什么，他在选择或者采取行动的时候，他都是自私的’（米塞斯，1949：42，44）。它进一步论证到，分解是对解释被揭示偏好的必要条件：“如果我们考察了个人采取行动的各种含意，我们一定会了解整体行动的内涵……不透视他的成员，没有人能够透彻地了解一个国家。从此意义上看，社会集体是通过个人的活动而存在的……是刽子手而不是国家给罪犯处以死刑”（米塞斯，1949：42，43）。仅仅个体能够思考和行动。只有当一种理论自我意识到从微观到宏观，它才能够在环境中对团体的目标和选择进行描述。

关注的焦点是行为，而不是动机。即时与最终之间的差别很重要。如果没有反对多数人的不宽容和暴政的先例，方法论个体主义就并非那样保护“贵族残暴”不受一个不想要的上层建筑的束缚或者支持天才的民权。作为一种方法论而非一种社会哲学，这种方法并不支持自由主义者关于权力转移的理念。它所做的更温和，较少受到意识形态上的攻击。方法论个体主义的立场是所有的主观实体在本质上都是分立的，因此它从最基本的单位思想

出发。只有凭借那种深入的理解才能向上聚合成家庭、团体以及共同体本身：“在社会学著作中，为了对行为进行主观阐释，这些集合体必须完全被视为对特定人的特定行为的组织模式和结果，因为这些自身就能被视为主观上可以理解行为的行为主体”（韦伯，1947：101）。无论这个结构可能有多么的确定、多么的统一，仍不能说它有自己的思想。只有组成它的个体才具有感觉、认知、企图、相信、渴望、评价以及推断的能力。

正如布坎南和图洛克（Tullock）所描述的那样，运用这种方法，“所有的理论、所有的分析最终都化解为作为决策者个人所面临的思考”（布坎南与图洛克，1962：315）。在认识论中，这种方法是“自明”、“我思故我在”、“无窗户的单子”的知识个体主义以及亚当·斯密从大卫·休谟等早期启蒙思想家——怀疑论者那里吸取的“感觉认知”的根基：“一个人的能力是他判断另一个人的能力的衡量标准。我用我的视力判断你的视力，用我的听力判断你的听力……我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判断它们的其他方法”（斯密，1759：18）。在经济学中，值得小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比较充满困难、“使用价值无法用任何已知的标准进行衡量”、“不同的人对效用有不同的估计”（李嘉图，1817：429）：“每个思想……对于其他思想来说都是神秘不可知的，似乎不可能有衡量感情的通用标准”（杰文斯，1871：85）。当与规定本质和抽象名称的哲学并立时，方法论个体主义必定总显得苍白无力。它是一种次优的方法，与黑格尔和马克思有说服力的社会-文化整体主义相比，它更适用于沙克尔（Shackle）关于想像力问题，哈耶克的不确定性问题以及凯恩斯的预期性问题。自上而下的方法在那些形而上学主义者或经验主义者能找到方向的地方有意义。然而，在我们一筹莫展时，除了从个体入手并用自下而上的方法进行研究之外，可能没有其他途径。

关注的焦点是个体的行为，而不是个体的动机。方法论个体

主义是从团体内成员可以独立决定和权衡的行为和选择来建构团体目标和利益的一种诠释模式。它并非是对 19 世纪浪漫主义的承袭，那种浪漫主义认为所有的道德价值必须追溯到基本单位的自我表现，并将习惯和风俗视为羁绊和歪曲的同义词。方法论个体主义是一种科学的方法，它认为对集合体必须在单个人和单位体的行动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它不是一种心理学方法，那种方法只关注思想结果而否认思想本身可能成为先行的制约因素的包装。

分析的方法当然不同于解释：“明确阐述所有的个体主义都是心理学的是一回事，而将个体主义与心理学相混淆是另一回事”（阿加西，1960：187）。分解到基本单位并不是将社会环境的早期影响排除在外，对此米塞斯十分清楚：“这并不意味着个体在时间上是在前的。它只是说个体具体行为构成了集体”（米塞斯，1949：43）。米塞斯还说，实际上，在自然状态下的自由意志通常受社会化和思想制约，但二者在过去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次序：“遗传与环境指引一个人的行为……他自己并没有创造出的他的观念和价值标准；他是从别人那里借鉴而来”（米塞斯，1949：46）。大多数人不是天生的改革家，不能担负起完成重大的新变化的责任。大多数人受到出身和经历的限制。方法论个体主义显然不违背对社会再生产的研究或对习惯反应的辨别。范伯格如是说：“当然，制度体系是将构成人类共同体生活框架的传统标准、理想和行为规范加于个体之上。因此，这个领域的科学研究必须解决个体行为，并根据个体行为来系统阐述理论成果”（范伯格，1919：243）。从个体行为出发向上建构理论的方法显然与一个正在发展中的整体的非自我控制和共享动力并不抵触。简而言之，从这个视角看，整体必定受部分制约，而部分则可以将意义置于可观察的事件状态之中：“离开相关人物和发生的时间、地点就无法描述一个历史事件”（米塞

斯, 1949: 59)。

离开局部就无法描述整体。把整体进行无限的向下分解, 然后不带任何情绪的从这里出发进行研究。方法论个体主义者认为, 即使是从过去传递下来的社会压力也必须通过受社会化个体的行为 (作为思想的代言人) 来阐释, 而社会化个体的也需要遵守这些流传下来的社会标准。通过现在的行为来解释过去的行为, 通过单位来解释整体。每个单位所受的强制力显然不能被纳入一个缺少意识的结构的整体性假定之中, 这种意识在某种程度上不需要人这个行为体就能解决问题。人类社会学具有一种由互动和分享塑造成型的受教育的本质。方法论个体主义者的意图不是去否认一种共同语言的事实, 或质疑模仿和犯罪的一般动力, 这种力量是斯蒂芬·卢克思 (Steven Lukes) 要求把有意识的选择放入人际间的背景下进行阐释的根本内容: “正如有关社会现象的事实视有关个体的事实而定, 反之亦然。因此, 我们只能在谈论军队的时候谈论士兵: 只有当关于军队的某些说法为真时, 其他关于士兵的说法才为真” (卢克思, 1973: 117)。方法论个体主义者的所有要求就是, 社会学者的调查应当从建构单位入手, 而不应从一个无目的、无意志、无自我的聚合体出发: “个体在社会内部生存和活动。但社会只是个体合作性努力的结合。它只存在于独立个人的行为之中” (米塞斯, 1949: 143)。

只有个体才能体验情感或制定计划。正是由于那种明显而又基本的不可还原性, 当方法论个体主义者把相互关联视为一种依赖性的、衍生出的状态时, 他才能真正了解所建构的实体: “社会科学中的基本建构单位, 也就是基本的解释单位, 是受某种意图指导的个体行为” (艾尔斯特, 1983: 20)。去除掉“国家利益”、“公共政策”、“阶级意识”的虚假的具体形态。带有进攻性防卫观点的独立布里顿 (Briton)、喜欢长头发的独立的斯科

(Sikh) 以及厌恶白领差别个体的工人吸收进来。随后出现的集合体不是大于局部之和的一个整体，而是通过讨价还价、民主和集体选择而对个体差异进行的一种简单的调和。

方法论个体主义者将社会看做一种虚构假定和一种抽象：“只有个体才有目的，并能采取行动实现它们。对于不以各个特定个体的行为出现的‘群体’、‘集体’或‘国家’而言，就没有什么目的或行为可言”（罗斯巴德，1962：1，2）。因此，方法论个体主义者担负起研究个体单位然后再将它们被动地累加起来的的责任：“实用主义原则是指根据增加或减少牵涉利益方的幸福的倾向来赞同或反对任何行动的原则……那么，人类共同体的利益是什么呢？——是组成它的成员的利益之和”（边沁，1780：2，3）。毋庸多言，方法论整体主义者没有时间将规范和习惯归结到个体心理学的次级主题，而这无疑将成为他们的便捷途径：“社会不仅仅是个体之和。个体组成的体系代表了一个具有其自身特征的特定实体……当个体被消除时，社会单独存在。那么我们就必须从社会本身的特征来解释社会生活了”（迪尔凯姆，1895：102，103）。因此，方法论整体主义者从集合体向内——而不是从基本单位向外来确定行为主体在“倾向于以自身形象塑造他的社会环境”的模型中的形态。（迪尔凯姆，1895：6）。社会存在于个体之间是因为它存在于群体之中。社会不存在于群体之中是因为分立的个体不遵守外部规则，对约束视而不见。

迪尔凯姆认为，经验的反复出现构成一种模式，包含在其中的成分都要适应这种模式：“我们说着并非我们创造的语言；我们用着并非我们发明的工具；我们要求并非我们确立的权利；知识的宝藏传给每一代但这些知识并非他们自己积累起来”（迪尔凯姆，1912：212）。在历史环境中的个人显然可以获得大量来自前人传递给使用者的免费馈赠知识。处在相互依存中的个人同样可能面临一系列变化了的选择，发展出“一种新的心理个体主

义”（迪尔凯姆，1895：103），作为它的团体成员资格的直接后果，这个团体将情感在转变成员方面的作用扩大化：“群体思考、感觉和行动的方式与它的成员在被孤立起来时可能采取的方式极为不同。那么，如果我们从个体出发，我们就不能理解群体中发生了什么”（迪尔凯姆，1895：104）。考虑到社会整体的“具体的活生生的事实”，集体压力使个体相信“存在一种他所依赖并从中得到最优秀东西的道德力量”（迪尔凯姆，1912：225）。这种道德力量，既不是幻觉，也不是天赐的，而是整体对个体的外部强制力，这种强制力在个体的意识中都被视为最高力量。真理被拟人化为神灵，成为“上帝只是对社会的一种想像性的表达”，宗教的理念与道德共同体不可分：“通观历史，我们找不出有哪种宗教是没有教徒的”（迪尔凯姆，1912：44，226）。

作为圣女贞德（Joan of Arc）（能够听到社会的呼声并视其为神圣力量的人），就如同作为炸弹自杀者、暴力革命者以及足球流氓一样，“在普遍兴奋的影响下，我们发现大部分平庸且不招惹人的中产阶级分子或者变为英雄，或者成为屠夫”（迪尔凯姆，1912：211）。事情虽然是由单个人完成的，但是这仍然暴露出一种“团体的化身或人性化的团体”的偏好。（迪尔凯姆，1912：211）。真理在人群之中。也就是说，以分析集体而不是分析截然分离的圣女贞德（Joan of Arc）以及完全分开的“平庸且不招惹人的中产阶级分子”开始是明智地，尽管从他们中我们能够观察到集体的思考、感觉和行动。个体常常成为工具，而个体的集合则成为目的。独特性（Sui generis）起着决定作用。个体能动性参与了执行。面对着选择的需要，迪尔凯姆决定从整体的水平进行解释。

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把观念上的文化随意地解释为长期的个人间的相互依赖，而且这种相互依赖还导致了一种关于他们是什么的主观看法。因此，整体主义假定把个人的活动置于被经常视

为根源的社会关系背景中来研究。另一方面，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集中研究个人现象而忽略隐藏的原因。个体主义根据个人的选择来解释人类活动。这是因为个体的集合决没有做出决定、进行反应的独立能力。

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者不否认个体是整体组织活动的器官。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者也不否认环境的约束会限制个体变革的机会。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者承认，有些被观察到的活动起因于个人的特质而不是预先计划。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者也接受有些被揭示的偏好来自内在的、普遍的、共享价值。很明显，在综合的拥护者和分析的支持者之间有明显的重合部分。

一派由上向下地调整行为模式，另一派自下向上地重构选择框架，有人据此说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实际上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从方法论的角度说，可以认为每种方法都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同一幅整体图画，这种直觉认识是正确的。然而在哲学上却带来了矛盾。整体主义者试图在集体主义者的整体和归属的价值观中寻求支持。而个体主义者却从自由主义精神和言论自由中寻找能够证明他们的个体主义的证据。即使在方法论上它们是相互补充的，可是有一点仍然很明显，这就是世界观把它们各自的支持者分为两个阵营。方法论和世界观常常搅和在一起。如果它们的结果不是如此经常地混合在一起的话，那么就这一问题而言，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得到一个相互配合的确切结论。

争论很明显集中在两大学派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方法上。资本主义在个体竞争的地方高歌猛进，在个人相互模仿的地方黯然失色。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既适合进行静力学解释，也适合进行物力论和变化论解释。然而，这在哲学上却带来了矛盾。规范性个体主义注重革新和利益，规范性整体主义关注模仿和遵从。至少在规范层次上，可以非常确定地说这两个学派是相互替代而根本不是相互补充。

7.2 规范性整体主义

规范性整体主义发展起来了。它们认为，团体具有自己的身份、利益和为其现有成员预先提供保护的权威。它们确信个体的理由对于“未经思考的智慧”而言是易错且脆弱的，而这些“未经思考的智慧”就是已经逝去的高贵血统，“革新精神通常来自自私的性格和狭隘的视阈。人们不会向前看到他们的子孙后代，而他们的子孙后代也不会回头看他们的祖先”（柏克，1790：119，121）。社会契约与那些孤立的、易逝的事物无关，追逐利润的行为和“夏日的飞蝇”一样迅即被遗忘，但恰恰是与将来的那种合伙关系作为“团体的整个链条和连续性”不会消逝，因为它也是与过去联结的纽带，“因为这样一种合伙关系不可能在许多代之间结束，它会成为不仅在活着的人之间，而且在活着的人、死去的人以及将要出生的人之间的一种合伙关系”（柏克，1790：172，182）从经济上讲，累积的和共享的事物会比短暂的和分离的事物带来更多的回报。“我们担心让人生存并以各自的理性进行交易，因为我们怀疑在个人手中的储蓄太少，个人如果长期利用大的银行和国家的资本，可能会做得更好”（柏克，1790：183）。从政治上讲，它是一种偏见和传统，而不是自由和人权这些被认为“信念的守望者，责任的有效监护人”的东西，“当过去的观念和生活规则消失时，损失可能无法估量。从那时起，我们就失去了指导我们的指南针……国王会因为臣民背离原则而变更政策，成为暴君”（柏克，1790：172，182）。团体有自己的身份、功能和需要履行的责任，正是由于柏克接受了这种带有历史和意图的整体——并且不能还原到组成整体的单位成员的意志，他才拒绝有利于社会事实的简单地累计，而选择了规范性整体主义，甚至在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被选为一种分析工具的地

方也如此。

作为亚当·斯密同时代人、工业革命的见证者，柏克太熟悉生产线（**Change Alley**）的工作流程而无法否认波普尔关于经过扭出能动性的观点是确定的：“所有社会现象尤其是社会组织的作用应被理解为由于人类个体的决定、活动以及态度等导致的”（波普尔，1945：98）。就像柏克看到集体压力始于外部现实的解释功能一样，他也无法反对从已经揭示的偏好基础上向上进行考察。然而在规范层次上，解释和建议并不适用于经验实用主义。个体能够改变他们的命运，但是必须在制度的框架内和无法选择的压力下。个体能够改变环境，但不应以非常激进的方式发展创造力以致于威胁到他们遗产或者剥夺了他们的义务。与黑格尔同时代，并且作为法国大革命的见证人，柏克太熟悉暴民和囚车而无法否认迪尔凯姆关于有机体立刻从压抑中获得解放的意见，“通过让人们理解社会体比个体更富有、复杂和完美，经过反省，向人们揭示一些易懂的理由用以提供给询问他的下属和习惯于心的归属感与尊重感”（迪尔凯姆，1895：123）

卢梭视团体为人造的，视个体本质上为善良的，但却为统治所伤害，“如果有人天生是奴隶，因为他们背叛了自然而成为奴隶……人人生而自由，然而他却无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1762：240，242）卢梭的贵族暴政的思想是启蒙时期在巴士底狱起义者的最基本思想。迪尔凯姆的回答是，启蒙时期的自我决定论者犯了不顾联盟和共同体团结的错误，如果没有这些，对贵族暴政的谴责会变成无目的且无约束的限制，“当一个人不再受牵制时，他将不能检视自己”（迪尔凯姆，1897：271）

等级森严的天主教徒比代表个体良知权威的新教徒更不可能牺牲自己的生命，“新教对于自杀的偏好必须与激励这种宗教的自由探索的精神相关”（迪尔凯姆，1897：158）。尽管肩负着的担子和责任重大，已婚男人比那些没有孩子和亲属关系的单身男

人具有更高的自我保护系数，“家庭是已婚男人免受侵害的基本因素”（迪尔凯姆，1897：198）。战争和革命减少了自我毁灭事件，因为爱国精神和责任感唤醒了大家的集体感情并激励大家相互支持，促使个体主义投身于在时空上独立于个体之外的事业中去，“由于他们迫使人们消除等级观念，面对共同的危险，个体越来越少地考虑自己，更多地考虑共同的事业……相反地，自杀也随着政治社会一体化程度提高而发生逆变”（迪尔凯姆，1897：208）。作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他的行为不必对任何人负责，迪尔凯姆认为，与被束缚在教堂、家庭、政治社团的个人相比，孤独的个体更可能向空虚、幻灭屈服。对迪尔凯姆来说，整体主义很明显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的抽象。作为整体主义方法论者，迪尔凯姆声称集体情感不能脱离个体意志；“社会事实的决定因素应该在此前的社会事实中去寻找，而不是在个体意识状态中寻求”（迪尔凯姆：1895：110）。作为规范性整体主义者，迪尔凯姆预测，失去了基础的个人会表现出忧郁症状：“他看不到自己追求的目标，感到自己毫无用处，漫无目的”（迪尔凯姆：1897：225）。从文本分析，迪尔凯姆认为社会力量是一种非个体性的东西，在哲学上，迪尔凯姆指向个体无意识。

迪尔凯姆关于个体作为包含了个人起源本质的社会化的人观点被厄兹奥尼在以下主张中再次阐明：“出于自由的需要，每个人并不是孤立于社会，彼此不相联系的；他们必须彼此联系并结成共同体，形成一个‘我们’，并能维持每个人的情绪稳定和内部安全。在心理和社会的基础上人们得以充分的发展，自由地张扬个性”（厄兹奥尼，1988：138）。厄兹奥尼认为自由必须与行动协调一致：事实上，社会中的个体之间的固有联系被切断是对自由的最大威胁”（厄兹奥尼，1988：10）。

阿希（Asch）把伙伴关系、参与、合作、交际和亲属关系看得非常重要。作为一个社会心理学家，阿希认为人类具有彼此联

系的天性。他解释到这种渴望一度具有经济上的意图（通过聚居来满足其动物性倾向中寻求安全的特性），并且在情感方面是非理性的（包括社会性、移情、认同以及作为情感源泉的爱恋）。阿希讨论了人们具有这样一种趋向和需要：即提高自己孩提时代那种容易满足的理想，这往往是阻止他们发展的明确信号。他还指出，为自身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斗争，往往导致了共同体遭受挫折，格式塔心理学对此作了仔细剖析：“我认为对自我的强调常常只是一种回应而不是强烈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趋势，但是挫折和抵抗成为一个集合体的某种需要，要知道一个人是受人尊敬和爱戴的，感到自己在他人生命中扮演的角色将比与他人发生联系存在更大的问题”（阿希，1952：320）。阿希所坚持的实际上是这样一种观点：规范性个体主义是让渡的次优，即当集合体的联系变得非常松散时仍存在偶尔的剩余：‘自我中心主义是这些条件下自我意识膨胀的恶果’（阿希，1952：321）。规范性整体主义杜绝集合体受到没有约束力和目光狭隘的贪婪的干扰。规范性整体主义承认存在这样一种无法避免的盲点：家庭可能是关注的中心而更广阔的社会却不比乱成一团的海鸥强多少。

像厄兹奥尼和迪尔凯姆一样，阿希欢迎那种涉及所有“相互分享领域”的相互融合和促进的结果：“没有社会经历的人称不上是一个真正的人，由他人及其劳动产品构成的环境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广泛的权力领域，在这个领域，每个人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并实现人之为人的真正内涵，与世隔绝则无法产生我们能在社会中观察到的这些影响”（阿希 1952：119，163）。像迪尔凯姆和阿希一样，厄兹奥尼不希望人们像士兵遵守军规那样来遵守社会秩序，他以一种更温和的观点来看待道德的无序和对普遍价值的否定：“集合体经常需要朝向个人权利和社会责任大致均衡的中心方向推动”（厄兹奥尼，1995：X）。像阿希和厄兹奥尼一样，迪尔凯姆钟情于这样一种中间道路，即社会压力的拉动作

用。“当我们试图摆脱他们时，我们却感受到了抵制的力量”（迪尔凯姆 1895.18）——和个体利益的推动作用：“我们具有双重天性”（迪尔凯姆，1912：264）。阿希、厄兹奥尼和迪尔凯姆都没有攻击这样一种想法：被动、从属于某一整体的控制下的某一部分能够独立繁荣，规范性整体主义而不是规范性极权主义认为，当个人扎根于更好的土壤中时，可以生长得更好。规范性个体主义无意于剥夺每个个体发展和成长的营养成分。

7.3 规范性个体主义

规范性个体主义者依靠独立自主确立了自我形象和自我尊重，并提供机会以确定自我方向。用柏林（Isaiah Berlin）的话来说，这种人始终信奉“每个人都有成为自己主人的自由”的信条：“我希望成为主体而非客体；以我自身而不是受外界影响的原因以及有意识的目的来指导我的行动。首先，我希望自己是这样一种有自我意识的人：有自己的思想、意愿和行动，能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并能对自己的想法和目的做出解释”（柏林 1953：131）。我就是我——一个发动者和行动者，而不是为他人观点所左右的奴隶，动物或物体。我就是我——这就是为什么规范性个体主义者把外部所强加的自由作为自我表达和自我实现的必要条件：“作为自由主义者，我们把个人或者家庭的自由来作为判断社会制度的最终目标……自由没有对人们运用自由来做什么做出规定”（弗里德曼，1962：12）。我就是我——这就是为什么规范性个体主义者希望决定性的力量能从社会中转移，并且希望政府能够成为一个对抉择给予理解和做出果断选择的尽可能小的单位：“自由主义哲学的核心是一种关于个人尊严的信念，在不妨碍他人做同一件事情自由的前提下，人们可以依据自己的见解尽最大努力利用各种机会来实现自由”（弗里德曼，1962：195）。

个体主义者在方法论上钟情于因子分解 (**factoring down**)，因为没有广泛的非中心化磋商，就无法了解潜藏于内心的主体性，规范性个体主义者偏好于此是因为，对人的尊重本身就是目的。

有人喜欢红色的领带，有人喜欢蓝色的领带，有人视运动和城市生活为自己的最爱，有人却钟情于艺术和乡村生活。出于对每个人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上的不同观点的尊重，有一种关于平等自由的解释：“对所有的问题有一个很好的综合性的答案，最好的社会即是适合身处其中的每个人的社会，似乎可以把我变成一个具有非凡能力的人”（诺茨克，1974：311）。在惊讶于人类完全不同的多样性之后，诺茨克得出结论认为人们由于偏好不同而产生的分化是必然的，这与人群的异质性相一致的：“以尊重我们权利的方式来尊重我们，我们自身或者我们选择的他人均是如此，都必须允许我们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预知我们行为的结果以及思考自身存在的意义，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接受其他志愿合作者的帮助，以获得共同的尊严”（诺茨克，1974：334）。其可取之处显然不在于其一致性、服从性、公共舆论以及适应集合体整体约束条件的社会压力。相反，它是一种关于容忍和自由的请求，由斯图·穆勒 (**John Stuart Mill**) 在1859年关于“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则”里公开提出的：“社会由人们之间的交互行为组成，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肩负对社会责任。这其中仅仅涉及他自己权力的部分，他的独立是绝对的。在超越了自我、超越了身体和灵魂后，个人是至高无上的”（穆勒，1859：68~69）。个人自由终结于其本身。规范性个体主义坚持认为，在个人没有将自己置于所追逐的目标的首位时，个人自主性决不能做出让步。爱好是不容争辩的 (*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个人必须决定，对于他来说谁是上帝，谁是魔鬼，这应贯穿他的一生的生活法则”（韦伯，1948：148）。

米尔顿·弗里德曼把自由看成是必须被最大化的终极效用。

正是根据绝对价值，而不仅仅是依据工具效用，他寻求获得对企业、交换、财产、契约、讨价还价的支持，换言之，他对市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支持：“只要能有效维护自由交换，经济活动的市场组织的中心特征就是，在大部分经济活动中，防止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干预”（弗里德曼，1962：14）。政治上的限定，获利的协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首先也最主要的特征是它的合法性和适当性，因为它“赋予人们自己所需，而不是某个特定群体认为他们应该需要的。绝大多数反对自由市场争论的本质是都对自由本身缺乏信念”（弗里德曼，1962：15）。

自由是一种道德，一种价值。然而却并不止于此。作为一种目的，自由也是实现其本身的方法。自由会带来福利的增长，最明显的例证是，如果贸易合伙人不能确实指望取得令他满意的进步，就不会进行彼此交易。“除非每一方都从中获利，否则就不可能发生交换。在没有强制的情况下，合作因此取得成功”（弗里德曼，1962：13）。更为重要的是，自由释放了企业的活力和自我追求的目标，刺激了分配和动力效率。竞争促进了对稀缺资源的节俭，还为“那些经济发展的真正精神内核，如事业心、独创性、发明、努力工作和节俭等基本力量”提供了有效的出口。（弗里德曼，1968：102）。规范性个体主义者处于国家财富中的硬通货，并不仅存于绝对道德中的温暖光照中，他们将在“公开和简明的自然自由体制”中发现许多非常值得赞美的东西。（斯密，1776：Ⅱ208）。身处理性时代的亚当·斯密对此表达了非常高的评价：“规划者在处理人类事务的进程中破坏了自然；仅仅需要让她自由处理，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公平竞争……没有必要把处于最低层次的落后状态、但却和平、税收秩序良好且拥有一个宽容的正义政府国家发展为具有最高富裕水平的国度，万物都是自然的造化”（斯密，1776：Ⅱ208）。

斯密的观点具有双重性。规范性个体主义的首要内涵就是对

人的尊重：“只要不违反正义的法则，每个人都享有完全的、按照自己的方式追求自我利益的自由”（斯密，1776：Ⅱ 208）。规范性个体主义的另一内涵与经济进程相关：“当努力构筑的自由和安全被损害时，每个人的天性中都会产生一种改善自身条件的需要——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法则，这种改善是独立而无任何外力帮助的，这不仅能够给一个社会带来财富和繁荣，还能克服因人类法律中的愚蠢成分而对人类社会的正常运转造成损失的许多障碍”（斯密，1776：Ⅱ，49~50）。规范性个体主义的首要因素是毫无差别的保护，其次是家庭财富。亚当·斯密认为此两者是殊途同归。然而，概括地说，它们是各自分离、无甚联系的。

然而乐善好施者追求的是一种“以自己的方式实现自己的利益”，他们较少为“繁荣富强”的事业而努力。其原因在于，乐善好施者是果断而独立的，选择把痛苦的减轻置于消费品和投资计划的平等分配上。个人自私的非物质性解释确实打破了分散和聚集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经济学家斯密坚信，他能够把这种价值取向作为例外而非规律：“每人为了改善自身环境而进行的一以贯之、坚定不移，从不间断的努力……伴随着我们从摇篮到坟墓的整个生命历程”（斯密，1776：Ⅰ 362~363，364）。斯密相信个体主义一直是为人们所渴望的。由于这个原因，经济进步可以从现实世界的个人中获得，而这些个人的偏好是对自由主义者的自发性尊重。

正如对人的尊重与国家财富之间存在分歧一样，不需要求助于对人的尊重，也可以实现对国家财富的更好追求。这在经济计划的制定者如约翰·斯特雷奇（John Strachey）和科尔（G.D.H Cole）之间产生了争执，他们二人都指望技术专家可以取代个人的选择，并且可以加速经济的发展。与企业家中估计相关的科学家对官僚智慧的评价，受到交换这一核心问题的质疑。然而，如前所述，亚当·斯密认为无须在公共产品中引入任何的变化。他

说，受管制的经济真正暴露了“无以复加的欺骗性”，并遭到“公共浪费和不端行为”的玷污。“我从不了解那些影响同公共商品做交易的人所做的善事”（斯密，1776：I 208，363，478）。对斯密而言，万能的国务活动家在现实世界中；就像乐善好施者一样不具有代表性。

自我利益是一种可靠的物质利益。经济增长有赖于商品交换。简而言之，对人的尊重与财富的增长之间具有可靠的密切联系——对那些有能力支付的人来说。那些没有尊严和自我发展的人较少地被斯密提及，但却常常成为他批评的对象。既然对个人的尊重和国家财富之间没有必然联系，那么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些哲学家把国家而非市场看做规范性个体主义所需的一剂良方。

然而，波拉尼（Polanyi）对生活在贫民窟经受寒冷的独立个体的选择自由作了如下分析：‘社会主义是个体主义的继承者，这是一种在当代世界中惟一保持了个体主义实质的经济制度。’（波拉尼，1935：365）。对于不能支付者的尊敬并不意味着仅仅到大街上（High Street）购物，甚至还包括减免租金、提高收入、房产咨询、保障就业、提供教育机会和公众健康等问题。个体主义和斯密的双重观点中的第一部分是相同的。尽管个体主义与此相同，但由此而导出的推论却完全不同。用斯蒂文·卢克思的话说：“认识个体主义价值的惟一途径就是借助于社会主义的人道形式来认识”（卢克思，1973：157）。这一观点对把市场交换和国家财富置于何处却并未明确。斯密的双重性理论至少为生活水平的提高提供了可能——对那些有能力支付的人们而言。

国家富裕是追逐私人利益的结果：“每个人都尽力使自己控制的资本找到最有利可投的部门投资。实际上，他考虑的正是他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社会的利益。但他对自己的利益的研究很自然或者说必然驱使他选择对社会最有利的部门”（斯密，1776：I，475）。私下的罪恶在一个自由竞争的经济中将无疑能够传递多余

的利益——就好像受一只无形的手引导，甚至能够在单个行为体的微观理性不能扩展宏观意义上的地方，都能够保证功能的实现。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从一些微不足道的想法中经过演化而获得的出乎人们意料的结果，国家财富在获得了可能的推动和竞争之后取得了意想不到的结果。

这是一个综合观点，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在下文中对附属于环境力量的因素超出政府智慧做了系统阐述：“人类总是相信自己当前的感觉，他们努力克服不便之处，获得明显的可接近的利益，达致一个他们自己的想像力所无法预期的结果，并继续前进，像其他动物一样追寻天性，直至在最后时刻恍然大悟”（弗格森，1767：122）。弗格森关于人在行动失败后，其理性选择的期望值会上升的观点与卡尔·波普尔不谋而合，后者认为“社会制度中只有一小部分被有意识地设计”：“即使那些有意识的、有目的的人类行为所呈现的后果，一般也是间接的、无意图的、而且不需要的这种行动的副产品”（波普尔，1945：93）。亚当·斯密采纳了这一观点，并把它推而广之，应用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领域。由于个人存在追求产品和利润的特性，封建制度为商业上的成功者让道。由于个人是为了效用和地位而劳动，所以英国等国逐渐壮大而中国等国却日趋衰落。由于个人分工的专门化和集中化，精神伤害也能够通过生产价格的提高而体现出来。间接的、无意图的、多余的——亚当·斯密坚持认为以上三点是个人行动的原动力，但直到这一切成为既成事实之前，人们是无法觉察到的。

许多事情事前（*ex ante*）不可知，又与事后（*ex post*）相关联。斯密在这种环境中认识到把历史与社会学的方法论整体主义的视野与他对国家财富的计算相联系的必要性。但个人行为是动力，这就是为什么亚当·斯密作为经济学家不愿意在规范性的个体主义哲学问题上妥协的原因。其他经济学家也效仿他。受到斯

密经济哲学的影响，他们吸收他的经济心理学及市场资本主义的思想。他们已经这么做了。只有在个人以有利于货币价值的方式活动时，规范的个体主义才能认为是规范的经济。

市场资本主义建立在享乐主义计算的基础上。边沁 (Bentham) 对此的总结令人回味：“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个完全的统治者下，痛苦与快乐。只有它们才能指出我们应该做什么和决定我们将做什么” (边沁, 1780: 1)。杰文斯把整个市场边际主义 (marginalism) 建立在这一条件之上：“快乐与痛苦无疑是经济学计算的最终目标。以最小的代价、最大限度地满足我们的需求——以最少的无关紧要的东西为代价获取最多有用的东西——换句话说，使快乐最大化，是经济学要解决的问题” (杰文斯, 1871: 101)。这种情况与对成本与收益，奖励与惩罚的主观估计有关。在目的与手段、投入与产出之间做出明确区分，意味着有感觉的行为体将理性地行动，使福利的减少最小化、使个人的满足最大化。随之产生的交换与替代通过诉诸精密计算而处于避免浪费、提高效率同时又面临着资源缺乏的社会核心。正如一个动物在风雨或大火中会自发地寻找避难所，一个经济行为体将会被追求舒适的愿望引导，在寻求实效和利益时削减无用的部分。

一个依靠痛苦的驱使、快乐的诱导来解释人类行为的经济心理学无需把这两类分开。不公正是错的，因为它是痛苦的根源。慷慨是对的因为它是快乐的源泉。讲真话是好的因为它使人们感觉好，丑陋是不好的因为它使人们感觉不好。好的慈善家并不遵循一条不可颠倒的戒律，但买下了纯真良知的幸福。不好的捐赠者并不以道德准则为生，但倾销非谋杀性的东西只是为了不受惩罚。后天学来的习惯与社会价值观 (迪尔凯姆的共同良知) 本身并不是相反力量而只是买来的现成品。米塞斯的观点说的就是这个：中世纪后的人拒绝把消极的混合置于以目标为中心的动力之上，也不准备把这个工具夸大成绝对的。米塞斯写道：有代表性

的个人“选择遵循传统模式或别人都采纳的模式是因为他确信，这个程序最适合实现他自己的幸福”（米塞斯，1949：46）。米塞斯继续指出，有代表性个人只要确信这将更好的服务于其自身利益，就会改变他的思想方式和由此而来的行为方式。（米塞斯，1949：46）。米塞斯总结道，有代表性个人将不会接受超出他所能承受范围的保守主义，因为他像边沁一样被引导以避免感觉的不舒适和感觉健康的效用：“人成为一个社会的人，不是为了神秘的摩洛——社会而牺牲他所关心的东西，而旨在提高他自身的福利”（米塞斯 1949：160）。成为资本主义制度基础的经济心理学预先假定了人在善、恶方面的灵活性。没有必要去更深入探究造成交易现状的微观动机。

成本——效益思维方式的预期绝不是断言，整个人类生活将退化到类似于猪对更满的食槽的追求。交易的预期并不意味着，对物质消费品的货币控制必须被当作人类努力的唯一目标和目的。它意味着处于竞争的终极状态（endstates）必须位于经济化过程的框架中。研究型科学家回答了仅仅源于斯密所谓的“奇迹”或凡勃伦（Veblen）的所谓“闲暇时的好奇”的问题，这些科学家可以被认为以失去在产业中获得薪水的代价来换得心灵的平静，而这些薪水可以通过不同的考察工作获得。织布者通过在一次完成不错的工作中的精湛技艺和自豪而揭示了他的创造性本质，他完全可以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通过垄断和提高产量获得额外收入，而他却放弃了，从而满足了对技艺的本能追求。把祈祷本身看做是终极目标、总是完成他的职责的修道士可以被认为是，把中心完成任务、诵读福音书替代为他以前自我理解是次优的、美学上的、金钱上的以及感觉机会类的东西。标准的节俭不否认人类有许多愿望、动力、动机和本能，这些不能被简化到类似于猪对更满的食槽的追求。然而它断言的是，心理需要的满足必须付出一定的成本；有代表性的个人对于与选择相伴而来的成

本应有一个合理的认识。认识到这一点具有决定性意义。主观的计算必须是行为者事先知道的，而不是统计学家根据结果进行计算重新建构的结果。规范的节俭者声称，修道士对于他的教堂之外的诸多选择还有一个可行的评价，并且在他的生活塑造中表现出合理的灵活性。

成本一效益的思想方法就像目的性行为的假定那样普遍。它认为，如果所有可预测的经济是修道士将牺牲肉体的享乐以服务于圣经，那么市场资本主义将在一夜之间崩溃。在斯密那里，“自然自由的公开和简单的体制”的结果将是“财富和繁荣”，很明显，标准的节俭者肯定会依赖对财富的评价而不仅仅依赖于利益公理。猪的食槽说正在失去市场。因此，消费者必将通过没有止境的需求服务于生产者，这些需求的满足对于闲暇和储蓄来说是一个威慑，通过一个由多到少的掠夺性地位，它延缓了‘充足’的停滞。类似的是，生产者必须对未能满足的需求的可赢利的开发保持警觉，有狭隘的自利使他去迎合甚至连他自己都会觉得不值的突然间产生的念头。通过这两种方式生产者服务于消费者。消费者不会靠排斥对有利于边缘地带的老年人商品和服务来服务于生产者。生产者也不愿通过一件没有一个家庭愿意展示的艺术作品来表达自己服务于消费者。由于市场资本主义将出现于规范个体主义，很明显，消费者可以从交换物品中期待得到效用，而生产者可以通过销售寻求获得利润。这两方提供了对方的所需，将通过这种方式结束纯粹的捐献者，不是对修道院里读《圣经》，而是对在扩大的经济中的“财富和繁荣”有所贡献。

交换的双方事实上是满足了对方的需要。以利益为基础的合作中的互利互惠是保持这一共同体的凝固剂。就像米塞斯所写到，在解释他作为一个方法论上的和规范上的个体主义者依然相信——“人是社会的动物，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展”时，契约的补充部分是一个有力的联系。“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米塞斯：

1949, 184, 194)。这样的结果是对别人的服务，但不是初衷。亚当·斯密在他的关于“商店供应的肉、啤酒、面包”的著名命题中，捍卫了决定论（consequentialism）高于义务论（deontology）的观点：“我们不要期待从屠夫、酿造者和面包师的仁慈那儿得到我们的晚餐，而是从他们对自己利益的考虑，我们针对的不是他们的仁慈而是他们的自爱，并且决不同他们谈论我们自己的必需品而是讨论他们的利益”（斯密，1776：I，18）。正如好的收成是对肮脏和肥料最好的回报一样，“财富和繁荣”似乎也是贪婪和占有的无意间取得的成果。从经济上讲，这意味着贪婪是非常好的，因为它能发挥功能。妨碍增长的情感保守主义，阻止了获得就业的新机会。通过牺牲数量来强求质量，导致了生产不足、缺少说明（misspecification）和瓶颈问题。把人作为手段而不是作为目的，这就导致将工人们置于挣钱购房、买车和外出度假的地位。

规范性经济没有价值中立，而是带有判决和指令性的，它是以狭隘的自爱为前提，这种自爱不是把自己与他人的共同体孤立起来，而是与他人的交易孤立起来。因此，市场资本主义正是起源于规范性个体主义，它是以工具理性、成本——效益观、物质主义和利益作指导，所有这些结合在一起，把动机机械化了。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都是观察世界的一种视角和窗口。同时，由于规范性个体主义和规范性经济具有的价值导向性，使得市场资本主义成为自我维持的系统。

八、道德的约束

一方面，曼德维尔（**Mandeville**）对自私是作如下描述的：“自尊和虚荣比所有美德的作用更大”（曼德维尔，1914：1，261）。另一方面，马克思则把共产主义描述为超越了逃避与贪婪的制度：“只有到那时，狭隘的资产阶级权利才能够被完全抛弃，社会把以下的观点写在自己的旗子上：每个人将从根据自己的能力，到根据自己的需要获得所需”（马克思，1875：566）。介于这二人之间的是亚当·斯密，他认为：“人类无论怎样自私，在人性中还是明显存在一些基本原则，这些原则使得个人对别人的命运发生兴趣，并且认为别人的幸福对自己是必须的，尽管他自己除了目睹别人的幸福而感到快乐外，什么也没有获得”（斯密，1759：3）。从中间立场出发，实用主义的斯密从复杂的人性中获得的，正是在自爱和仁慈中获得平衡，这种使现代资本主义考虑他人甚至把它作为国家财富的复合取向，正是依赖于自我利益的追求和竞争。

从人性出发，斯密既没有预期世界会成为霍布斯式的战争状态，也没有预想伊甸园式的和平降临。他的预测力结合了牺牲、混合了效用的职责，引起了其他市场资本主义的理论家的共鸣，他们对外在现实的解释超越了追求物质财富的最大化。科拉德（**David Collard**）指出，代际之间的传递、为政党的志愿性工作、

捐献金钱、鲜血和肾，在公共事务中自我约束的诚实，对陌生人在街头受到攻击无偿提供帮助，所有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物质上的自私不可能解释资源分配的全部：“人类并非完全自私的，甚至在经济交易中”（科拉德，1978：3）。与此类似的是，霍华德·马格里斯（Howard Margolis）提出了以下观点，除了那些根据交换的范式进行选择的人以外，那些审慎地献出选票并有意识克制自己不去盗窃的个人，一定将行动建立某种功能偏好的基础上：“一般的经济模式不仅能够正确预测免费搭车问题存在，而且还能够预测（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以下的严重问题，即如果任何一个社会成员按照他们理解的一般经济模式行动，那么我们所了解的社会不可能发挥正常功能”（马格里斯，1982：6）。真理是处在二者之间并且是二者的混合。市场资本主义的本质不是非此即彼：“我们既不是圣人，也不是恶魔，只是人类。遗憾的是，居住在讲求经济模式世界上的人并不很多”（泰勒，1992：3）。

在现实世界所显示的偏好中，以自我为中心的经济模式并不是仅仅进行正确的预测。利他取向是非常熟悉的社会事实（social facts），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情况下也是难以忘记的附带意见。社会事实也应该经常被引入能够履行经济功能的分析，像费尔普斯为了捍卫由于陌生人的馈赠对市场资本主义生产的贡献，所提出的如下观点：“如果经济行为体不是瓦尔拉斯（Walrasian）价格体系模式所描述的那样无情地追求收益最大化者——而是考虑到与其交换的对方的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那么价格体系就不可能发挥作用，甚至不会广泛推广”（费尔普斯，1975：3）。用赫希的话说：“普通的、共同的诚实和信任标准是公共产品，对大部分经济产出来说，这是必要的输出……乐善好施者可以医治市场失灵的弊病”（赫希，1977：79，141）。像费尔普斯和赫希这些思想家将会由于熊彼得式的悲观主义（Schumpeterian pes-

simism) 而沮丧，而这种悲观主义是由厄兹奥尼提出的，他批评课本经济学促使了非道德的、无序的、虚无主义的观点的泛滥，而这些观点则是自我约束这一必要条件的对立面：“市场依赖于规范性支持（提供契约前的基础像信任、合作和诚信），这种支持是所有的契约关系所需的：“接受新古典范式作为他们行动指南的人的人越多，维持市场经济的能力将损害得越多”（厄兹奥尼，1988：250）。像费尔普斯和赫希这些思想家更倾向于马歇尔所要求的类似于基督徒的牺牲，马歇尔要求有责任感的经济学家发动一场个人运动，加快“经济骑士制度”的演变：“毫无疑问，人类现在有能力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可以做得更无私；经济学家的最高目标就是发现这种潜在的资产怎样尽快开发出来，然后对他进行更明智的计算”（马歇尔，1890：8）。“最高目标”就是不可能被理性地埋没作为其他情况。人类无论怎样自私，都不可能人性中完全排除利他因素，而这种利他因素也不可能在对现实世界的交易描述中被完全消除。

本章讨论的就是利他因素，共分三节。第一节是关于“赠与的本性”，主要观点是利他主义植根于社会环境，并且成为个人自我定义的组成部分。第二节是“社会伦理：迪尔凯姆和康德”，考察了利他主义情感在个人间的起源。第三节是“伦理学和经济学”，利用具体的有关价格和信任的个案，说明通过道德原则增加财富。

8.1 赠与的本性

语言能够使每一次单向的馈赠变为赠与者的自私性被蒙蔽的具体表现。自杀性爆炸者为了取得伙伴群体的承认而献出自己的生命。父母亲为未来而积蓄，因为孩子们的消费可以使得父母亲的效用最大化。企业主可以保留多余的操作工人，因为一次解雇

就可以破坏他的良心。语言可以使每次赠与变成新古典主义的交易。它也可能使利他主义完全变成自我尊重的交易。

没有报酬的提供毫无疑问将另当别论。布劳 (Blau) 关于不诚实问题揭示了以下隐含的关联：“通过欺骗手段有可能放弃好处的人，如果他们因为诚实而获得的心灵平静和社会承认比他们通过欺骗而获得的利益有更多的回报，其行动结果并不完全违背他们的自我利益” (布劳, 1964: 258)。“慷慨”可能被定义为“获利”的另一个同义词。然而，从直觉上看，大多数人几乎都将任何语言修辞手段归结为简单的诡辩法，而没有区分‘为上司开门的拍马逢迎的职员’ (科拉德, 1978: 4) 和即使释放一个被俘获的昆虫，也无须感谢、无须引人注目和居功自傲的虔诚佛教徒之间的区别。大多数人对这种语言上的修辞都很满意，因为这种修辞对有关自我利益的广义方法和狭义方法进行了区分 (广义的方法是通过否认遵循价值和观念行动的独特性把人类行为同非评估的动物行动联系起来)，狭义方法是明确区分个人的快乐和非自我的规定。广义方法将所有选择归结为最高层次的满足，自我领悟 (self-perceived)：它利用理性的基本假设解释购买菠菜和第二戒律 (the Second Commandment)，照顾弱智儿童和到酒吧间的醉鬼。狭义的方法指出，自杀性爆炸者献出的是他们的生命，有责任感的父母亲正在分享他们的消费品，情绪化的顾主牺牲了他们可以获得的利润：它承认像这些个人间的传送并不符合对自我利益的共同理解，并且坚持多数人都应该记住两个领域、两个最高纲领、“两个主要目标——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和行动的道义感” (厄兹奥尼, 1988: 83)。没有报酬的供给无疑应另当别论。然而狭义方法的鼓吹者认为，将杀人犯当作无足轻重的东西“是错误的”。

一些人为同质性和单一效用所吸引，而另一些人则为混合和平衡所倾心。没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在以下两种人之间进行裁定

——一种人认为自私无处不在，而另一种人则是将自私作为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没有对这两种偏好进行解释。尝试进行这种不可能的事，即证明广义的定义比狭义的定义更好或者更差，不是本节的任务。本节的任务仅仅是澄清赠与的关系，指出免费划拨的原因。本节讨论分为以下三部分：“从宏观到微观”、“从微观到宏观”和“利他主义及其演变”。

(a) 从宏观到微观

规范性整体主义者将规范的单向传递作为社会事实。个人来源于社会，并受集体制约，个人接受了社会的共同特征，并遵守社会当前的标准：“我们不必在行动过程中通过从基本的原则推演的方法来建构这些规则：它们已经存在”（迪尔凯姆，1925：26）。经济学家不用再算计。规范对探索的取代也存在着局限和约束。

迪尔凯姆强调，自我的大部分实际上都来源于外部：“因此，我们的个体性是完全相对的”（迪尔凯姆，1925：216）。他论证到，团体身份是个人身份的源泉，对于那些关系密切并且保持经常接触的个人来说，无利可图的行动至少同自私行动一样令人满意：“我们实际上受到一切我们所在的、减少我们活力的生命的伤害；我们属于这些生命，它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迪尔凯姆，1925：215）。迪尔凯姆集中于研究感情的分享和孤独的根源问题，他认为对他来说很难准确看到，自我从哪里结束，利他就开始于哪里：“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是高度简约的两种极端状态，在现实中实际上并不存在；一种状态实际上包含了另一种状态，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如此”（迪尔凯姆，1925：217）。士兵为捍卫祖国而进行的利他主义的自杀就是事实：“自我并非就是自己的财产，它还包含了其他的东西”（迪尔凯姆，1897：221），当个人尽了义务和责任就获得了成就感，而如果能够抵制则是不可想像的。

妇女为自己已故的丈夫殉葬（193 页，第三行）就是一种预先已经确定的献身，这是由保守思想和人身依附关系所致。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纳税人，他们也很高兴他们上缴的钱可以养育他们的同伴。作为直接负责英国国家卫生局 1948 年成立的英国卫生大臣的贝文（**Aneurin Bevan**），非常欣赏这一新的体制，因为它仅仅根据医疗需要分配药品和服务：“免费医疗服务是完全的社会主义……它本身违背了资本主义社会享乐主义的原则”（贝文，1952：106）。他也谈到他早期追求的理想一直是在一个有组织的共同体的框架内相互援助：“这一方案的再分配方面几乎就像针灸疗法一样令我着迷……对一个百万富翁来说，没有什么比知道他所纳的税用于救死扶伤更快乐的了？”（贝文，1958：Col. 1389）。

贝文宣称正是这些税款而不是消费品使得快乐到达极点。他对更合算的买卖的评价可能会变成毫无情感的成本——收益资本主义的语言：“福利国家的基金可能处于帕累托最优分配。如果人们都关心其他人的福利，在一些资源从富裕阶层向贫穷阶层转移的状态下，每一个人的生活可能更好”（米勒，1988：163）。通过社会联系在一起的男人和女人，由于为别人提供了好处而没有索取任何回报，其结果是“自我感觉非常良好”。他们对幸福感的提高促使他们要求转换。如果贝文的分析是准确的话，那么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将是对同一种刺激和选择的相互交换使用的名称。

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研究了特罗布里恩（**Trobriand**）岛上宗教捐献仪式的循环流动。他发现库拉圈是渗透在关系网之中，整体上“形成了一个相互交织的网状结构”：“从社会学上看，尽管部落之间的交往存在语言、文化甚至种族上的差别，他们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建立在固定的、永久性的地位基础之上，建立在把成千上万的个人连接成伴侣的伙伴关系基础之上。

这种伙伴关系是一种永久性关系。它包含着各种相互间的义务和优惠，在更大范围内建构了一种部落间的关系”（马林诺夫斯基，1922：85，92）。马林诺夫斯基认为社会目的论是主要的、受约束的。他说，个人既不能影响交易，也不能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即使最聪明的土著人也不了解库拉的庞大的、有组织的社会建构，更不要说它的社会功能和影响”（马林诺夫斯基，1922：83）。

库拉是一个奉献和反奉献的网络。其本身目标毫无意义，也没有作用（马林诺夫斯基，1922：86）。用于仪式上的红项链（*soula*）和白色贝壳（*mwali*）手镯等饰物并不一定同那些例如鱼和山药（*yams*）等实用的交换物（*gimwali*）相混。然而他们临时的所有权和早期的传递在美拉尼西亚（*Melanesian*）的文化中是社会统一的中心。库拉等符号使各种结构化关系相互接合起来。它们巩固了长期的庇护和支持关系。战利品同回收的战利品相区别，给予库拉是一种信誉、信任和信心的表达，而不管时间的流失。库拉的比例并不屈服于价格上的争论不休或者商业上的讨价还价，其传统义务非常稳定，没有受到短期贿赂的污染。

尽管如此，库拉仍然保持着一种交换关系，在平等基础上进行交换，并在预期中进行扩展。正像在英国第一巡酒的购买是建立在未来习惯性的互惠基础之上，正像今大的宴会所供应的东西意味着明天的宴会所需要的东西，在美拉尼西亚人中存在的库拉也正是建立在这一原则之上（一个远离原始共产主义的世界），每一个人都将尽自己的义务，并将他已经接受的价值与他的同伴分享。简单地说，库拉就是一个利益重叠的社区，并且与习俗、神话和巫术相结合，它们来源于并加强了社会控制过程。马林诺夫斯基几乎没有发现个人自发性的证据，没有他在托罗布兰德岛上所观察到的按惯例所获得的补偿。

莫斯（*Marcel Mauss*）在相互交换问题上也问题上也得出了

相似的结论——“我给予所以你也给予”——甚至在前货币社会和前工业社会时期：“根据我们的观点，市场是一种人类现象，并不是外生于任何已知的社会”（莫斯，1950：4）。根据莫斯的观察，作为交换的等价物甚至可以出现在那些发展水平很低、商业不发达的社会中。物质生活较少依赖于追求利益的谈判——优雅（*politeness*）的交换取代了商品的交换：“不是个人而是集体防御了承担了交换的义务，并且通过相互签订条约形式确定下来”。莫斯考虑到，相互承认、财产交换表明交换无处不在。

馈赠可以被理解为关于多人的权利和义务理论的分支。给予一个礼品只是一个志愿行为。但是，拒绝给予“就意味着宣战；它将拒绝把忠诚和地方自治（*commonality*）连接在一起”（莫斯，1950：13）。从这个意义上说，志愿就接近于义务，因为羞辱和拒绝必须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无论选择的自由是否摆脱了常规的束缚。

由北美洲科瓦克尤特尔部落（*Kwakiutl*）所拥有的“炫财冬宴”（*potlach*）揭示了奉献的社会性质：“互惠的义务构成了“夸富宴”的本质”（莫斯，1950：41）。*Kwakiutl* 部落领会了他们期望，即可以提供也可以接受殷勤；持续的宴会、招待会以及并不是扩大财富的经济交易，而是“更普通、更持久的协议的一部分”（莫斯，1950：5）。这一协议是超级二元的、系统的社会协议，而不是追求满足的个人经济上有用的连接。它接受了友谊和团结、交往和接触。“夸富宴”是一种义务和价值。更重要的是，它同时是一种交换和代价。个人将会支付这些确定的礼品。个人反过来将接受适当的回报。

义务可能进行交换的思想并不陌生。在“睡美人”中应该参加节日活动的小妖精由于被排斥在外而进行疯狂的报复。然而，上帝、爱情和仁慈需要有上帝的特选子民的契约，并且没有对捐献、牺牲和下跪的反对意见以支持、祈祷、和请求。街头的乞丐

唱着无调的歌曲表达着他们对工作道德性的信心以及对令他们感到羞耻和污辱的施舍的恐惧。福利接受者抵制着低层人员的自我意识，他们不能通过指出纳税的历史和有目的的自我依靠的未来而采取互惠行动。在类似这些熟悉的例子中，奉献和交换是共生现象，很难把他们孤立开来进行观察。

承认僧侣接近这种奉献的理想状态是很容易的，对所有人来说，交易都将忍受葛播硬、夏洛克和史克鲁奇^①等类人。真理往往是一种混合物。通过自我克制而进行的秘密贸易可以根据上帝的复合利益而付出。高利贷者可以最大化地利用自己的金钱，但是由于这种堕落的地位而获利。一方面，坏的食品也可以使人得到拯救，另一方面好的食物往往也伴随着失去脸面——一个像莫斯这样的思想家认为，道德生活和物质生活与其说是现实生活中经常遇到的两种选择，不如说它们是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事实。因此，从方法论上说，正是像莫斯这样的思想家通过环境这一纽带把利益和慷慨的概念结合在一起：“社会学的原则和最终目标是观察群体以及他们整体的行为”（莫斯，1950：81）。真理存在于整体。从宏观到微观可以赋予馈赠以意义。

(b) 从微观到宏观

前面的讨论中是将部分作为整体推导的结果。这一部分的讨论开始于单位并且从单位上升到群体。采取这种归纳主义的方法论是自下而上的世界观，它可以根据三类因变量解释道德和利他主义：许可、亲属关系和同情心。

在第五、六章我们已经考察受协议的约束。它表明对某些长期规则的遵守在某种情况下将成为实现利益最大化目标的自我否定的手段。如果你做出贡献，我也将做出：我们的协定取代了我

^① 葛播硬为狄更斯小说《艰难时世》中的人物，史克鲁奇为狄更斯小说《圣诞颂歌》中的人物。二者均是一毛不拔的吝啬鬼。——译注

们协调方面的不确定性，并且使得我们的相互依存具有更多的可预测性。如果你克制我也将受到克制：我们针锋相对带来的是我们不需要进行再谈判就可以获得的一致性，它保护我们的公共产品免受搭便车者的消耗。人们乞求圣书上提供从宏观到微观上的依据，在有限的时间内，利他主义者也同样将这种文化含义深深内化到他的个性之中：“个人动机的开发是……一个社会规范的内化过程”（帕森斯和斯梅尔塞，1956：32）。从微观到宏观，保守主义已经更多地具有资本主义的契约性质。我签了我的名字是因为你签了你的名字。这些规则决定了我可以安全地延续我们的生命。

道德和利他主义起源于一种规范的计算，这种规范的计算不能被还原为在独特环境中存在的标准的结果。它们可能起源于确定亲属团体的具体制度环境。亲属意味着认可：互动的频率赋予习惯和常规以共同决定的权威。亲属意味着同情：熟悉和接触可以有助于解释充满感情地捐献肾脏。亲属意味着持续性：一种最初的奉献意味着在后期可以取得一个很好的互惠的机会，同时他们的后代（这是在下一节将要讨论的话题）比陌生人继承了更多的共同基因。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家庭可以被看做保守的延长生命的生产单位，它可以扩张进入更广阔的生存方式。

来自于亲属关系中的自我否定发射根源于血缘关系，并且受到一种本能的支撑。最初起源于照顾和警惕最野蛮的消灭他们种类的捕食者，因为他们“需要尽力为他们后代着想”（马歇尔，1890：202）。动物如此，资本主义亦然。阿尔弗德·马歇尔相信父母亲的癖好，生物学上对所有生物的天赋，事实上在物质、精神财富都很富裕的社会是非常明显的。目前，马歇尔说过：“家庭联系的纽带在许多方面比以前更强了”，“家庭友好的义务……比以前更突出”（马歇尔，1890：5）。在富裕国家的人，其“无私的倾向更明显”，“而且更趋向于努力工作，为家庭的未来做准

备”（马歇尔，1890：566）。结果，由于物质富裕而带来的利他主义成为某些国家更明显的利他主义倾向、更多的物质财富的重要原因，在这些国家有责任感的父母积极地将他们的精力和资金投入他们充满希望的孩子们身上，为他们确立一个很好的起点。

熊彼得也强调，经济人在某种程度上也不一定能够解释一切。熊彼得写到，至少从历史上看，自私的企业家的成就部分可以通过他的妻子、家庭和后代来解释：“家人和家庭过去常常是资产阶级追求利润的动机的主要源泉。而经济学家对这些事实总是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当我们更进一步地观察企业主和资本家自私的思想时，我们一定会发现，它可能产生的结果并非我们所预想的超然独立的个人或者没有孩子的夫妇理性的自私”（熊彼得，1942：160）。至少从历史上看，财富的积累与代际间的馈赠不可分离。与斯密同时代的柏克也同样说过：“在我们的家庭内部，使我们的财产延续的权力存在于最有价值、最有趣的、属于家庭的环境，他也是使我们社会延续的最有效途径。它使我们的弱点服从于我们的优点，将仁慈赋予到贪婪之上”（柏克，1790：140）。尽管家庭的家和名字同资本主义的理想一样高贵，熊彼得不同于柏克的是，他并非把它同已取得的地位联系在一起，这种地位是通过贵族院的世袭权力作为代表，而是同商业王朝建立联系，使每一个资本家为保持他们已取得的成就而进行殊死的争夺。熊彼得对联合证券公司的兴起持严肃的保留态度。这种纸券是出于财政上的考虑，而不是保守的商业上的约定，它对利他主义没有什么帮助，这种利他主义曾经阻止了理性资本家的急功近利：“他失去了资本家喜欢为未来而工作的伦理，不管自己是否能够得到收获”（熊彼得，1942：160）。对熊彼得来说，这种丢失是在走向贵族化的道路上所迈出的另一步骤——后资本主义社会。

由亲属关系所引发出的利他主义从定义上说并非自私的利己主义，也不是个人的快乐。在这个领域内的突破并不容易看到。父母亲对孩子的教育投资同时也是他们对孩子尽力做到的义务。父母亲早期的奉献可以通过父母亲后来以（他们的孩子成为）医生、律师为自豪作为补偿。熊彼得著作的中的资本家为他们的荣誉而工作和积蓄，而不仅仅是为了他们的后代承担他们的职责。社会认可是对父母亲提供了这种习惯转移的报答。而没有提供这种奉献的父母则会受到良心的谴责。总之，纯粹的利他主义并不容易完全观察到。

亲属团体的核心是不需要任何报酬的补偿。因此，即使没有紧急情况，它也是熟人和陌生人超越于血缘和基因的核心圈子。而在其他例子中，亚当·斯密说过，自我约束和仁慈可以根据移情、同情和“在想像”中换位（斯密，1759：4），分享心理的情感。一个男人可以神入到一个分娩的妇女之中，或者同一个对环境毫无感情的僵尸（？）发生移情作用。一个饱食的人可以想像饥饿的感觉，一个心智健全的人可以想像他疯狂时的感觉。在所有这些个案中，个人可以神入别人的痛苦之中，但是没有一个人自己可以直接体会到这种痛苦。换句话说，在以上所有个案中，个人将处于一个远离他自己环境的地位，并且向他的同胞们发表以下充满感情的宣言：“我的痛苦……完全是因你们而致，丝毫不是因为我自己。因此，它根本不是自私的”（斯密，1759：466）。

在这里亚当·斯密坚持认为，同情丝毫不是以自我为中心。因此，他想进一步区分心理疾病导致的正确行动。他因此想进一步对正确的行动进行区分，这些行动是由于在霍夫曼意义上自我否定的选择导致的：“利他行为是一种促进其他人的福利，而不是有意识考虑自我利益的行为”（霍夫曼，1981：124）。然而，森（Sen）并不可信。必须承认，作为同情的反应的馈赠是热心

的、正和形式的自私行动：当 A 为了缓解他认为是 B 的更大的需求而放弃了他应该享用的消费品时，B 的效用比 A 就增加了，而对于来 B 说也同样如此。即使如此，它仍然有自私的考虑：“当一个人对生活的意识从心理上是依靠其他人的福利时，这就是一种同情的例子；在其他情况给定的情况下，意识到其他人福利的增长可以使这个人直接受益”（森，1977：92）。依据义务而进行的馈赠，接近于非等价交换的真实含义：“确定义务的一种方法就是根据一个人采取的某一项行动与其他替代行动相比，是否给他带来更低层次的个人福利”（森，1977：92）。选择义务，个人将会摈弃即时的满足。选择同情，他将通过博得同情心以增大他的效用，这种效用是弥补而不是竞争性的。

自我可能是处于中心位置；但是至少由于意识干扰而存在资产的再分配。人们反对把核废料埋藏在可储存一个世纪的容器内，因为他们共享尚未出生的婴儿面对海底反射性污染物质所带来的愤怒。人们捐献食品和衣服给国外在地震中的受灾者，因为他们可以想像倒塌的建筑物和破碎的梦想。人们对那些与身体有关的慈善行为表达的支持非常慷慨，因为他们同情那些熟悉的偶然疾病和死亡。对别人的开放实际上就是对以自我为中心的失衡的纠偏，这引起了向利他行为的转移。形象化和国际化确实可以把利己因素引入道德的冲动。但关键是，双方必须同时对同样的资源表示满意。即使它可能也是一种利己主义的，它也完全是一种非霍布斯式的看待自我的方式。

同情是许可的但并非被迫的。同情有时候提供了一种动机，但是它不可能赋予某种职责。情感可能是狭隘的——就如同一个人发现认同他的邻居和朋友比认同被处决在甚至不能拼写出名字的一个长颈子部落族人更容易些。感情往往是不可靠的——正如爱可以变为恨，……想像可能会使自己的眼界变得狭小——正如可怜的纳税人迫切希望根据他今天的收入纳税，而没

有要求代际间的保证，未来的同伴将重复他的对自己变老的担心。换句话说，同情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责任是一种不朽的艺术。责任是在规则框架内的行为。游戏一旦达成一致，个人就有义务给予。

(c) 利他主义及其演化

威尔逊 (E.O. Wilson) 把利他主义定义为：自愿选择牺牲行为体的个人财产一部分或全部：“当一个人（或动物）以他自己的健康为代价而换得他人的健康时，他就有可能被认为从事了一种利他主义的行为”（威尔逊，1975：117）。这里最重要的词是“以某某为代价”。根据威尔逊的定义，利他主义意味着，存在个人的财富、生命的机会甚至生命本身的牺牲。威尔逊利他主义的定义提出了在有限资源的条件下经济限制，并且归功于具有自我破坏倾向性格对财产的共享。威尔逊的视角是社会生物学的，“对所有社会行为的生物学基础进行系统的研究”（威尔逊，1975：4）。自马尔萨斯和达尔文以来，社会生物学在传统上一直是强调竞争和适者生存。从实践和客观上看，很难把饿死是一种利己行动的观念同牧师通过同别人分享更多的食物比他独自品尝可以赢得更多的满意一样。左派经济学家称饥饿的牧师是自私的牧师。像威尔逊这样的社会生物学家则不愿意寻求不可还原的利己主义的建构。

对于阿尔弗德·马歇尔而言，利他主义是不可思议的：“为存在而斗争从长远看可以导致人类的各种族生存下来，个人为了他周围人的利益愿意牺牲他自己；结果作为整体就可以充分利用他们的环境”（马歇尔，1890：202~203）。马歇尔承认，通过个人克制提高集体成熟度并非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是不可动摇的过程：“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可能不会给有机体带来有益的结果”（马歇尔，1890：201）。他同时也强调，……保守只是使自己取得逐步的提高：“那必定是缓慢的增长，几代的结晶：它一定是

建立在习俗和大多数人不能够迅速改变的倾向”（马歇尔，1890：203）。马歇尔承认，无意识（或自动性）是不足的，其进程也必然是缓慢的。然而，所有的情况都考虑到了以后，马歇尔相信，某种自我牺牲是维持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条件，有关平衡问题的演变道路是片面的。

马歇尔确信，利他主义拥有高度的演变灵活性。马歇尔不能清楚说明的是在这种筛选背后的逻辑。以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去拯救一个懦夫的士兵，可以确信的是，他如果获利或者生存，将显得更自私。正在监视危险的鹿，通过发出警报把猎人引向自己以拯救它的同伴。善良的企业主给那些雇工付出足够多的钱以解除他们的饥饿，这无疑使他自己的企业降低了市场竞争力。问题可以这样简单地表达：好的小伙子总是坚持到最后。生存者的生存之道是明显意味着狭隘的自我生存而不是献血者、慈善者以及……的自然选择，他们是通过降低自我的利益而增强整体的利益。

假如给予足够的时间，自然选择的偏见可能是反对抵制廉价足球制造自我否定，而是激起了经济学课本上经济人的自我利益：“经济学的首要原则就是每一主体都是仅仅靠自我利益激发的”（埃奇沃斯，1881：16）。然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不能误认为是社会学预测的理想类型：“在19世纪，具体的个人在相当大程度上并非是一个纯粹的利己主义者，而是混合的实用主义者。……的复合的特质是对经济人抽象的有价值的修正。然而更它在对威尔逊的“代价”进行实质考虑时更没有价值。更具体地说，其可能性在于，当利他主义处于利益不健全的环境中时，它的演变进行非常有说服力的塑造。三个相互关联的解释可能服务于特殊关联性的目的。

第一种解释是根据马斯洛的需要等级模仿社会的发展。在低层次的需要上，上缴实际上就是一种剥夺，因为捐赠者实际

上也是处于饥饿和寒冷状态。在较高层次的归属和财产层次上，就已经摆脱了零和博弈，因为捐赠者的自我实现是以对邻居的爱作为前提条件。结果过去的贪婪就演变为今天对父母的照顾。

乞丐需要圣·安东尼。然而，圣·安东尼也需要乞丐。他们的需要，正如卢兹和卢克斯所描述的，是如同男人与女人那样相互补充，而不像猫和鼠那样相互对立：“当处于需要等级高层次一端的人去帮助那些处于较低等级层次的人时，他们实际上也促进了他们自己的发展。这是因为对别人的服务和帮助，事实处于这一等级最高层的需要之一……但更高层次的人帮助更低层次的人时，就构成了一个完美的需求协调。双赢，或者说相互获利，实际上就是意味着每一组给予其他组的所需；富人给予穷人足够的东西以使其摆脱贫困，同时穷人也给予富人服务的机会”（卢茨和卢克斯，1979：167）。每一个人都获得，而没有人损失。马斯洛认为，在交换过程中存在自我利益意味着：“在自私和无私之间的二元划分在健康的人那里完全消失了，因为从原则上看，每项行动都既是自私的又是无私的……当工作就是一种游玩时，责任不可能同快乐产生冲突；正如责任是一种快乐时，工作同游玩不可能发生冲突一样”（马斯洛，1954：179）。毫无疑问，当像富人贝文那样为了获得帮助病人的报酬而否认自己有第四辆车，这就说明在交换过程中存在自私自利。然而，这就是马斯洛提出的著名的自私的形成方式。在过去，自我意味着战争。现在自我意味着血库（blood-bank）。富裕——和成年——事实上存在于康德的理想。

马斯洛的心理学，如同资本主义经济学一样，是通过思想过滤（filter of thought）而建立的。因此，受情感支配的、对相互依层持自我否定的方法非常明显地解释了——当然是非常有限地——发出警告的鹿的反应。当然，把动物界和人类放在一起比较在相当程度上并非都有实质意义。像霍曼斯这样的行为主义者

宣称“鸽子具有完全的社会性”时，他实际上就是承认这一点的。（霍曼斯，1961：31）。然而，考虑到牺牲了他们生命的士兵或者支付了更多的超越了竞争的工资，这里就出现了依据财富的扩张、对国家同情扩大的利他主义进化的假定。通过竞争、嵌入、模仿和提供报酬，利他主义由于没有在功能上同利益混合在一起，出现了自我扩大的现象。

当然这种转移可能被认为是一种理性的交易，一种在社会尊重方面的投入（表面上一种“有选择的刺激”）。当然，对于那些卷入其中的热心参与者来说，心灵的获得可能更具有吸引力：“还存在大量的与公民对公共幸福的努力追求相联系的任务”（赫希曼，1982：90）。当然对行动的替代可能意味着对内疚产生的不舒服心理，而这是需要避免的：“在大部分案例中，我们需要平息的不是在印度爆发的饥荒，而是我们自己的良心”（威克斯特德，1940：413）。从词典上简单的定义我们就可以明显发现，“我的自我良心”不同于“代价”（*at the expense*）。然而，问题的关键是，饥饿的受害者愿意接受他们的食品，而不指望支付报酬。他们将成为同情的对象，因为根据马斯洛的观点，社会发展和它的动力机制使得那些更更惬意的公民更富有同情心和爱心。

第二种解释——从社会地位到经济上的成功，通过把自我牺牲的行为同自我服务的目标结合起来，继续把这两个主题混合起来。结果，正如贝克尔（Becker）所理解的（贝克尔，1976：292），利他主义是通过演变而受到欢迎的，因为它提高个人的生存期望并且没有消除它们：“如何仅仅提高了自我体质，那么自然选择将大受欢迎”（贝克尔，1976：292）。从这一视角来看，利他主义是一种对进步的自我利益，一种带有冒险的投资以获得长期的折扣带来好处。如果对某一零售业主在衰退时期的仍存在的信任，原因是我们回顾以前该业主兴旺时期的表现，我们就可以说这种信任正是一种报答。对雇佣工人富有同情地给予一些假

期，可以产生一种潜在的义务：这些工人通过义务工作，并且工作量超过最初休假损失的工作量，这样问题就或许得到了解决。陪同一个“仅仅看看”（**just looking**）的顾客一个小时时间，当这个顾客决定消费时，或许就可以得到及时的回报。每一个父母——包括每一个孩子，都知道“购买偏好”（**buy affection**）意味着什么。由于在经济生活中利他主义履行着相似的功能，因此存在向没有报酬的方向演变的可能性，因为规范本身是个人实现价值目标的手段。

第三种解释，是由达尔文直接创立的，他将利他主义和演化同具体生物学上的需要和代际驱动力联系。在研究自然的过程中，达尔文提出，忘掉我们周围的所有有机物可能在尽最大努力增加数量的事实将是一个错误。（达尔文 **1859：119**）。繁殖是原始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这个意义上达尔文生存竞争是关于其他物种的生存而不只是生存本身：“我是在宽泛的、隐喻的意义上使用生存竞争这个词，包括了一物对另一物的依赖，也隐含着（这也是更重要的）不仅是个体的生命，还在于成功的留下后代”（达尔文 **1859；116**）。即使考虑到达尔文的观点，自然选择基本上是在后代的层面上发挥作用，而在经济人这一层面就是次要的了。

孔雀在求偶过程中用它的全身漂亮的羽毛作为招牌。美洲寄生子属植物同其他的结果类植物竞争，以便更好地使它的种子被鸟类广为传播。在像这样的事例中，生物界的核心是繁殖的本能。然而，繁殖可能需要付出昂贵的代价。蜜蜂的刺保护了蜂群的食物存储，但对蜜蜂却是致命的。雌夜鹰将入侵者从她的巢穴引开，却使自己置身于捕食者的威胁之中。母亲从着火的房屋中救出她的孩子，父亲冒险跳入冰河。在这种情况下，牺牲可能会发生而“代价”却没有划清。“从传统角度来说，为了后代而自我牺牲是利他主义的，但不是从严格的基因学意义上来说。因为

个体的健康是由存活的后代数量来衡量的”（威尔逊 1975: 117）。为帮助一个不认识的陌生人而捐赠的骨髓可以被当作是一件真正的礼物。在血亲之间，相互防御和合作觅食则更为含义模糊，结果平均存活率与多产率更大了：“这些血亲相互合作和给予利他的帮助，这种方式从整体上有助于家族成员的平均的基因的健康，即使有时这种行为会有损集体中某一成员的个体健康”（威尔逊 1975: 117）。因此，试探水里有无海豹的企鹅，不应老是考虑自己受到威胁的生存机会，而应是考虑与它拥有相同基因的姻亲群体的高度竞争性。这一群体将把它的后代带入一个它自己永远不可能瞥见的未来。

繁殖有得也有失。将二者对比，威尔逊承认，在代价问题上，后代制造了一个真正的问题。“集体选择的理论出于利他主义选取了绝大多数善良意愿。当利他主义被认为是 DNA 通过亲属的自我繁殖的机制时，精神特质成了又一个达尔文主义的可行的设计”（威尔逊 1975: 120）。这里，利他主义伴随着利益，但至少这隐蔽的交换保证了雌狮不会吞掉她的幼狮。自我约束使她的骄傲永存。如果缺少仁慈和母爱将使她的名字永远消失。“慷慨（至少一定时候，对一定的受益人）是有选择性的，比自私自利优越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赫希莱弗尔，1977: 20）。长期的这种演化使（混合的动机）提高了利他主义一般水平。

与威尔逊一样，多金斯（Dawkins）用代价来定义实体的利他主义——这种利他主义是这样运作的，通过牺牲自身的幸福来增加他人的福利（多金斯，1989: 4）——他很难对甚至是中等的合作的生物基础产生信心。多金斯写到，是基因而不是人，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他接着写到，基因从根本上来讲是狭隘的复制者：“在基因这个层次，利他主义是恶的而自私自利是善的，基因是自私自利的基本单位”。兄弟姐妹从同一父母那儿得到相

似的基因。即使这样，兄弟姐妹也没有对外部竞争者的生存机会给予同等重要性的生物的需要。“我拥有我的百分之百的基因，对我来说，我比他更重要。我的每一个基因都肯定我是惟一的个体”（多金斯，1989：106）。威尔逊的进化论观点偏重于一种集体倾向的利他主义，而多金斯的观点则更多带有关注自我的偏见。

重要的是，多金斯没有仅仅因为利他主义不是进化过程中的被选择的候选者而放弃利他主义。他是一个工程师而不是一个宿命论者。他求助于道德教育以纠正生物学的观点“我们的基因也许指导我们自私自利，但生活中我们并没有被强迫着去遵循它们。也许学习利他主义比我们被基因决定利他要困难一点”（多金斯，1989：3）。这也许会更困难，但是仍然是必须进行的尝试。“让我们尝试去教授慷慨和利他主义吧，因为我们生来就是自私的”（多金斯，1989：3）。于是在第8章第1节“赠与的本质”结束后，第2节“社会道德：迪尔凯姆与康德”开始，这一节并不是围绕决定论者的必然性，而是有关善的社会和规范的合法性。

8.2 社会道德：迪尔凯姆与康德

本节的主题不是柏拉图主义者对普遍性的追求。这种普遍性不能用各种意见和偏见来衡量。反对贩卖军队免于服兵役、人体器官、通奸的通行证以及反对故意欺骗有智力障碍的人士的事件不能永远有效。为什么圣经上的“你不应该杀人”在道德上被认为比虚无主义者的“你确实可以杀人，而且不受时间限制”要高明，没有原因能表明。不考虑规范的特殊性，而只是考虑人际间的传播，本章的主题是学习机制。这种机制使敏感的行为者清楚知道他们可以合理地做什么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正当的。因此本章的主题不是个体的道德，而是社会伦理及其保守主义的限制。这里我们引用两位对此有特别兴趣的学术泰斗：迪尔凯姆和

康德。

社会价值具有规范性的内容：个人应该享有自由、机会均等、公平交换。道德价值也有规定性和约束力：兑现承诺，防止侵犯，不讲谎话。将社会的“有义务去做”和道德的“应该去做”作比较。艾默尔·迪尔凯姆认为他看不出来二者有何区别。“真正的道德生活的领域只有在集体生活开始的地方开始……。只有我们是社会的存在才能是道德的存在”（迪尔凯姆，1925：64）。他说，环境的独特性（*sui generis*）是道德标准的唯一来源：“只有集体目标才是真正的道德目标，只有附属于一个集体才有真正的道德力量”（迪尔凯姆，1925：87）。如果社会群体失去了它的控制，道德生活也会瓦解，因为它不再有目标。

迪尔凯姆认为，道德不过是一种共同的东西，通过共识来达到。“如果社会是伦理道德的目的，它同样也是制造者”（迪尔凯姆，1925：86）。社会价值是同一团体成员的行为模式中出现重复性、一贯性和规律性的因素。由于纪律对于个人来讲是外在的，社会价值对自我设定了限制。社会价值因为是整合而被认为发挥着功能并为人期望得到。社会价值使得人们自愿接受，也没有假定无法做出选择的奴隶因害怕而接受。社会价值有长期的稳定性而无政府主义的独立自主却注定不能停留。迪尔凯姆说，在所有这些方面中，社会价值具有道德的特征——伦理价值之所以有道德的属性，正是因为它们的权威来自于群体。

迪尔凯姆的关于道德与社会的合成导致了时空上的没有妥协的相对主义：“每一社会类型都有它必要的伦理道德”（迪尔凯姆，1925：87）。迪尔凯姆对演化持乐观态度，但并不完全绝对信服。迪尔凯姆对伦理体系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该体系在应该指出具体社会事实的时候，进行了一个普遍性假定。对于神学和宗教，迪尔凯姆提到启示也许是对人们风俗的文雅称呼。他警告说，对上帝的崇拜事实上可能会隐匿上帝的名字所代表的社会压

力。“神圣性是集体的象征性表达”（迪尔凯姆，1925：105）。对于自然权利和不可还原的本质，他写到，“单独的个体没有道德价值”（迪尔凯姆，1925：59）。他拒绝给自我服务的序列以命令。他认为只有超越个人的价值可以使自我满足，甚至施舍变成一种义务而不是一闪念。迪尔凯姆也曾尝试过，但他没能找到不能用社会整体的非个人力量来重新解释的任何道德行为的源泉。

迪尔凯姆的道德保守主义在表面上看来与功利的资本主义的手段——目的的功效性没有共同之处。戒律和权衡的区别在他看来确实存在，然而夸大这一区别将是一个错误。

一方面，归属和共同体赋予个人以观念和实践的宇宙观，增进成员间的团结，加强了有共同目标的成员之间的相互支持。迪尔凯姆说到，个体“不是真的他自己，他没有完全认识到他的本性，除非他处在一个社会中”（迪尔凯姆，1925；68）。酒精中毒、沮丧、悲观、社会道德沦丧、自杀，不成比例的往往是没有孩子的夫妇，单身男人，所有允许深藏的联系自我消融的人的痛苦：“人越从社会分离，他越容易受到伤害以至自我毁灭”（迪尔凯姆，1925；68）。希望在平静中生存下来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将会生活得很好：为社会的纪律付出代价，接受由独处所带来的失望。

自我控制有助于个人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伦理与权益之计有密切的关系。这权益之计在过去是无奢望的，在现在也是没有指望的。一方面，道德规范（与根据私人结果的合法规则对比，如牙齿卫生的规则）有绝对的权威，它超越了次优者——结果和利益：“个人出于对道德规范的尊重，必须遵守道德规范，其原因也仅仅如此”（迪尔凯姆，1925：30）。另一方面，道德规范对个体来说是有用的，一些约束也是有助于解放个人而不是阻碍其发展：“自由是规则之果……当个人只拥有他自己时，他拥有的是仅仅是自己”（迪尔凯姆，1925：69）。一个有理智的人，在他

知道另一个合约将使他得到更多时，则不会安心于较少的那个。由此可以得出，任何谨慎的购买者都愿选择一个不依赖个人感情的统治者和一部有道德的宪法。

迪尔凯姆在把道德与人际交往联系起来时，利益是暗含在绝对之中的。对于康德来说同样如此。他承认，非享乐的义务论也能成为善的结果主义。

于是，康德给出了讲真话的例子，来说明道德规范能在为团体发挥功能时，毫不影响其自身的义务。他的推理是这样：“确实，我可以凭意志力撒谎，但我决不愿意存在一个撒谎的普遍性法则；因为如果有这样的法则那么将完全没有信用可言”（康德，1785：71）。康德认为说谎者将在众多谎言中殚精竭虑地生活一辈子，他们担心自己同样被别人骗。骗子不想被人骗，强盗也不想被人抢。对混乱状态的抵制、对利益的敏感都会被“单独的绝对命令”吸引，而集体中的幸存者似乎都认可这一命令：“要这样行动，永远使你的意志的准则能够同时成为普遍法则”（康德，1785：88）。

康德的解决办法是黄金法则、可普遍化的标准——“推己及人”。他对霍布斯派的虚无替代，与亚当·斯密关于移情的想像、圣经上的祈祷：“就像爱你自己一样爱你的邻居吧”有明显的亲和联系（列维提克斯，19：18）。亚伯拉罕·林肯的“人生而平等”，约翰·洛克关于自然法的观点：“理性，正是这个法则，任何人都会求教于它，它施教于人类，由于人是平等的和独立的，任何人都不能伤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洛克，1690：7）。另一方面，它与功利主义倾向几乎没有共同点，功利主义将正义降低为享乐，将次要的目标降为效能。康德坚持认为即使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也不能弥补将自己和他人作为工具来对待。康德把谨慎的选择的假定命令斥责为非道德的，他在以下这条法则后提出他的权威观点：“按照你一贯的对别人人

道的方式行事，无论是对你自己还是任何其他人，不能仅仅是手段，同时还应是目的”（康德，1785：96）。如果曼彻斯特和布拉福的矿主以像喜欢金钱那样的热情喜欢形而上学的话，新生的资本主义就很可能不会经历工业革命了。

然而完整的描述却有点复杂。康德要求个体按普遍性行事，而不能在边际拿他的原则做交易。他也承认，在自我约束能实现、义务能防止混乱出现的地方，共同体的生活会变得更和谐，争端更少了。简短地说，完整地描述不只是一致，而且还是一致性所带来的对整体的真诚。

在绝对主义者和康德的道德理论那里，利益是隐含的，就像商人明显的以天堂与地狱为买点，而其利益却隐含在宗教的手稿里一样。大卫·科拉德清楚地掌握了对利益的绝对补充。科拉德举出志愿献血者的例子，以解释绝对命令在无知的人中和罪犯的两难境地中的灯塔作用：“在决定是否尝试免费搭车时，非康德的利他主义者只考虑他个人对可重新分配的资金的贡献（几乎是不需考虑的）”。与此相反，康德式的利他主义者询问，如果 A 做出类似的举动，将会发生什么，如果他们这样做 B 将什么也得不到。非康德式的利他者没能合作，而康德式的利他者却自发的合作。（科拉德，1978：15）。阿尔弗雷德·马歇尔阐明普遍法则是供应的前提。因此，举例来说，“在零售和批发业许多正常交易的安排中，还有在股票和棉花交易中心，取决于与一个假设即口头的合同，在没有证人见证的情况下，也会得到诚实的履行”。然而，在多头所有的合股公司里，领薪的经理们由于却乏管理的公正，在事实上已足已“阻止商业的民主形式的发展”（马歇尔，1890：29，253，又做出强调）。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原理》的作者，以满足和痛苦的方法来解释供求理论而著名。但是因为他在伦理学上信仰道德的绝对主义，使得马歇尔的经济学理论中对利益的关注并没有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为了

阅读那些原版的经典著作，马歇尔学习了德语。他曾经把康德描述为“我的导师……惟一让我崇拜的人”（马歇尔，在凯恩斯的著作引述，1925：10）

康德的解决方法是黄金法则。尽管一个严格的康德主义者肯定会宣称这个道德法则从本质上讲其本身就是终极目的，但是像克拉德和马歇尔那样的经济学家却发现这个精神状态能对供给理论予以补充。毕竟绝对的道德主义也许不一定是与利益截然对立的。但即便如此，那些认为绝对责任有助于保守的资本主义的主张其实依然受到限制，而这些限制来源于在运用康德主义工具中产生的一些困难。

首先，对康德来讲，上面提到的绝对责任的关键其实是思维本身：即使是对于谋杀的禁止也来源于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我被谋杀，我会作何感想？”当一个人建立起一种责任感，去帮助一个寻求避难的难民或者是一个贫困的单亲家庭，归还公共汽车上拾到的别人丢失的钱包，对那些自己无据可查的收入报税。这个人正在做的与其说是为了适应那些由来已久的道德约束，还不如说是他创造出了自我的约束，这种自我约束来源于他自己心中对人人平等的希望。义务是绝对的，与利益无关。但是，正是这个被同样的我所确认的责任，又在工厂里寻求利润，在商店里寻求效用。在这种意义上，当一个人像利他主义者那样行事时，所谓康德主义者责任观的建立，其实和罗尔斯主义者所讲的那种能规避风险的人做出的理性选择一样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为了能使那些获利最少的人得到最大的利益，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将得到重新安排”。（罗尔斯，1972：302）——这只是由于这个原因，即没有人在处于罗尔斯所假设的无知之幕的状态下，能够清醒地认识到他个人将是获利还是遭受损失：“没有人知道他在社会上的位置，也不知道他天生的长处，所以没有人有能力按照其利益来设计原则”（罗尔斯，1972：139）。罗尔

斯写道“我认为在康德的伦理学中，关于无知之幕的概念是含蓄的（罗尔斯，1972：140~141）。也许是这样，但这也会削弱那些讲真话和互相支持的品格高尚的典范，为了提高反射自我的福利可以对买来的保险进行精密的计算。

个人之间的相互诋毁将进一步延伸到自我的支配。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考虑到利他的思想并不完全适用的真理，自私在某种程度上将是不可避免的。既然这样，像爱你自己一样去爱你的邻居，并不能真正保证你爱她的同时他也正想被爱——或者她爱你。制定一整套普遍适用的法律并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任务，在这些法律中，（排序）重要性没有被揭露出，（基本）用途也没有指明。虽然在非资本主义环境下，绝对责任肯定是那些从人们自身生发出来的猜测与臆断的产物，但是自由市场能够通过交换自动地使揭示出的对人们的关心得到递增。这种程序并不是确实可靠的。既然这样，在黄金法则中暗含的社会契约论肯定很容易遭到以下观点的攻击，即我的“利益”通过你的“正义”取得，就好像受到由于看不见的近视者的引导，把你看做我，因为那就是我能够做的最好的事。

信息不对称会所有经过比较得出的结论发生。亲戚、朋友和同事拥有足够的共同的保守经验，能够在共同的过去历史的基础上建立一些计划。而另一方面完全陌生的人之间发现这很困难，即人们间的相互诋毁并不能威胁到心理距离的违背。问题的关键只是程度问题。知识有成本，而需要的东西又不明确——除非一个人对这些有一个好的想法，否则他者就不可能仔细尊重“自我”的偏好。

对多样性的宽容会进一步引发难题。社会工作者像爱他自己一样去爱他的邻居，给他们以热汤、补助和装帧精美的《卫士》（*The Guardian*）。走投无路的人，可以利用酒精、可卡因、用现金重新分配以及可以自由选择通往地狱的道路，来重新诠释他承

担的义务。A 给 B 自己想要的东西，B 却反驳道，这样的爱是爱管闲事和自私的表现，泰晤士河大堤上的平等的人性，不可能完全用来修饰肯辛顿的牧场。如果 A 和 B 的行为一样的话，或者最少 A 和 B 们打算根据单一的准则达成妥协，那么像这样的问题可以一举得到解决。并不能期望着两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能够在次优的环境中保持不变，而在这种次优的环境中，爱类似于严格控制，而其他人的权利则被当作似乎是自我的外部性。

在上面所引用的例子里，自我无疑是太重了。然而在运用康德主义的工具中，即使是个人亲自去做的事也会产生问题。对未来和当前同样的预期，将使得那些受制于贴现过程的公众投资显得不太适当。借贷者和放贷者平等地位会导致用利息来作为延期再还的金钱的酬劳成为不可能。从短期看，对那些死囚犯的同情，将意味着在随后一系列的博弈之中会有更多的吸毒者和罪犯产生：“除非建立起一种平衡机制把自我选择的局限强加在类似慈善行为上，否则物种灭绝的速度将加快而不是减慢”（布坎南，1975：84）。在一报还一报的地方，显出来的利他主义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侵蚀康德主义自身：考虑到贝克尔的“不健全的孩子”（贝克尔，1981：7~9），他们由于总是得到能够谅解的他们父亲的慷慨行为，而决定去永远地进行免费旅游。做一个人将被要求做的事将产生一个“追随你问题”（after-you-problem），这一问题将使得针对伯顿人（Buridan）冷漠的行动固定化。A 的行为是为了满足 B，而同时 B 的行为是为了满足 A，那么就没有一扇门能够首先进入，也没有得到同意的价格标签。而作为康德主义者，A 和 B 两人就处于由饥饿导致死亡的严重危险中。而某种程度的自私反而能够挽救他们的性命。如果说，道德的严重缺乏是造成霍布斯所说的战争的原因的话，那么完全有理由说，太多的所谓的道德却能导致一种暗淡的结束。

8.3 伦理学 and 经济学

迪尔凯姆强调一致性：人们内化了那些优秀价值观，使得那些延续着的习俗能够永远保持下去。康德的标准是普遍性的：人们按照他们想被对待的样子对待别人，而且人们还指望别人也能用同样的慷慨方式来对待自己。而伦理经济学中首先是价格然后是信任这两个角度很好的阐明了一致性和整体性的建构。

(a) 价 格

简单地说，市场价格是公平价格，而价格的公平可以由作为供给一方的多个公司间的竞争取得，作为需求一方的未受操纵的偏好。这的确太容易了，因为隐藏在均衡机制后面的肯定是均衡的有效性，并且舆论也许并不会那样简单地接受如下观点，即马歇尔主义者的干扰 (**cross**) 和他的拥护者所主张的效率一样公平。显然，与教材上的曲线一起，“那里依然存在公平交换的社会规则，在一个组织内部交换的比价并不是必须的或者是具有典型意义的，等同于被看做的交换公平比价” (布劳, 1964: 154)。人们即使在价格方面也有自己的偏好。下面就是明证，它将具有说服力——但也很难操作——通过调查问卷和考察的方式而不是假设建立一个“公平”的图表，人们将自动认同准备处理的邮票价格。

实验得出的一个结果是对正常和预期的主要吸引力：“关于适应方面的心理学研究表明，任何一种事物的稳定状态都将趋向于最终被接受，至少它的替代物不再容易被记住” (卡恩曼、纳奇和泰勒, 1986: 730 ~ 731)。保守主义似乎被当作其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依据。市场价格不存在例外：“起初被当成不公平的交换这个词，随着时间的推移获得了与交易相关的地位。因此，在人们所考虑为公平的行为和他们希望在市场中所作的行为之间的

距离变得更小”（卡恩曼、纳奇和泰勒，1986：731）。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状态被认为是公平的。之所以被认为是公平的，因为这就是现状。

在中世纪，公正的价格是一个文化上的事实。他是一个深深植根于正在发展的生活方式中的习俗标准。历史上确定的比价是一个永远持续下去的传统，这种比价无疑承担着道德的重任。稳定准则的道德起源具有双重性，即同时存在于迪尔凯姆（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些准则是具有自我意识的独立共同体共同具有的）和康德的思想中（因为买卖双方被要求不要利用同伴非正常的需要）。中世纪天主教的公道的价格观依然存在于当今的苏黎世和柏林，在那里经布罗洛·弗雷访问的1750名家庭主妇中，绝大多数证实了他们发现维持现状比吸引力的冲击更公正。

因此，当被问及在一个偏僻的地区，并且是很热的天气卖水给观光者这一问题，78%的被访者认为在需求过多的情况下，由价格来配置这是不公平的，34%的人认为是非常不公平的。当被问及在一场大雪后雪橇的分配时，83%的人认为利用价格机制上是不公平的，69%的人认为是非常不公平的（弗雷，1992：159~160）。不管经济学界提出什么建议，大部分家庭似乎对价格的变动不考虑稀缺资源而持保留态度。

弗雷正确观察到这种否定态度必须被置于过去的次优状态中：“公平的价格必须在比较之中来分析。没有哪个决策制度是完全公平的，重要的是价格和其替代物之间是如何联系的”（弗雷，1992：160），实物必须和实物而不是和虚构的观念进行比较。在瓶装水的例子中，弗雷把它等同于三个可行的替代物。最小范围的民意测验是诸如抽签之类的随机选择，这其中每一个参加者的机会都是均等的，并且都没有担保者：只有14%的被调查者认为这是“公平的”并且（不同于其他替换物）对它的评价并不比市场好。中庸的选择是由不掺杂个人因素（包括，或许是

需求的标准) 的工作人员或官僚来进行分配: **43%** 的人认为这种方法将达成“公平”。最流行性的观点是传统的“先到者先得”: **76%** 的人认为按序排队的方法是“公平”的——尽管忽略了个人的强烈愿望。只有在供给趋向于上升时, 被弗雷调查的人才选择拍卖这种方式, 而不是利用暂时的短缺而采用非法的手段敛财。他们的道德标准使资源无法分配、信息无法传播、市场无法有序。也许他们并不知道是他们的道德观使他们付出了代价, 也许他们知道但却不愿妥协。

只要存在参照价格, 就一定存在参照利润。在经验研究中, 被调查者趋向于从记忆中搜寻已购的相关价格来作比较, 不是主观的效用, 而是已付出的代价。尽管考虑参考价格作为一种惯例、一种预期和一种规范, 但他们仍会反驳, 因为在康德的意义上看, 成本和附加成本的变动对买卖双方来说都是不公平的。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关于生产成本 (和/或“劳动成本”) 的价值理论和非保守主义有关利润的理论具有直接、明显和紧密的联系, 后者回顾了过去的和现在的历史, 提出供给和需求的消极剩余的任何增加都是“公平”的。一个隐含的意思是理论经济学家将对多数人的需求非常满意, 如果他们能模仿“合理的”和“超额的”利润进行区分, 并且说明国家的管理能够消除市场无序导致的不公。

卡恩曼和他的同事在温哥华和多伦多做了大约 **100** 个采访。他们的发现确认了参照利润有很强的普遍认同。当被问到雪橇价格一夜之间上涨时, **82%** 的人认为这是不公平的, 因为其成本显然不受需求引发的危机的影响。当被问到新的存货批发价成本更高, 零售价也增加时, **77%** 的人认为把提价的日期往后推是不公正的。显然当调查者反对因需求过多而使利润最大化时, 是历史成本而非机会成本影响了他们 (卡恩曼、纳奇和泰勒, **1986: 729, 733**)。

如果价格与成本不成比例，就会被普遍认为是**不公正的**。因此对其名声很敏感的剧院，在决定最受欢迎的剧目的供需时并不依照剧案的兜售情况：去剧院的人希望他们花的钱物有所值，而且带给他们其中所包含的成本以及强烈的渴望。泰勒发现消费者宁愿在度假旅馆中花**2.65**美元的中等价格买一瓶啤酒而不愿在当地超市花超过**1.50**美元的钱买啤酒：度假旅馆被认为成本较高，因此有“权利”收费更高（泰勒，**1985：206**）。卡恩曼和他的同事发现，调查者中**91%**认为房东仅因为房客在附近地区有工作就提高租金是不公正的：成本并没有改变，房东利用事实上需要的特殊环境是不公平的（卡恩曼，纳奇和泰勒，**1986：735**）。弗兰克总结周六理发的价格没有上涨的原因是人们认识到理发者的成本并没有变：“在消费者眼中，周六理发的成本与工作日理发的成本没什么不同，许多一周中不能来的顾客宁愿在一个拥挤的理发店排队等候也不愿在他们认为收费高的理发店得到舒服的服务——尽管在抽象意义上，他们在后者理发店节省的时间要比多付出的理发成本珍贵得多”（弗兰克，**1985：105**）。这些观察表明消费者对什么是公平的有一定的见解。他们觉得，当他们的贸易伙伴由于超过参照点收益而接近他们，那么规范就有可能被违反。

当生产成本上升时，大多数人并不会认为这是不公正的而予以抵制。卡恩曼和他的同事们发现他们，在受测样本人群中**79%**都并不会反对店主转移生产成本增加的整个负担：**75%**都得出了关于地主的同样结论——即使最终佃户不得不搬出去。参照利润的公平一定不会明显地等同于一个慷慨仁慈的回应。

受访者看起来在过去都将参照利润看做是公司在成本提高时的权利。当生产成本下降时，他们更加不会坚持标出正常价格。如果成本下降了**40**美元而价格下降了**20**美元，**79%**的人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如果成本下降**20**美元而价格一点也不下降，

53% 的加拿大受测试者——是微弱多数但仍然是多数——乐于忽略来自购买者的新补贴而说没有不公正发生。看来大众对于成本价格的反应似乎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对称：“公平原则允许一个公司不去承担其强加给它的交易人的损失，也不把同它们分享收益的明确责任强加给它”（卡恩曼，纳奇和泰勒，1986：734）。对价格分配的误信，没有作好准备将机会成本看做是真诚的牺牲，公众看起来由于成本涨落根据“公正的”利润将自己分成了几份。协议的公正没必要意味着是在看不见的手中的集中。它是有功于社会民主的容忍与支持的。

劳动力市场，作为针对人的市场，对公众标准尤其敏感。将参照工资看做是工人的权利：在加拿大的研究中，83% 的人认为当外部市场工资降低时，削减被雇佣者的报酬是不公平的（尽管73% 的人相信提供一个新雇佣工人的较低流动率是正确的）。考虑当利润降到保守基础以下时削减正常工资：68% 的人认为如果公司确实是遭受损失是可以接受的——但是77% 认为只要公司还有一点点的财政盈余就无法接受工资的削减。想想尽管量是相同的，但评估却是不同的：62% 的人认为在萧条中削减工资的7% 是不公平的（尽管80% 认为取消等同价值的奖金是合理的），但是78% 的人认为，在良好时期价格上涨了12% 但工资上涨5% 是公正的。传统差异、过去的先例、刚性下降、弹性上升，报酬损失与有限收益被看做是不一样的，尽管存在着大量的失业预备人员但仍不降低工资，联盟在历史分界线上的保护角色——所有的这些都在劳动力市场内建立起一种标准维度，超越了市场确定工资，没有必要招致对金钱印象的误解。

劳动合同并没有赋予它自身以全部和完整的细则：在勒宾斯坦看来，使得“X—非效率”的随意的一半（discretionary penumbra）对那来说都太过庞大了。主动的再定义是组织生命的事实，劳动力有机会在他实际提供努力的数量与质量施加巨大影

响。工资是按照最小量来支付的：“在这些最小标准之上，工人业绩可以自由决定”。

工人们有权选择最小工作量。对工友与负责人的认同责任感会促使他们做得多一些。在阐释多余的劳动实际是一种义务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看起来像是埃尔顿·梅约在过去霍索恩工厂研究中指出的占主导地位的参考劳动强度大纲：“一个工作组作为一个整体实际上通过参考标准决定了每个工人的产量，预先决定了但是绝对没有明确表明，这种参考标准代表了集体观念中一个正常工作日的工作量。该标准即使有过、但也很少与熟练技师的标准相等同”。在霍索恩的工人们做他们认为是公正的事。正是他们同伙的一致意见给了他们一个基本水准，然后放慢了节奏。

绝对主义者经常注意的是附加利益。作为同一类人，霍索恩的工人们团结一致地，不惜毁坏声誉搭税收便车。从等级层次上看，作为报答而返回礼物的同样含义，似乎是将工资接受者与他们的资本者之间义务的连接的特征。公司提供了超出竞争以外的工资，尽管外部提供了偶尔的失业工人。公司使得循环过程中冗杂事物最小化，因为工人关注的是同事，而道德规范则面临着背叛者的威胁。公司降低了高报酬与低报酬差距的扩大，因为人们知道，被雇佣者们是要评价一个能反映他们的对社会差距不信任的压缩型分配体系 (**compressed distribution**)。很容易把这种抵制市场的行为看做是分担风险和含蓄的契约订立、一种善意的投资与长期利润的投入。当然在绝对主义者那里也有利益。但是也有绝对主义者——以公司为例，每个企业只有很有限权力去拒绝公正的参考标准。到那种程度时，可能不会再要求价格控制、雇佣管制、垄断和合并限制、最低工资的法律规定等方面的综合运用。非正式压力在保证延长强有力的契约方面可以发挥同样的功能，这些契约是目标而不仅仅是手段，在他们限制的范围内，与公众了解的预算约束相匹配。

(b) 信用

信用是“在一个常规的、诚实的、具有合作性行为的共同体内产生的一种预期，建立在共享的标准之上，代表了共同体的其他成员”（福山，1996：26）。被称作是值得信赖的，一个人如果诚实和遵守诺言而值得依靠、有可靠的表现以及守契约的行为，那么他就是值得信赖的：例如，医生不能滥用不对称信息获利，法官不能因受贿而做出有偏见的判决。一个人如果被认为是很爱说谎、作弊、欺骗、欺诈、玩忽职守以及奥利弗尔·威廉姆森所描述的“以阴谋诡计寻求自我利益的“机会主义”（威廉姆森，1975：9）：想想一旦当选便立刻撕毁其信誓旦旦诺言的政客，或者是隐瞒事实而给其部门带来问题的经理。杰克相信他以后能从他的所作所为中获得好处，吉尔相信，她的孩子们好像她年老时候的保险政策一样会有所回报。杰克和吉尔以诸如此类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未来关于法律不会执行的预期的信心。杰克与吉尔，简而言之，是将他们的信念放进了一种自我决策的道德信念中，这种道德信念能够传达在其基础之上建立的非意图性结果。

肯尼斯·阿罗将信用看做是有高社会回报的背景价值：“信用是社会系统中的重要润滑剂。它是极度有效率的；它避免了很多麻烦，人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相信他人所说的话”（阿罗，1974：23）。阿罗继续论证到，像所有其他非公开的信息一样，它不可能成为一件商品，“而商品在市场上进行公开交易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也具有意义”：“如果你必须买它，你就已经对你的所购买的东西表示了怀疑”（阿罗，1974：23）。信用在追求利益循环的末端至关重要——这样的案例非常有限，因为金钱与货物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同时易手的。但是，信用并不是因为对商业保持敏感运作起来就没有风险了：“你不能很容易地在像那样的基础上建立起信用。如果你的基础是理性决策而你的潜在动机是自身利

益，那么你就能在任何时候背叛你的信用，只要有利可图而且那样做有利于你。所以其他人不可能相信你”（阿罗，引自斯威德伯格，1990：137）。信用，简而言之，只能在没有将它当作能够盈利的商业资产的地方，才能作为能够盈利的商业资产起作用。阿克洛夫基于无用和忠诚角度上得出了阿罗结论推断的逻辑，即没有经济外与多时代的相似替代物。

不完全信息使得消费者很难或者是不可能估计将要购买的东西的质量。在一些情况下——例如新车——有生产者保证事实上将风险返回给了销售者。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例如旧车——将不提供担保方。是在旧车市场而不是新车市场上，消费者更有可能最终拥有一辆无用的东西，因为他的缺乏经验，使得他在上当受骗之前是无法辨认出次品的。

但是信用是重要的润滑剂；道义习俗能对被暴露者提供帮助。健康保险中的模型要算是康德哲学的应用者了，他通过真诚地宣布，他要冒很坏的风险因此需要补偿性保险金，从而来挫败相反选择。这在汽车市场便意味着诚实的卖家要揭示缺点按比例削减他的价格。

阿克洛夫并不否认诚实以这种方式能够保持住平衡，而如果知识不平等就会打破这种平衡。但是他也要附加上严格的条件，即如果诚实是用来纠正市场失灵的，那么诚实必须是普遍的而且是公开的。信用，阿克洛夫警告道，必将不可避免地被一个混合道德环境的双重性所挤出，在这种环境下一些人高贵无私而一些人下流无耻：“不诚实的交易总趋于将诚实的交易挤出市场。或许有潜在的高质量产品购买者也可能就有处于适度价格范围内的该类产品；但是，以次充好的人的存在总是易于将合法商业挤出。因此，欺骗的成本，不仅存在于被欺骗的购买者数量；也必须包括由于将合法商业别挤出所遭到的损失”（阿克洛夫，1970：15~16）。高尚的人与卑鄙的人在市场上可

能是根本无法分辨的。结果就是将“格雷先姆法则 (Gresham)”进行富有想像力的延伸所预测出的郁闷局面。消费者在私下必须对正人君子 and 卑鄙小人的声明同样地打折扣。高尚的人会贱卖或者整个就从交易中退出。而卑鄙的人既不会有负罪感也不会有放弃的意图。这样从长期来看，坏道德将挤出好道德，部分信用让位于根本没有信用。

阿克洛夫的要旨是，诚实，如果是普遍的，就能重新恢复市场平衡。他也能接受资本主义自身能对其一些不足进行修正的观点。第二位医生又给出了一个意见，即使第一位医生已经把他的职业道德放到了诊断中。即使房产商发誓绝对货真价实，建筑评估师还是做出一个客观的评估，。法律顾问写上的遗嘱以把继承人的义务具体化。旧车交易商提供市场信息（他对好车比对较次的车要价更高）和提供保护（例如他使用他的专业知识来提供有限保证）。顾问、中介人以及企业家很明显地都有能力提供以市场为基础的对信用伦理观的替代——当然，索要市场决定交换的报酬。保守主义能重新造成市场不平衡。当然，很明显的，市场自身也是如此。

旧车交易商自己面对诱惑而在交易中夸大与隐瞒他的无用之物。而他的企业的长期性质不可能刺激他为了追求短期收益而牺牲长期利润。原因在于名誉是一项商业资产，而诚实的名誉（例如“品牌名称”）是经济租赁的一项来源。客户与雇佣者支付差价以上的部分给他们所信赖的贸易伙伴。从此意义上说，好的道德既是手段又是目标——而且这手段还是自然选择过程本身所强烈维护的：“为什么不欺骗？答案是在一个先进的、个性化社会里，每一个人都能被认出来，他们的行为记录被他人所评价，因此欺骗得不偿失……选择将会歧视个人，如果欺骗在他日后生活中有不良影响，而且再生产会超过当前获得利益”。（威尔逊，1975：120）。鹰的视力好就在于，如果视力差，它在高空寻找猎

物时就不能得手，从而不能再生了。功成名就的交易商之所以值得信赖，是因为依靠废弃之物来谋取暴利的无用商人发现，根本无法在一个臭名昭著的交易所之外与一个顾客进行一丁点交易。马基雅维利的学生伊阿果（Iago）道出了全部真谛：“男人或者女人的好名声……是他们灵魂的最珍贵的宝石；偷走我钱包的人偷走的是垃圾”。

喜爱戏剧表演的哈姆雷特，提出了如下建议：“拥有一种美德，如果你还未拥有。”他对人们的倡议使人们回想起了凡勃伦著名的消费理论，寻求报酬的质量是成功的，因为它能公开展示：“对装作诚实是有回报的，但是对实际的诚实却没有”（阿克洛夫，1983：181）。盈利发生在认知而不是事实上。被认为是值得信赖的有一个很大的优点。而如果被认为是值得信赖的同时还引导自己扮演黑衣武士和流氓角色（Knave），那么这更是一项长处。很明显的是戏剧学校而不是商业学校教授伪装和掩饰，而如果哈姆雷特的忠告被当成信用的话，这些将在房地产商以及未来的扑克玩家训练中很有价值。

当然，长期接触的确起到了将真假分开的作用；而由竞争者间的比较也起到了同样作用。但是心理学本身似乎是站在诚实一边，而且与建立在假装基础上的战略也不协调。

这样，那些知道自己背叛了信用的人们，就经常由于无意的暗示而让他们自己失望。一些有表达意思的信号如脸红、眨眼、结巴、冒汗、心率变化，无法与别人的眼睛接触，都像木偶皮诺曹的鼻子，说明了有一种错误印象被一个操纵者和一个有东西要隐藏的伪君子有意识地投射出了。尽管有些骗子能够骗过测谎仪，但是大多数人的身体语言还是不习惯虚伪的：“为了显得诚实，有必要或者至少是有帮助，成为诚实的人”（弗兰克，1988：18）。从这个意义上看，美德既是它自身的报酬，又是物质成功的投入。

神经系统同道德情感相关的。早期社会化也是如此。阿克洛夫不相信骗子们会大行其道，他认为概念和事实是同一硬币的两面：“它要求父母注意对孩子们进行诚实教育，因为装做诚实的个体功能特征同个体本身是诚实的功能障碍特征 (**dysfunctional trait**) 是相伴而生的。装做 (**appearing**) 与实际存在 (**the being**) 是结合在一个整体里相互传递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学习的保守特征 (**conservatism of learning**)。曾经习得的知识是不容易散失的：“根据我的育儿模式，诚实刚开始时可能是作为发展经济的手段，但以后就有替代目标，以至经过学习的人将会抑制自己不去贪污，即使不会受到处罚” (阿克洛夫, 1983: 180)。如果一个社会化的产品需要具备可靠性、诚实性和自我约束性等品行共同组合而成，那么一个旧汽车商就需要大量新的商业伙伴，因为他清楚只有严格按照规范作业，他才能塑造他的生活：“即使这个世界在午夜灭亡，并消除了所有错误的可能带来处罚，但是真正值得信赖的人将不会受诱惑去欺骗” (弗兰克, 1988: 69)。他的服务声誉将证明是企业的宝贵财产，本身就可以获得一个好的市场价格。

好名声就能获得好的市场价格。同样，独立地看，也可以获得一个好的事业。在美军校的教育，或者在一个优秀的英国公共学校，通常都被看做是在一个易受影响的年龄里反复灌输绝对的受人尊敬的集体的指标。高贵的背景 (像通过服饰、举止和口音) 可能标志着对某一可预测团体行为模式的认同以及对贵人行行为理应高尚 (**noblesse**) 的继承。以严格的道德准则著称的某一宗教派别的成员身份，可以作为碰巧居住在非常危险的贫民窟，但是却享有高度安全的申请者的证明。像这些因变量 (阿克洛夫的“忠诚过滤”) 都可以被广泛地作为甄别的工具 (**screening devices**)。它们是保守的代表，从长远看最有可能选出具有好的声誉的贸易伙伴。通过承认行为的可信性，它们可以减少交易成

本。更令人奇怪的是，当不负责任的货币问题（经过通货膨胀）剥夺了现金持有者的购买能力时，甚至国家也可能拖欠债券。当然，正是这些古老的道德规范可以节约过滤成本（**filtering costs**），结果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经济学引进伦理问题作为供给与需求的补充。

九、结构作为资本

经济学中的市场经常被描述为一个瓦尔拉斯矩阵，一个由多个独立的部分聚合而成的凝结物。其中每个部分都是匿名的、势单力薄的、面目不清的、可以互换的和孤立的。在这样一种世界观看来，资源配置的任务都是自动完成的，各别的单元被指令干什么就干什么。

然而，我们有另外一种在人潮人海中识别各种面孔的方法。甲向乙兜售一张用过的旧卡，乙与甲具有血缘关系，或是从意大利或巴基斯坦的同一个村庄移民过来的同乡。乙付给丙小费，丙不仅是一位出租车司机，而且是乙的邻居、朋友、当地高尔夫俱乐部的会员、当地童子军的领导。丙用他的车为甲服务，后者是前者长期的商业伙伴、定期光顾其美容院的常客、教堂唱诗班的男高音、晚会中的酒友。从客观层面上说，杂货店老板、出租车司机、美发师近似于教科书上所说的理想的竞争者、脚注中所说的价格承担者，他们存在与否对最终的市场结果只有很小的或者说没有影响。如果从主观层面来看，它们的地位就很不一样了——因为正如马歇尔所敏锐地观察到的，人潮人海中的每个人都同时面对着“广大市场上对其商品的一般需求曲线”和“他本人特殊市场的特殊需求曲线”（马歇尔，1890：379n）。即使在类的层次上是同质性占主导地位的地方，在次一级的种的层次上，

仍然存在着垄断和分化。在人潮人海中，谁的面孔也别想逃过人家的注意。

在辞典上所说的一致性中，经验和接触是的知觉独特性 (**perceived uniqueness**) 的一个重要来源。因此，甲与乙，乙与丙，丙与甲之间的个人关系，可以被视为一种不是由物质而是由联系构成的有价值的资本。这种资产存在于“与”之中。正是由于甲与乙，乙与丙，丙与甲之间存在着无缝连接式的人际关系，詹姆斯·科尔曼才能够将离散的过程比做一项由相互独立的部分构成的单一的生意：“由于整个市场中普遍存在着如前所述的种种关系，所以我们可以将市场看做一个组织，它就像一个百货商场一样。或者换个说法，市场可以看做是多个个体零售商的集合，每个零售商均拥有可以使用的广泛的社会资本，市场中的各种关系是这种社会资本的基础” (科尔曼, 1990: 304)。市场是一个为结构化复制和保守的从属关系准备的论坛。市场不仅仅是由仅在非人格化交易中进行一次性投资而联结起来的群众的各色面孔。

本章的主题是作为沉没成本 (**sunk cost**) 的结构和连带关系。9.1 节，“社会资本”，将给出这一资产的定义；9.2 节，“社会关系的扩充 (**empowerment**)”，将考察社会资本投资赖以发生的渠道；第 3 部分，“非社会资本”，考察社会资本这一资产在现实生活中成为某种经济体制的债务，使之在历史面前迈不开步的几个可能的方面。

9.1 社会资本

这里所说的资产即是网络：“社会资本是全部现实或潜在的财源，该财源与多少已固定化的相互认识和相互承认的长久关系网络联系在一起” (布迪厄 1980: 2)。物质资本是非人力投入。

人力资本是一种“由人体中蕴含着资源的嵌入过程”（贝克尔，1962：9）而造成有差别的生产力。社会资本是结构性互动的存量，它既不像膳食一样是一种终极效用，也不像汽车一样是一种耐用消费品，在这一点上，它与种植、上学、维生素和在职培训具有相同之处，即它应当被视为对一个国家未来财富的投资。

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一样，仅仅是一个比喻。说某人像一只土豚，是一个真实的陈述，但不一定是一个有用的陈述。说社会资本与无生命投入（*inanimate input*）具有家族上的相似性，除非合理地说明它们之间的差别和联系，否则，按照同样的逻辑，也不是一个有价值的类比。

首先，社会资本是无法挪用和占有的：“与其他形式的资本不同，社会资本存在于人与人之间或之中的关系结构中。它既不驻存于个体之中也不驻存于物质性的生产设施之中”（科尔曼，1990：302）。物质资本可以买卖。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社会资本既不能分割也不能交换。由于它只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所以它具有这样一种特殊的属性：它注定永远不能成为资本家的财产。

其次，社会资本是非排他性的和非限制性的：一部机器可以注册专利并根据它的收益来标价，但却没有行之有效的办法将不劳而获者与自觉自律的诚实——这是送给市场资本主义的一个礼物，它给市场资本主义提供了一个由戒慎恐惧的同一宗派教徒构成的网络——区分开来。非商业性的溢出效应（*spillover*）是一种可供整个俱乐部分享的外部性。如果这成为事实，那么作为开放边际使用权的直接后果，公共物品就会因此而供应不足。

社会资本的典型特征是无法计划。工业上的革新通常需要决策，以决定是否投资。而与此不同，关系网（*the web of contacts*）最经常地表现为一些与财富没有关系的活动的副产品。在社会资本问题上，个体只是在启动阶段才会做出某些独特的有意

义贡献。一个厂商在把自己的机器人电脑化的时候，他会计算并编制预算。但没有人在安家、服兵役、参加共同决定 (*Mitbestimmung*) 或参加戒酒者互诫协会时所抱持的目的是使经济效率有所提高。

社会资本很少能够贴现。与物质资本一样，它有一条第二好的底线：在那些邻居们认识到参加一项志愿守望计划的成本低于请保安的成本的场合，或者人们相信一个受人尊敬的承诺比一个可执行的合同更为节省稀缺资源的场合，这一点看得很清楚。不过，人们发现，与物质资本不同，社会资本难以通过一个外在的贴现率将其与未来的机会集之间的交换形式化。这种商品既可以消费也可以用于投入：商人喜欢参加鸡尾酒会，在那里所结交的都不是等闲之辈。此外，这种商品能够随着使用而扩张：一些关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贬值（比如，具有历史意识的移民出嫁之后被逐渐同化），但另一些却变得越来越亲密（想一想安特卫普珠宝交易中人与人之间的期待，累积下来的人家对你的义务能够像“存在银行里的钱”一样发挥作用）。社会资本所具有的这些属性鲜明地将卫理公会教徒在不意之中积累的财富与一口油井的有计划的回报率区别开来。把后者作为成本—收益分析的焦点更有意义。

最后，社会资本难以划定界限。一张犁具有空间边界。世界对牙医或祖鲁人的供应没有空间边界，而资本却只能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即药箱里的物品能够克服由移民法、交通和通讯所带来的分割。资本的属性 (*the capital-ness*) 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改变：欧盟、空中旅行和移动电话显然非常有助于消除物理上的隔离。一种资本属性 (*the capital-ness*) 可能与别的资本属性相互嵌套：因此甲和乙本身就是一个个别性的网络，但与此同时，它们作为一个对子，也构成了一般性和周边网络的一部分。一种资本属性也可以切入竞争性的资本属性：丙，一个天生的祖

鲁人，后来成了牙医，所具有的分割的嵌入性，即可为例。伴随这些难题而来的问题是，有人警告说，对社会资本的认定本身就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所有社会资本都是互动。是否所有互动都是社会资本则不见得。

不可否认，社会资本区别于物质资本的差别一定存在。不过，尽管存在一些差别，但它们同样具有相似性。社会资本是一种永远生生不息的资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川流不息地产生着它的效益。社会资本是一种固定成本。社会资本是不确定的。社会资本是非现金形式的。社会资本相当于保险费。在所有这些方面，社会资本与那些传统的投资形式在关键属性上是一致的，即它有利于人们按照波姆—巴沃克（Bohm—Bawerk）的那种方式——这种方式因为时代久远而受到人们的尊敬——实现自己的目标。

社会资本就是社会结构。社会结构是社会价值赖以建立的基础。因此，正是像肯尼思·阿罗这样具有伦理学头脑的经济学家，通过假设网络和气质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建构性的关联，从而将像信任这样一种陌生人馈赠的礼物看做一种无意识的产物而不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对阿罗来说，考虑到他人而自我克制的根源不应到功利性算计中去寻找，而应到包围并且形塑着其组成部分的社会整体中去寻找：“因为哪里有信任，哪里就存在着以不同于赤裸裸的机会主义动机为基础的，或者以用社会地位作担保的、具有奉献性质的某种东西为基础的社会结构”（阿罗，转引自斯威登伯格，1990：137）。社会互动约束着逐利行为。因此，伦理的绝对性（ethical absolutes）是一种生产性投入。因此，人际关系可以说是道德资本的一个来源，同时本身也作为社会资本发挥着作用。

不过，关键的问题是，传输经济回报的正是叫得上名字的伙伴所具有的易识别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德和社会资本市场进

行优化选择的方式与机械和技能市场上黑箱式的摸索产生配置效率的方式正好相反。在标准的资本主义情况下，是那些几乎可以互相置换的竞争者之间的非人格性竞争，将价格和利润扳向其函数最小值。而相反，在道德和社会资本的情况下，正是身份 (**identity**) 而不是匿名性保证了市场的运作。身份是将某种服务标准广而告之的品牌名称（就像大学里的一个系或一家熟悉的蔬菜水果店）。身份使得像家里（比如履行代际抚养责任）或公司内部（比如防止偷懒和随意推诿）那种面对面的执行成为可能。身份是对长久关系进行投资的前提条件，也是君子约定和延期回报 (**return-gift deferred**) 的前提条件，因为以前的交往使人们相信每个人都会尊重自己对别人的责任。在这样一些情况中，身份扮演着提供信息来源并减少交易中必然存在的风险的角色。正如本一波拉什所发现的：“为什么在这种环境下对身份进行投资能够得到回报，为什么信任是互益互利的，为什么亲近和广泛的参与能够以极低的代价创造出陌生人中所缺乏的信息，创造出导致得体行为的动机，显然，其原因正在于此”（本一波拉什，**1980: 21**）。如果信息是完备的，不确定性为零，那么道德和社会资本很可能就没有什么经济价值。然而，不管怎样，我们就从这里开始，探讨为什么身份 (**identification**) 和资本主义必须结合起来。

在援引了诸如货物或货币的远期交割、市场上为了获取保险费而进行的逆向选择以及二手车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等例子后，本一波拉什得出结论说，大量经济活动离开背景态度和人际关系网络，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在他之前的熊彼得亦曾对关系和价值表达过类似的支持，对以权利为基础的个体主义表达过类似的忧虑。不用说，熊彼得是一个心甘情愿接受恰恰是他曾经抬得很高的那种保守主义正在萎缩这一事实的演化主义者。熊彼得写道，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动乱或社会主义，注定会成为资本主义历史性成就的必然受益者：“资本主义秩序不仅依赖由资本主义之外

的其他材料构成的基础，而且会从资本主义之外的其他行为模式中吸取力量——与此同时，必然要摧毁它”（熊彼得，1942：162）。本一波拉什争辩说，赤字或次优状况可以通过重新投资于社会资本得到修复。熊彼得则更有神示意味地宣称，资本主义已经为自己造就了掘墓人，除此之外，它已经无事可做。

弗朗西斯·福山不像熊彼得那样悲观，但他对未来更为忧心。福山的观点分为两个阶段。首先，他论证说，伦理绝对性是成功的先决条件，而不仅仅是蛋糕上的糖衣：“法律、契约和经济理性为后工业社会的稳定和繁荣提供了必要但不充分的基础；它们还必须通过互惠、道德责任、对社群的义务和信任——这些品质基于习惯而不是理性算计——来发酵。后者与其说是现代社会中不合时宜的现象，不如说是它成功的必要条件”（福山，1996：11）。其次，福山继续论证说，作为行为约束之来源的社会资本正在随着社会的演化而不断遭到侵蚀，而且未得到及时补充：“具有共享价值观的、其成员愿意让自己的私人利益服从更高目标的共同体，已经越来越少了。而只有这些道德共同体才能培育出对组织效率至关重要的社会信任来”（福山，1996：309）。

福山所说的“必要条件”，福山所说的“至关重要”，强调的是必要性而不仅仅是优先性：“如果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制度要良性运转”，他说，“它们就必须与保证其良性运转的那些前现代文化习惯和平共处”（福山，1996：11，黑体字为作者所加）。将义务（obligation）和联系（association）视为成功的先决条件而不仅仅是一个趣味（taste）问题，确实是一种非常激烈的主张。然而，这一批评确实至少填补了一个知识上的空白，即看不见的手的最优化过程为何总是受到无知和不确定性等摩擦力的阻碍。在这个意义上说，第2章和第3章使本章像红绿灯一样实用，像牙医的钻头一样管用。即便如此，本章仍将以讨论非社会资本结束。非社会资本提醒读者，单单考虑一个事物的优点，是多么的

不科学。

9.2 社会资本的扩充

在一个一次性互动中，不存在什么历史和预见的问题。一个不讲道德的贸易伙伴可能将赝品卖给你，却说那是一块宝石，或者既承诺之后却不向你付款。1875年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就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就像托克维尔在1831年时那样），即在一个没有根基的民主制度中，这种信息缺乏的状况表明稳定已经被流动所代替：“诚实是最好的政策。这一至理名言如果服从于对一个交往对象不断变动（即使他本身保持不变）的人的判断，那它将处于不利地位”（马歇尔，1875：364）。马歇尔在1875年发现，美国人是不断迁移的——因此“货币是比高度的道德声誉更易于携带的商品”（马歇尔，1875：364）。这种易变性，这种不可知性，使马歇尔对康德式的普遍律令在一个非权威主义社会——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每个美国人都只对将自己的理解付诸实施感兴趣”（托克维尔，1840：2）——中能够起到的抗衡作用持强烈的保留态度：“我想，不可否认，在美国社会中，一个目光短浅的人会因此而受到强烈的诱惑”（马歇尔，1875：364）。

马歇尔认为，美国是一个缺乏嵌入性的国度，是追求短平快（immediacy）的故土。相反，英国则是一个乐于接受重重中介社团保护的国家，几乎没有什么共和政体的氛围，教育它的子民在需要“一忍再忍”时：“在逆境中，他会饱受饥谨之苦；在安乐中，他会懒于进步”（马歇尔，1975：365）。马歇尔发现，中介实体作为一所培养能够提供社会关系方面训练的道德家的学校，比那些离群索居的原子更为重要，但它并不像历史学家所说的人民（Volk）那样能够包容一切。作为一个经济学家，马歇尔对“一流的英国工会”，一个受人尊敬的康德式组织，所具有的那种

“近乎道德的深邃的智慧”表现出特别的兴趣：“工会组织现在正普遍显示出这样一种迹象，即开始反躬自问是否任何共和国都有理由采取某些管制，周边共和国普遍采取管制是否会对所有国家造成伤害。在反躬自问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也使自己受到了一次很好的教育”（马歇尔，1875：364，366）。托克维尔，作为一个离经叛道的国会议员，对在政治权力向地方爱国主义下放过程中专门培养起来的纪律性和一体性也有着相似的见解：“英格兰的土著居民总是依附于自己的镇区，因为镇区是独立的和自由的：他在镇区事务中与他人的合作保证了他对镇区利益的依附；镇区提供的福利则保证了他对镇区的感情”（托克维尔，1835：64）。一方面是那些购买《论自由》的人，另一方面是黑格尔式的整体性，经济学家马歇尔和政治学家托克维尔都认为，这两者之间的依存关系从好的方面说，能够增加社会资本的存量，最次也能减缓它耗竭的速度。

本节，“社会资本的扩充”，要考察的就是这两者之间的依存关系。起点是马歇尔和托克维尔的一个观点，即结构性的分群化（grouping）和持久的关系有利于塑造对伦理规范起着加固作用的制度模式。在诸多学者中，格拉诺维特是惟一的人，他发现，对霍布斯式的涣散、多疑、混乱和狡诈的反面乌托邦（dystopia），社会资本的跨时性支持是一个现实的替代选择：“相反，嵌入性观点强调的是具体的人际关系以及由这些关系组成的结构（或网络）在创造信任和防止欺骗中的作用。人们普遍倾向于与名声好的人打交道这一事实表明，实际上很少有人愿意依靠什么普遍道德或制度安排来避免麻烦”（格拉诺维特，1985：490）。出于对自然状态的忧虑，也因为不愿完全依靠道学家和道德箴言以及合同和诉讼，格拉诺维特在环环相扣的忠诚和易于确认的重复交往中寻找霍布斯问题的解决之道。本节也加入到他的探索中，去考察一下对社会资本的形成和维持具有特殊意义的各种制

度。

① 家庭

家庭作为一个群体，过去已经存在，将来仍会继续存在下去。它对孩子进行社会化，使他们具有合作的态度，它向他们灌输有关惯例和期望的非我权威。它是各种反映的条件——在这里，各种争端都会和风细雨地解决，一报还一报的做法被给予时间，让它们逐渐成为规则。它树立了利他主义的榜样——在这里，人们为了孩子拼命地工作和节省，非常重视孙子辈的健康，为此不惜为保护臭氧层支付额外的费用。它是一所培养责任心的学校——在这里，人们义务看护上了年纪的亲属，在与血亲打交道时尽量说实话。家庭是团队精神和互助精神的一个重要来源。它是归属感和爱心的焦点，对资本主义只顾眼前的自利作风起着平衡作用。家庭传授各种规范和作为一个成员所应有的行为。如果这一背景是经济市场的一个必要的补充，那么，家庭就是某种有价值的外部性的一个来源。

我们可以证明家庭承付着经济意义上的期利率。我们也可以证明相反的观点。班菲尔德 (**Banfield**) 报告他在“蒙特格兰诺”的田野调查中发现的“非道德的家族主义”——“不可能在直系家族之外协调行动” (班菲尔德, 1958: 10) 时，就差不多是证明了相反的观点。班菲尔德发现，蒙特格兰诺人非常忠于其亲戚群体的利益。由于他们的公益精神就局限在这个范围，因此在当地孤儿需要人们捐赠食品的场所，在—项灌溉工程亟需志愿劳动力的场合，在曝光政治腐败需要证人的场合，甚至在教堂寻求布施的场合，他们都觉得没有必要做出牺牲。

蒙特格兰诺人敏于追求直系家族物质利益的最大化。在家族网络内部他们积极参与并通力合作，对那些仅仅基于地理毗连关系而建立起来的组织化行动则毫无兴趣。人们对法律视若无睹，诉讼也是不可能的事。逃税、行贿、克扣工人工资。学校教师经

常迟到甚至根本就不来。利益而不是伙伴感情才是规范着相互行为的、人们所要考虑的东西：“甚至小恩小惠都会导致一种义务并必须报答”（班菲尔德，1958：121）。因此，从潜在的方面说，朋友关系是需要付出代价并不得不理性化的：“朋友是蒙特格兰诺人感到难以负担的一种奢侈品”（班菲尔德，1958：121）。政府官员对集体利益没有任何使命意识、职业意识和责任意识：“在一个处处充斥非道德家族主义分子的社会中，那些当官儿的人对组织目标缺乏认同，觉得没有必要太辛苦，只要能够保住位置……或者升官就行了”（班菲尔德，1958：91）。这样，极端国家主义也就近在咫尺了：“在一个处处充斥着非道德家庭主义分子的社会中，弱者会欢迎一个以铁腕维护秩序的政权”（班菲尔德，1958：96）。经济剥夺是活生生的事实：“极端贫困和落后……在很大程度上（但不是全部）都可以从村民不能为了他们的共同利益——事实上，是任何超越核心家庭的直接物质利益——而共同行动这一事实中得到解释”（班菲尔德，1958：10）。蒙特格兰诺人已经将关于勤劳、同情、依附和信任的价值内部化（*internalized*）。简单地说，他们已经表明，他们不愿拓展其道德原则的普遍性。相应地，由于家庭的存在，蒙特格兰诺人的社会不可能变得更为道德。相反，它已经变得更没有道德，更惟利是图——从而也更缺乏生产力。

如果把蒙特格兰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家庭作为一种中介性关系，显然未能承付较高的期票利率。然而，在其他环境下，家庭的作用则非常有渗透性，它的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非常有利。在那些儿童被告诫要守时和忠诚的地方，在那些对自己的手艺感到自豪并不惮繁难已经成为人们的第二天性的地方，家庭可以说是一种耳提面命的反作用力，是一种针对今后工人的生产函数而进行的有助于提高效率的投入。

不难证明，资本主义从家庭所传播的非理性的、非算计的精

神气质中获得了一系列好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资本主义亦有可能将一个本质上是保守主义的制度所能提供的支持推向绝境。资本主义是充满活力的：地理意义上的流动打破了扩大家庭，而技术上的转型则为年轻人的经验投了保。资本主义是追求享乐的：随着效用最大化原则从超市扩展到家庭，“你想什么就干什么”、“各人自扫门前雪”、“消费者是上帝”等原则也可以意味着性泛滥、儿童虐待、感情淡漠、频繁离婚、夫妻不忠、意外怀孕、单亲家庭和利益依附。资本主义是科学主义的：它热衷于追求功绩和成就（因此它对企图保持家族经营方式的裙带主义和偏爱主义是一个威胁），因此它对父慈子孝行为那么高的成本—收益比感到别扭（因此他对圣经十诫中关于“尊敬你的父母”的训诫和儒家对长者、资历和辈份的尊重感到很不舒服）。尽管资本主义确实依赖于亲属网络，但我们仍然有理由相信，经济演化将会导致保守主义支持的衰败。

各种事实表明，资本主义体制对其自身的稳定性也可能是一个威胁。熊彼得关于现代经济史的理解不无裨益地提醒我们注意到一直作为一个威胁而存在的社会原子化现象：“在打破前资本主义社会框架的过程中，资本主义不但打破了阻碍它进步的壁垒，与此同时失去了防止其崩溃的扶壁”（熊彼得，1942：139）。对保守主义国家来说，寻求被社会演化挤到边上的家庭的帮助是一个现实的诱惑。

毫无疑问，强调国家领导者作用的统制主义也是一个选择：由此而导致了法律（它解释了为什么小孩犯的罪要由父母来承担责任）、规矩（否认应该给未婚夫妇——至少是同性恋者——提供公用住房）、税收（丈夫和妻子在财政上被视为单一的纳税单位）和补贴（比如，慷慨的儿童福利和国家提供给那些以尽心养育孩子为惟一职业的家庭妇女的津贴）的强调。因此，可能让人有点吃惊的是，国家干预将家庭从其作为社会工程师所承担的

外部指导职责中解放了出来。从消极作为的方面来讲，国家可以抵制那些为了赢取选票而提出的社会福利政策，以免关爱的官僚化免除了那些有金钱至上思想的家庭对老幼弱孤者的责任。从积极作为的方面来讲，政府可以颁布学校社团目录、扩大家庭教师协会的权力、坚持父母监护制度和以学费（在那些利用专用代金券和以发放业绩津贴等手段挪用公款的地方要提高父母自付学费的比例）为惟一渠道的财政资助制度，以便更直接地把家庭卷入到孩子的培养中去。不管是通过统制主义方式还是使孩子摆脱家长的管教而获得合法权利的方式，很显然，国家都能做很多事情来保护那些属于家庭的代际资本。

② 亲戚和种族

处在核心家庭的外围是亲戚和种族。这是一组对个人意志的社会化有着特别重要意义的关系。亲戚确实有利于增加就业机会，因为他们有关于你之勤奋程度和可靠性的个人知识可资利用。亲戚可以大胆地授予商业信用（或现金借贷），因为他相信，本家族的人如果窃取了财产将会遭到普遍排斥。亲戚们可以支付高于实际所需的货款，因为他相信自己不会遭到次品的坑害，在交货日期上也不会宕后于他人。在上述方面，亲戚关系都对经济市场具有重要影响。它之所以具有这种影响，一方面是因为亲戚网络所产生的内部信息，另一方面是亲戚网络所强化和灌输的非市场性态度（**non-market attitudes**）。

种族经常被看做亲戚的扩展。狭义血缘关系和广义血缘关系之间的相似之处是显而易见的。更为重要的是，在所观察到的经济推动力方面，它们也具有显而易见的相似性。因此，一个自己出资的企业家可能希望招收那些在感情上与自己具有一致性的同种族的人做职员；而一个飞地的杂货店老板可以抬高自己货品的价格，因为黑人宁愿到他这儿而不到亚洲人那儿买东西，而穆斯林宁愿到他这儿而不到中国人那儿买东西。新来的移民经常到在

母国有着一定名声的早期移民那里去工作：劳动力的流动程度通过这种方式得到缓解，丑闻可能带来的羞辱阻止了欺骗行为的发生。劳动盈余通常是大家共享的（一般是通过钱会），以便为扩大生意提供财政资助：在共同体内部团结紧密或者留下来的亲戚必须偿还携款潜逃者留下的亏空的地方，精心拟制的法律条文是没有必要的。特殊主义和排他主义所具有的经济意义显然是不能抹煞的，与个人后天做出的成就相比，先赋地位也不是丝毫不起作用。无论是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未被同化的犹太人、乌干达籍亚洲人这样不得其所的资产阶级（*displaced bourgeoisie*），还是三合会、*Yardies* 和黑手党这样以社区为基础的地下经济，很显然，传统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共同的文化理解使种族成为社会资本的一个取之不竭的源泉。

有趣的是，洛里（*Loury*）1974年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研究组中引用过的例子之一就是种族。洛里是琼·雅各布斯（*Jane Jacobs*）于1961年首先使用“社会资本”这一术语之后使用这一术语的第二人。他的研究主题是这样一个事实：美国黑人在收入上的差距只能部分地反映他们的个人技能和生产能力。他的解释是，不断累积的歧视已经导致市场失灵，社会背景成了首要的指示器：“个人的社会出身对最终能够投资于其发展的资源的数量有着明显而重要的影响。因此，有必要使用‘社会资本’这个概念来描述社会地位有利于正常人力资本属性的获得这一后果。……这一观念有利于迫使分析家去考虑个体的收入在多大程度上应从个体无法控制的外部社会力量中得到解释”（洛里，1977：176）。

洛里的观点涉及分群（*grouping*）现象，即“人们倾向于按照种族界限在社会交往方面把自己分成若干群体”（洛里，1977：159）。结果，黑人父母的后代的生活机会受到了不利影响。一方面，亲戚和种族网络为这些作为受害者的孩子所提供的社会关

系，其收益要低于特权阶层的孩子。另一方面，由于在地理上处于少数民族聚居区，那些潜在的精英不得不进入贫民区的学校接受教育，甚至那些较为成功的当地人士也不得不将他们的后代遣送到这些学校。过去的歧视决定了现在的前途。技能和地位上的赤字是投资不足的必然结果。让不同种族毗邻混居，用公共汽车将孩子们运到不分种族的学校去上学，在大学中给予不同种族一定的配额，在工作中采取亲和行动，都是政府对社会资本所应该及时采取的以前从来没有采取过的行动。

③地 区

与种族共同体一样，在地理共同体中，参与是持续不断的，监控也是面对面的：“共同体是由那些彼此了解并具有某种道德要求的人们构成的一张社会之网。共同体利用人与人之间的连带关系去敦促成员们遵守共同的规则……共同体对那些违反共同道德规范的人进行温和的处罚，并对那些遵守共同道德规范的人表示嘉许。只有当所有这些措施都失败之后，他们才会求助于国家（法庭、警察）”（Etzioni, 1995: ix）。邻里关系可能是扼杀性的、限制性的和审判性的，它对少数派是一个威胁（在这里，学校里的祷告是强制性的），对爱管闲事的人则是一张通行证（在这里，道德劝诫将奇装异服铲除）。邻里关系也可以是支持性的、具有社会化功能的和象征性的，它是信任的来源（在这里，互惠和声誉已经经过时间的可靠考验），也是依赖性的方便之门（在这里，看孩子经常是志愿性的，肆意抢劫因此而不经常发生）。地区网络的拥护者们的信念是：道德上的无政府状态是比专横跋扈的压制更直接的威胁。在这里，那些对放纵的贪婪顶礼膜拜的人们可能不得不再一次让步于强调道德教育的迪尔凯姆。

地区共同体就是布迪厄的“……”，亦即布迪厄的社会化原子“……”（布迪厄，1980：2）。地区共同体在结构上具有稳定性，它使以逐利为能事的现时代在长期的适应过程中不过是飞逝

的一瞬。多尔上 (Dore) 总结说, 分期报答 (multi-period pay-offs) 并不是绝对义务和已经内化的责任的代名词: “善行就是义务。句号” (多尔, 1983: 470)。不过, 它们是一个有益的补充, 就像传统的日本村落中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的互助保险、风险分担、长期互惠所显示的那样: “也许, 这是一种直到最近才自然而然地光临一个紧密团结的小村落共同体——它到最近基本上仍生活在位于一片饱受地震和台风破坏的土地上——的算计方式。在传统上, 你会甩开膀子, 去帮助你的邻居重建遭了火灾的房屋, 哪怕直到两代或者三代以后你的房屋才有可能遭火灾, 你的孙子辈才需要他们的报答” (多尔, 1983: 470)。多尔写道: “你应当相信, 对他人的帮助是会得到报答的” (多尔, 1983: 470)。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迪尔凯姆意义上的一般化的本分 (generalized dutifulness)。次要原因则在于, 经济学意义上的村民的新古典估计: 在一个缺少社会流动的地区——用柏克的话说, 就是为“公众友爱”和“不讲究推理的习惯”提供的“客栈和休息室” (柏克: 1790: 315) ——与人为善确实是最有利的政策。

地方共同体强加给其成员一定的限制并分派给某些责任。这样做时, 它的根据是一个成员的权利同时是对另一成员的要求这种事情所发生的频率。一个火车司机拒绝酒精检验的权利, 就是要求他的乘客接受安全上的高风险。一个没有任何保护的伞兵参加危险体育运动的权利, 就是要求旁观者目睹一场伤亡事故, 就是要求保险公司为其健康支付大笔保险金。地区共同体, 为了在一个成员的自由与其他成员所遭受的外部性之间保持平衡, 显然需要对所有成员进行集体主义教育。甲鲁莽地不系安全带会威胁到乙的孩子的生命。丙忘记了为邻居丁看门, 一旦丁的鹿匹被人偷猎, 丙就要遭受牢狱之灾。一个地区会举办戏剧协会、排球俱乐部、校园跑步、狩猎集会、圣诞抽彩等活动。通过这种方式, 它教育它的成员们: 自己的每一天都应与自己的伙伴分享, 每个

人都是其他人的一部分。

政治上放权可能有利于促进部落的自我意识。不那么直观的是，政治上放权还会提高信息技术的水平，从而使有利于远程通讯的发展，进而使坐在家上班成为可能（这是迈向一个必然融入全球经济的非集权社会的一个步骤）。补贴和关税可以用来防止外来竞争摧毁那些久经风霜的社区内部的互助体系。给萧条地区提供工作岗位比让劳动力在地理上重新分布会更节约稀缺的社会资本。按照使共同体保持长期稳定的方式来缔结公众契约（**public contracts**）比把他们重新安置于新的城镇和高楼大厦之中，使之成为不知名的、彼此孤立的人，更有利于国家财富的增长。显然，科学和政策非常有利于保护地方共同体免受割据性（**fragmenting**）个体主义的侵害。而从长期来看，后者会妨碍增进参与度和亲密度的效率。

④商业网络

总是有那么一种诱惑，引诱着学者们按照这样一个模式，即一个与环境无涉的行动单位洽谈一次性交易，去建立商业生活的模型。一个个体买了一个苹果，然后消失了。一个企业一次只卖一个橘子。当然，不借助任何中介的交易确实存在着：想想那些通过火车窗户与旅客交易的小贩，那些不会再次碰头的卖冰淇淋的人就是。但是，更经常的情况是，总是有某种过去和将来将这种交易关系框定于一个历史的情境之中，这样，他人就成了我店铺的四壁。这一部分将讨论将交易限制于特定时空之中的三种商业网络。

在交易中人们总是有固定的伙伴。甲据说总是能够按质按量完成工作。乙据信不会利用消费者的无知损人利己，或者为了得到某种好处而逢场作戏地说假话。在诸如此类的情形中，作为一方对另一方持续工作绩效表示满意的反应，两方的交易就可望重复进行下去。

毫无疑问，以价格为信号的竞争会受到自满情绪的破坏。如果每个厂商凭着自己的商业信誉和习惯，都想成为价格制定者，甚至在多个厂商并存的市场上成为垄断者，那么购买者就会面临错过其他地方的便宜货的危险。另一方面，一种商业关系如果像一场婚姻而不是一夜风月（这里采用的是罗伯特·索娄的区分），显然会更有好处。这样会节约搜寻和重新谈判的交易成本。供给（处于景气状态），需求（处于衰退状态），会更为稳定。投资规划能够以较低的风险进行。不管是关于整个产业还是关于产品本身的信息会更为可靠。相互之间信任建立起来，并有利于创造出一种无需担保的（**not-unwarranted**）信赖：“屠夫只要不利用顾客不能区分臀尖肉和前腰肉这一事实谋利，即表明他有良好的品行”（多尔，1983：475）。罗纳德·多尔相信，在一个经过专业分化从而质量问题显得很敏感的社会中，这种可信度对质量保证是必不可少的：“你总是知道屠夫收了你六十便士还是七十便士。但如果你不知道臀尖肉和前腰肉的区别，并且你相信你的客人可能也不知道，那么，你就不得不相信你的屠夫：你不得不依靠他良好的品行”（多尔，1983：477）。你不得不相信你的屠夫。既然如此，以价格为信号的竞争就成为一个获取边际收益的足够小的牺牲。

展望未来，多尔提出了频繁的变换（以抑制价格）将让位于长期关系（以培育服务标准）的假设：“霍布豪斯（Hobhouse）会说，关系性缔约（**relational contracting**）是富裕之后才会有的现象，是道德进化的产物。只有当人们都处境良好，市场摊位彼此竞价让位于这样一种景象，即最好的买卖是以质量而不是价格尺度来界定的时候，关系性缔约才会盛行起来”（多尔，1983：477）。稳定的授受关系消除了大量组织松散、动力损耗、“X效率”现象，使人们能够安心地从事计划、合作、减少亏损、强化感情等活动，从中取得的效益大大足以补偿由于你死我活的竞争

的萎缩而可能损失的配置效率。除此之外，多尔还暗示，从对抗状态（**the confrontational**）向亲和状态（**the relational**）转变本质上是对喜欢高收入弹性的社交需要的一种满足：“只有当物质上的富足减小了价格压力的时候，选择稳定的友好关系而厌弃对抗性的竞价所带来的玩扑克牌一样的压力的倾向——一种在以往被不能损失哪怕一个宝贵的便士这样一种渴望所压抑的倾向——才能显示出它的威力”（多尔，1983：477）。日本的市场比起英国的市场，对质量更敏感，而对价格较不敏感。日本人也更少对抗性和操纵性。在这两种情况中，多尔要暗示的是：日本的长期主义（**long-termism**）是长期主义可能在其他国家出现的前兆。

买方和卖方之间的长期关系可以与买方和卖方本身之间的同边（**same-side**）关系相互补充。在这里，固定网络在超越当下的、弹性的和自发的买卖行为的同时，再一次发挥了协调各种反应、巩固各种交易组合的作用。交易联盟内部涉及他人的行为也许就是竞争各方通力合作的结果。

法律合同总是有个问题：由于信息不完全而不够完备，由于未来不确定而容易受到攻击。往好里说，它需要费用去执行；往坏里说，它只是一个意向书。社会资本的优势在于，在从嵌入性中取得先赋承诺（**precommitment**）的同时，通过求助于自我执行的内生性而省却了 **exmachina** 裁决者。企业卡特尔将垄断巨头们召集到一起协调各自的价格，避免彼此杀价以至资不抵债的赔本买卖。同业公会能够传播关于各种创新和动态的情报，并通过社交聚会推动人际交往。专业实体是传统的保护者和各种标准的稳定器。工会维护各职业界别的权益，阻止企业的廉价拍卖。诸如此类的结构化网络协调着各种同边（**same-side**）反应，并且省去了诉诸法律的麻烦和代价。

国家可以快助网络巩固其地位。因此，它可以免除卡特尔制定限制竞争协议的责任；可以将新产品的准入控制权委托给专业

组织；可以通过与工会和雇主联盟协商，制定相应的收入政策以保持社会稳定。显然，国家能够使互动重复地进行下去，通过重复的互动给个体造成一种来自群体的压力，进而促使他服从。然而，比这更重要的是，即使作为私人的个体也可以在将商业利益融进社会网络方面大有作为。一个例子就是那些老关系。它使合作成为可能，并为**准契约 (sub-contracting)** 提供了经得起反复考验的可信度和可靠性基础。另一个例子是掌握把柄。

国王甲的女儿嫁给了国王乙的儿子，国王甲对国王乙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就很小。如果甲国的公民在乙国的首都被当作人体盾牌的话，甲国就不大可能对乙国实施轰炸。如果乙犯坚持不交待甲犯的持刀杀人罪，那么甲犯就不大可能揭发乙犯的持枪杀人罪。在这里，国王、国家和罪犯有一个共同之处，即他的女儿、他的公民和他犯下的持刀杀人罪正作为把柄掌握在人家手里，以防止它们背叛。奥立弗·威廉姆森坚持认为，这种交易模式在商业生活同样屡见不鲜：“不但把柄的经济等价物被广泛地用于保证承诺的兑现，而且未能正确认识把柄的经济用途，也是不断犯政策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威廉姆森，1985：168）。股本交易使掠夺性要价成了一种自杀性选择。盘根错节的董事会保证了竞争各方在决策过程中都有一席发言之地。控股公司把投入到大量独立企业中的投资统一起来。针对具体产品的投资即是对经销商所做的一个保证：任何竞争性经销商都不用怀疑质量。这样一来的后果是，产生了自律、透明、诚实和忠诚。后果是，产生了伦理和道德——但根本的原因还是利益。由于有痛处掌握在人家手里，任何一个理性的资本家都不会让一个其儿女同意婚嫁的商业王朝破产。

第三种商业网络应当到组织内部而不是其外部联系中去寻找。韦伯式的齿轮执行着运行图所下达的指令。追求自我利益的工人有他自己的事业、偏好、目标和理解。当他寻求在工作中为

自己绘制道路时，形形色色的朋友和同事网络就成为他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

网络经常是找工作途径。在以往的工作过程中滚动积累起来的关系往往会成为有关职缺、机会、升迁前途、问题督导员的一个信息来源。由于这些信息中的很大一部分在性质上是个人化的和印象主义的，因此，如果熟人在传播和进言这些信息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与其说是效果不彰，不如说是更为有效。一个老板不会对同一圈子里的同行的个人引荐（扩而大之，是书面介绍信或推荐信）无动于衷——这位同行可能在其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与他所提名的候选人一起工作过，他也许可以保证录用这位求职者是一次不错的赌博。大学里的学位说明了一个人的职业熟练程度，但它不能识别谎言、背叛和彻头彻尾的残忍。因此，老板不得不求助于“名誉资本”和同行们的判断力。

被录用以后，新录用的员工将会努力利用新的网络去扩充工作的内涵。没有哪个合同能够详尽到足以囊括每一种业务的每一个方面或者能够未卜先知一个组织及其运作在将来的发展。在某些时候，合同会求助于（这些义务可能是合理地分配的）具有正式等级制度中具有自主决定权的权威，而不是那些从来都不能完全白纸黑字写下来的交换条件。不过，就像那些备忘录和档案文书所遭遇的情形一样，对那些经理人员和监督人员而言，能够对生产力产生事实上的影响仍然是网络的特权。这一点，那些一味追求利润的人可能会危险地忽视之。狂热分子对那些能够证实其部门偏见的资料抬得很高，却抛弃或者误导那些对他们传统的有色眼镜构成挑战的数据。一个办公间的同事互通根据理性选择原则制定的组织运行图之外的秘密，其依据的逻辑却是偶然的，比如利用午餐、酒吧聚会、一起骑车回家——此即赫尔伯特·西蒙所说的“谁对谁有多频繁地说些什么的模式”（西蒙，1965：xx）——等场合。工人们利用无所不在的压力对程序进行标准

化，对历史上形成的工作说明进行保护，对工作的步调进行规范。新来的员工在咖啡厅的灯光下阅读“工作须知”。他会被一项工作的本质在如此高的程度上是一种习俗——这个习俗，他的同事比他的经理更有权力向他进行解释——这一事实所震惊。

终生雇用和论资排辈强化了凭借个人信誉的借款方式、各种习惯成自然的规则和盘根错节的小圈子。对一个组织的长期固着会强化组织内部的网络，加深其偏见的保守主义性质。影响更为深远的是，扩大了奉献精神为自我动员性（**self-motivated**）合作、对做好工作之后的个人自豪感、强烈的共同体意识以及对整个集体的认同——这一点，是一个稳定的工作单位与那些员工不断签约、走马灯似的跳槽的集体的重要区别——提供了一个发泄机会。作为一种产权的职业结构和工人对于工作保障的感觉可以减少工人的疏离感和阶级冲突。结果，国家能够有正确的经济意识去制定有利连续性（通过增加遣散和裁减员工的难度等手段）和防止短期性（通过保证产假和病假等手段）的法律。有一种奇怪的论调认为，对培养工人的勤劳品质和保证产品的质量来说，取消竞争比自由市场中获取短期利益的动机更有好处。然而，没有任何一个研究资本主义的学者敢忽视竞争的作用，原因只有一点，因为正是竞争，为资本主义内置了一个刚性的保护篱。这已经成为定论。正如罗纳德·多尔所说：“有可能正是由于，而不是摒弃了理性缔约方式，日本才获得了比我们更好的增长业绩”（多尔，1983：473）。历史至今并未宣布它对日本模式的终审判决。然而，如果多尔是对的，那么，较低的职员淘汰率和因组织稳定而产生的共同的理解将再一次证明，作为时间和空间中的一个家园，商业网络在经济上的价值。

⑤所有权纽带

资本主义一直依赖于私人财产权的存在。资本主义经常受益于社会资本的支持。一方面是私人对于利润的追求，另一方面是

社会的嵌入性。两种投资模式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直接的平衡。说得更明白一点，即对所有权的部分的集体化可能是社会资本扩充过程的一部分，如果不这样，资本主义市场能够取得的效益将达不到正常水平。

身处一个到处是无所事事的食利者、不在股票持有者、追求盈余最大化的剥削者的体制，可能会降低私有企业寻求协作、奉献和车间积极性 (**shop-floor initiative**) 等超越少干活多拿钱之类个人算计的品质的热情。托尼的心中非常明白，高涨的士气和产业的专业化翘盼着使所有时钟都走时不准的磁铁的毁灭：“从有利于建设性工作的角度出发，要得到当前很悲观甚至很敌视的职业感情的支持，首要的条件是要保证，这种职业感情一旦产生，其结果应当有利于大众，而不是那些资本、土地和其他资源的所有权占有者” (托尼, 1921: 146)。托尼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他相信，只要国家的资本仍然保留在作为一个阶级而独立存在的一小撮逐利者手中，一个真正一体化的社会在理论上就是不可能的。

国家社会主义者对竞争性贪欲可能产生的腐蚀作用的反应是，实行有目的的计划 and 让公有成分占据统治地位。这样一种资产管理方式也许会释放出保守主义的正面功能，同时消除资本主义的负面影响。与此相对照，市场社会主义者则希望保留求利行为，与此同时抑制搭便车行为——搭便车由于在工人看来是资本家为了征收私税 (**private tax**) 而打出的幌子，从而成为工人不满的焦点和分化的根源。一种选择是，让国营企业开展逐利性竞争，除工人仅仅取得一定股份作为报酬这一点而外，各个方面都资本主义化。另一种选择是，建设一种社会资本主义体制。这种体制由许多生产合作社构成，每个生产合作社都是一个名义上完全拥有自身产权的工人集体。如果所有权和劳动力的分离确实是社会一体性的严重的挑战的话，那么，市场社会主义也许能够在

无需放弃资本主义的核心的条件下解决阶级分化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市场社会主义可以看做某种同为保守资本主义的基础，而不是取而代之。当然，随着财富的日益增加（也许，通过有目标的私有化和对投资收入实行免税政策，财富的增长还会加快），上述功能可以通过股份所有权的广泛分布得到满足。同样应该记录在案的是，那些被社会主义者称作正义的抵抗的东西，在共同体中的另一种知识传统看来，也许应该称作粗俗的妄自尊大、劫富济贫和顾影自怜。

当老板不在场盯着的时候，办公室职员会龟缩在一本小说后面。售票员会到黑市上去揽生意以赚取不可告人的第二收入。社会主义者在解释造成浪费的冷漠行为时可能会说，这些现象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基于所有权的矛盾阻碍了社会资本全力以赴地为资本主义体制服务。更为中庸的评论可能会将注意力集中到权力上，而不是逐利行为上。托尼本人认为，协商和责任——绝不是认为劳动力的剩余价值被非正义地榨取那种马克思主义观念——是他所期望的未来一个本质属性：“认为人们会尽力为他们不信任的体制服务，或者会信任一个自己完全没有控制权的体制，完全是空想”（托尼，1921：149）。协商和责任可能会给予普通职员所需要的参与感，如果他放弃这样一种观念的话，即，就像加农炮之于一个冷漠的司令官一样，对他来说，也没有什么个人动机促使他放弃偷懒或对那些尚未被发现的偷盗行为敬而远之。

工人可以通过劳资联合委员会、工人代表和工会领袖参与企业决策。工人也可以让国家代表他的利益。最低工资法案、健康和安全保障法案、在职培训条例，都赋予了工人与他们的企业面对面地提出自己的要求的权利。权力分享是产生感性正义（**perceived justice**）和人际互信的原因之一。哪里出现了依赖性强的情况，哪里就会出现生产力提高这样一种副产品，它证明，社会资本的扩充具有经济价值。

福利国家对社会资本的发展也可以产生正面影响。这可以再次证明，使社会关系更为健康，更受欢迎的，正是非市场性纽带的功能。

理查德·蒂特马斯 (Richard Titmuss) 认为，像健康、教育、公用住房和收入保障之类的福利设施是民心所向的实际体现：“所有由集体提供的服务是刻意谋划的结果，其目的是迎合一定的社会认可的‘需要’；它们体现了，第一，社会愿意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生存下去的意愿；第二，所有愿意帮助别人生存下去的人的良好愿望” (蒂特马斯, 1963: 39)。有机性和一体性是这些制度的基础。这些制度也体现了一种因果关系——既是在前已存在的一体性的大力推动下产生的某种共同福利体验的原因，同时也是它的结果。蒂特马斯相信，福利政策与经济政策是不同的，原因只有一点：市场瓦解并萎缩了社会的整合系统，而对社会—政治禀赋来说，“将其与伦理方面的考虑联系在一起的是其对整合系统的关注：对那些促进个体的认同感、参与意识和共同体意识，赋予他更多的表达利他主义的选择自由——这同时能够防止个体产生异化感——的过程、交易和制度的关注” (蒂特马斯, 1970: 253)。蒂特马斯之欢迎各种服务设施，不仅是由于其张扬在外的宪章，也是由于它们隐而不显的课程。它们通过使原子化的个体对外人的存在保持敏感，从而使一般化溢出效应——即使私营部门也能从中得到好处——的产生成为可能：“施予外人的利他主义不始于或止于献血。它可以触及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并影响价值的整个构成” (蒂特马斯, 1970: 223)。既然如此，那么，那些希望他的工人可靠并且正直的资本家就应当接受建议，对那些作为民心所向之原因和结果的福利设施给予强有力的支持。

福利国家增强了共同体的道德力量，从而使共同体成为一种

不能仅用销售额来描述的东西：“我们希望看到一种不是游离于民众生活之外、对民众生活冷漠无情的，而是作为国家统一性之表达和强化的公共医疗卫生服务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蒂特马斯，1964：214）。福利国家的萎缩把那些作为伦理外部性之来源的、在边做边学过程中塑造着行为习惯的角色扮演推向了困境：“有可能某一人类活动领域中利他主义精神的衰落会伴随着其他领域中态度、动机和关系等方面的类似的变化”（蒂特马斯，1970：224）。将整个国家看做一个结构性的网络，正是蒂特马斯以及其他宏观经济学家和社会民主分子的做法。对蒂特马斯来说，社会资本与公民身份是有效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他希望通过福利国家政策使全国百姓变成真正的社会资本而不是仅仅是一种护照性法条主义（*passport legalism*）。

怀疑家会认为，希望从献血行为中产生出市场的真诚品质（*truthfulness*），从而净化利益冲突；或者希望由于在同一个国家保健计划医院中住院时邻床而居的关系，老板和工人就必然发展出真心诚意的一国同胞的情谊，完全是夸大其词。批评家会反驳说，在专业精英和政治精英提供的各种有价值的物品中，更多的是家长制，而不是利他主义；一个消极的，能够保证定期得到食物的受保护人会丧失自己寻食的习性；道德上的风险是即呼即应式牙科（*density on demand*）和作为合算的一夜情之后果的堕胎的不可避免的伴生物。反对派扬言说，真正的慈善事业必须是一种志愿选择，但税收却是强迫性的；那些富人和成功者被迫以更高的税率做出额外的牺牲，甚至在那些不能分享与劫富济贫捆绑在一起的救济的乐趣的场合也是如此；在那些没有经过经济情况调查，所有阶级都能使用学校和医院的地方，以及那些今天的富足意味着明天几乎没有任何保险可以防饥备寒的地方，福利不过是一种经济性的自私自利而已。蒂特马斯关于非商业性福利是使网络统一起来的一种有重要意义的建筑材料的观点，显然不能得

到大家的普遍接受。相反，它不无裨益地提醒我们，是各种形势塑造了关系，并进而影响到社会资本。

⑥教堂和学校

卡尔·马克思就在《物种起源》发表的那一年表示，不相信存在着什么圆融自足的观念和超凡脱俗的意识。马克思说，物质现实是原动力，而哲学家只不过是当孩子已经分娩之后才赶到现场的记者：“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了社会、政治和知识生活的一般过程。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了他们的存在，而是他们的存在决定了他们的意识”（马克思，1859：425）。加尔布雷思在冷战正酣的时候，曾经颇见功底地表示过类似两种经济体制将会趋同这样一种观点：“所发生的大多数事情都是不可避免的，毫无二致的”（加尔布雷思，1967：388）——他预测说，它们都是事物内在动力推动的直接结果：“技术和组织的强制性，而不是意识形态的想像，才是经济社会形貌的决定因素”（加尔布雷思，1967：26）。马克思和加尔布雷思都深信意识的力量：在马克思的模型中，正是阶级意识导致了无产阶级革命；在加尔布雷思的著作中，正是社会民主价值才使肯尼迪的当选而不是撒切尔的胜利越来越成为一种可能。然而，不管是马克思还是加尔布雷思都不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观念和意识能够强大到足以推翻经济力量所造成的主流发展趋势。作为结果而不是原因，对这样那样决定论者来说，宣言式的承诺只不过是一出自己没有撰写剧本的戏剧中的演员而已。

像马克思和加尔布雷思这样的决定论者可能会对本节把教堂和学校看做建构社会资本的投资主体持怀疑态度。决定论者会说，宗教和教育确实能够传播一种既存的信仰体系，但在那些外部环境不利的地方，仅靠布道和教育缺乏培植对抗性意识形态的力量。由自由资本主义的生活条件所决定从而成为一种强制力的工作伦理和延期满足（*deferred gratification*）将会生根发芽并蓬

勃成长起来。将金钱比作“万恶之源”和对追逐利润的反感就像一头呆在画室里的猪一样不合时宜。既然如此，那么，失去信徒的教堂被改为股票经纪人的公寓，知识分子不再是舆论领袖和行为的楷模，而仅仅是一个可供娱乐的小丑，也就不足为怪了。

决定论者不相信教堂和学校能够对资本主义施加具有重要意义的限制，使之成为一种保守主义的体制，即使它当时仍是一种富有活力的体制。理想主义者则对此抱有较大的希望。在证明理念也能产生某种后果的同时，他们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训教制度有利于补充和重建一个国家匮乏的规范资本存量。对此抱有更大希望的是社会互动论者。他们苦口婆心地阐明，教堂和学校是一种社会网络而不仅仅是一个听讲的场所，他们在学习经历中发现了一种本质上与布道和授课无关的建构共同体的功能。在考察教堂和学校对社会资本的贡献时，决定论者所犯的错误在于，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规则的文字上，而忽视了作为规则之支撑条件的因袭行为（**replication**）和连带关系。

宗教已经很古老了。宗教植根过去，天生保守。它们是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有记录的反应。这种反应对当前那些贪婪地投资于自我利益的个体主义者来说是陌生的。印度教徒痛批物质主义，所以苦修自己的肉体。佛教徒沉湎于冥想，并依靠他那只化缘钵讨生活。基督徒从造物主的平等爱中引申出众生平等，并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贯彻终极所有者神示意图的好职员。消极论、宿命论、内敛、服务——以责任取代富足，以自我发展取代自我放纵可以提高社会精神的道德品位，但从表面看起来，它对那种逐利性体制越来越快的扩张无能为力。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追求财富最大化成为一种近乎宗教的强制性力量：“积累，积累！这就是摩西和预言书！”（马克思，1867：595）。由于“为积累而积累”成为新的圣经，因此，它意味着，“摩西和预言书”就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

着一样，逐渐变成了一堆残障者、被抛弃者和被淘汰者们的档案。然而，即使是马克思主义者也承认，宗教仍然扮演着支撑资本主义体制和衡量其精神贫乏程度的剩余角色。一方面，它具有社会控制功能，是减轻痛苦的止痛剂和安慰剂：“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1844a：43~44）。另一方面，惟心主义的虔诚与造成阶级异化的经济体制的精神贫困之间存在着可以感觉到的不可调和的死结（*memento mori*）：“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要求抛弃关于自己处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想的处境”（马克思，1844a：43，44）。尽管马克思是一位无神论者，但他仍然看到了宗教的保护作用（作为镇静剂安慰待价而沽的自我）和自我超越功能（就像它所宣传的那样：造物主会仁慈地普渡众生，天堂是一个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共同体）。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宗教既是一种心智上的支持又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教条。显然，通过这两个方面的阐述，他们要表达这样一种信念，即在那种同样保守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摩西和预言书”仍然具有实际上的重要性。

宗教教义可能会妨碍资本主义的扩张。耶稣关于禁止高利贷的训诫就是一例：“如果你仅仅是为了还才借，那么对你的名誉意味着什么？……像你父亲对你一样仁慈”（路加，6：35，36）。另一个例子是耶稣关于利益冲突的论述：“你不能为上帝服务，同时又为钱服务”（路加：13）。诸如这样的段落似乎是在暗示，资本主义“与其说是非基督主义的，不如说是反基督主义的”（托尼，1937：170），资本主义会由于读经会和祈祷会的阻碍而寸步难行。然而，事实上，宗教训诫远没有阻碍资本主义的扩张，反而是加速了它。马克斯·韦伯关于商业上的成功与加尔文基督教义之间的相关性的论述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明。这个证

明是无意识的，但是是非常贴切的。加尔文主义是一种强调经验主义（在上帝分配的工作中发现上帝的旨意）、理性（有效地节约上帝分配给你的禀赋）、勤奋（通过履行此世的天职以服务于上帝的意图）、节俭（摒弃消费主义的自我放纵，拒绝在泪雨滂沱中苦修）、个体主义（摒弃同事和兄弟情谊，认为邻居可能是注定要遭天谴的罪人，他们是真正的危险）的理论体系。韦伯并未说加尔文主义创造了资本主义。他确实说过的是，加尔文主义的气质与资本主义的气质是一致的——并且现实的结果强有力地支持了这一假设性关联：“商业领袖和资本所有者……占压倒多数的是新教徒”（韦伯，1904～5：35）。如果韦伯是正确的，那么，结论必然是：通过海盜行径获取经济利益向通过簿记方式获取经济利益的过渡，由于日内瓦宗教改革运动新创的知识体系而变得非常平稳。

宗教能够传授一种知识体系。他们同样能够对规范起到维护作用。宗教通过传播功能而发挥的强化作用，得到了托尼的证实。他说，神圣物可以通过外在的纪律来约束信徒的行为，而无需等到个体的良心发现：“加尔文……使日内瓦变成了一座玻璃之城，在那里，每家每户都生活在精神警察的监督之下”（托尼，1926：125）。人应该远离夸饰和奢华，应该奉行勤劳和节俭，这是上帝的旨意。共同体的义务就是要保证那些堕落的敬畏上帝者能够坚持沿着好牧人指引的道路走下去。这样，教徒对某一宗教的归属地位对伦理道德起到了强化作用，并限制教徒因受某种诱惑而选择一些过失行为。

宗教可以是单一性的，一座垄断性的教堂独自承担起宣传某种单一观点的重任。宗教也可以是多样性的，就像教派之间形成的一个十足的市场，每个教派都与其他教派竞争信徒，任何一个教派都没有大到足以将国家分裂为一个北爱尔兰、一个印度和一个巴勒斯坦。大卫·休谟赞成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宗教权力机构，

亚当·斯密认为还是保留多个教派比较保险。洛伦丝·安勒克恩(Larurence Iannacone), 折衷这两种观点, 毋需说, 其观点是, 大量的事实强有力地支持这样一种主张, 即保留多样化的发泄渠道和保证看不见的手的自动性: “将典型教派的综合行为准则与其成员高水平的忠诚和参与结合起来; 辅之以广泛的监督和制裁, 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 直到取得约束机会主义行为和传授价值给孩子的非常有效的手段” (安勒克恩, 1997: 109)。教派可能比教会权力机构更有效能, 但其功能与家庭是相似的: “它们帮助那些陷于财政困顿和疾病的人。它们的社会网络帮助成员建立合资商业企业, 建立长期友好关系和寻找合适的婚姻对象……他们还提供有关个人可靠性和可信任程度的信息” (安勒克恩, 1997: 109)。封闭的教派或完全地方性的教区以及以信仰为基础的共同体能够使传统标准长期保持下去, 并充实对利己主义的最大化动机起着抑制作用的嵌入性。

宗教组织是具有教化和控制功能的文化性组织。教育制度也是如此。它们同样能够传播某种受习惯制约的价值体系——并且是在一个亚群体、一个网络和一个面对面聚会的框架之内发挥这种作用。

在智力层面上, 学校通常享有对正态和偏态做出权威区分的社会特权。学校通常为自力更生、各负其责、精英主义成就制和按果取酬制、延期满足和高瞻远瞩、尊重等级和控制的合法性等价值背书。在上述方面, 对文凭主义的投资可以说就是对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投资, 而不仅仅是对生产技能(人力资本)本身的投资。进步的教育就是关注自我发展的教育, 就是歌颂出身的不可流动性的教育, 就是谴责精英循环, 对一个充满活力的、依靠特殊主义态度以保证其效益的经济来说, 可能谈不上起什么作用的教育。这里可能要加上那些通过社会化已经获得某种态度资本的人, 他们最热衷投资于那些能够使他们在职业阶梯更上层楼的证

书和资格。这种优先权秩序就是为什么具有资产阶级背景的人在那些野心勃勃的、贪婪的和物质至上的人们一心追求的正式教育和高级职位中经常多得不成比例的原因之一。

学校反复灌输各种态度。它们也提供各种结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对观念具有强化作用，它是正式教育反复灌输“我们”的合法性，以限制“我”与过去决裂的自由这一复合产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一个层面上说，在生活中积累起来的友谊和关系，比如由于校友关系，然后又由于玩友关系而结合在一起的老朋友，提供了一种来自小群体的激励，促使人们好好保养自己在球场上和钓场上获得的忠诚和可靠等有利可图的名声。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学校教育这样一种共同体验本身也具有这种功能。迪尔凯姆强调，相互沟通的接受过程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种条件反射：“如果认识到社会生活很重要，离开它什么都干不了，一个人就一定会发展出共同行动和思考的习惯”（迪尔凯姆，1925：233）。迪尔凯姆指望学校教给年轻人如何作为群体的一分子去生活和呼吸。

因此，学校应该严格对待抽象数学那种把整体化约为部分之和的机械论逻辑的作用。为了防止个体离群索居和社会失范，学校亦应将卢梭的先天爱弥尔和自由主义者鼓吹惟我独尊的免于的自由（freedom from）看做次要的和有问题的东西：“鼓吹不受限制的自由的好处的理论，是对一个弊病丛生的国家的辩解”（迪尔凯姆，1925：54）。在替换下那些为因子分解（the factored-down）唱赞歌的课程表之后，学校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在像历史和生物学等证明群落的维久性和集体的统一性的课程上。团体活动能够将个人兴趣引向通力合作。对一部小说和一首诗的班级讨论既有利于培养移情式理解，也有利于培养共同的冲动。有利于整体而不是部分的惩罚和奖励提醒那些哪怕是精英分子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在为别人工作，别人也都在为他工作”（迪

尔凯姆，1925：246)。可以将以往流传下来的论文开办一个展览。可以把校友请回来参加一年一度的会餐仪式。迪尔凯姆相信，通过这些方式，学校能够培养孩子对欲望保持克制、依恋群体的习惯：“如果人是一种道德的存在，他一定会致力他之外的某种东西；他一定会感到与社会是一个整体，尽管这样做可能会降低自己的位置”（迪尔凯姆，1925：79）。

迪尔凯姆的观点可以推而广之。伙伴群体的监督可以使孩子们更愿意帮助他人。跨文化教育能够提高人们对其他表达方式和自我呈现方式的敏感程度。角色扮演和角色转换可以通过对一个黑人如果变成一个棕色人或一个男人如果变成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的亲身体验，而使网络变得更加充实。非竞争性评价可以打破由嫉妒、焦虑和对失败的恐惧等情绪自发混合而形成的壁垒。建设性模仿可以通过放映“特蕾莎修女的一生”而不是“守望水库的狗”（reservoir dogs）得到培养。组织学校乐团和社会服务社团有利于学生感受集体生活娱乐的一面。

同样不应该忘记的是，政府也有机会通过教育参与到网络建设中来。国家可以为无差别教育立法，以防止阶级分化。国家可以坚持开一些公共课程以保证形成共同的文化。学校可以通过为社会底层阶级学生提供新的住房的方式，使学校这块集水地能够横跨更多的社会阶层。当然，也有人指责学校搞意识形态宣传、压制不同意见、对学生洗脑。要承认，对社会工程师来说，他永远不会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制造出看不见的手所制造的那种状态，上述指控并非完全是捕风捉影。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教育是一个涉及社会资本的充实的问题。一个希望扩大其社会资本存量的民族拥有要求政府为这一斗争做出贡献的民主权利。既如此，那么，问题的实质就在于干预的原则不是干预的主体。只要惟民意马首之瞻，国家干预并不一定意味着国家将凌驾于社会之上，而不是对社会资本的加强。

9.3 非社会资本

上一章，“道德约束”，考察的是态度资本的心智建构。它表明，利他主义的强制性和其他道德冲动具有经济收益。而本章，“资本作为结构”，已经将注意力转移到嵌入性绝对权威（**embedded absolutes**）赖以获取支持的人际基础。它表明，关系丛有利于发展和加强一定范围内人与人相互联结的规则，这些规则进而有利于经济增长率的提高。上一章讨论的是适应和自制。这一章则讨论整合和团结。两章讨论的都是有利于国民财富增长的方面。既然如此，那些赞同道德限制、社会约束以及经济富裕的读者此刻如果面带微笑，大舒一口长气，也是可以原谅的。

然而，事实并非一开一关那么简单，因此，此时采取乐观主义态度还为时过早。道德哲学可以较为自信地建立在其普遍性和一般性所具有的力量之上。但是，市场经济永远是其相对物（**relatives**）、相关物（**contingencies**）和流沙物（**shifting sands**）的产物。这实际上意味着，一个不怀偏见的观察者，如果抱着实证主义的和务实的态度，不管是关于原则还是关于网络，都不可能取得一个惟一的、颠扑不破的永恒真理。不同的情况意味着不同的结论。那些在古希腊能够提高经济生产力的东西在现代罗马可能会降低经济生产力。

历史已经在旷野中设下了路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市场永远是一位充满疑问的商人。保守资本主义，一种混合性的精神气质，综合了父本的确定性和母本的不可知论。对于喜欢不断回溯历史的未来来说，惟一能够预测的是，其伦理和结构同时具有阻碍致富和促进致富两个方面。本章的任务就是使用“非社会资本”——对研究保守资本主义的理论家来说，说非社会资本，而不是社会资本，才是正确的——这个术语，来考察以上三个

方面。

第一个命题是，保守主义的内容并不总是有利于资本主义潜力的全面发挥。想一想那些和尚，恪守浆果根茎、青灯黄卷的养生之法，在冥想中而不是在追求财富最大化的享乐主义中追求生命的愉悦：“劳动是一种将和尚的注意力从冥想的拯救价值中转移出来的东西”（韦伯，1948：332）。想一想那些神秘主义者，他们像加尔派教徒一样禁欲苦修，通过这种方式将自我弃绝（**self-abnegation**）引导到从现世超升而不是受现世羁绊的境界上去：“他要通过弃绝现实世界，弃绝现实世界中自己的行动来证明自己……众生必须肃静以便聆听上帝的指示”（韦伯，1948：326）。想一想中国封建王朝那些身著长袍马褂的官僚们，学者派头十足，知识渊博，处世圆滑，倾向于让和谐的安排凌驾于经济控制之上，并抵制私人利益的最大化所带来的社会距离：“他们对市场上自由交换这样一种纯粹经济的方式必然导致的过大的社会差别特有的厌恶”（韦伯，1948：441）。想一想那些印度教徒，对符号特别敏感，沉醉于内心的沉静，毫不怀疑地接受种姓壁垒，从而妨碍了职业流动所应有的适应力，以及那些拥有不同教派教徒的工厂中劳动力的集中：“一种任何职业的变动、任何劳动技能的变动都会导致仪式破坏的仪规，从其内部当然不可能产生经济和技术革命，在它的阴影之下，甚至不利于资本主义的萌芽”（韦伯，1948：413）。马克斯·韦伯的这四个例子证明，喜欢回溯历史的（**backward-looking**）并不总是资本主义的。在上述四个案例中，那些将宗教共同体部落化的价值和贵族，对那些与追求商品、赢利和革新明显相左的世界观提供了全力支持。

就像特定类型的宗教一样，特定类型的社会主义也是如此。因此，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几乎完全不赞成契约法和劳资分化：异化、剥削、虚假意识、仅够维持生存的工资，这些都是私人所有制和追求利润的必然结果；最小国家也被他们看做资产阶级的道

具，它一心想着积累，对正义则漠不关心。另一方面，那些计划经济主义者则会按照某种社会思潮在某种网络的支撑下进行商品交换。在这种交换网络中，科学高于 **tatonnement**，关税高得出乎想像，指令高于竞争，收入政策高于供求关系：由于受到那些自认为对未来趋势了然于胸的专家和官僚的迷惑，和那些重叠的和造成浪费的不协调的投机者的逼迫，聪明的领导人会将商业性管理 (**management**) 逐渐变成行政管理 (**administration**)，并把对可预测性的投资视为一种反资本主义的保守主义——这种保守主义表现在回避风险、法团主义、膝跳反射式的整顿、失业保护和追求平静生活的最大化。最后，社会杠杆会对任何致力于这样一种平等自由的努力持强烈的保留态度，即它虽然缩小了相对性并对战利品进行重新分配，但它并不意味着经济指挥权的平等：正像准备使那些最好的东西普遍化一样，那些平均主义者准备把那些成功者与失败者扯平，所以他们希望对遗产（因此而削弱了那些名门望族所具有的代际保守主义）、高于平均水平的收入（丝毫不顾及这种近乎没收的行为和嫉妒政治对市场成功的阻碍作用）和学术专长收税（也不管智商和基因的不够发达会不会构成二流学术提高自尊和自信的必然障碍）。在那些所有权和利润、竞争和搜寻、激励和成就对资本主义的未来来说是功能上的必要条件的地方，那些挑战资本主义体制逻辑的社会主义类型与资本主义潜力的全面发挥是不可调和的。

伊斯兰教苦行僧的迷梦和空想共产主义者的集体主义并未带来资本主义体制所能带来的最好的东西。让人吃惊的是，这一点对纯粹的免于的自由 (**freedom from**) 来说也是同样适用的。市场自由是一个个人自治、经济核算、志愿行动、不可让渡的权利、个人选择、理性评估、消费主权、精英主义薪酬制 (**meritocratic remuneration**) 的世界。它是一个多元主义、多样性、隐私性、流动性、转换性、功利性的世界，一个轴心原则为免受强

制而非加强整体的世界。市场自由是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过去的传统赋予当前的合同以合法性——但将会永恒的价值和结构是绝对私人性的，蓄意非社群化的（**non-communitarian**）。市场本质上是一个保守主义的构造物，是一种遗传下来的习俗，而不是一个需要从头开始的创造物。市场本身是保守主义的。不过，如果它要对资本主义经济做出最大贡献，它还需要加深自己的保守主义背景。在严词批评背景薄弱的免于的自由（**thin-context freedom from**）强调解放而忽视文化补充的众多批评家中，约翰·格雷是惟一亲资本主义的人。

格雷关注的是人们对下层社会的忽视和对未来的冷漠。他深信人的福祉依赖于共同体而不仅仅是个人的乐趣，认为那种单维度（**one-dimensional**）的自由意志主义太脆弱了，根本不能支撑现实中的自由企业，他写道：“尽管人们需要一个独立行动的领域，包括一个自由的领域，如果他们继续成长，他们内心的需要还是一个家，一个由共同实践和世代相沿的传统构成的网络。这个网络给予他们一种稳定的身份所有具有的幸福。真的，如果离开一个共同文化框架的坚定的支持，那些被自由主义珍爱有加的个人自由就没有任何价值，也不会长久”（格雷，1993：125）。格雷不是一个斯大林式计划经济的崇拜者，也不是一个随意自主的提倡者。他相信，资本主义，如果保持稳定，它就必须是保守主义的。它所需要的保守主义一定会比立足于当下的狭隘的个体主义的消极经历更为深厚。

第一个命题涉及的是一些不合时宜的内容。第二个命题关注的是那些过分的约束。第三个命题要说的是，一旦道德和网络的回报不断下降，那么社会资本就有可能蜕变为非社会资本。

因此，利他主义本质上是一柄双刃剑。人们献血帮助不知名的陌生人，捐款为社会脆弱群体买食品。诸如此类的捐赠对资本主义市场是一个补充。但另外一些捐献对资本主义毋宁说是一种

威胁。父母的津贴，就像国家的补贴一样，会导致熟练劳动力的生产过剩。失业补偿金使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去徒劳地寻找一份符合其参考工资但随着去技能化（**deskilling**）和自由化而趋于消失的工作。多愁善感的依恋、动情和守旧情绪，可能会推迟一个低效率供给者的现代化过程。为准备过冬节（**potlatch**）而强迫性地囤积物品，可能会使制造业陷于困境。为了多留些遗产而过分俭省可能会导致未来的遗产受赠人整个儿退出生产性工作。这些例子非常清楚地表明，保守主义也可能削弱资本主义，而不是一定加强它。

微观一宏观二重性是义务和效益之间保持平衡的共同原因。在那些存在着志愿工资限制的地方，那些最赤裸裸地服务于其捐助人的组织，就是那些导致通货膨胀公害，哪怕这样做会付出砍掉养老金、增税、低速增长——这会导致名义上得到执行的私人合同这样一种副产物——等等代价的组织。在那些存在着社团慈善事业传统的地方，那些最不能有效地承担自己对股东的责任的管理者，就是那些未经上司的同意即出资助艺术或者从本拟用于设备改造或再投资的利润中抽出钱来给予那些最穷的等级以超竞争报酬（**supra-competitive**）的管理者。在那些存在着“与小偷为伍光荣”这样一种习惯的地方，那些处于贸易管制中的合作社社员非常忠于他们的同谋者，尽管存在着以下不足，即他们对价格的操纵会导致市场的自动性。在这些案例中，就伦理而论，在微观义务层面上的包含（**within**）和宏观义务层面上的排除（**without**）之间存在着表面冲突。就经济而论，也存在着对效益的威胁，哈耶克把这种威胁归罪于非功能性保守主义的根本原则：“我相信，对高贵的原始人的生活的返祖性渴望是集体主义传统的根源”（哈耶克，1988：19）

哈耶克写道，在部落军队中，正是互相帮助而不是私有财产保证了同志们能够存活下来：“一个离群的人马上会变成一个死

人。因此，托马斯·霍布斯所描述的原始个体主义是一个神话。原始人不是孤独存在的”（哈耶克，1988：12）。他继续写道，在扩展秩序中，正是另外一个字眼——“‘社会的’——实际上应该叫做‘反社会的’”（哈耶克，1988：118）才是进步的前提条件：“不仅所有的进化都依赖于竞争，而且继续开展的竞争也必须保存既有的成果”（哈耶克，1988：26）。哈耶克并不是说自我牺牲本身会因此而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他要说的是，如果自我克制过了头，必然会阻碍发现的进程从而阻碍生活标准的提高。成本不断膨胀的社团，乐善好施的经理人员、垄断寡头之间的兄弟情谊都体现了哈耶克在社会连带主义纽带中发现的那种对效益的威胁。

过度的网络化，就像过度的义务一样，有可能造成资本主义体制的功能障碍。亲戚关系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家庭是一种过去已经存在和将来仍会继续存在的制度。它希望人们实话实说；它谆谆教导人们要相互信任；它心平气和地解决争端。然而，它也具有消极的一面。惟亲是举保证了一个商业王朝能够长存，但这也意味着可能会出现一个管理不够专业化的商业领导阶层。血缘关系的排他性对企业的规模是一个限制，它会阻碍小型企业发展成为跨国企业，甚至阻碍它们发展成为大众（public）企业。要为下一代留下遗产的陈腐观念会导致以安全为导向的投资方式，从而限制了风险资本的供给。内向（inward-looking）性家族主义会将更具有包容性的公民义务推向困境：只知道耕种自己那一亩三分地的家庭会觉得没有必要向慈善事业捐款（甚至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相互通婚的亲戚群体能够撇开国家对所有部门进行规划：甚至在那些个体公司被从法律上加以分离的地方，那些位居高层的家庭也拥有大家的忠诚。相互通婚的亲戚群体能够对掠夺性进攻具有威慑作用，其全部原因在于，它们垄断了一个控制性行业：在那些股票被视为一

一个家族集体的非交易财产的地方（比如在韩国现代之类的财团内部），即使竞争效益很差，其效率低下的管理也不一定会沦落到被外部接管的窘境。很显然，所有这些事实所表明的信息，结构化过度了。在某些情况下，背景化（**contextualization**）能够限制涉及他人的反射，并将财富追求者整合到由多个世代构成的整体之中。然而，泛滥的背景化可能导致缺乏想像力的僵化，这对资本主义体制来说，与其说是前提条件，不如说是火烧眉毛的否定。

确实，陈腐化是过剩的保守主义可能带来的最大的威胁。低劣规范的专制性在马歇尔举的蒂罗尔木雕艺人的例子中看得非常清楚——传统的束缚使他们永远只能“按照已经为他们设定好的模式复制一些粗糙的、造型不佳的复制品”：“对这种负担的追问引发出一个回答——‘父亲在世的时候就是这样教我们雕马的，所以我们不能尝试任何新东西。’因此马脖子全都弯曲成同一条不可能的、丑陋的曲线”（马歇尔，1919：808）。这样一种橡皮图章式的维持现状的做法与市场资本主义独特的和革命性品格所具有的敢于尝试、敢为天下先和精益求精的精神气质是不相符的。不过，这只是非社会资本的一种形式。它在马歇尔本人所说的传统主义中或在任何为自己的跨时性身份（**inter-temporal identity**）而自豪的稳定的资本主义中尚未发现。作为长期服务之报酬的职务晋升把企业预先托付给在适应过程中才能逐渐习得的技能水平。条件反射式的任人惟亲的做法将浪费性的惯性筑进搜寻过程。缺乏挑战性的例行公事培养起组织内部的小圈子，窒息创新观念的自由流动。对家族代理人企业的忠诚使运用罢工和离职来产生市场出清工资的可能性降低。正是由于能够识别的态度和结构有可能与资本主义不相适应，所以，很显然，即使是社会资本，一旦收益不断降低，也可能变成有害的非社会资本。

第三个命题涉及那些由于代价太高而沦为非社会资本的资

本。从最严格的资本主义标准来看，这里所说的这种资产的存量仍然缺乏，但这既不是由于它本身不合时宜也不是由于它在数量上供过于求，而是由于它比那些商业性选择的代价更高——前者只是由于次于后者而被放弃。

信任使协议能够自我执行。履约保证书、婚前约定、法庭、出庭律师、诉讼和赔偿实现了几乎可以相互替代的功能。诚实是对犯罪的一种矫正。门锁、保安、看家狗、电脑化的数据银行（提高了侦查的可能性）以及严刑重罚也对犯罪是一种矫正。道德自律能够提高资本主义的价值。但经济学本身也可以买卖自己的保护性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道德在取而代之市场矫正器之后，对矫正市场的失灵也不是那么管用。毫无疑问，对它来说，这样做是经济的——这仅限于在那些成本—收益证明它是一笔更好的买卖的地方。在那些会计抱怨道德不合算的地方，那里，当然它就必须加强财政意识，仅仅把资本主义本身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只能把保守主义理解为一种情感性反应。

处在某种结构中就像处在某种精神状态中一样，两者之间存在着并不一定那么显而易见的相似性。网络对规则进行监督（但文化性纪律可能意味着有组织的懒散和一种非常不经济的缓慢的工作节奏）。市场出售监督（但这种平稳力量需要额外的代价，而领工资的执行者们可能会沦为规则之牢的牺牲品）。网络监督人们说实话（但它这样做时可能参照的是已经过时的大纲和那些顽固不化的偏见）。市场监督人们说实话（但这第二种意见涉及代价，而实验室检验则需要时间）。换句话说，网络是通过人际压力来对付不确定性——而市场是通过资源供求来满足同样的要求。无知，无论在何处，都是有效节约的基本障碍：“机会主义在无限理性（**unbounded rationality**）面前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威廉姆森，1985：66）。也就是说，没有必要觉得结构比市场买卖能够更经济地实现收益。交易成本总是特殊的而不是普遍的。

既然如此，那么经济学家就应该根据本身的绩效去认真对待每一个事件。

科斯和西蒙关于组织与谈判之相对关系的论述就是一个榜样。科斯对内部生产比根据不断变动的市场价格连续购进 (**buying-in**) 更有利可图的那一个精确的点的位罝，事先持完全开放的态度：“一个企业必然会扩张，直到在企业内部组织一个交易的成本与通过在开放市场上进行交易实施同一个交易的成本，或在另一个企业中实施同一个交易的成本相等” (科斯，1937: 44)。西蒙也根据他对个体接收、储存、处理和追溯信息的能力本身会在什么地方搁浅的中立的观点，对官僚制、等级制和内部化采取了视具体情况而定的态度：“只是由于个体在知识、预见、技能和时间方面是有限的，所以在实现人类目标方面，组织才成为一种有用的工具” (西蒙，1957: 199)。就像组织一样，精神气质和网络对经济进步具有很大的作用——但与此同时，它也常常会阻碍经济进步。实用主义才是基本原则。相对价格决定一切。

经济制度，威廉姆森写道，“主要目的和后果在于节约交易成本” (威廉姆森，1985: 1)。节约交易成本才是关键。只要人的成本高于商业的成本，在这一点上社会资本就会转变为非社会资本，惟一的原因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它已经丧失了他的竞争优势。这并不是说，一些伦理和结构不值得继续购买，而只是说，保守主义有可能成为一种超过成功资本主义的支付能力的奢侈品，因此之故，市场而不是嵌入性才值得人们给予最大的信任。

十、结 论

本书的主题是保守资本主义。它力图展示，历史是深深地留存于现时之中的，即使在那些历史上最面向未来的经济体制中也是如此。第2章和3章主要讨论的是推断（*extrapolation*）和期望，第8章和9章主要讨论的是习得的精神气质和习惯性网络。第4章要证明，经济是锚定于社会之中的，第5章要证明，社会是受习俗支配的，第6章则要说明的是，社会和习俗都是随时间而逐渐演化的。第7章指出，方法论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可以作为一种分析工具，但各种选择和转折仍然是文化、社会化和累积性因果关系等的免费礼物。保守资本主义是一种强调社会性的经济。那些依然认为对洒脱的自治来说，只有自杀或发疯才是惟一不受限制的选择的读者，应该好好看一看有关的指数，看看统计意义上的概率是不是已经把它放进了风险目录。

经济学就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研究：“经济学是对在西方国家越来越流行，并扩张到越来越多的行为领域中的、人类特定组织形式的需要—满足活动——它就叫作自由企业或竞争体制——的研究”（奈特，1921：9）。本书所要证明的是，正是基于经济学主题的本质，经济学才不得不也是一种关于保守主义的研究。经济学中的多数技术主流倾向于从模仿经典力学无摩擦力真空的假

设性前提中推出简单化的命题。在此过程中，“物理学家”撇开了“社会学家”，它必然把资本主义之保守主义的一面赶到脚注上去，如果不是赶到政治学、心理学、经济史学、法学和社会学等相关学科中去的话。正如富兰克·奈特所说的：“计量经济学家通常首先是数学家然后才是经济学家，他们总是对数据做过于简单化的解释，并低估他们的假设与生活事实之间的差距”（奈特，1921：49）。这种差距对理解资本主义体制毫无助益。因此，本书一再强调的观点是，经济必须作为是其所是（**as it is**）来研究，而不是将其模型化到一个似其所是（**as it would be if**）的真空之中。

本书力图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由于保守主义压力而变得色彩斑斓。本书并不寻求对共同遗产这笔民族财富的意义做出判断。一方面，保守主义能够培养可预见性和可靠性。另一方面，它也是造成故步自封和因循守旧的原因之一。如果知识是完备的，除非万不得已，人们不会需要历史作为指示器。如果交易是完备的，那么合同和监督作为一个付费的选择，就可以取代长辈们在一个世纪以前阐述的原则。然而，我们仍然不得不从这里开始。由于不能获得全面的信息和知晓万花筒般的市场结果，我们能够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保持开放的胸襟，严格逐件事地（**case by case**）进行。

保守主义可能是对资本主义的一个补充，也可能不是。鉴于它在取向上与资本主义存在差别，因此其作用的不确定性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市场的效率取决于自我中心主义的攫取性和争强好胜的占有欲——而保守主义整体的稳定性取决于社会的和睦和集体的团结。一个最大化利润和功利，另一个最大化接纳和秩序，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不断赢利这一资本主义的目标，同时是对追求愉悦这一保守主义目标的威胁。敌意对和谐是一种威胁。自我的膨胀对角色扮演是一种威胁。多样性对确

定性 (**establishment**) 是一种威胁。确定性对多样性是一种威胁。在所有这些方面，可以说，这两种取向的差别是如此之大，以致这两种气质混合所可能产生的经济后果几乎是不可能预测的。

资本主义也许会逐渐消解保守主义——想一想那些竞争策略中包括谋害对手的职员和商人。保守主义可能会阻碍资本主义——想一想那些无可指摘的忠诚，它们抛售积存在手中的股票，就像是一个人背叛了一桩多年的婚姻一样。保守主义也许会加强资本主义——想一想自律性的诚实和对反复无常构成限制的凯恩斯式道德价值给社会带来的好处。资本主义也许可以强化保守主义——想一想那些福利国家，其成本超过了快速的经济增长。鉴于取向上的差异，假设好的保守主义一定导致好的资本主义，显然是不科学的。不过，这一点必须铭记在心：一个具有混合目标函数的国家仍然会追求感官性福利 (**felt welfare**) 的最大化，即使用物质效果来换取具有更高价值的对认同、平等和归属的投资，也在所不惜。最优化是一座大大的教堂。除非那些强迫性的经济中心主义者，没有人会认为，适者生存的法则意味着在经济上具有适应能力的人会不战而胜。教皇、达赖喇嘛和大不列颠首相仅凭牛津大街上买卖的前景就能当选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换句话说，保守主义不仅仅是一个将货物送进商店的工具。保守主义的诱惑力不仅仅是由于它使资本主义能够提高生活标准，而且是由于它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个理想的终极产品。纷繁芜杂的互动被整合到各种结构化的共同体中。这样那样的规则和习俗使一个个单子过上共同的生活。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在习惯和经验中获得了一个支点。未然的历史不会由于已然的历史的可靠的忠告就变成了一本合上的书。不管它们对于经济增长率的意义如何，这些属性显然都是积极的方面。因为正是由于这一

点，一个理性的购买者能够很有希望通过交易取得每年三分之一时间的沐浴阳光的假期和每餐饭都可以啜上一口的白兰地。这并不是说，假期和白兰地自身就不是一个正当的选择，而只是说，社会制度也可以成为一个选择。用 J.M. 克拉克的话来说：“最糟糕的不幸是否认那些代表着人们自认为最好的东西的动机。如果自利动机停止工作，那将是一个失败；如果自利动机没有机会工作，那将是一场悲剧”（克拉克，1936：26）。资本主义的保守主义还是保守资本主义，关键的问题是，独立自主的消费者有权知晓所有的选择并被允许购买最适合其个人口味的礼物（**bundle**）。

译名对照表

Agassi, j	阿加西
Akerlof, G.A.	阿克洛夫
Alchian,	阿尔钦 A. R.
Uncertainty, Evolutionay, and Economic Theory	《不确定、演化与经济理论》
Aquinas	阿奎纳斯
Aristotle	亚里斯多德
Arrow, K.J.	阿罗
Asch, S.E.	阿西
Availability	有效性
Axelrod, R.	阿克塞罗德
Ayres, C.E.	艾尔斯
Bagehot, W.	巴奇霍特
Banfield, E.C.	班菲尔德
Becker, G.S.	贝克尔
Bell, D.	贝尔
Ben-Porath, Y.	本一波拉什
Bentham, J.	边沁
Berlin, I.	柏林

Bevan, A.	贝文
Bias	偏误
Blau, P.M.	布劳
Boulding, K.E.	博尔丁
Bounded rationality	有限理性
Bourdieu P.	布迪厄
Brennan, H.G.	布伦南
Buchanan, J.M.	布坎南
Burke, E.	柏克
Business networks	商业网络
Capitalism	资本主义
Choi, Y.B.	科伊
Clark, J.M.	克拉克
Coase, R.H.	科斯
Codes of community	公约
Cognition	认知
Cognitive bias, and economic choice	认知偏见, 与经济选择
Cognitive dissonance	认知差异
Cole, G.D.H.	科尔
Coleman, J.S.	科尔曼
Collard, D.	科拉德
Commons, J.R.	康芒斯
Darwin, C.	达尔文
David, P. A .	戴维
Dawkins, R.	多金斯
Dickens, W.T.	狄更斯
Dore, R.	多尔

Downs, A.	唐斯
Durkheim, E.	迪尔凯姆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社会分工论》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Moral Education	《道德教育》
The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社会学方法原理》
Suicide	《自杀论》
Earl,	P. 厄尔
Edgeworth, F. Y.	埃奇沃思
Einhorn, H. J.	埃因霍恩
Elster, J.	艾尔斯特
Ely, R. T.	伊利
Engels, F.	恩格斯
Etzioni,	厄兹奥尼 A.
Ferguson,	弗格森 A.
Festinger, L.	费斯汀格
Frank, R. H.	弗兰克
Freud, S.	弗洛伊德
Frey, B. S.	弗雷
Friedman, M.	弗里德曼
Capitalism and Freedom	《资本主义与自由》
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	《实证经济学方法论》
The Role of Monetary Policy	《货币政策的角色》
Fukuyama, F.	福山
Galbraith, J. K.	加尔布雷斯
Gauthier, D.	加斯尔

Golden Rule, of Kant	黄金律, 康德的
Granovetter, M.	格拉诺维特
Gray, J.	格雷
Hall, R.L.	霍尔
Hargreaves Heap, S.	哈格瑞弗·赫尔普
Hayek, F.A.	哈耶克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自由的宪章》
The Fatal Conceit	《致命的自负》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个人主义与秩序》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法律、立法与自由》
Vol I: Rules and Order	卷 1, 规则与秩序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法律、立法与自由》
Vol III: The Political Order of a Free People	卷 3, 自由人的政治秩序
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	《哲学、政治与经济学研究》
Heiner, R.A.	海纳
Hirsch, F.	赫希
Hirschman, A.O.	赫希曼
Hirshleifer, J.	赫希莱弗尔
Hitch, C.J.	赫奇
Hobbes, T.	霍布斯
Hodgson, G.M.	霍奇森
Hoffman, M.L.	霍夫曼

Homans, G.C.	霍曼斯
Iannaccone, L.R.	安勒克恩
Jevons, W.S.	杰文斯
Kahneman, D.	卡恩曼
Kant, I.	康德
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 of Morals	《道德的形而上学基础》
Keynes, J.M.	凯恩斯
Knetsch, J.L.	纳奇
Knight, F.H.	奈特
Kula	库拉
Kuran,	T. 库兰
Lamberton, D.M.	兰伯顿
land, Polanyion	土地, 波拉尼论
Latsis, S.J.	拉特瑟斯
Leibenstein, H.	勒宾斯坦
Leijonhufvud, A., and The Generdl Theory	《普遍原理》
Lewis, D.K.	刘易斯
Loasby, B.J.	劳思百
Locke, J.	洛克
Loury, G.C.	洛里
Luce, R.D.	吕斯
Lukes, S.	卢克思
Lutz, M.A.	卢茨
Lux, K.	卢克斯
Macpherson, C.B.	麦克弗森
Malinowski, B.	马林诺夫斯基

Mandeville, B.	曼德维尔
Margolis, H.	马格里斯
Marshall, A.	马歇尔
Marx, K.	马克思
Maslow, A.	马斯洛
Mauss, M.	莫斯
Mayo, E.	迈耶
Menger, C.	门格尔
Mill, J.S.	穆勒
Miller, D.	米勒
Mises, Ludwig von	米塞斯
Muth, J.F.	穆斯
Nelson, R.R.	纳尔逊
North, D.C.	诺斯
Novak, M.	诺威克
Nozick, R.	诺茨克
Oakeshott, M.	奥克索特
Olson, M.	奥尔森
Omerod, P.	奥米诺德
Parsons, T.	帕森斯
Phelps, E.S.	费尔普斯
Pigou, A.C.	庇古
Polanyi, K.	波拉尼
Aristotle Discovers the Economy	《亚里斯多德发现了经济》
The Economy as Instituted Process	《作为制度进程的经济》
The Essence of Fascism	《法西斯主义的本质》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伟大的变迁》

The Livelihood of Man	《人的生活》
Marketless Trading in Hammurabi's Time	《汉莫拉比时代无市场的贸易》
Our Obsolete Market Mentality	《我们过时的市场精神》
Polanyi, M.	波拉尼
Popper, K.	波普尔
Quattrone, G.A.	科尔特恩
Rae, J.	雷
Raiffa, H.	瑞弗
Rawls, J.	罗尔斯
Reisman, D.A.	雷斯曼
Ricardo, D.	李嘉图
Richardson, G.B.	里查森
Riesman, D.	里斯曼
Robbins, L.	罗宾斯
Robertson, D.	罗伯逊
Ropke, W.	勒普克
Rothbard, M.N.	里斯巴德
Rousseau, J. J.	卢梭
Russell, T.	罗素
Sahlins, M.D.	沙林斯
Schlicht, E.	石里克
Schotter, A.	司各特
Schumpeter, J.A.	熊彼得
Sen, A.	森
Shackle, G.L.S.	沙克尔
Sholes	萧尔斯
Simon, H.A.	西蒙

Sinden, J.A.	辛登
Smelser, N.J.	斯梅尔塞
Smith, A.	斯密
Solow, R.	索洛
Stanfield, J.R.	斯坦菲尔德
Stigler, G. J.	斯蒂格勒
Strachey, J.	斯特雷奇
Swedberg, R.	斯威德伯格
Tawney, R.H.	托尼
Thaler, R.H.	泰勒
Thurow, L.C.	梭罗
Titmuss, R.M.	蒂特马斯
Tocqueville, Alexis de	托克维尔
Tullock, G.	图洛克
Tversky, A.	柴维斯基
Ullmann-Margalit, E.	乌尔曼—玛格丽特
Vanberg, V.J.	范伯格
Veblen, T.B.	凡勃伦
Walras's Law	瓦尔拉斯法则
Weber, M.	韦伯
Weinstein, N.D.	维恩斯坦
White, H.C.	怀特
Williamson, O.E.	威廉姆斯
Wilson, E.O.	威尔逊
Winter, S.G.	温特

后 记

本书分工如下：

吴敏：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

冯仕政：第六章，第九章，第十章

方长平：第七章。第八章

全书由吴敏统稿定稿。

由于水平有限，错误在所难免。凡容易歧义的词语，都保留了原文，方便读者理解，也是就教于高明的意思。

主题精品图书推荐

《资本主义的终结——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女性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J.K. 吉布森-格雷汉姆 著

大32开 定价: 28.00元

2001年10月出版

ISBN 7-80149-689-2/D

本书是有关资本主义霸权的论述,而且反对这些论述。它殊途同归,是迄今为止人受到抑制的有关部门经济多样性论述的出现和发展展开了一片散漫的空间,希望对经济学发明的反资本主义政治会有所贡献。

读者对象:政治学、国际问题研究人员,大专院校师生

《赌场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英] 苏珊·斯特兰奇 著

大32开 定价: 16.80元

2000年6月出版

ISBN 7-80149-283-8/D

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 1923~1998),英国著名国际政治经济专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创始人之一、英国瓦维克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伦敦经济学院荣誉教授,著有《赌场资本主义》、《英镑与英国政策》、《贸易顺差的国际政治》、《国家的退却》、《疯狂的金钱》等书。

本书作者是世界上第一个预言亚洲金融危机的人。书中提出：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已变得像一个巨大的赌场，它使每一个人都毫无选择地被卷入其中。美国是这个赌场的导演和决策者——即便美国没有显赫的军事势力，但是美元在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中的主导地位仍决定了美国的霸权地位。本书重点探讨了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所形成的现代国际金融体系的弱点；形成今天的赌场的原因；美国的国内决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为了避免今后出现全球性金融、债务危机；如何冷却现在的赌场。

读者对象：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教学研究人员，金融证券业人士，理论宣传工作者，党政机关领导干部。

《新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威廉·哈拉尔 著

大32开 定价：28.00元

2001年1月出版

ISBN 7-80050-234-1/C

本书主要介绍美国资本主义企业管理方式的变革，作者认为“旧资本主义”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的，企业的管理方式主要是企业主说了算的“独裁主义”。“新资本主义”则以说服社会为目的，雇员、工会，甚至顾客和客户参与决策和管理。作者还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彼此补长取短，可使各自的经济顺利发展。

读者对象：经济工作者，国有企业厂长、经理

《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法] 米歇尔·阿尔贝尔 著

大32开 定价：17.00元

1999年10月出版

ISBN 7-80149-216-1/D

米歇尔·阿尔贝尔 (Michel Albert)，现任法兰西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法国伦理和政治科学院院士，曾任法国计划总署署长、法国保险总公

司董事长。

该书认为，自由资本主义内部的阉墙之争主要来源于富有魅力的“新美国资本主义”和较为完善的“莱茵模式资本主义”之间的深刻分歧。其中，前者讲究的是个成功、短期金融利润和金融媒体化，包括以美国为代表的讲英语的国家；后者追求的目标则与其相反，包括以德国为代表的欧元区国家。

读者对象：政治、经济界研究人员，大专院校师生

《公共生活与晚期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英] 约翰·基恩 著

大32开 定价：18.80元

1999年2月出版

ISBN 7-80050-326-7/D

本书详细介绍了韦伯和哈贝马斯等西方著名社会学家关于“晚期资本主义”的论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都生活在全是专业人员的官僚主义机构不断延伸的阴影下；官僚主义希望管理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全体居民；由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制度容易受到瓦解和政治化危机的影响。本书是在国际、国内有着广泛影响的当代学术名著。

读者对象：社会科学研究者，理论宣传工作者，大中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

《帝国主义与依附》（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巴西] 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 著

大32开 定价：28.00元

1999年2月出版

ISBN 7-80050-358-5/D

本书主要阐述了与“世界体系论”齐名的“依附论”。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分析了二战后帝国主义的新征和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研究了不发达国家新的依附形式，即工业、技术依附，以及这种形

式对不发达国家经济结构和国际关系等方面的严重制约。这部著作在拉美和国际有较大影响，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和认识国外学者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论述，加深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研究。

读者对象：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研究者，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

《历史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美] 伊曼努尔·华勒斯坦 著

大32开 定价：13.80元

1999年6月出版

ISBN 7-80149-141-6/C

伊曼努尔·华勒斯坦，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社会学教授及费尔南德·布劳代尔经济、历史和文明研究中心主任。

作者为当今世界四大社会思想家之一——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华勒斯坦，他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个历史体系，从其全部历史和独特的具体现实中加以考察。他还认为，应该把整个一体化的资本主义现实描述出来，探讨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领域的表现形式。本书附英文原文。

读者对象：经济学、社会学的研究者、爱好者，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保守资本主义/[英]大卫·雷斯曼著;吴敏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3

(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ISBN 7-80149-795-3

I.保… II.①大… ②吴… III.资本主义经济—研究 IV.F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66524号

·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保守资本主义

著者:[英]大卫·雷斯曼

译者:吴敏

责任编辑:严波

责任校对:闫晓琦

责任印制:同非

出版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10号 电话65137751 邮编100005)

网址:<http://www.ssdph.com.cn>

经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版:东远先行彩色图文中心

印刷: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开本:850×1168毫米 1/32开

印张:10

字数:243千字

版次:2003年3月第1版 2003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149-795-3/D·137

定价:19.00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02-1718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文字與漢字大義與字義，亦即此一類學術研究與漢字學，與已
中區除了大義與字義，亦即此一類學術研究與漢字學，與已
中大區，與漢學研究與漢字學中大區，與漢學研究與漢字學
中大區，與漢學研究與漢字學中大區，與漢學研究與漢字學
中大區，與漢學研究與漢字學中大區，與漢學研究與漢字學
中大區，與漢學研究與漢字學中大區，與漢學研究與漢字學

中大區，與漢學研究與漢字學中大區，與漢學研究與漢字學
中大區，與漢學研究與漢字學中大區，與漢學研究與漢字學
中大區，與漢學研究與漢字學中大區，與漢學研究與漢字學
中大區，與漢學研究與漢字學中大區，與漢學研究與漢字學
中大區，與漢學研究與漢字學中大區，與漢學研究與漢字學
中大區，與漢學研究與漢字學中大區，與漢學研究與漢字學



http://www.pishan.com.cn
ISBN 7-309-07950-4

定價： 18.00元